全视角看美国丛书

# 流氓国家

## ——谁在与世界作对？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著

ROGUE NATION

CLYDE PRESTOWITZ

新华出版社

**全视角看美国丛书**

| | |
|---|---|
| 反恐陷阱 | 12.00元 |
| 谁是无赖国家 | 25.00元 |
| 流氓国家 | 22.00元 |



ISBN 7-5011-6443-6

9 787501 164431 >

责任编辑：尚惠敏
封面设计：伍民力

ISBN 7-5011-6443-6/D·1021
定价：22.00元

# 流氓国家

## ——谁在与世界作对?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著
王振西 主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氓国家/〔美〕普雷斯托维茨著；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

ISBN 7-5011-6443-6

Ⅰ.流… Ⅱ.①克…②王… Ⅲ.美国—研究 Ⅳ.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272 号

京权图字：01—2003—8198 号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
by Clyde V. Prestowitz, Jr.
Copyright © 2003 by Clyde Prestowitz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 L. 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流氓国家**

——谁在与世界作对？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著

王振西 主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31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43-6/D·1021 定价：2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 65895562 65897685

# 目　　录

# 译　者

王振西　张兰琴　刘庆雪　侯松山
张士跃　钱俊德　符成礼　张菁蕾
赵小卓

## 作 者 简 介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现任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他撰写的上一部著作为《商场》(贝塞克书局，1989年)。现住在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市。

# 第一章

#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无赖，形容词—不忠，不亲．不恭．不受制约或不负责任．离经叛道，具有变态的野蛮或无法预言的盒向。

—韦氏百科详解辞典

我们本应像座山巅之城①，让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若我们。

—约翰·温思罗普③总怪

本书故意用了一个挑衅性的书名。我得赶紧声明，我无意将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或其他残暴专制的政权

---

①“山巅之城”系温思罗普语，意思是当年欧洲移民所以甘冒危险，背井离乡来到美洲大陆就是为了逃避腐败世界，他们要设法建立一个有别于旧世界的社会，所谓的“山编之城”，供世人敬仰，让世人仿效。—译者注

②约翰·温思罗普（1588—1649）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许多新英格兰人返回祖国与查理一世作战，但是温思罗普没有离开美洲。——译者注

等同看待。我一向乐于认为我国是一个山巅之城，尽管有时候阴天比晴天多了一点。然而，令我烦恼并促使我用这个书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在内，开始看我们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韦氏百科详解辞典中所说的是一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且具有不可预言的意向”的国家。果然，今天（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说，世界上许多人认为乔治·W·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这并不是关于应该如何处理伊拉克的争论最新发展的结果。请看伦敦《卫报》的报导：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一个最无赖的国家。布什的美国不领导国际社会，而是一心要与国际社会对抗。它不做阳光灿烂的山巅之城……而是一个劲儿地发出民族主义的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忍着点儿。’这话不是昨天报上写出来的，而是2001年春天美国拒绝在关于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时说的。

当时我在国外旅行，在一系列旅行中我采访了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现外国正在疏远美国，其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2001年9月10日下午3点45分，当我准备踏上旅途的最后一程时，我听到了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四点钟航班的最后一次广播，于是加快了脚步。这是令人害怕的“红眼”出现以前下午最后一班飞机了。我很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错过这一航班。于是跑步赶上去，在波音777飞机正要关机舱门时挤进了飞机。在旅行中我到了东京、新加坡、雅加达和植香山等地，参加了一些有关全球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研讨会，并进行了一些采访。作为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我有时候驻在国外，当从报刊上读到和听到说美国与

其长期盟国的隔阂日益加大时，不由得优心仲忡。

这次旅行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担心。美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眼里越来越丑恶。在亚洲，如同过去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我听到对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对美国的恐惧，美国既不履行它自己公开声明的主张，又与其他国家闹别扭。最近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宣布中国是“战略对手”，这一切行动引起了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心。不仅如此，美国宣传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许多亚洲人看来并不能对付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遭到灾难时，美国的资金和银行毫不受损失地逃避了。有的人甚至开始认为全球化就是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我还听到人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其证据就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和友好国家几乎全都通过的情况下，反对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

在赶回家的路上，我陷人了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批评的深思。现在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将显著促进对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行为问题的思考。就在我坐的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有两个来美国访问的普通人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布杜勒·阿齐兹·奥马里从波士顿市米尔纳饭店出发，开车前往缅因州波特兰市南部的康福特假日旅馆。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号召对奥萨马·本·拉丹和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和侦察行动的国家安全指令正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办公桌上，等待总统批准。我于9月11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后，立即驾车回家。这时阿塔、奥马里和他们的哥儿们还在睡大觉。

大约在上午9点15分，我抓起了正在响铃的电话，心想

这是我的助手索尼亚·哈里森来电话告诉我，她已经为我预约了上午看病的医生。不错，是索尼亚，但她来电话不是因为医生的事。她急促地命令说：“快打开你的电视机”。看到突如其来的惊恐场面之后，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心想我精神错乱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受攻击后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治·W·布什总统被问到：“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问题中的“他们”指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人们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布什后来所说的“邪恶轴心”。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却来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们”，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不是对我国的憎恨，而是对我国的热爱。俄罗斯（我们长期的冷战对手）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白宫。他之后紧接着是中国（另一个与美国关系长期不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很快飞往纽约，他是观察“零地带”（即灾难现场）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后，还有许多人来，当然他们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态。但是，不能否认全球广大人民表达同情的诚意。从伦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都淹没在人们献的鲜花丛中。在巴黎，沿塞纳河悬挂的法国国旗均降了半旗。“世界报”以横贯全版的大字标题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

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攻击都不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感伤情绪。仿佛全世界都像美国人一样感受到了同样的无辜损失。尽管存在我所听到的各种批评，世界人民仍然把美国看作是“山峨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着它，因为它有潜力，如果它愿意，它就能像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能够保证希望战胜畏惧。看来，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兴风作浪的恶人。所以全世界

人民愿意与美国人一道哀悼，并下决心不让这种灾难重演。这是对 2001年“ 9·11”不幸的慰藉，它为美国及其友好国家消除过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偷快提供了机会，用前总统林登 ·约翰逊和圣经上的话说，大家“ 机缘相投 ”，步调一致，共同创建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一年半以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伊拉克没有完全履行联合国 1441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和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该决议要求伊拉克交出证据，并不是要求联合国核查人员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寻找证据。美国国务卿科林 ·鲍威尔要求安理会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碟，要求他与联合国合作，否则其政权将被摧毁。

在鲍威尔发言之后，法国外长多米尼克 ·德维尔潘接着发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员，并给他们更长的时间去沙漠中搜寻证据。在一片实际上是空前没有先例的并严格禁止的情感宜泄中，观察员席上为德维尔潘热烈鼓掌。那个周末，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和美国，他们打出的横幅标语将美国称为无赖国家。这样一来，出现新开端的机会眼看着付之东流了。美国与别国不是“ 机缘相投 ”，而是越来越疏远了，我们被别国怀疑，我们也怀疑别国。我们在与世界闹别扭，也与我们自己闹别扭。

2003年春天，我国与盟国最新的争论是伊拉克问题，但疏远美国的根源则更深远，在萨达姆下台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试图向困惑而受伤害的美国人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好像转而反对美国，同时也向外国人说明，他们经常是怎样误解美国的良好动机的。当我冷静地评论美国时，并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亚洲度过了一‘ 1:-中很长的一段时光，可

能比布什总统还厌恶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国社会党人，也不是没有改造的上世纪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国花孩（嬉皮士的一种，常戴花，象征爱—译者著）。事实上，我是一个不适于写出本书的人。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保守僵硬的共和党人和超爱国主义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学毕业后上了斯沃思摩尔学院，为对付校园里势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称其为准左倾分子）观念，我加入了学院的保守派俱乐部，后来去日本留学，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愿报名去越南工作，但却被派往荷兰，在美国驻海牙的大使馆里任负责维护美国越南政策的官员，我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甚至在其他许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持后，我还继续长时间地支持它。接下来我先后在数个跨国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鲁塞尔和东京，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1981年，我参加了里根政府，最后成了商业部长的顾问，在这个岗位上我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与日本签订了数起商务合同，此外还参加了各种其他的国际贸易谈判，期间获得了“贸易之鹰”的美名。后来，我创立了一个非底利性的研究机构或者叫“思想库”，专门研究全球性问题。

正是这些外事工作经验和研究工作使我对我国的前途深为优虑。有时候，我不相信美国是魔鬼或者如同萨达姆一样的无赖。美国好像是一股“恶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动的强水流，使水手们惊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坏。美国是个巨大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对待别的国家向来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与冷漠相处这两种手段。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导下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我担心在美国和其友好国家之间横亘着

的危险鸿沟正在扩大，因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心和看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又认识不到我们有些行为在蔑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在现在，我们常常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看成是由于忌妒我们的成功和强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缘故。这肯定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也许我们还应当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理解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

在许多主要的担心中首先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将之看作是美国特色的“温和帝国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全球化即美国化问题，无论人们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两个相关的问题，各国对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国对外国原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从而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美国对主权、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的看法，同样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诚然，以色列一巴勒斯坦问题不可忽视，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热点。美国和中国将来互为朋友还是敌人，仍然是个问题。的确，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来了。冷战结束之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关系好像起了变化，老朋友之间关系紧张，而老对手之间相互却发现了以前被掩盖起来的亲和力。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社区的恶霸（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语），还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美国是山巅之城。

2002年夏秋两季，我再次访问了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地区十四个国家的首都，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上述问题。所到之处我都觉得美国故意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分离开

来，疏远其他国家，露骨地维护自己的霸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关系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国对北约有很多批评，因为它的某些成员国不支持美国改变伊拉克政权的做法。但是5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北约作为它安全战略的基石。"9.11”事件后，北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引用了该条约的第5条。该条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所有缔约国应视其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并应支持在必要时所做出的军事反应。这一决定（考虑到目前美国对法德两国的行为不满，记住这一条尤为重要）纵然是一致同意的，但从技术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恐怖行动根据北约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装攻击。况且，"9.11”事件后，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不仅提议，而且恳求允许它们派部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行动。然而五角大楼只同意英国派少量特种部队参加，它对其他国家说：“谢谢，不劳大驾了，没有盟国参加更方便一点，我们还是自己单干好，需要时我们会请你们的。”除了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国这一单边主义的表现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做法的普遍反对。一位马来西亚的最高领导人告诉我：“照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美国人谈论“志愿者联合”、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总是与防止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明确战略联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吓唬世界人民，迫使他们考虑他们最好还是回到丛林中去，或者永远也不要离开那里。对美利坚帝国—或者中国人称作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被“支持我们或者不要介人”的花言巧语闹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鲍威尔的要挟性言论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萨达姆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无赖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为人们害怕萨达姆，但更害怕美国。

赞洲的长期领导人、美国坚定的老朋友艾蒂安·达维隆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面强大，它用广泛划定自己国家利益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吸引别的国家趁机照美国的办法划定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建立全球机制、公理和法律规范方面更是如此。现在美国又全面强大，而世界再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塑，但这次美国没有对任何人说，它打算放弃半个世纪以来所创建的机制，转而去保卫美国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且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借口。另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三边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裁彼德·苏瑟兰在另一次交谈中说：“美国不再支持它曾经大力提倡的多极化了。”另一个欧洲人、前欧盟驻美国大使胡戈·佩曼指出：“在国内，美国有很好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完全没有准头，美国的钟摆可以很快地从这一边倒向那一边，我们这些深受其影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受其影响。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美国的动机通常都是好的，但其行动则经常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空想或追逐某种利益，它可能对我们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者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就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从北朝鲜和中共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36000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人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

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

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是，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它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有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然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儿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儿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人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

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的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是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

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于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的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爱昧。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

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8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者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美国工业界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军事开支会延缓经济的发展。上海一位官员对我说：“我们希望向美国卖东西，而不是攻击它”。其他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在内都指

出，主观想象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硬把中国当敌人看，那么它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至于台湾问题，许多亚洲人士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了三十年“一个中国”政策后，美国改变作为整个美中关系的基础的立场，将会损害该地区的稳定。即使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独立，也不太担心共军人侵。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人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仅在上海市就有近50万台湾人定居。我采访的一些亚洲人惊奇地问道，是不是美国真的需要树立一个敌人。

许多外国领导人还指出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其他缺陷：言行不一，目中无人。他们指出，1979年以前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1979年苏联人侵阿富汗并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傀儡政权，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扇动伊斯兰圣战组织起来反抗，为阿富汗游击队包括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打苏联人。苏联一撤出阿富汗，美国人对阿富汗立即失去了兴趣，当塔利班强迫阿富汗妇女离开学校、离开工作岗位并佩戴面纱时，美国一言不发。现在美国又对阿富汗十分感兴趣。从这一角度讲，美国是不可信的，自私自利的，不讲道德的。

美国类似的口是心非还表现在全球化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如同它的地缘政治存在一样是抹杀不了的。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是全球化的设计大师，它鼓吹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利己主义、非条例化和相互依存。当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面临困难时，美国及一些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贷款，条件是停止财政补贴和“任人惟亲的资本主义”。在与日本、韩国和欧洲没完没了的谈判中，美国官员坚持要终止对所谓的敏感物资进行保护

和补贴，并要求开放大米、牛肉、桔柑类水果以及大量其他产品的市场。美国在鼓吹“贸易不是援助”的时候，强调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发展和强大的最佳途径。

2001年，美国对进入美国的钢铁加征紧急关税，使世界其他国家非常失望。甚至更无理的做法都被说成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声称，钢铁是在进口倾销中遭受损失的敏感物资。全世界许多受到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威胁和要挟的人只能一笑了之。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农场报单显著提高了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补贴。在这里，请看加征紧急关税和进行补贴对别国带来的后果，饱受危机折磨的巴西出口的近75%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巴西人惊叹道：原来这就是“贸易不是援助”啊。墨西哥的情况更糟糕，尽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的限额使墨西哥的大部分白糖根本进不了美国市场。现在，墨西哥的糖业工人失业，墨西哥软饮料的用糖已被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的甜玉米产品取代了。

与贸易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一直是过去20年来大量谈判的课题。美国作为使世界气候变暖的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源，一直是这些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大家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可能的程度和影响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此表示了谨慎的关注，但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以前，反对规定数量指标。1992年，美国保证按里奥条约采取措施延缓气候变暖，但仍坚持超出协定规定的减少排放量的定额或特定指标。后来，到2001年3月，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关于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了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切条约。

这一行动虽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遭到广泛谴责。大家特别指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仅因为可能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就不愿与其他国家一道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办法来延缓严重的环境恶化。

2001年 6月 14日，布什总统前往瑞典的哥德堡，参加与欧盟 15国元首的会面，在当地受到数百名示威者的抗议，瑞典首相约兰 ·佩尔松代表欧洲领导人对记者讲话时说，美国正在推行一条“ 可能危害环境的错误政策 ”。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任何问题上的隔阂都没有在以色列一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隔阂那么大。对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亲密朋友和盟国。千百万美国人作为旅游者到过以色列，数十万美国人—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原来就住在那里或者有朋友和亲戚住在那里。对许多犹太裔和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地方。美国许多科技公司在以色列的尖端工厂中有大量投资。近 40年来，美国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保护国和财政支持国。不仅如此，+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把以色列人反对恐怖分子自杀性爆炸的斗争看作如同它自己反对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样重要。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的动乱，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取代已经当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即亚西尔 ·阿拉法特），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国却表示，根据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与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来的包括亚西尔 ·阿拉法特在内的任何领导人打交道。其他国家尽管也谴责自杀性爆炸，但同时指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近 40年的占领，在过去 10年中，以色列在占领区的定居点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增加。许多人讲，这就招致了一种普遍的内心的不满。有些人还将此与 19世纪和 20世纪初叶美国拓荒者建立定

居点时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做法相比较。2002年夏天，一些外国领导人在与我交谈中强调说，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动乱，却只字不提以色列定居点问题，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会起反作用的。

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更大范畴。在最近去东南亚旅行期间，我发现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态度在迅速地走向激进。战略上重要的和传统上是自由伊斯兰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与中东有重要的联系。几乎没有哪次交谈能够避开巴以纠纷。每天晚上，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一起出席鼓舞士气的集会和以色列人用美国武器攻打巴勒斯坦目标。结果，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得出结论说，美国自己在攻打伊斯兰。在欧洲，形势不那么感情化，然而巴黎的一位外交官对我说：在法国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让我国政府拿安全去冒险”。

有些国家，其中许多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几乎完全与美国的观点相反。他们是傻子？是懦夫？是腐败分子？真要是那样倒好了。可是事实却是我们是常常和大家合不来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自身块头太大，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别人，还因为我们很强大，使我们觉得我们的标准或者我们的观点是主导全球的或者应当主导全球。因此，眼界狭隘，抱着英里、英寸和华氏温度不放，而世界其他国家早就采用了更简便的度量公制。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太强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惟美国马头是瞻，结果就使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

世界其他国家小心谨慎地看待美国，并重视美国的观点，

而美国人却经常觉察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观点存在。即使觉察到了，它也不在意。最使外国人受刺激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而是隐藏在政策背后的东西。

而且，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我们的使命感和自以为是使我们很难听进去别人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认真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需要，我们一向认为没有谁有许多值得对我们讲的东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告诉我们会令人不愉快的真情，因为害怕惹恼我们。我们是何等的闭目塞听，只要看一下2002年由“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性大规模民意测验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这一结果证实了我在旅行和采访中所听到的东西，形象地说那就是，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的大水库依然存在，只是其中的水浅多了。具体说，有两点发现对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十分重要。当问到美国在制订政策时是否考虑到别国时，75%的美国人说“是”，而在几乎每个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却说“不”。第二个问题是要求被询问者给出他们对美国人作为一个人的看法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看法。答案表明，对美国人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好一点。例如，在约旦，25%的被询问者对美国的看法较好，53%的人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在整个中东，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与此类似。这似乎说明，外国人比较喜欢美国人，而不大喜欢美国的所作所为。

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用意高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9·11”攻击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大侦探去从周围的蛛丝马迹，甚至是摆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桌上的材料推论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有，我们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应当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拿越南来讲，法国人在我们之前遭到惨败，但他们是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们在德国进攻面前失利后，不是没有放弃吗？此外，我们并不打算重建什么帝国。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是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而战一，并企图阻止失败的多米诺效应。这里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明白，民族主义和独立是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大家本应当明白这一点，但因为我们不关心它，所以也不明白。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时有亲身体验。我学了两年日语，成绩尽管不是顶尖的，但也不错。有一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我用日语询问问讯室服务员一个问题。她用英语回答说她只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转向我的中国夫人（她不会说日语），告诉她对服务员说些什么。当我夫人用日语重复我刚才的问题时，服务员立即用日语作了回答，给了我们所要的信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该服务员知道外国人不会说日语，于是当不像日本人的人说她的母语时，她就听不懂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美国人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别的国家一贯正确。就拿京都议定书来说，我们本可以拿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布什政府的立场，、然而我们不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甚至承认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而是企图发号施令，这常常坏了我们的事，即使我们有正确的理由也是枉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我们的单边主义做法可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修改后的协定上签字，而这个协定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如伊拉克和反恐问题—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努力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即我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我们才应该矫枉过正，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多边行

动，以便将我们不能避免的阻力减至最小程度.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反正他们也不能伤害我们。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他们能够伤害我们，办法多的是：例如，在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情报方面不合作，不为美国的远征部队提供中转设施或飞越领空的权利，或者抵制美国货抑或推销其代替品。实际情况是，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和如此之危险，美国完全不能忽视自己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情况，或者误解别国的作用。里根总统重复约翰·温思罗普的理念说：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要像别人看我们那样来认识我们自己，并要做出决定，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还是希望成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人。

您在阅读以后各章时要记住，所做出的选择，不仅对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对美国自己，以及对维护我国的驻外使馆在'9，11'事件后淹没在鲜花丛中的那种理想有何意义。还请记住第二点，也是温思罗普训诫中常常难以说出口的话：“如果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对上帝不诚实，上帝就会撤销它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新闻报导的题材，就会臭名远扬。我们将会给敌人以口实，让它诽谤上帝和所有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将会使许多上帝的信徒丢脸，使他们的祈祷语句成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无地自容。

# 第二章
# 不被人承认的帝国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负载着世界自由之舟。

——赫尔曼·梅尔维尔

波托马克河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山间狂奔而出之后，河面豁然变宽，舒缓地弯向汇人大西洋前的最后一个航段。美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华盛顿，就坐落在这个航段的岸边。它宽阔的街道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延伸，环形交叉口、雅致的纪念建筑物和城市广场星散其间，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些许欧陆风情，展现出了它的原设计者，法国城市设计师皮埃尔·朗方的美学风格。它的规模与质朴，使得它与其它大国的首都相比别具一格。该市的人口不足60万，面积仅为68.25平方英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不许建摩天大楼，按世界标准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既没有纽约或洛杉矶那么强的影响力或令人叹为观止的辽阔地域，又没有巴黎的辉煌，也不像东京或伦敦那么密集交错，但市内众多的公共建筑和纪念建筑物的希腊与罗马风格，却将它与昔日古典主义的荣光，具体而言，是与伟大的共和国与共和制，而不是与帝国和帝国传统联系在

了一起。

这座城市的雕像与纪念建筑物，纪念的是那些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们，其中不少都不是美国人。乔治·华盛顿的挚友，美国革命事业处于黑暗时期之时在福奇山谷给了他极大鼓舞的拉裴特侯爵即来自法国。他从自己所在的公园，放眼跃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可以将对面的白宫尽收眼底。当然，杰裴逊、华盛顿和林肯这些伟大的开国元勋和拯救者有着专门的大理石纪念堂，纪念堂的墙壁上铭刻着他们各自的讲话。在华盛顿，人们将敬意投向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原则和思想。这些政治家和哲学家均是支持众生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者。这里没有为征服或征服者而设的纪念碑，没有凯旋门，没有勃兰登堡，没有白金汉宫，也没有紫禁城。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念碑，所纪念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惟一输掉的那场战争。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天神情肃穆地走下倒映池附近越南战争纪念碑那平缓的斜坡，到镌刻着阵亡将士名单的黑色花岗石上去寻找朋友、儿子、女儿、妻子或恋人的名字。没有哪位陆、海、空军的将官能吸引得住如此不尽的人流。在北京、维也纳或罗马，人们情不自禁感到的是对帝国传统的骄傲，华盛顿的外表展现出的却是一种谦逊和素朴，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为建成帝国中心而设计的。

从越南战争纪念碑漫步几个街区，踏上宪法大街朝国会大厦走去，您就会见到左侧的椭圆形公园，从那里可以看到白宫的后面。白宫虽然绝对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官邸兼办公室，却没有那些地方通常所有的那种气派，与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华盛顿湖畔为自己建造的6.　　6万平方英尺的豪宅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它的庭院和园圃景致秀丽，管理维护得也非常好，但跟洛克菲勒在波坎蒂科山的庄园或天皇在东京市中

心深壕环绕、树木成林的城堡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更不足以为道的是白宫那些办公室。我第一次去参观椭圆形办公室时，不禁为它如此的狭小而震惊。如今大公司大多数总裁的办公场所都比它要大。白宫内其它办公室简直就更是小得可笑了。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的房间好容易才放下一张茶几和一把来宾坐的椅子。他副手的办公室只放得下一张办公桌。看来白宫显然从来不准备建成一座宫殿。

我们美国人从小就受到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教育。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之所以来到这片土地，就是为了逃离欧洲君主制与帝国的压迫、腐败和强权政治。是拉尔夫 ·沃尔多 ·爱默生那些“ 从戎投战的农夫 ”，康科德和波士顿那些召之即来的民兵，以及那些弃耕猎于不顾而赴蒙茅斯和约克敦投身在华盛顿麾下的志愿者从英帝国手中燕得了美国的独立。言辞坦率的本 ·富兰克林虽然没有穿欧洲宫廷的奇装华服，没有沿袭欧洲宫廷的礼节礼貌，却智胜了法、英两个王国的政府，扩大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土，保障了自由的推进。对这些早期的美国人来说，欧式常备军以及这些常备军似乎需要的那些“ 缠人的盟友 ”（杰裴逊语），是一种需要避开的危险，这已成为他们的信条。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民军的传统，每逢紧急情况即把民众召集起来抗敌，危机一结束再将其遣散。对美国人来说，帝国这个字眼意味着征服和违背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外邦，它所代表的是旧世界的邪恶本质，与美国以之为建国基础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正是我们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将之消灭的东西。

随着美国势力在 20世纪的增长，“ 不情愿的超级大国 ”这一概念也有所发展。历史学家欧内斯特 ·梅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十分精辟。他说，“ 有些国家的大国地位是挣来的，美国的大

国地位是送上门来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并不谋求扩张势力范围或领土，它只是在被迫维护自己的势力，而且是为了保障和平与捍卫民主的崇高目的。美国两党的领导人对此看法均有过清楚的解释。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美国不是从它具有获取并维持对他国霸主地位能力的角度，而是从它具有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与他国共同协作能力这一角度去界定自己的实力—实际上即它的伟大。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在大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补充说，美国是“第一个非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也不甘落后，1999年秋天，他对加利福尼亚的听众说，“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有此机会却将它拒之门外的强国—因为伟大比强权更诱人，正义比荣耀更可取。”在这一点上，布什无疑和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三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6月1日，已当上总统的同一位乔治·W·布什，在对西点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班学员发表讲话时却改变了看法，彻底推翻了美国两百年来的战略原则。讲话伊始便不乏先兆。他说，“美国既没有帝国要扩大，也没有理想国要建立。”“我们期盼他国得到的，”—他认为—“只是企盼我们自己得到的那些：不遭受暴力的袭击，获得自由的报偿，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布什接着却强调指出，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威慑与遏制防御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依然适用，但“新的威胁也要求有新的思维。”他接着说道：“我们必须到敌人那里去打仗，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要去对付它。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通向安全的惟一道路是行动之路。”

第一个行动不到两周就到来了。6月13日，美国正式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接着，9月20日，如今被正式宣布为“先发制人”的新原则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这种报告是每个总统均须提交给国会的文件）中更加彻底地得到了完善。报告开始即称，美国决不会用它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强行获得单方面的优势，而宁愿建立对人类自由有利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只有那些致力于“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并保证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未来得到保障。”报告接着指出：

> 任何地方的人都想畅所欲言，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有信仰自由，能让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男还是女—受到教育，拥有自己的财产，享受自己的劳动效益”二这些自由观是正确的，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保护这些价值观不受敌人的践赌，是爱好自由的人们共同的心声。美国将利用这一时机，将自由的好处扩大到全球。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有关人的羊严的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以法治国，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羊重妇女，容忍不同的宗教与种族存在，羊重私有对产。

文件至此并无什么不正常的内容，但接下去说明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的办法。总统说，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有必要，还会通过“先发制人”来保卫自己。为了防止有人不明白这一点的含义，文件在结尾处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去劝阻潜在的对手，让他们不要怀

着超过或与美国势力并驾齐驱的希望去搞军事集结。”换言之，我们现在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希望处于这种地位，并打算将其一直保持下去。

这种新的优势说与先发制人进攻原则的突然提出，不仅使美国多年来实行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逆转，而且还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根基。三百多年来，该条约一直支撑着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国际体制。这一条约本是为结束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签订的，作为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它承认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一国不能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布什的理论似乎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又与纽伦堡审判中将“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战争罪论处的结论相悖。联合国宪章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这一新政策虽然出乎世人的意料，实际上却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苏联在老布什政府接近尾声时垮台，美国防御机构突然面临一个存在判断的问题。在没有“邪恶帝国”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继续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分布广泛的军队并给予其预算支持的意义究竟何在？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要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为新的美国防御战略拟订指导方针。鲍威尔在1992年初向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曾对新战略有所暗示。他说，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去“制止任何梦想在世界舞台上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挑战者。”他还说，“我想成为街区的霸王，”这样，“试图向美国武装部队发起挑战就不可能成功了。”1992年3月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新国防规划指导方针认为，美国防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再出现新的对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使盟友和对手都相信，“他们不必力求发挥

更大的作用。”先发制人的力量若是一种选择，美国就要保持规模可观的核武库，同时还要劝导其它国家削减或放弃自己的核武库。最后，新的指导方针暗示，未来的联盟将是“临时的权宜性组合，常常不会延续到所对付的危机以后，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般性地赞成要实现的目标。”

这份文件草案的透露，激起了猛烈的批评浪潮。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试图让切尼置身事外，称这份文件是“底下拟的一个草稿，”国防部长尚未过目。1993 年 1 月，五角大楼最终公布了一个口气较为和缓的文本。不过，那时公布已无异于告别之举，因为老布什给新的克林顿政府一让位，后者很快就将新方针搁置起来了。现在，九年过去之后，小布什政府又把它从搁架上取下来，作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采用了。

此举或许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上个十年，相当可观的一批先驱就在为新生的美帝国标划航程了。《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布特要求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朗，或许还有其它地方，并且要在那些地方强行实行自由民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和波恩所做的那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后来成了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金斯 1997 年写了一本书，题名为《不情愿的治安官》。到了 2002 年夏天，他却在说，如果不得不重写这部书，他会把书名中那个形容词删掉。保守的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断言，“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即便舆论和我们所有的政治传统观念都不赞成这一想法。”

美国的新战略文件出台后，这种新秩序的最佳写照或许可见于 2002 年 10 月底的墨西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各经济大国首脑齐聚洛斯卡沃，参加与一年一度环太平洋主要企业领导人总裁峰会相关的协商。在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举行的

闭幕晚宴上，总统与总理们坐在大厅一端的高台上，演员们在另一端的舞台上唱着舞着，实业家围坐在两者之间的圆桌旁。由于是在墨西哥，不到晚9点就别想开宴。我朝高台上瞥了一眼，发现许多领导人其实都在受罪。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已经76岁高龄了，前一天刚从北京赶到。他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样，显然都还没有克服时差引起的不适，其他人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疲劳。布什总统是当天早些时候乘“空军一号”从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牧场来的。由于只有3个小时的航程，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他坐在末端，紧挨着越南总理，看样子不像在交谈。实际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没说话。到了10点，饭还没有上。我们坐在企业家桌旁的人把餐前饼干都打扫光了，还喝干了瓶子里的水。我正思忖（以早睡闻名的）布什是否能挺过整个晚宴时，他站起身就出去了。他得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6点钟能起来到海滩上去慢跑。我敢肯定，墨西哥的官员们事先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总统可能会提前离席，可企业家们肯定无人相告。他们注意到，美国总统虽然走了，江泽民、小泉及其他人却都撑到了最后。一位墨西哥的企业经理评论说，“布什以为他是谁，是皇帝？”

## 帝国的面貌

这个问题问得有多好，可能连这位实业家自己都没意识到。我敢肯定，布什并不认为自己是皇帝。帝国本来是欧洲人、中国人或日本人的所有物，而不是美国人的。不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很可能就是只鸭子。当然，美国没有多少块像昔日的英国和

日本那样传统的直接殖民地或领地，但帝国的衡量标准还有它的能力—形成影响的能力，迫使或诱使他人听命于己的能力，制定与强制实行规则的能力，以及建立社会规范的能力。如果看一看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鸭子的形象就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了。

美国的航空母舰“小鹰”号通常从它在日本的母港横须贺驶往西太平洋巡逻。这艘航母不单是一条军舰，它更像是一座浮动的核动力城市。它长1100多英尺，高度相当于一座20层高的楼房，飞行甲板宽250英尺。这个庞然大物除了能装载70架现代化飞机外，还能装得下近6000名船员、飞行员和机械师。不管它驶向哪里，都有一艘装备有可击落来袭导弹的“宙斯盾”号巡洋舰相伴，另外还有几艘护卫舰和驱逐舰，一两艘猎潜艇和补给船相随。“小鹰”号的航行时速为30多海里。为了支援美国袭击阿富汗，它曾12天航行6000海里，从横须贺赶往印度洋。这是一种军事能力真正令人生畏的大集中。

像这样的航母战斗群，美国有13个。其它国家却连一个都没有。美国无论是在轰炸机、弹道导弹、战略潜艇、激光制导炸弹、低空巡航导弹、无人驾驶飞机方面，还是在武装直升机方面的优势都大致如此。不仅如此，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还分别驻扎在遍布全球的700多个美国军事设施内，其中欧洲驻有美军12万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9.2万人，北非、中东和南亚3万人，美国以外的西半球地区1.5万人。美国的国防开支占世界所有国家国防开支总额的40，而且还在上升。美国的军费相当于位居其后九个国家的总和。单就军事优势而言，全世界有史以来独此一家。

从经济上看，美国几乎同样鹤立鸡群。它的国民生产总值

为10万亿美元，占世界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30%还多，比位居第二的日本多一倍。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算上新加人的国家虽然可达约9万亿美元，但它不是一个国家，只能在有限的领域与美国平起平坐。即便如此，美国在经济上也大于整个欧洲，是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的4倍。在市价方面，中国的经济只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10，俄罗斯的还不足它的一半。即便由于最近技术泡沫破灭，美国的市值损失了7万亿美元，但美国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仍占全球市值的36%。更重要的是，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比其它发达国家快50%。另外，以上数字都还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随着它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资产计价、生产率增长诸方面所占份额的继续攀升，美国经济将会显得更加突出。其结果之一便是，即使减少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军队已经占压倒优势的规模和力量照样还将增加。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和它在知识与文化方面的优势。美国在研究与开发上的开支，占全球总额的40%多。在医学与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美国的花费大于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世界85%以上的计算机在靠微软的视窗软件或Unix软件运行，用的是英特尔或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软件与系统集成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微软、奥拉克尔、EDS和IBM等几家美国公司手里。新医和新药的开发绝大多数也是在美国完成的。全球所有因特网通讯的近75%在传输过程中的某一点上都要通过美国。美国电影占欧洲票房收益的约85%，整个全球市场的80%以上。最近在2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十部最佳影片调查表明，在可能上榜的220部片子中，美国片占了191部。

这样的优势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大不列颠在帝国

顶峰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赶不上美国，它的国防开支比俄罗斯和法国的都少。在文化方面，英国的优势也接近不了同等比例。法国人就不把鱼和油炸土豆条当正餐，也没有对英国娱乐趋之若鹜。相比之下，就连罗马帝国也相形见细。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只是在地区范围内活动。若要与历史对比，当年的波斯帝国倒可以与今日的美国相比。中国在历史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许比美国更高，它的技术大概也更先进。

然而，大而强且具有影响力，未必就是帝国主义，即便是，帝国主义也许是个魅力问题，不是个高压统治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力量至少以三种方式让人明确感觉到了，即：压力、魅力和说服力。

压力当然是最直接的方式。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它引起了怨恨。2002年6月13日，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从美军在汉城市中心的基地开着装甲扫雷车去市郊的教练场。他们走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通往目的地最不可取的一条路线。在高速驱车转过一个看不见另一头的拐弯时，他们撞上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两个女孩在人行道上正走着，就被碾到了车轮底下。按照与韩国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美国军人不能由韩国当局调查，而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11月底，两人双双被判无罪，调离了韩国。

这一事件在驻韩美军军事存在史上称不上绝无仅有，但发生的时机却很引人注目。这两名军官被无罪开释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前两周。判决一公布，5万名抗议者立即走上了汉城街头。他们的怒火为卢武铉的竞选运动大助了声威。卢武铉是一位自学成材的民权律师，当时正在讲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反对美国对北朝鲜的政策，主张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结盟条款。卢武铉的对手李会昌则主张坚持结盟传统，坚定地走美国路

线。近60%的二三十岁的韩国人都投了卢武铉的票，使他得以胜出，同时也使华盛顿对韩国的反美主义产生了担忧。卢武铉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的年轻人对于当美国的附属国感到愤慨。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韩国是一个勇气十足、勤奋、独立的盟国，但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都是美国的一个附庸国，而且不是惟一的一个。跨过朝鲜海峡，90英里以外就是日本。几年前，日本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小泽一郎就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号召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肯定没有意识到日本是个非正常国家，但小泽恰恰认为，日本也是美国的附庸国。它和韩国一样有不少美军基地，也和韩国一样不断出事—人被车撞，居民和美国兵打架，当地妇女遭奸污等等。然而，日本地方当局调查与审判美国军人的能力却受到限制。关于此中的关系，我了解的最确切的实际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去东京之时。副总统的座机需要一个零件，这个零件须从境外运进日本。有人问，我们飞这段航程是否需要征得日本人的同意，负责的军官马上回答没必要报批，因为“那是我们的空域。”

经美国人起草的日本宪法禁止日本进行战争，它的“自卫队”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安全条约都是单向安排。美国答应在这两个国家遭到进攻时保卫它们，对方却没有保卫美国的相应义务。万一发生战争，韩国的军队可以由美国指挥，日本军队实际上和韩国军队处于同样地位。

但是，主权这一问题并非仅限于军事事务。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试图独立发起救援东南亚国家的行

动，不料却因美国财政部的反对半途而废了。韩国则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重建经济，而该组织受美国财政部的影响甚深。小泽揭示出来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坐下来玩牌时，日本人带来的不是一副全牌。

在这个问题上，惟一令人安慰的是，日本并不孤独。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说，“哪个欧洲国家都无法拥有—或者说并不真正想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是当前存在的事实，只是在外交上未公开承认而已。它们在当地虽然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但仍属于依赖型国家。”

同时，美国的力量又很有魅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头一个方面与卓尔不群和企业家的回报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虽然问题成堆，但无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对来者不拒，根本不问原籍是哪个国家。事实上，不少大学都从外国招生。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时刻都有约60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经过这么些年，毫不夸张地说，已有数百万名外国留学生拿到美国学位。在伯克利或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牌院校，许多理工科研究生计划又吸引了本院的大多数外国留学生。

美国同样是世界企业家的圣地。在提供资金与培育好的想法方面，硅谷完全不讲国籍。例如，2000年在硅谷所建的公司，40%以上是印度企业家创办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在自己本国创办了大企业。这种办法对企业家本人好，对美国好，对印度也好。如果你向往的不是创办公司，而是打棒球，或者是往篮框里塞篮球，美国依然是你理想的选择。

魅力的第二个方面不大关乎卓尔不群问题，更多的倒是与说服力有关。我们以所有国际公司中最为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以其200亿的销售额和2/3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而论，

它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它不但不能，反而是忧愁多多。为了不断吸引投资者和英才，它只有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发展到可口可乐那么大的规模，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待到渗透进世界市场很大一部分之后，你又要开始考虑何处为增长点。所幸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仍有好多人在喝茶或是喝水。“口渴虽然没办法制造，口味却可以……”所以，可口可乐公司拿出它巨额收人的一部分用于广告（常常利用美国成功的形象），目的是使印度人或印尼人相信，可乐是世界性饮品。喝茶或许对你更有好处，可是茶跟美国成功的形象不沾边，所以世界各地不断有人改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也因此而不断发展。

通过军事实力、不平等条约、卓越的才智、企业家的报偿和容易为人所接受的劝说，美国已对全球建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管统治。因此，对于我那位墨西哥商界朋友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管布什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人，他就是皇帝。

## 帝国的生成

美国虽诞生于对帝国的反抗之中，但它从一开始即埋有自身成为帝国的种子。17世纪初，冒险到新大陆来建殖民地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命运而来。与约翰·史密斯船长一同奔赴弗吉尼亚的冒险家和手艺人寻求的是财富，与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去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寻求的是天堂。从那以后，这两股力量就一直在驱使着美国人进行扩张。

首先，在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内心深处就存在着一定的两重性。一方面，华盛顿和杰斐逊发出警告，要提防缠人的盟友。

大家都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表示过，“美国到国外不是为了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她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但是，梦想有个“自由帝国”的也正是杰斐逊。他大胆地购置了路易斯安那属地，把国家的版图扩大了一倍，还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们要大到即便不能覆盖南美，也要覆盖整个北美。”亚当斯对他的想法表示赞成。他说，“神圣的上天似乎往定要让北美由一个国家的人居住。”实际上，对外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态度和扩张主义精神，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就叫做“美国例外论”。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同于普通类型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就认为整个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再沾染依赖的习惯或采取旧历史中那些民族的方式。同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并逐步开始认为自己—用本章前面引语中的话来说—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假如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美国就是希望之乡了。美国人必须创立一个两边都是海的大陆国家，这一说法被命名为“上帝所命论①”。1885年，上帝所命论已成为现实。当然，这一现实是以墨西哥和美洲土著人为代价换来的。前者在美国人挑起的战争中丧失了一半国土，后者几乎被完全灭绝。这一现实当时不知怎么无人注意到，反而披上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谓的“扩大自由区域”的外衣。

①上帝所命论—美国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是上帝指派去建立模范社会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意图。上帝所命论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译者注

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淦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人战争，目的是为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实行民主”。他搞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分子造成的。但实际上，反对派参议员是美国殖民地扩张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拒绝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例外论之争。威尔逊就算输了第一轮，可还是为该世纪下剩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与框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和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

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崩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

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

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 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 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 ·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 ·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商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 ·弗里德曼所言，“我们既想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也想扩大我们的比萨饼店。”按照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作用就是要在“各个重要的全球性网络中发挥中心作用，”这些网络要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影响力，使我们能与他国一道为和平⅃ 人权和稳定做出努力。”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所采用的战略，就成了为达到“创造国际环境”的目的，以有助于推进“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方式进行“交战”的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的当选，起初还预示着要采取新的方针。竞选期间，布什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是个傲慢的国家，人家就会那样看我们。我们如果是个谦逊的国家，. 人家就会尊重我们。”另外，他还主张减少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多种义务，并发出过不要搞“建国”的告诫。但是，刚一迈进新政府，他对中国的叫法就从“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并急切地重

新强调了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不过，不管潜存着什么新方针的可能，肯定都被 9月 11日发生的事给抹掉了。 9月 20日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这位总统说，“ 自由本身正在遭到攻击。 ”在 2002年 6月发表的西点讲话中，他谈到了要倡导我们的人类进步模式，但要“ 以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宗教的容忍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为基础。 ”他还说，“ 只要我们用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代替贫穷、压抑和怨恨，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推进公正的和平。 ”布什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说就等于宣布自己为一方的皇帝，而对他的“ 承认 ”，用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 ·尼布尔的话说，我们“ 避之惟恐不及 ”。

## 帝国的精神

. .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命定不会有多种盒识形态．而是一种。 ”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国是惟一一个国名后缀有“ 主义 ”二字的国家。“ 崇美主义 ”算得上是一个熟悉的字眼（不过，听到更多的是它的反义词“ 反美主义 ”，但从来没听到过“ 反日主义 ”或“ 反德主义 ”）。其它国家一般都是遗产社会，它们的身份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和遗产。美国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理念之上的。一个人要想成为美国人，就得在爱默生称为“ 宗教经历 ”的过程中改信那些主张。正如英国作家 G'K·切斯特顿所指出的那样，“ 美

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建立在某种信条上的国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得更深刻，因此我们用他的话做了本节的引语。该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有限统治。由于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新社会而辛勤耕作的选民，所以他们在这些价值观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从上帝到足球，可能全都各不相同，但是却无人对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产生质疑。

“9·11”事件发生后，似乎凡是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挂起了美国国旗，所有的演讲都以“上帝保佑美国”告终。因为刚从国外回来，我知道这种做法会让外国人觉得多么奇怪和不悦。爱尔兰共和国军的恐怖分子在英国发动袭击，或者说，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在法国，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在日本发动袭击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国旗满天飘，他们的首相或总理也没有要求上帝给予特别的保佑。难道美国人以为他们比别人神圣吗？不，但他们敢肯定，他们的理念比他人的更好、更神圣。关于这一点，布什总统表达得非常到位。他说：“遭到袭击的是自由本身”—不是世贸大厦，五角大楼或者美国，而是重要得多的东西：自由，信念，真正的信仰，惟一能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希望的东西。

美国人相信崇美主义具有普遍性，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更好，更神圣，就该当领导者。这种信仰的好处在于，这是一种超凡的信仰，任何人都可以加人，无论你是否有其它信仰或加人了其它团体。实际上，美国人对自己的帝国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打心眼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美国人，他们目前的国家或文化团体是一种可悲的偶然，但又是可以转化的。爱默生写道，美国将会是“人的第一个国家”—是个人

的，而不是国王或各个阶层的第一个国家，但不会是最后一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他人的引路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也想跟从。美国领导人说要在全球促进自由的传播时，他们心中想的是崇美主义的传播。

这一信念从许多方面看都无比诱人—不亚于平等的主张。在美国人的信念中，平等并不等于平等的社会地位或同等的报偿，而是同等的机会。最早到新大陆来的殖民主义者是为了致富，信念向它的信徒们预示着永远都会有同等的机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言，“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进新大陆那时起，美国就成了机会的代名词，美国人民则从不断扩张中找准了自己的基调。这种扩张不仅是开放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美国人旺盛的精力，将不断要求有更广阔的施展领域。在我国大部分历史上，美国一直是对新来者开放的，而且一直是才能、商业技能和辛勤工作可望得到公平（或者说更好）回报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比较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时曾这样写过：在日本，一切都在禁止之列，除非得到特许；在美国，则是一切都允许，除非被特别禁止。这种自由，或许比政治自由更使美国对移民有吸引力，更能使美国成为全球许多人的希望之源。除了这种吸引力之外，还有我们的容忍态度和我们这个移民社会的包容性。只要你坚持这种信念，你就几乎可以心想事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有信奉其它宗教的自由。尽管也有别的担优，但开国时坚持政教分离，的确是天才之举。它保证了宗教的活力与权力。欧洲的国教和贵族统治集团与专制政府已混同一气，难分彼此，并逐渐开始消亡，美国独立的教会却方兴未艾。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是宗教观念最深的人，这话到今天都千真万确。在任何一个周末，

一多半美国人都会去某个礼拜堂。相比之下，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只 1000^20% 的人去教堂。在这方面，美国与穆斯林社会倒更加相象。

美国宗教生活的基调一直是由新教各个教派来定的。这些教派强调个人以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严格遵守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建立的道德规范。因此，说教习惯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很盛行，尤其表现在美国对其它国家的看法中。

这种对宗教的笃信与对平等机会的那种万事皆可行精神的结合，产生的结果有好有坏。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强有力的结果是人才兴旺。这一点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使它在技术、医学、艺术和大学教育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美国不但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在全世界最富的人中占绝大多数，在慈善捐赠方面迄今为止也位居榜首。一些名牌大学，如斯坦福、哈佛和耶鲁，都得益于慈善家的乐善好施而存在。安德鲁·卡内基曾宣称“死时还富有的人死得可耻。”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原则。美国个人财富达到 1000万美元者每年捐出约 9%，普通美国人向教堂和慈善团体捐出自己收人的 2.2% 以上。美国的捐款总共占国民收人的 1%。相比之下，欧洲的占大约 0.5%，其它地区则更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平等机会原则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这些年来社会公正状况不断得以改进的结果。笃信宗教的人们一面主张平等，一面搞种族歧视那种矛盾的局面，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却无法保持下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因为歧视作法的慢慢停止（这一过程仍在自我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因为美国人的道德观最终无法接受非人道的行为。

然而，美好的神话下面往往掩藏着种种罪恶。有一种矛盾的现象说来耐人寻味。一个因其宗教观连堕胎都加以限制的国

家，却经常动用死刑。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使美国社会其它方面的古古怪怪显得更加突出了。美国每年有1.5万多人被杀害—按人口平均，比其它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得多。这一比率与美国平民人口武装到牙齿一事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美国的监狱也比其它任何一个大国都人满为患。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将近1人被判犯有重罪，20个人中有1个进过监狱（黑人的这一比率是1比5）。美国的人口虽然才占世界人口的5%，囚犯人数却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经济方面的矛盾同样突出。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富国来说，贫富差距算是很大的。例如，1998年，8个美国人中大约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20%是儿童—这两项的数字都比西欧大约多一倍。没有国民保健计划，意味着4000多万人得不到健康保险。可是，富人的情况却格外好：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有家庭所积累的财富比占95%的整个底层的财富还要多。在这一点上，美国同样位于发达国家之首。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似乎无一使民众感到非常不快。机会平等这一神话的魅力太大了，美国人根本就不去想怎么打败富人。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致富上，即他们自己如何致富。

那么，当美国领导人大谈扩大自由王国之时，对这个帝国的外国阶层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人的信念来自慷慨，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想给自己机会，也想给世界机会。可惜的是，美国人对于给世界机会想得太少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惟一重要的世界。越南战争期间，士兵们一谈到回家就常说“回到世界中去”，这决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美国人不学外语（美国的大学2002年共毕业了9名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也不到国外去旅行，大多数人在地图上找不到“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伊朗、北朝鲜）

的位置。美国是一个机会众多，新思想层出不穷，无论哪个专业都明星云集的地方，外面的一切在概念上几乎都不值得一提。美国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帝国，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虑它将走向何方，它需要什么，而且肯定无人负责。这种不去注意的状态会造成疏忽，导致采取条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亚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政府经验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正急于建立基本的民主结构—宪法，市政会，非军事警察部队，独立的中央与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层官员请求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大使拉尔夫·L·博伊斯尽其所能做出了反应。但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减少了50%还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这种情况不独印尼一家。据《纽约时报》2002年7月报道，美国在诸如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外交岗位都人手不足。几个月前，《时代周刊》曾经报道，原教旨主义者开办的穆斯林学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补因政府预算失败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应是放弃对巴基斯坦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以便让对方腾出资金用于教育开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时代周刊》2002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说，由于担心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有可能把钱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强制流产的计划上，美国拒绝拿出原定给该组织的3400万美元。且不说花在中国的只有300万美元，而且具体目的还是通过展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性来制止强制性流产；也不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同时正在宣布与同一个

被拒绝给予人口基金的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的计划。拒绝给联合国资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戏外，．简直毫无意义。“ 既然流产在我们这里都不违法，我们怎么能去告诫其它国家不能搞流产方面的咨询呢？ ”美国作家加里 ·威尔斯有此一问。我们能够，而且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流产问题在美国承载着宗教意义。我们认为，其它所有国家都是美国人想怎么样，他们也想怎么样。除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外，谁都不会对其多加考虑的。

当然，除非是有什么阻碍了机会，或者是有什么带恶意的事情发生。这两者必定引起集中反应。如果是阻碍了机会，反应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大量非法复制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使微软在那里及其它地区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还是那个将驻印尼代表削减了一半、又对巴基斯坦的学校状况毫不在意的政府，但这次它却全力以赴，迫使中国政府对非法仿制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之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倘若事情跟恶意沾上边，做出的反应可能要厉害得多。

塞缪尔 ·亨廷顿曾经指出，美国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不合意的“ 对方 ”相对抗中形成的，而对方总是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起初，这个对方指的是英国贵族统治的压迫，后来广义地指欧洲封建君主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其后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统领欧美文明抗击德意志帝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领头人物，最后美国便把自己看成了自由世界对抗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每一次，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都把斗争变成一种道义上的圣战。因为美国人做事不能有违良知，他们发现很难支持似乎是非正义的战争，

也无法为世俗的或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战。若要支持某场战争，美国人必须得觉得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在以正压邪。由于是在对邪恶开战，就得不折不扣地取得胜利，对方的投降也必须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9 . 11’事件引发的反应,这就是布什总统为什么会说“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和“不论死活，我们都要逮住他们。”他将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套改为“邪恶轴心”，原因亦在于此。为了值得一战，敌人的恶行也得是不折不扣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目前在奉行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一体化原则，目的在于将“其它国家和组织纳入某些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支撑一个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世界，从而促进和平、繁荣和正义。”这种学说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说服各国政府和人民签字同意“有关人类尊严的那些不容协商的要求：实行法治，限制国家权利，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和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这些价值观“不是仅有益于美国人的狭隘美国价值观，而是有益于各地人民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

这些说法明显引出了一些问题，主要一个是这一切如何实现。答案似乎是通过不断推进全球化，与“志愿者联盟”一道促使我们认为危险的政权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看作是一种“软力”，它将借助那些志愿干我们希望他们干的事的力量，在帝国内部促成一体化。据信，人们将会把一体化视为通向繁荣之路，而繁荣将会引发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又转而会导致持久和平与稳定。行家们认为，由美国的市场、文化和习俗合力形成的这种软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它会使美国的帝国与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先例截然

不同，会使它成为一个自愿组成的帝国，但很大程度上又不会承认有其存在。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合作性安排基础之上的，不过是由美国牵头，由美国的软力胶合在一起而已。尽管过去五十年的经历为这种有诱惑力的方案提供了依据，但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拿它与其它帝国相对照，是对历史的误解。罗马帝国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将它的法制、文化、甚至于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其它民族来实现的。罗马往往喜用间接的统治方法，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使用武力。正如孟德斯鸿所指出的那样，“那是一种缓慢征服法。”同理，英帝国是“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的，这一点人人皆知。“不用武力，我们能在哪儿经商就在哪儿经商。万不得已时，我们才用武力经商。”说这话的是英国政治家乔治·坎宁。罗马人和英国人最终发现，硬力不仅领导着软力，似乎也被软力所领导着。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与第一点有关。托马斯·弗雷德曼称，全球化是一种代替了冷战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可以产生财富与相互依赖，可以对旧观念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还可以传播新的思想，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所言，“美国依仗在全球形象方面的优势，可以煽起他国的梦想和欲望。”可是，究竟是何种梦想和欲望，以何价值为基础，又是在何种政治与社会框架中呢？（最近，我在雅加达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一打开电视，最先看到的频道在放映《海滩护卫者》。）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所长安德鲁·沈最近对我说，“只有在大量资源任你调用的情况下，美国的价值观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如果以为你们在美国拥有的东西谁都能拥有，那准是疯了。首先，只要想想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就够了，那就得闹环境大灾难了。”

全球化是由市场推动的，但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而且要受自然选择的制约，而消费是它们的反上帝。麦克尔·普劳斯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效用最大化（道德观在其中不起作用）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生活观，但与良好的社会行为不相符。”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镇压；塞拉利昂未成年的士兵身穿印有他们喜爱的美国球队标志的衬衫，却去砍俘虏们的手。这一切使过去十年的幻想化作了泡影，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决不会打仗这一说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现代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是一艘承载着价值观的航船。在这些价值观中，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但是，资本主义自来就不重视国家及其利益。直到现在，国家都是通过以价值为基础的某些约束措施来控制资本主义的。然而，全球化侵害并削弱着单一民族的国家及其价值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但它同时也使得本杰明·巴伯称为“圣战”运动的那些四分五裂的力量有所加强。实际上，恐怖分子的部队要比目前主张一体化者的部队全球化程度高得多。美国倡导世界开放所导致的结果极具讽刺性，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反而使美国更不安全了。

圣战甚至以特别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到了美帝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如今在家上学这个行业生意十分兴隆，目前参与各种各样计划的学生有15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以70o–15%的数字增长。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信教的父母不想让孩子接受全球化那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难解之题，布什总统说得很透彻，即便他可能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他告诉美国人，他们目前已处于战争状态。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而多消费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义务。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新兴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人去强制实行，”这是“美国新的义务”。可

是，他从来没说过美国要强制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实行。难道美国要用武力去销售《海滩护卫者》吗？它是单枪匹马去，还是和盟国一起去呢？

答案也许是这样：它要在“志愿者联盟”的帮助下去实行那些不容协商的普遍要求。但是，这样做就会有人提出疑问：那些要求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布什的要求几乎与伍德罗·威尔逊 1917年所提出的完全吻合，只是突出地加了一条—尊重妇女。这条新的普遍价值准则是美国人最近刚刚发现的。美国人有关尊重妇女的观念真是一条普遍准则，而且它的实现与否不容协商吗？我们还可以以限制国家权力为例。实际上，世界各国根本不赞成美国的限定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增加国家的权力—譬如说，通过对枪支严加控制。在其它情况下，又会使它显得比较人道—譬如说，通过废除死刑。如果说我们寻求的是志愿者联盟，那么，有证据表明，很多国家并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这一说法，而且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

## 帝国内部的情绪

冷战中首轮大的对抗之一发生在西柏林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占领的一块自由的飞地，周围都是苏军。苏联当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来，但又不愿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实施了封锁。他们不给这块飞地提供补给，也不允许西方通过他们占领的领土运送补给品。美军情急之下，开始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柏林空运行动，每天将数千吨补给运至藤佩尔霍夫机场，看你

苏联人敢不敢出来阻止。这一着果然奏效。此后四十年间，直到柏林墙倒塌后这座城市的两半最终合为一体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盏自由的灯塔。柏林人与美国历届总统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这座城市说“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时，曾激起热烈欢呼；1987年，里根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这面墙”时，听到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可是，布什总统2002年5月访问这座城市时，听到的却是嘲弄，而不是欢呼。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就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于2002年春夏两季在44个国家访问了3.8万多人。对美国人来说，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对美国怀有深厚的善意与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渐降温，不信任与不喜欢美国的情绪在上涨。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某些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远，而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赞许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却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东那些国家之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对美国总体上持好感的人占调查对象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实际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国人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国，持好感的比例从83%下降到了75%。印尼从75%下降到了61%，日本从77%降到了72%，阿根廷从50%降到了34%。有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对美国持好感的人从62%升到了63%，而俄罗斯则从37%升到了61%，尼日利亚从46%升到了77%。不过，总的来说是呈下降趋势。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埃及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大约70%的调查对象

将美国列入不喜欢之列。如第一章所言，许多调查对象对美国人民持好感的比例大大高于对美国这个国家持好感的比例。例如，约旦人对美国持好感态度的仅为25%，但对美国人持好感态度者却占53%。

在对世界最严重的危险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美国及其邻国差别悬殊。在美国人看来，头号危险是核武器。其它（除了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将此列在第一位。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中，污染和环境问题排位最低，但其它所有地区对这两项的排位都很高，尤其是在亚洲。艾滋病和传染病也是其它地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在美国受关注的程度却没那么高。宗教与种族仇恨在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与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也属主要关注之列，但在美国亦非如此。

美国最受人羡慕的是它的技术与科学。各国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这一项上划了赞成。美国的流行文化同样是个大赢家，只有印度、孟加拉和几个中东国家等少数地方例外。2/3的欧洲人和拉美人，以及一半以上的亚洲人都说喜欢。然而，似乎无人赞成美国习俗和思想的传播，这似乎有些矛盾。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2/3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以及3/4以上的中东人对此持不赞成态度。美国关于民主的思想得到的反应更是好坏不一，但在某些方面比较令人担忧。在非洲和除印度以外的亚洲，这些思想为人接受的程度相当高，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意见却是双方基本持平。例如，英国43%的人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42%的人不喜欢。加拿大是50%对40%。

调查的三个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未能解决贫富之间的问题，而且还在将差距拉大？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时是否考虑他国的意见？如果再有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会不会更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占压倒多数的回答是美国没有解决，并认为它在拉

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埃及、巴基斯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明显例外。关于第二个问题，如第一章所言，各地绝大多数人都说美国不注意倾听他国的意见，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在美国75%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美国相当忧他人之忧。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预料之中的，但分歧的大小和普遍性很说明问题。不过，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再有一个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国家，世界上的危险会更多。尽管这一点令人宽慰，但也掩盖不了不满之意。最后一点尤其令人不安，那些最了解美国的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及其他西欧人），往往是打分最差，或者是在赞成比例方面下降最大的。

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将美帝国之内臣民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我在世界各地所听到的数千次谈话的内容量化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一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召开比尔德堡会议，在春季的一个长周末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2002年的年会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时间刚好在总统发表西点讲话那个周末。在会上，欧洲人表露出了不相信、气愤、乃至失望等情绪，甚至大有遭到背叛和羞辱之感。正如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前任代表所言，美国实际上要的是以某种保护关系“监督欧洲”。欧洲一位前任专员强调指出，“假如美国以为意见一致可有可无，便会强烈损害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反全球化的，实际上，与美国模式本身也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位金融家也说，“单方面随意实行政策，等于是取消制约、协调和法制机制，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所主张的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实际上是在说，强权就是真理。”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驻华盛顿大使强调指出，

先发制人这一战争原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有核武装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也决定采取这种战略，你又将如何呢？”他问道。

这种反映不独欧洲有之。比尔德堡会议结束不久，我在纽约与墨西哥、巴西、法国、瑞士、欧盟、新加坡、日本、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共进晚餐。他们到达时实际上早就超过约定的晚8点，原因是安理会的一场争论把他们都耽搁住了。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要求给予美国公民特殊待遇，以此作为美国赞成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机构原本是美国自己提议成立的。到了东道主在上西区的公寓后，他们仍在愤愤不平。他们认为，防止因政治动机加害美国人的那些预防措施本已十分详尽，他们已经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又要求什么特殊待遇，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也太过分了。一位拉美国家大使说，“美国对全世界都不信任，只相信军事力量，根本没有与他国合作的观念，总是什么都围绕着自己转。”有一位欧洲大使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过去美国是世界的一盏灯塔，但是它行事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他国，也不考虑它之所以成为灯塔的那些原则了。这一点让我们大家感到万分沮丧和失望。”他们大家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个人对美国立场的反对，甚至厌恶。不过，他们大都也承认，他们的政府可能会让他们去按美国人的意图行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其它国家过得不痛快，谁也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得罪世界上最大的强国，除非碰到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当美国在协议里加上特殊待遇条款的提议在安理会付诸表决时，他们都会捏着鼻子说一声“赞成”。但是，他们是决不会忘记这一耻辱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可以发现同样不满的情绪。亚太经合会2002年10月在洛斯卡沃开会时，总裁峰会装了一种很有特色

的瞬时民意测验系统，它可以将观众对主持人所提各种问题做出的回答迅速投射出来让大家看到。其中两例特别有趣。一例是这样：据知 10万美军在日本、韩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已部署达 50年以上了，要求观众说出预计这些部队还将在那里存在 10年、 25年还是 50年。将近 2⁄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 25年或 50年。后来，又要求观众从以下威胁中投票选出对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崛起的中国、日本再度军国主义化、大批民众越过边界、水资源短缺、艾滋病以及美国的霸权主义。虽然近 60%的观众选的是恐怖主义，但美国霸权主义仅随其后，占 30%，遥遥领先于其它选项。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左翼激进分子，而是来自亚太地区的 800名高层商界领袖。可他们却说，除了恐怖主义外，最可怕的是美国霸权主义。

这个世界所渴望的是迈克尔·赫什所说的美国人对“广泛的理想主义”的看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美国所感兴趣的是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所做的错在哪里的问题。可是，恰恰相反，正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所说，“美国专横霸道,而且这样做时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2002年 12月 22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报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内容是关于尼日利亚石油资源的。这篇报道记述了谢弗龙／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终端站的经理们在尼日利亚乌格博罗多的豪宅的奢华与石油工人住的棚屋之间的悬殊差别，他们分住这条小溪的两边。这些工人在一次和平抗议中夺取并占领了这些富人的宅第。整个情况非常复杂，这与尼日利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当然也有很大关系。当地一位名叫维克托·奥穆努的市政官员对此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不错，尼日利亚政府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是美国人在左右政府的政策。如果他们心里装着公众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能引起尼日利亚政府的注意呢？……美

国人号称是自由的斗士，号称要提升人类的素质—可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是魔鬼。你能说他们比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是奥萨马·本·拉丹好吗？他们来了，拿了，走了，却没有还回来。”

多年来在国务院工作的官员，驻沙特阿拉伯的前大使查斯·弗里曼措辞比较委婉。他说：“美国本来是一座山巅之城，可是头上笼罩的烟雾越来越多”。他接着说道，“我们既需要向恐怖开战，又需要向傲慢开战。”

# 第三章

# 美国的花招

“金融市场竟然让巴西为进行一场民主选举付齿经济代价。这似乎不公平。”

——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

素帕猜·巴尼巴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圆脸膛男子，而今依然保持着昔日当教授时的儒雅风采。离开大学跻身政界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上了泰国副总理，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10月，他到世贸组织就任前，我们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饭店共进过午餐，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出席亚太经合会论坛的会议。俯瞰着过往船只驶过黄浦江外滩的忙碌景象，我们不期彼此都享受了一段往日的回忆。我们两人20世纪60年代都在鹿特丹住过，可惜，只是无缘相遇。我们试着用已经生疏的荷兰语聊了起来（他比我说得好），从中得知他曾被泰国派往鹿特丹大学，师从大名鼎鼎的扬·廷贝亨学习经济学。返回泰国前，他在那里连续当了十年教授。我1966至1968年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担任副领事。

我们的交谈从遥远的过去转到最近的情况。换用英语后，他话风一转，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起来，谈起了最近的经济发展

情况："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泰国和东南亚都是毁灭性的。许多人不禁要问，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是清楚全球化对亚洲的经济影响。"

## "97"大崩溃

素帕猜指的是1996年秋季曼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日本，后来发展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终于在90年代来到了泰国。对东南亚来说，那段时间可谓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冷战结束后，民主资本主义成了惟一幸存的经济体系，控制着它所审视的一切。在创造财富的竞赛中，它完全超过了共产主义。"全球化"—国家经济与公司实体在全球基础上通过贸易与跨国投资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成了新的口号。日本的大前见一等作家写的畅销书在为新的"无国界世界"大唱赞歌。在无国界世界中，标在地图上的国境线变得毫无意义，各国政府最大的职能是说服世界上对公司有控制权的人将资金投到他们国家，然后便走开，别再干预了。关于通向未来之路，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知名大学的权威人士中普遍形成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一致意见"。汤姆·弗里德曼为之冠之以"金紧身衣"之后，这一观点就广泛传播开了。这一方案要求平衡预算，降低税收，资本、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实行私有化，撤消管制，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政府要小，对利率的限制要放宽。据认为，以上措施的实施，将会带来繁荣，并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由此带来民主化，而民主化又会带来稳定与和平。

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说，实现所有这些的主要途径是借助于“电子群体”，他们是一帮从不公开露面的财宝守护神，一般都躲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本的兜町（证券交易大街）、伦敦的商业区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无人出声的高高的巢里，两眼紧盯着电脑屏幕。可是只要轻轻地一按鼠标，他们就能让数万亿美元很快在全球周游一圈。

20世纪90年代，电子群发现了东南亚，尤其喜欢上了泰国。后来被看作是历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东西，其时也正在美国积聚力量。低利率和蓬勃发展的经济释放出来的潮水般的资金都在寻找高利润。欧洲和日本这些经济增长速度慢的国家的投资者也在寻找更加葱翠的牧场。东南亚因其高增长率、高利率和汇率与美元挂钩带来的低风险，看上去很像是那种银行家们的天堂。1993至1996年，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银行在这一地区贷出了7000多亿美元。那几年间，每年光外国贷给泰国的短期贷款，便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国直接投资也大量涌人，通用、福特、丰田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全都宣布要在泰国建造新的汽车制造厂。与此同时，新的摩天大楼将天空遮得一片昏暗。1994年，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议，欣然接受了全球化理论，宣布设立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并宜布该组织承诺要在2020年以前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在全球知名人士于新加坡、达沃斯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博学的教授、冷酷的银行家和经验老道的政治领袖们，无一不认为东南亚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在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发挥着带头作用。

1996年8月底，能注意到曼谷商业银行垮台的人寥寥无几。1997年2月，当颂巴颂土地公司拖欠欧洲债券，发出了房地产泡沫可能行将破灭的首批信号时，有些人竖起了眉毛。

当月晚些时候，第一金融，即泰国最大的一家金融公司，突然开始寻求合并伙伴。电子群见状赶紧开始从栅栏里往外大逃窜。外国银行家开始要求还清他们的短期贷款，投机性投资公司估计泰株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难保，最终总得贬值，干脆把泰株都卖了。在国外借款甚巨的泰国公司同样害怕出现这种结果，也开始将泰株大量换成美元。在全力以赴支持汇率的过程中，泰国中央银行总共将260亿的美元储备抛进了疯狂抢购的浪潮。

1997年 7月 2日凌晨一两点，中央银行的官员给财政部长他农 ·比达亚打电话，向他报告了一个严峻的情况：美元储备很快将不复存在。泰国实际上已经破产了。离天亮还早，官员们就打电话把曼谷的主要银行家叫醒，通知他们去参加紧急会议。早晨6点 30分，他们聚集在一座低矮的楼房里，对面是装饰华丽的班昏邦宫，泰国银行所在地。他们被告知，政府的储备已经告罄，再也无法用美元换泰株，将它与美元的汇率钉死在 25泰株了。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固定汇率，让泰株自由浮动—或者说自由下落。上午 9点，外汇市场开门营业,泰株立即下降了15%最终泰株的价值将损失60% 12月初，政府已关闭该国 58家大银行中的 56家。失业率上升到了 20，先前的工商业巨头在曼谷街头叫卖三明治的不乏其人。出租车司机在标准的观光路线上添了新招：开车前往曼谷的华尔街夕隆大街，带游客去参观寿终正寝的银行。晚会结束了。

不过，且慢，这只是泰国。我记得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话，到会的都是美国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他们强调说，尽管泰国经济的崩溃对泰国是耻辱和痛苦，但我们不应当忘记，整个泰国经济加起来总共不过1850亿美元，比圣地亚哥市的还

要少，所以显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赞成这种说法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本人。日本领导的国际社会努力想为泰国搞个一揽子应急计划，克林顿婉言拒绝了，不让美国参加，还声称整个问题不过是在通往全球繁荣的“路上出了几个小故障”。然而，如果对克林顿来说只是打了个隔，但对泰国人来说可就是胃癌了。泰国人不会忘记，1994年墨西哥遇上同样问题时，克林顿是如何竭尽全力搞一揽子救援计划的；泰国人同样不会忘记，他们在越南是如何帮助美国人的，也不会忘记是美国人一直在压他们转搞自由贸易和开放金融市场。正如素帕猜在上海对我说的那番话所暗示的，泰国人是不会很快忘掉这些“路上的小故障”的，也不会忘记美国人对他们的事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可是后来，突然间就不只是泰国的问题了。7月，泰株下跌后，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印度尼西亚的卢比很快也开始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抢先采取行动，向菲律宾提供了11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汽车集团“现代起亚”公司要求给予应急援助。10月，林吉特按1月份的价值已损失25写，卢比损失了28%。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突然下令停止发售马来西亚股票，强行对本国货币的流进和流出实行有限控制，为的是防止出现泰国那种货币崩溃的局面。为此他遭到了几乎整个国际金融界上层人士的严厉指责，包括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说，这种举措会永久而彻底地降低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经济的信心，迫使它走向持续缓慢发展的状态。马哈蒂尔从来都不是个胆怯的人，他也对国际投资者进行了抨击，骂金融资本家乔治·索洛斯是个笨蛋，并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它们的政策为投机性攻击大开了方便之门，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赶上去的能力。马哈蒂尔后来对我说，他的内阁官

员和顾问们都想让他闭嘴，因为他每次一开口，林吉特就跌得更厉害。“但是，我必须讲实话，”他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9月份于香港举行的年会上，他对世界上的高级银行家们说，货币交易是不道德的，应当禁止。一直紧随在林吉特后面的印度尼西亚货币，在他这番评论后应声而跌。同时，失业率不可阻挡地升了上去。

尽管东南亚一片混乱，在香港开会的金融界领袖们却似乎与克林顿一个腔调。电子群都开始向山上进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还要求更改该组织的宪章，以便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让这些国家解除对自己金融市场的控制，向全球所有的玩家开放金融市场。他们确实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凑集了一些救援资金，不过，当然一点儿也没有给不听话的马来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对韩国的经济状况口气乐观，没有明确表示出多大的担忧。按照该组织报告撰稿人的说法，韩国的经济处于能多好就有多好的状态，显然是操作近乎完美的一例。

这场金融风暴的总爆发，是在这些世界之主们从香港返回家中正解行李之时。汇率与美元紧紧挂钩的港币，成了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投机性攻击的目标。庞大的全球性投机集团演绎了自己版本的《龙与地下城》。他们一边将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卖跌，一边抛售港币。他们估计，港币的抛出会迫使港府提高利率，维持对美元的挂钩汇率，但不断上升的利率会逼得股票价格下降，这样，抛售股票者就可以获利了。实际上，他们确实获利极为丰厚。当时，香港被打击得摇摇欲坠，印度尼西亚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财政援助计划，而该计划要求严格节制国内消费，这样一来，失业率肯定要冲破最高峰。日本当时本想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从日本的

巨额储备中拿出资金，用以稳住该地区混乱的经济状况。日本人曾经对人解释过这个想法，我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我向华盛顿相应的官员汇报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绝对不行。因为缺氧，这个想法只好悄无声息地胎死腹中了。这个想法断气之后，运行良好的典范—韩国的经济也开始厄运难逃。

整个10月，韩国圆一直在下跌。11月，韩国几家大公司被迫宣布推迟或停止在国内外投资。199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新成员。这个组织也因此而有了第二个亚洲成员国（继日本之后），否则它就成了纯西方国家联谊会了。不过，这样做也方便了美国的谈判者压韩国开放它的金融市场。加人伊始，随着131亿美元新增的外国银行贷款进人该国，大量外币涌了进来。如今这些外国银行，包括几家大的美国机构，感到害怕了，开始朝门口溜了。事情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当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期间，没人顾得上照管国家事务。由于急于保住自己货币的价值，韩国重蹈了泰国的筱辙。直到1997年12月底，官员们才告诉总统，储备已经所剩无几。

这时，华盛顿突然涌起了一股新思绪。韩国毕竟不是路上的小故障，它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强国，美国的主要战略盟友。决不能让这样一个国家玩完。1997年11月，香港干脆让它的金融管理局买下了恒生指数在外股票的大部，由此制止住了投机性攻击。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战略，但实际上和马哈蒂尔对流入和流出马来西亚的货币控制手法大同小异。由于香港是怀着歉意采取这一行动的，没有像马哈蒂尔那样公然挑战，美国及国际官员们虽然难咽这口气，但还是吞了下去。所以，美国驻韩国汉城的大使馆和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赶紧都打电话告诉华尔街，美国银行若不将其货币提出韩国，华盛顿将十分

感谢。实际上，如果能以新债券替换旧债券，将不胜感激之至。有些提议是人们无法拒绝的，这一手在此类中算得上玩得很漂亮。当然，最后还是要达成马哈蒂尔强行实施的同类资本控制。不过，韩国有真正的经济实力，而且是真正的盟友。

此举果然奏效，只是来得不够快。1998年春，亚洲的货币大流失才算基本止住。但是，已经在边缘上徘徊了一段时间的俄罗斯，这时却开始拖欠政府债券了，着实让世界信用市场打了个寒战，就连美国金融市场都感受到了。世界信用市场实际上已不再借款给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集团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个投机性投资集团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是专门为非常富有的阶层而生的组织之一。你至少得存进去1000万美元，还得在那里放三年，它才肯接你的钱。作为回报，该集团许诺每年至少可以赚1500''2000。它的投资方法复杂得你都不想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这些方法有什么不对头，而是你根本弄不明白。如果你想找投机的行家，那就非这些人莫属。他们是华尔街一群高级偷儿，中间还搀杂着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在复杂的表面之下，其中的基本道理其实也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债券的利率会趋于相近。一般来说难出其右。然而，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外部原因所致，利率会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你在利率相异时进行投资，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有趋同之时，几乎可以说是十拿九稳。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干的就是这种买卖。这当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杠杆作用：这些债券投资的差额和利润率极小，所以要想赚钱就得买得多，能用借的钱买最好。另外一个关键是概率。这就要看数学家的本事了。对于那些差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趋同，你得比较明白。如果比你预料的时间长，你会很快损失不少钱。长期

资本管理集团拥有最棒的数学家和最棒的计算机模型。它尽其所能借了最多的钱，然后把它们全部押上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计划运转良好，尽在所算之中。三年内，长期资本管理集团每年平均为投资者赚 34，同时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中结下了合作伙伴。

1998年春，不少投资者都恳求将更多的钱投入该集团。于是，这个集团的赌资翻了一番，起杠杆作用的资金总数达到了 1万亿美元以上。不过后来有了问题。这个世界一时没按常理出牌，这样一来，电脑模型所依据的推测就全错了。趋同现象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发生，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的钱像打开了的消防水龙头似的哗哗地往外流了起来。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它的投资者来说，这当然是个坏事，但这种情况也搅得其他一些重要人物跟着操心，其中一个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家（有些人会说他是最重要的人）。作为极端自由意志论小说家艾恩 ·兰德的信徒，以及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长篇证词中向美国国会保证，没有必要去制约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样的投机性投资集团。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而且准备接受这些风险。可是，如今摆在格林斯潘眼前的风险是全球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借了这么多资金，下了这么险的赌注，如果它崩溃了，很可能要拉着各大银行，或许是整个系统一起完蛋。面对这一危险，格林斯潘眨了眨眼，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组织进行了紧急财政援助。实际上，他还强行实施了资本控制，可能因此而拯救了全球金融系统。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抢救出了华尔街某些大玩家的赃物。在吉隆坡，你可以听到马哈蒂尔在放声大笑。

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美国许多官

员后来认了错，承认政策失当，但美国躲过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基本没有伤筋动骨。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中国的香港人以及韩国人身上却依然有创伤的痕迹。对于美国及全球化机构的漠不关心、反复无常、自以为是和愚昧无知，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 行事依我言，请勿仿我行

2002年 8月 6日，乔治 ·W·布什签署了《扩大贸易谈判权限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强他的政府谈判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能力．布什说，“美国返回促进自由贸易舞台上来了。”他还保证，他要“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为美国家庭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在对美洲委员会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开放贸易不只是经济机会，也是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国务卿科林 ·鲍威尔进一步解释了以上看法。他说，“现实情况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从长远看可以增强劳动者的权利和人权，有助于环境的改善，让所有的人在经济上平等地获取更大的财富。”他还说，布什政府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原因很简单，贸易确实起作用。它给了人们希望，帮助他们养育孩子，给他们头上一片屋顶。他们一登上阶梯，就再也不回头了。”布什和鲍威尔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新意或别出心裁的东西。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一直是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和祷文。

可是，你把这番话讲给西非马里国科洛科罗的莫迪 ·桑加雷试试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布什的签署仪式马上开始的当儿，桑加雷把单桦犁套在两头牛身上，开始耕他那

15英亩棉花地。他得花14天才能犁完，这才是第一天。即便是辛苦地于着这艰苦繁重的劳动时，他对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多大好处也不敢存什么奢望。今年给马里棉农开的价比去年的最低记录还低10%，去年在偿付了所有生产成本之后，桑加雷家还剩下不到2000美元，这笔钱要用来养活24口人。现在价格又降了，进口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又不断上涨，家里可能没办法供有些孩子念书了。

《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还写道，就在桑加雷流着汗犯愁之际，在地球的另一边，密西西比州的甘尼森，肯·胡德踏进他那带空调的拖拉机，坐在有气垫的座位上，调了调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想查看一下他那1万英亩的大农场上早已破土而出的棉花苗需要喷洒多少化肥。尽管世界的棉价在降，胡德家还是在买地。胡德是全国棉花委员会主任，他说，“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鉴于美国棉农家庭的平均净值为80万美元，我们不难理解胡德为什么有信心。

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那种信心从何而来，莫迪·桑加雷和肯·胡德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差距。既符合逻辑又马上能为人接受的解释是竞争与生产率。在另一篇讲话中，布什总统强调说，“美国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这一事实很容易说明胡德先生的繁荣和桑加雷先生的贫穷。1万英亩地和现代化的设备与一小块地上的耕牛和单片犁，这两者似乎形不成什么了不起的竞争。也许正如胡德先生所说，“非洲的农民就不应该种棉花。”可是，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棉农并不是低成本的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最高，每生产一亩棉花要用600美元。所有的高技术设备都十分昂贵。三角洲的土地要灌溉，种子得要价高的，因为经过改良的种子可以抗虫害。另外，昂贵的肥料与脱叶剂也要花钱。既然这样，甘尼

森为什么还那么乐观呢？很容易回答：补贴。就在莫迪·桑加雷套上牛，肯·胡德爬进拖拉机前几天，布什总统另外还签署了一项法律，预定要在去年34亿棉花补贴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肯·胡德可望从中得到近100万美元。

但是，胡德先生和美国其余2.5万名棉农的好运，不仅是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换来的，也是靠像马里这种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换来的，也许最终是靠美国人的生命和国家安全换来的。美国的生产成本虽然很高，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在全球各地市场上与马里在竞争。西非，作为一个地区，是第三大出口商。美国的补贴可以保证美国农民1磅棉花挣70美分，而无需考虑世界价格（2003年1月为55美分／磅）。另外，这笔补贴不限种植面积。美国的种植者去年的收成创了记录，达到了近100亿磅，造成了产品大量充斥世界市场的局面，使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民将价格远远推到了盈亏平衡点以下。简言之，美国的补贴意味着：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生产者将棉花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将低成本的生产者逼得无法从业，然后他们就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应当运行的方式，但从马里的角度看，事情的确就是这样。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十个国家之一，一个连基本保健和教育都给它的人民提供不起的地方，如何去谈论与美国的补贴抗衡。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估计，若取消美国的补贴，将减少美国的产量，使世界棉花价格回升，给西非和中东国家带来多至2.5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对一个许多人一天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地区来说，这算得上是一笔财富。

这种补贴损害的还不止是世界上的棉花生产者，同时也不利于美国将与全球贫困做斗争作为反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容易容留恐怖主义集团，是贫苦和不稳定造成的。

为了打破这个循环，美国已开始强调发展援助和贸易开放。例如，美国在马里每年花 4000万美元用于教育、卫生和其它发展项目。但是，这笔资金几乎完全被国营棉花公司因世界棉花价格下降而损失的 3000万美元抵消了，这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有着 1110万人口的国家的痛苦，反而日益加深。农场主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莫迪 ·迪亚洛说，“ 这就是美国前进的方向。它想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称霸世界。 ”所幸这种情绪还没有化为行动，但西非那些一贫如洗的居民正在越来越多地涌人欧洲的城市，留下来没走的在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里见到巴基斯坦和中东毛拉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报告称，有些马里人和其他人还被派到国外去接受宗教训练。在西非，美国式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没有长着一副科林 ·鲍威尔那种能唤起希望的面孔，而是长着一副冷峻、伪善的面孔，让人产生的是滑向激进主义，也许是恐怖主义的欲望。解决这一问题所耗费的成本，当然大大超过花在补贴或援助上的费用。

有一位马里人，国营棉花公司的总裁巴卡里 ·特拉奥雷，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解决办法。他说，“ 美国付钱给他们的农场主，不让他们种棉花岂不更好。 ”这话说得太正确了。事实上，三角洲的农场主可以种玉米、大豆、或者是小麦，都比他们种棉花成本低得多。他们不用补贴就可以拿着这些粮食到世界市场上去竟争。可是，埃德 ·赫斯特对此的回答却是：“ 我用我的棉花采摘机只能经营棉花。 ”因为埃德和他那些棉农同胞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农业委员会都有很有势力的朋友，未来一个时期内，他肯定还得用他的采摘机经营棉花。这样做最终会花美国和世界多少钱，只有时间知道。

## 永恒的钢铁

然而，布什总统2002年3月对钢铁产品的进口广泛征收应急关税的代价，却能够立即知晓得一清二楚。30%关税带来的冲击，将美国钢铁用户的成本提高了30亿美元，同时使外国钢铁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利润减少了20%。那时美国正在为发起新的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做出努力，目的是将业已熄火的全球经济之车重新发动起来。在这个关头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引来了世界各地一片批评之声，认为这样做恰恰违背了美国正在为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极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又一次证明美国无视盟友的请求，为了一己私利在单方面采取行动。实际上，这是总统为了正确的原因在做错事。

由于不可思议之力的推动，某些行业往往附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航空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行业很少有赚钱的，但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不管它在经济上是否有意义。似乎没有航空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钢铁也是这样。它曾与蒸汽动力和铁路一道，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支柱。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钢铁生产上雄居世界之首，并以它在这种重要商品上的领先地位标志着它的猫主地位。为了赶上英国，先是德国，后是美国，对自己的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它们这样做，被看作是新兴强国崛起和英国衰落的信号。20世纪初，日本加人了这场游戏；二战结束后，欧洲煤铁联营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以至于最后组建今天的欧盟，起到了先导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一定会埋葬资本主义，除了其它办法之外，就是要在钢铁生产上压倒它。

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从韩国和马来西亚，到墨西哥和波兰，都认为必须将钢铁工业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的钢铁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了。

钢铁厂一旦开工，想关掉它就很不容易。钢铁厂需要投人非常大的资本才能增加收益，建一个要花10到20亿美元，其固定成本占生产1吨钢总成本的35%～40%。由于固定成本比率高，只要收益能覆盖至少一部分固定成本，即使相当亏本地生产和销售钢材也算经济。除此之外，钢铁厂要直接雇佣大量的人，甚至还会比较间接地使那些给钢铁厂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也雇佣大量的人。人们常说到“钢城”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钢铁厂常常是整个城市或地区的命脉。另外，作为一种源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阶级战争的老牌工业，钢铁业在各地的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政治影响力也很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里，各地的新厂在增加，老厂也没关闭，相反一直在艰难地维持着，尽管常常亏本销售。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边成立卡特尔以支撑钢的价格，一边拿着政府的大量补贴。其结果是，生产能力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有些分析家估计，世界上大约10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的近1/3是多余的。

过去二十年间，过剩的产品大都流人了美国市场，导致数十家美国钢铁公司破了产，1800万吨生产能力流失，美国钢铁企业的劳动力从1982年的45.9万人缩减到了今天的13.9万人。这些令人痛苦的统计数字主要是由三项原因所致：美国市场的相对开放，美国政府对钢铁业的援助相对缺乏，以及美国养老金和保健制度的特殊性。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招来了不少批评，但美国事实上还是进口市场中的首选。个中原因在于，即便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行动，但跟其它任何一个

大的市场比起来，还是容易进得多。从贸易统计数字上看，这一点非常突出。美国市场的进口量大约为24.1%，而欧盟市场的却只有19.3%，日本市场的更不足以为道，为1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都受制于相互默契的商业约定，这些约定的目的在于控制进口，具体操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和相互关联的公司构成的集团进行。另外一个因素是，政府以投人公有资本、吸收债务、或者是准备关键性基础结构的方式，向不少非美国钢铁业提供了大量援助。最后一个因素是养老金和保健的“遗赠成本”。

即便得不到外国竞争对手获得的那种保护和公共补助，美国许多钢铁生产商还是大幅度削减了成本，增强了生产力，以便在美国市场的消费者面前保持成本竞争力。（美国每个工时的产量从1980年的70.5吨增加到了2000年的142.9吨，德国的同比是67与127.9，日本的是63.2与134.1）然而，尽管他们缩小了规模，削减了人手，背负的养老金和保健开支数额却越来越高，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竞争力。在大多数钢铁生产国，保健和养老金都是由社会出。在美国，这些当然是由雇主出。在钢铁业，这是公司与钢铁工人联合会谈判的合同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协议，退休者和下岗工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只要活着，就继续享受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和保健费。往往是在政府的重大压力下达成的这些协议和遗赠成本，意味着一个13.9万人的工业得支付两三倍于它那么大工业的养老金和保健费。这些费用不仅本身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对该工业采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举措形成掣肘。从全球看，趋势是朝着合并与建立规模宏大的生产设施发展。但由于哪家公司都负担不起它所并购公司的遗赠成本，这种趋势在美国尚不大普遍。因此，虽然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

钢铁公司的合并在经济上很有意义，但只要有遗赠成本问题存在，合并就不会发生。

在解决钢铁业调整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久已可以像其它国家政府一样，把遗赠成本先承担下来，或者对那些美国贸易法认为对美国工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进口货物征收应急关税。根据法律，要获准征收这种关税，美国工业必须提交复苏计划。然而，这种计划历史上通常都实现不了，关税的征收只能暂时缓解低价竞争。若是提高汽车和机床公司这类用户的成本，这些行业也会因此而失去竞争力。另外，这样做还会对出口经济造成损害，对国内工业提高效率则于事无补。

显而易见，在 2002年 3月那个时候，比较可取的办法应当是美国政府承担部分遗赠成本，使该工业更具竞争力。有一次，我见到位居美国几大钢铁公司之列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得知钢铁业其实也愿意走这条路，这样就可以采取合并及其它措施，将钢铁业提高到世界级水平了。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帕斯卡尔 ·拉米以及各类日本官员也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的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 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之时。我们的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于今天坐七、／、个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满了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的现象，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候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

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窝房间，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浴缸，没有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的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

一周工作六天，从来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

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了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同时要跟踪鹿特丹港口的情况。当时还不叫全球化。法国作家让一雅克 ·塞尔旺一施赖贝尔在他写的一本畅销书里称为“美国的挑战”。不管怎么叫法，投资资本流人欧洲之后，工厂建起来了，可以吞进原材料、吐出预定运往巨大的美国市场的成品了，鹿特丹也随之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国际贸易和投资正在使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真正富起来—以美国人那种方式。

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的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的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这次到了那里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周工作的时间降到了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 ·福斯特虽然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

我成为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升至 158亿美元，美国年度贸易赤字总数为 27。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分析家说，这么大的赤字是无法支撑的。商业部长马尔科姆 ·鲍德里奇交代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减少这一赤字。 1986年，我们与日本的赤字已达 550亿，年度总赤字攀升到了 1500亿。我失败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于是我离开政府，打算写本关于贸易谈判的书碰碰运气，根本没料到美国的贸易赤字（严格地说是往来账户赤字）到 2002年底年赤字率会达到将近 5000亿。这一数字在好几个方面均意义重大。首要的是，它体现出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全球化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富起来的。

这一结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二战之后，美国决心避免再犯一战刚结束时的错误，采取了当今可能会称为 “ 建国 ” 的政策路线。“ 马歇尔计划 ” 提供了相当于现在 900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欧洲重建，为了帮助日本重新站起来而周密制订了 “ 道奇计划 ”。以美元为柱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目的是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世界银行的建立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基本的基金。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两个机构的最大捐助者。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削减了关税，真正在全球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由贸易。从 1947年日内瓦回合的贸易谈判开始，到 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止，美国在五十年间连续不断地领导着工业化国家将关税和正式贸易壁垒减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此期间，自由贸易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互惠的程度，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但是，在开始阶段，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自己的关税，而没有要求它的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相应地这样做。美国还使美元的价值保持了 25年不变，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其

贸易伙伴的迅速复兴和发展，则大大降低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刚开始阶段的领先地位。最后一点，政府一直敦促美国企业界在国外投资，搞技术许可，增加进口量，以助发展。摩托罗拉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高尔文即说起过，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年曾敦促他增加从日本的进口，以帮助日本增强经济能力，巩固与美国的联盟。

最早登上出口明星宝座的是欧洲。1958年，大众公司著名的“甲克虫”车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了美国汽车市场5%的占有率，而人们一看到带变速器和细轮胎的自行车就说是“英国自行车”。不过，在高尔文这类人物的帮助下，日本迅速赶了上来。它具体采取了一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1964年我到东京的时候，日本的公司早已在美国民用电子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正迅速走向统治地位。日本汽车是后来才进来的，但从日本进口的纺织、钢铁和零部件，却大有取代美国工厂之势，从而引起了贸易纠纷。

余下的事便人人皆知了。日本在好几个关键性工业领域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了美国，‘目前享有的人均收人，按照汇率，有时还大于美国的人均收人。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快学会了仿效日本，后来还另创新招—获取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到其境内办厂。不久，人们就纷纷开始议论亚洲的“小虎”和“小龙”了。最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在进口方面增加了137%，成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居加拿大之后）和美国投资的主要目标。纵览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里，更加自由的贸易已成了一个主要发展因素，出口和进口增长了一百倍还多，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幅为4%。此外，中国和印度上升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之中，使得世界贫

困水平有了大的突破。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百万人的收入超过了每天2美元这一极度贫困线。美国在这中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请看：美国用它的巨额贸易赤字，分别吸纳了亚洲25、拉美60%的出口，全球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总投资的35%均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关。全球化对非美国人有好处吗？无庸置疑。它是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的福利而构建的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

## 可是沙箱归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还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游览胜地打下的。在那里，同盟国就二战一结束即须就位的金融结构中的主要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目的是为了避免重演“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悲剧，引起大萧条时期那种经济灾难，致使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在布雷顿森林，美国和英国便认定，要想以坦率和相互一致的方式对特定的困难做出反应，就必须依赖普遍为人所遵守的原则。新体系的仲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这里建立的，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的多国机构—世界银行也是在这里创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美国都坚持并被认可享有决定性裁决权。

关于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性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应当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国际货币，称为“班戈”。凯恩斯的理由是，这样一种货币将会使本体系内所有成员处于同等地位，目的是保持该体系平衡运行。这样，如果某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它

就会被迫在国内采取紧缩措施，使自己能通过出口走出困境，而不是简单地将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通过过渡性贷款换取紧缩计划的方式，为这种调整提供便利。他另外还建议，贸易有盈余的国家要采取能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对出口征收临时关税。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通要严格调控。这样，国家的利率政策才能有效地调节国内经济。

最后，美国坚决主张用美元而不用班戈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可以按固定利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它各种货币要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货币汇率只能经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致后才能更动，说穿了，就是必须与美国协商一致。资本控制（可限制国际银行业务机会）最后也写进了协议，但对有贸易盈余国家征收临时关税这一点被放弃了。积累赤字的国家自会去调整，因为它们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临时性贷款来弥补赤字—或者说当时看来似乎会这样。

新体系的运行情况完全出乎所料。1947年到1961年间，关税降低73%后，国际贸易量猛增。欧洲和日本复兴的速度快得恍如奇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使其货物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美国市场上愈来愈有竞争力，美国战后之初的巨额贸易盈余不可阻挡地渐渐变成了赤字。当初美国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的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可任意用自己的货币支付这一有利条件。然而，赤字的出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不向有盈余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凯恩斯提出的临时关税，就不能压它们提高自己的货币价值或减少出口，它们的钱柜里就会积攒起大堆大堆的美元。

由于有盈余国家的银行系统里有效地建立起了额外储备，这些美元就可能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通货膨胀。实际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只要以美元计价，就是一个通货膨胀输出问

题，也是美国逃避应用于该体系其它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过也有一种补救办法。他国接受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单位的条件，一直是美国答应保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并保证可按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于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了。在整个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像其它国家一样按照同样的规章制度采取紧缩措施来维护该体系，还是废止该体系呢？面对这一痛苦的抉择，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利用它庞大的势力单方面这样做的。在没有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既要支撑越南战争，又要支撑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国际支付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受。1971年 3月 3日，尼克松总统干脆暂时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用事实上的标准代替了黄金兑换标准，使美元在世界上成了流通券，而美国对它的管理并没有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其它国家的货币须以美元为标准浮动，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得按照美国变幻无常的经济政策调整。在所有资本控制措施于 1974年元旦解除之后，美国真是可以用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而且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或对他国承担什么义务。这是真正的自由。至于世界其它国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美国人的观点阐述得很准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同我们共享繁荣一样。是朋友就该这样。”

在打造全球化的框架方面，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印刷世界货币的能力，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挥霍者：我们可以不去在意节省不节省，可以不停地积累贸易赤字，其它国家则必须经过一段时

间才能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贸易保持平衡，生产多少就只能大体消费多少。美国却不必为了买进而去卖出什么，它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美元本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也大为有利，它使得美国可以在积累将近6万亿美元往来账户赤字的同时，在国外的累积投资20世纪末也达到了约1.　　1万亿美元。

然而，美元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工具。美国市场的规模，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普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庞大，与美元合力将美国推上了全球化的统治地位。以电影和广播电视业为例。如果你是美国电影制作商或电视公司，你开始面对的是2.8亿潜在的国内观众。相比之下，如果你是法国人，面对的大约是6000万观众；如果是德国人，则是8000万观众。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可以指望有十几亿观众，不过这些观众会仅限于国内的。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可以指望有几十亿观众，因为除了美国的观众以外，全世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都是你的潜在市场。美国人比其他任何人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唱片都多，美国的流行文化遍布全球，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其它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武器供应商，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资源。例如，因特网最初本是阿帕网，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单单是开始于25年前的这一个发展项目，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因特网75%的流量要经过美国，并且在某个点上要由美国的载体处理。最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能通过使美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来加强美元的地位。纵令这个世界让美元搞得人晕头转向，但它还是要抓住美元不放。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你还能把自己的钱放到哪儿去呢？

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

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二十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的市场，而没有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商“ 自愿 ”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

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的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的时候，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

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人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一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民主，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收益。管理人员

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

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写，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鼓励资本的自由流通而将金融体系自由化，实行私有化，解除限制，维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保持汇率稳定。当1997年亚洲那种危机兴起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将实行紧缩和高利率作为应急贷款的条件，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没有提供体系的稳定，而是成了华盛顿一致意见那种市场基要主义观点的执行者。全球化明显就是美国化，但这有什么不对吗？正如汤姆·弗里德曼1996年所指出的，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从来不会打仗（这话当然再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实为美国化的全球化据说将导致标准不断增高，标准的增高将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有了民主，就会有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 反　冲

1999年11月29日那一周，西雅图连连有事发牛，但和

平与稳定不在其内。我站在斯普林街的街头，冒着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瓦斯，在观看反全球化的抗议者砸商店的橱窗和讥讽警察。与此同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则聚集在西雅图会议与贸易中心，试图发起新一轮国际贸易会谈。这是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次重要会议。1994年最后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即宣告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以往贸易会谈进行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痴迷者知道消息。但是，全球化问题事关重大，大约有5万名抗议者涌到这茨会议的地点来表达他们的优虑了。一群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码头上和附近波音飞机厂来的高大结实的工人们向身穿“拯救乌龟”服的环境主义者呼喊着“卡车司机爱乌龟”。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加人了职业左派的行列在谴责集团剥削，尽管他们脚上穿的耐克鞋暴露出他们与此缺乏关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与此关联甚深。他们抱怨说，全球体系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位第三世界的贸易部长辛酸地指出，他和他的许多同僚甚至参加不了大多数谈判会议。会议最后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失败了，但此前已让世界知晓了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

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声有些却来自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认为，全球化可以使资本主义得以规避国家政府多年来为了驯服它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威胁到他们的艰苦斗争结果。从整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输家。例如，进口到美国的廉价服装可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都从中受益，但是却损害了美国制衣业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像玛丽亚·加西亚·孔苏埃洛一样的少数民

族妇女。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太阳制衣厂缝制了15年波罗牌牛仔装之后，失去了她每小时4.75美元的工作。公司宜布要把不少活儿都转移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女裁缝每小时只需付给1美元左右。美国消费者虽然可以从中受益，但美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补偿像玛丽亚这样失去工作的妇女。她和她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工会不为全球化而欢呼，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尤其令人气恼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会交到中国的勤实（音）厂这样的地方去做。在那里，总工会发现，在给沃尔玛公司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牌手袋的过程中，工人若不能按时交活，就会受到保安的殴打。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人要求赔偿全球化带来的损失，并要求将基本劳动权利纳人国际贸易协议。

同工人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是环境灾难性地回归到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担心，减少成本这种挡不住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迁到环境未受控制的地区去生产。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碰到过许多例工厂迁址的情况，迁址决定的做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环境管理的性质及实施情况的影响。有些分析家指出，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以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00^—12%的环境退化为代价换来的。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森林里，每年有相当于康涅狄格州那么大一片森林被砍伐，以满足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室内地板、家具和办公文具的需要。这种贸易80%是非法的，而且会在未来十年内把苏门答腊岛的低地森林连同猩猩和苏门答腊虎一起完全灭绝掉。在巴西，大片大片的红木林正在因同样的原因逐渐减少。另外还有乌龟和鱼类。据海洋科学家说，由于渔捞过度照样受到补贴，这两种生物早已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灭顶之灾了。尽管如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契约》等志愿性努

力在使多国公司支持环境原则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进展，但是，面对老布什总统说的那类说法，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感到悲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最高级会议之前，这位布什总统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供谈判的。”他儿子决定不让美国参加《京都全球气候变暖条约》，原因是“对美国的经济不利”。这更使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全球化需要进行大改变。

对于职业左派和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来说，既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丧失了威望，反全球化就是攻击同一个资本主义目标的又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因素带有文化的同质化成分，这种同质化可引起怨恨。由于它往往是带着矛盾情绪屈从于诱惑的结果，所以更是如此。班邦·拉赫马迪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这位麦当劳饭店业主的85家店铺遍布印度尼西亚，"9 . 11"事件发生后,他赶紧挂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我对慈悲和仁慈的真主发誓，印尼的麦当劳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开的。"班邦先生认为，他的饭店对印度尼西亚有好处，但他也知道这些饭店的存在标志着改变了人们十分怀念的那种稳定的老一套的生活方式。除了这种丧失感，许多人还感到，这种改变是以一种最不民主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经济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即便单个国家变得更民主了，全球民主的总量却在减少，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例如，韩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精心制订的要求它的银行业向外国银行并购打开大门的救援方案。穷国和小国在全球化的条款上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全球化越发展，他们选择的自由会越少。

然而，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许多人认为美国人领导的全球化对他们不起作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最近

的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其余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起色。中东、北非和拉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大约1.5%。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中欧与东欧、以及中亚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减少。国内政策不当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固然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的影响也从中起了作用。

此外，有些重要国家虽然明显遵循着全球化的既定规则，却依然在走向失败。以墨西哥为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墨西哥完全踏上了全球经济的轨道，贸易壁垒减少了，金融市场放开了，保护知识产权等被认为可吸引外国投资的措施也全都采取了。在七十一年的一党统治之后，墨西哥还变得民主了。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规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发展资助或者是劳动力流动（像欧盟吸纳欠发达的国家参加欧盟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的条文，而美国对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崇信则使得那些东西似乎代价又高又没有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大大刺激了墨西哥的出口和外国资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增加。1991至2001年间，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12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60亿美元，可是在墨西哥境况好起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实行了二十年自由市场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约4美元过活。20世纪70年代我在墨西哥时，约60%的人口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在众多国内问题中，主要的一个是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迁往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作机会正在离墨西哥而去。例如，2000年夏天，卡拉韦高尔夫球俱乐部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减掉了一半墨西哥雇员。当年秋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墨西哥主要纺织品生产商中的马耶尔·扎

加。他告诉我说，在墨西哥市场上很难与进口的中国纺织品竞争。

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迫于压力实行了政治民主和市场全球化之后，巴西于 2002年秋季总统选举期间遭受了一场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左翼候选人路易斯 ·伊纳西奥 ·“ 卢拉 ” ·达席尔瓦获胜后不履行债务义务，外国投资者纷纷抽回了资金。正如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 ·巴尔博萨当时对我所言，“ 你们让我们为民主选举付出了代价，这似乎不公平。更糟糕的是，你们对我们想卖给你们的半数产品都设置了贸易壁垒，这样一来，我们挣钱偿还债务岂不是更难了。这些产品包括：大豆、食糖、橘汁和钢材。 ”

对美国的壁垒和有害限制问题，许多地区都有同感。"9 . 11'之后,巴基斯坦对美国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可美国只是象征性地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纺织品进口的严格配额，巴基斯坦对此很难接受。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对美国严格限制进口农产品也颇有微词。

非洲和印度则别有一番抱怨。在这些地区，艾滋病十分猖撅。富裕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药品并已用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成功地挽救他们的生命，但这些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昂贵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保护专利的规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非专利药品生产商无法廉价提供药物。因此，这些国家的有些人实际上把全球化看作最大的死因。

然而，在这些抱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全球化的理论正确与否的问题。乔治 ·索罗斯最近对我说，“ 一般看法认为，市场总是对的，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几乎总是错的，尽管能自我验证。 ”墨西哥与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全球化理论认为，国家如果向货物和货币的

自由流通开放市场、实行私有化、解除管制、严格实行法治、保持透明度、在财政与金融方面采取谨慎态度，大家就会涌上门来。不过，由于世界上的制造商纷纷涌上中国大地，中国实际上在吸纳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并没有实行法治，而且透明度很低，控制甚严，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那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事实上，东亚国家遵循的是一套成功的准则，这套准则由日本首倡，与全球化的标准原则罕有相像之处。它要求强制实行高储蓄率（例如，新加坡把每个工人将近一半的工资作为福利备用基金），抑制国内消费，对外国直接投资提出技术转让条件，政府干预资本分配，保护大部分国内市场，并强调以出口带动增长。

但是，纵令用了这套准则，面对中国现象是否能成功，也还是值得怀疑。按照过去的模式，发展中国家起步时都生产服装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再一步步搞比较复杂的生产。可是中国既能生产低端的，也能生产高端的，而且还能在两端都成为低成本生产商。这样一来，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余地就很少了。

## 让全球化切实可行

技术的发展可以缩短时间和距离，全球化在此推动下是不可遏止的，这已成为一种现实。不过，这话以前早就有人说过。1910年，诺尔曼·安吉尔写过一本，名曰《大幻想》。该书宣称战争已成为过去，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是那么相互协调。一战结束后，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达到了它

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这次若要畅行无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讲意识形态，处理好我上面着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协调做法。单纯号召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是不够的。人们并不是仇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即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亿人喜欢它。但是，它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广泛而公正地普及开来，同时还要敏锐地看到许多不同社会的社会与政治需要。

# 第四章
# 燃料告缺

十二码长，两个车道宽
六十五吨重的美国车来了
请让路！请让路！

——《辛普森家庭》
（仿休闲越野车广告而作）

2002年3月10日是个星期日，当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和脱口秀节目的话题都是阿富汗。塔利班已被废黜，崎岖不平的托耶巴德山区已布下天罗地网，开始追捕奥萨马·本·拉丹，代号“蟒蛇”行动。《华盛顿邮报》头版约一半的版面都被一幅大规模轰炸山区据点的照片占据了，还附有详细介绍行动进展的报道，并说明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伤亡人数总共为58人。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惊天要闻。

在这份报纸的A12版上还有一篇文章，却默默地缩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文章是关于该周参议院辩论的，辩论的主题是将汽油的英里数要求应用到休闲越野车上的问题。这些要求是继1973~1974年的石油冲击之后于1975年对轿车采用的，称为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标准。当时美国汽车每加仑燃料所行驶

的平均英里数为13英里。该标准要求，到1985年，美国制造商新生产的小客车要达到每加仑燃料行27.5英里的平均燃料节约标准。轻型卡车到1979年要达到平均每加仑燃料行17.2英里。

最初效果十分明显。七年之内，美国新出轿车的每加仑平均行驶英里数便从13英里上升到了25.1英里，1987年达到了每加仑26.2英里的高峰。然而，从那时开始，休闲越野车和皮卡就开始作为日常家庭用车流行起来了。到2002年，数量已占汽车总销量的一半还多。汽车市场上这一变化使汽车生产商获利甚丰，休闲越野车和皮卡车的利润要比轿车高得多，但对节约燃料却造成了严重破坏。参议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平均汽油英里数已经滑到了每加仑24英里。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和石油进口量都在猛增。为了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参议院正考虑通过一项将轿车的标准延用到休闲越野车上去的议案，目标是将全美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行驶英里数增加3英里，大约上升到1987年的水平。

《邮报》的文章引用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的话说，提高标准一事无法接受，因为“这里还是美国”。标准要是提高了，他就不“能再开车带孙子绕着牧场转了。”倘若这不是大肆夸张，那就是太不幸了，每个美国人听了都会心碎的。然而，洛特这番话与“蟒蛇”行动那篇头版报道之间的联系，却似乎无人看到。为了得到一桶油，好让我们能在牧场上转一圈，我们到底愿意牺牲多少条性命？当然，这个问题问得不大公平。但问题的结论我们却难以逃避。那就是，洛特认为石油就该便宜，因为这是美国，而美国有权享用廉价汽油。“蟒蛇”行动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想法造成的结果，只不过这一点探藏未露而已。

在伦敦或欧洲的其它地方和日本，人们难得看到休闲越野车。主要原因是，在所有这些地方，加油泵里的汽油每加仑要卖3.97美元(日本)到4.66美元(英国)。没有加税前，这些国家的费用要低得多。实际上，美国的税前价最高，为每加仑1.20美元，其它发达国家平均大约为1.10美元。但是，美国只加约38美分的税，其它发达国家所加的税比它高6倍还多。欧洲和日本生产的汽车能达到每加仑行大约34英里—或者说比美国车每加仑高10英里，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美国车如果能达到欧洲和日本车的节油水平，美国就根本不必进口波斯湾石油了。

节能方面的差异并不仅限于轿车和卡车。你如果从布鲁塞尔去巴黎，可以乘坐高速列车，坐日本有名的子弹头列车的欧洲改进型，大约1小时2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大致相当于华盛顿到纽约之间那么远，可是所需时间只有乘美铁市际高速列车的一半。因此，乘火车从巴黎往返布鲁塞尔的人要比坐飞机的多。欧洲建了现代化高速铁路系统之后，大大降低了对节能较差的飞行旅行的铸求，人们更偏好效率极高的铁路。

电价和汽油的价格一样，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同样较贵，难怪美国人均用电量比用电第二大户日本多一倍。事实上，日本很强调节能问题，他们可以用比美国少一半的能源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美元的产出。当然，日本是一个小国，大多数人口和工业都集中在东京与大阪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所以距离与气候的差异都不如美国大。但欧盟地域辽阔，气候与地形差异大，人口比美国多，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大致相当，但情况却与日本。要创造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美元的价值，欧洲人只用美国人所用能源的2/3，假如美国像欧盟那样节能，它就可以不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连石油进口周期也可以没有了。这

样，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1000亿美元，美元也可以不再通过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再流去为恐怖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资金，并可以大幅度减少美国在波斯湾部署军事力量的必要了。这些兵力的部署每年要花费600亿美元，这就将海湾石油的实际成本抬高到了每桶大约200美元。世界各国的许多观察家都感到不解，为什么美国不纯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一下防止浪费能源的问题。依我看来，个中缘由与美国的应得权利感有关，另外还牵涉到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问题．但这种自主换来的却是不自主。这种不自主会使我们很脆弱，而脆弱反过来又会导致战争、毁灭和死亡，最后便是提醒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 布巴与生俱来的权利

“布巴”的标准定义是这样一个人：他感到他天生有权以1小时 8。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驾驶自己的皮卡，敞着车窗，激光唱机和空调开到最大，腿上搁着一罐开了盖的啤酒。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其实，从康涅狄格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种族和两种性别中都能找到布巴。我们所有美国人身上都有布巴的某种成分（完全坦白地说，我本人就开着一辆休闲越野车）。我们姑且不谈这个典型形象那些非本质的东西—音乐、啤酒雄、乘客座上的大狗、后窗后面枪架上的猎枪和爱国小标语，还是先来看一看马力过大、附件过多的汽车（大多是美国工业化的产品）、道路（美国政府的杰作）和权利感（美国历史的产物）吧。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我们常常把美国想像成一个白手起家，通过辛勤的努力和艰苦奋斗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国家中最发达的这么一个国家。然而，事实上美国却是一个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富有的国家。欧洲在17世纪所拥有的技术，对新大陆的移民来说唾手可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主要能源是木头、风和水，而这三样东西最多的地方莫过于新殖民地了。那些清教徒和其他早期移民等于是发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沙特阿拉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拥有储量最大、成本最低的能源，当年的北美也是一样。所以，从它诞生起，这个国家就享有廉价能源，以至于后代渐渐把它看成了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种价廉量大的能源与移民从欧洲带来的技术和工具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股经济增长的浪潮。这股浪潮迅速使新大陆的生活水准堪与那些老牌国家相匹敌，甚或有所超越。182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富有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90年美元的价值计算）达到了1257美元，仅次于荷兰（1821美元）、英国（1707美元）和比利时（1319美元）。法国当时与美国大体相当，德国和意大利则被远远抛在后面，大约为1100美元，而日本大约才有美国的一半。在人均寿命方面，美国以39岁名列第三，仅次于德国（41岁）和英国（40岁)。

当19世纪与工业革命共同向前迈进时，世界上的能源从木头、风和水转向了蒸汽、煤和鲸油的新时代。美国这时再度成了那个时代的沙特阿拉伯。美国的煤产量从1820年不足挂齿的水平上升到了1900年的差不多2亿公吨。1755年始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富的捕鲸队，1857年拥有的船只达到了329条的最高峰。这种量大而所费无几的能源，是使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主要因素。

1870年，美国已有把握在未来四十年内使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以上，稳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一把交椅。它的崛起大大得力于几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石油河”的发现。

据记载，从地里渗出某种黑色粘性物质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的希特，离巴比伦和当今的巴格达不远的地方。当时这种物质被称为沥青，修建耶律哥和巴比伦的城墙时曾作砌砖的沙浆用。挪亚的方舟和摩西的蒲草箱上的缝隙，很可能也是用它灌的，以防进水。另外还用于筑路，照明，做药，当然还有战争。荷马在《伊利亚特》诗篇中就记载过特洛伊人往希腊人的船上发射不能熄灭的火焰一事。波斯人在征服的过程中用过火，拜占庭城的居民用过希腊火，即一种沥青与石灰的混合物，触水即燃。罗马衰亡后，石油及其用途在西方基本上被遗忘了。不过，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维也纳，人们将从加利西亚和罗马尼亚发现的原油中提炼出的煤油用来照明，这才传到美国来。

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发展，纽约的律师乔治·比塞尔和一小群投资者才对渗进石油河周围泉井和盐井里的石油发生了兴趣。有一个时期，河面上浮的石油是通过撇或将布片在有石油的水里浸湿后再绞干的办法采集的，所以采集的油量很小，大部分都用来做药。不过，比塞尔那帮人看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那就是可以把它当灯油卖，跟煤油和鲸油竞争．可是，撇油和浸油的办法都无法达到他们希望销售的产量，挖也不行。为了很经济地探到石油的源头，他们决定采用当时用来钻盐井的技术。钻探是1858年春天开始的。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后，丝毫未见成效。由于越来越感到失望，这些人便把钻探的事从夏天推到了8月底。后来，眼看资金要用完了，投资者给钻井工头E. L.德雷克‘上校’寄了最后一张汇票，并随之寄去了

停止作业的指示。1859年8月27日，星期六下午，钻头掉进了裂缝里。德雷克这时还没收到信，只在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停了一下工。星期一，信仍未到。德雷克到工地时发现，他手下的钻井工正俯身站在大桶和盆旁边，桶和盆里都装满了黑色的液体。石油时代开始了。

美国能源的数量到底有多大，最初并不很清楚。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石油业处于风雨飘摇、前途难卜的状态中，而且完全依赖宾夕法尼亚的油田。18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地质学家替告说，石油是一种“暂时而逐渐消亡的现象”，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人员对不断下滑的产量忧心忡忡，竟以25%的折扣把他在公司的股份卖掉了。孰料他刚一卖掉，在俄亥俄州的莱马就发现了新油，地点在俄亥俄州与印第安纳州交界处的一个油田里。这块油田产油量非常高，到1890年已占美国总产量的1/3,

此后六十年里，由于不断发现大油田，有关石油储量的忧虑消失殆尽。1893年，得克萨斯州科西卡纳小镇的居民开始打新井，以弥补供水越来越不足的局面。然而，他们打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油。这才是个序幕。1900年秋，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附近一个叫斯平德托普的盐丘顶上也开始了钻探．钻到圣诞节时，石油初现，估计那口井的产量大概能达到日产50桶。能有这个结果已经算不错了，但与接下去的发现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钻油工人过完圣诞节后，在新年元旦又接着干了起来。1901年1月10日，地面突然炸了开来，钻管、石块全都飞上了天，几百英尺高的石油射向空中。这是美国第一口自喷井，流出的油 t大得惊人，每天达7.5万桶。其它地方的也随即接着打出了自喷井：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格纳尔山，俄克拉何马州的大塞米诺尔，然后是所有自喷井的老祖宗，得克萨斯

东部达德．乔依纳的黑巨人。美国不愧是这个时代的沙特阿拉伯。谁能怀疑拥有这种廉价能源不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权利呢？

麻烦的倒是石油太多。每次出现一口新井，油价就猛跌一次，生产商就面临一次破产的威胁。在石油河首次发现石油后不久，这个问题就出现了。1861年初卖到10美元1桶的油，到年底降到了10美分。约翰·D·洛克菲勒通过新泽西托拉斯的美孚石油公司控制了销售和运输渠道，所以还能凭借价廉的优势赚取巨额利润，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市场的秩序。但是，得克萨斯州那些巨大的油田，尤其是黑巨人油田，连美孚石油公司都难挡其势。1926年，得克萨斯的石油卖1.85美元1桶，1931年5月底降到了6美分1桶，连最大的生产商都能闻到破产的味道。于是，他们开始寻找限制产量与稳定价格的办法。

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是1891年作为平民对垄断性铁路获取一定控制权而尝试设立的。1931年，它被授予对石油生产中的“自然浪费”有一定控制权。凭着这一点点权力，历经了种种艰难曲折，它逐渐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限制住了石油产量，稳定住了石油的价格。直到1960年沙特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立才发生变化。实际上，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就相当于它那个时代的美国欧佩克。

美国大t的廉价能源储备，将它推上了全球领先的地位。1913年，美国人均收人达5301美元，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是4921美元，美国远居其上，而且还成了钢铁等其它许多主要工业产品最大的生产国。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开始取代油灯，石油业曾泛起一阵恐慌。不过，1885年“不用马拉的车子”一发明，它便柳暗花明，转败为胜了。汽车工业的兴起，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面貌。美国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350万辆汽车在美国的公路上跑了。1929年底，这个数字增长到了2300多万辆，那年，美国拥有全世界汽车总数的78% a

石油不只是一种经济力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把部队运上战场的是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拉大炮和补给车的仍然是马。四年后战争结束时，装有汽油发动机的英国坦克横冲直撞地越过了德军战壕，而德国的潜艇却因为缺少柴油而陷人灭顶之灾。石油是“胜利的血液”，法国石油总委员会主任说，当时石油的80%均来自美国。与其说是由于美国军队的后期参战，倒不如说是因为美国石油及早和源源不断的运来，才使协约国获得了胜利。

如果说石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戏中唱了主角，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全是它的天下了。1940年日本推进到中国时，美国曾考虑是否要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但由于这些石油对日本的军事机器至关重要，所以又担心这样做会促使日本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夺取对油田的控制权。最后，即1941年7月，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接管于7月25日造成了事实上的禁运。从那一刻起，袭击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然而，日本人即使掌握了东印度群岛的油田，也需要把原料运回本国的岛屿去。这条补给线距离太长了，又很容易遭到袭击。由于它的油船无法正常往返，日本输掉了这场战争。最后，日本的油船一启航便被击沉，日本舰队由于缺油而无法开动。原子弹也许是致命的一击，但导致日本失败的是缺油。

欧洲同样上演了这一幕。希特勒之所以攻占不了莫斯科，主要原因是他必须抽调很大一部分兵力去夺取巴库的油田，这些油田对他的整个战争能否顺利进行下去非常重要。同时，俄罗斯恶劣的路况又使德军用的油比最初估计的多了一倍。他们

未能到达巴库，希特勒的军队在离莫斯科还有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就真没油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将盟军赶下海的最后机会，可是他又因为缺油而未得逞。德国的北大西洋潜艇部队一直在袭击驶往英国的油船护航队。美国和大不列颠 1943年设法将其打败，轴心国的命运就注定了。石油从美国毫无阻碍地源源流去为盟军提供动力。为了打这场战争，盟军总共消耗了 70亿桶油，其中 6。亿桶来自美国。

美国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终于取消了战时汽油配额时，一声声“加满”成了这个国家的新口号。从 1945年 8月战争结束到 1950年底这段时间，随着美国人全新生活方式的建立，战争期间低迷的汽车销售量骤然猛增。美国人花了三百年建国，尔后用十五年的时间熬过了大萧条和继后的战争，其间美国一直在苛刻自己，克制自己，如今该是享受自己对廉价能源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了。

## 布巴抵押了他的自由

布鲁克林区的弗莱特布什是 19世纪 90年代式的典型郊区，离闹市区曼哈顿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街区短而直，有人行道；房屋密集得在凉台上就可以和邻居很方便地聊天；商店、学校和火车站就在附近。汽车在这里简直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只会因塞满街道而惹人讨厌。当初建弗莱特布什的时候，根本就没把汽车考虑进去。

美国战后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建造了种类迥异的郊区而促成的。新的住宅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远离市中心区的地方。

大多数人认为那里是乡下，可是这乡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郊区，街区长而弯，没有人行道，却有半英亩或再大一点的小块地，走着去哪儿都不近，附近没有商店或火车站。这些房子一开始建得就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娱乐室、乡村厨房和小巧舒适的书斋成了必备处所之后，房子就建得更大了。当然，这些房子全有温度、湿度控制，装满了各种最新电器。战争结束十年后，900多万人搬进了这样的郊区。到1976年，住在郊区的美国人要比住在乡镇或市区的还要多。

当然，所有这些人都得到某个地方去购物，郊区的沿公路商业区就此应运而生。这种商业区与老市区的商业区也大相径庭。代替一排排好几层楼高、面朝公用人行道商店的，是郊区分区法规规定在巨型停车场中间建立的一簇簇低层商店—常常盖得从一家店走到邻近的一家都很不方便。同时，市区的面貌也在变。由于很多人住在郊区，市中心区就成了高层办公楼群。不过，这些楼房并不是早期那种砖石结构的，而是闪闪发光的玻璃高层建筑，夏天像热水器，冬天像冰箱，只有装上温度与湿度控制系统才能住人。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得力于廉价的能源。

起初，郊区的人口集中程度不足以吸引私营铁路线投资，但它们又在城市的管辖区域之外，没有建立公共交通的可能，所以去那里的惟一办法是开汽车。导致这一结果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铁路线是由私人公司来投资、维持和交纳税收的，公路却属于由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公路建设业因之随着住宅建筑一道兴旺发达起来了。这一切的典型例证就是洛杉矶。那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刚见雏形就被毁掉了，原因是一家由汽车、燃料和轮胎公司组成的联营企业买下了市内有轨电车公司。他们关掉电车公司，将轨道拆除，把电车路线改成了公共

汽车路线，目的是想为公共汽车、轿车、轮胎和燃料扩大市场。这个想法获得了成功。

1947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修建大型公路系统，该系统将连人整个地区的公路网。新泽西州紧跟着建了花园州①风景干道和新泽西收费公路，其它州也大都很快跟进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州际公路法案》，计划建一个全长4.1万英里的全国超级高速公路网，从此拉开了最大公路项目的序幕。该项目主要是作为一项全国安全措施来搞的，它可以使人们在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城市。然而，设法使这个项目得以通过的并不是军方，而是一大批来自汽车、石油、橡胶、房地产、货车运输和停车业的说客。艾森豪威尔说它“将改变美国的面貌”，此言确实非虚。

人们不仅把他们的住所搬往郊区，连办公室也开始搬往郊区了．航空旅行的增加，使人们感觉办公室设在机场附近也很诱人。航路和机场与公路一样，也是由政府负责修建与维护的。由于喷气式客机大大减少了旅行时间，而且可凭借价格低廉的燃料成本降低票价，所以旅行者大批转向这种新飞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人逐渐对享有补贴的公路和航运渐生好感，公共交通和铁路日见衰微。

1975年，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建筑上，这个国家都是小汽车和飞机胜过火车和公共汽车，私人交通胜过公共交通。我们大都住在房距甚宽的大房子里，离工作地点、娱乐场所或其它有可能去的地点很远。价格低廉的能源给予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再无选择：这个国家的结构布局要求如此。

造成这种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汽车—也在发生着变

---

①花园州：新泽西的别称。—译者注

化。由于人们很多时间都是在车里度过的，所以把汽车看成自己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汽车也因之变得车体更大，马力更大，而且更豪华了。尾翼和全框架镀铬金属保险杠，使车身增加到 25英尺长的汽车愈加生辉。自动换挡装置和空调，与 250多马力的 V型 8缸发电机一样，已成了标准配置。 1973年，一般小汽车每加仑燃料只行 13英里又有何妨呢？汽油不是问题。

## 石油冲击

实际上，汽油成其为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在 1943年，内政部长哈罗德 ·伊克斯就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即将无油！”的文章。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的发现没有重复。随着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纯输人国。这种情况来的比大多数人所预料的要早— 1948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石油的进口超过了出口。自从首批移民抵达詹姆斯敦开始，美国就不曾对能源有过依赖性，而如今要开始了。

不过，这种转变除了标志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外，并没有立即引起过多的注意。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维持价格稳定，用的是使实际产量远低于最高产量法。这种做法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可以使生产能力猛增。正是这种剩余生产能力，使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了胜利的余地。 1948年至 20世纪 60年代末，产量继续保持在日产几百万桶的水平。但是消费量增长得比预料的更多。由于欧洲和日本都已复兴，其它国家也开始工业化，所以消费量增长的不止是美国，全世界的消费量都增长了。 1960至 1972年间，自由世界的石油消费量从

每天1900万桶攀升到了每天4400万桶以上。1970年，当美国的产量上升到了最高峰，达到每天1130万桶时，剩余生产能力下降到了每天100万桶，从此便一路下跌。1971年，铁路委员会批准全力生产。可是，进口量仍在迅速上升，从1967年的1天200万桶多一点，升到了1973年的600万桶，占美国消费量的35%以上。1968年，国务院通知在巴黎的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后万一发生危机，美国将无法提供剩余生产能力。世界和美国这时已十分依赖中东的产量，而且这种依赖有增无减，而中东则是世界上最不保险的地区之一。

尽管在古时候已有所知，但直到1900年，石油才成为中东商业兴趣的焦点。当时，一贫如洗的波斯国王想稳住他一贯朝不保夕的财政状况，便找到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探讨有无可能出售在波斯勘探石油的特许权问题。英国企业家威廉·K·达西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开采业发了财，还做过多次投机生意，他买下了这一特许权，并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于1908年5月26日上午打出了第一口自喷井。1909年，威廉·达西的公司作为英波公司挂牌了，后来的美国企业家称之为“首次公开亮相”。在后来的五年里，由于英国与德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英国政府在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敦促下，把宝重重地压在了燃油的海军船只上，以代替烧煤的船只。国王陛下的政府继后于1914年6月购买了英波公司51%的股份，后来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在那年8月开始的战争中，英波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占国王陛下舰队所耗油料的20%

中东大油田的发现与开发过程，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故事，只是说来话长，无法一一细谈，只好长话短说：达西在波斯发现了石油之后，竞争就开始了。中东各地一贫如洗的酋长，顷刻之间全成了西方寻求钻探特许权的企业家们所钟爱的

对象。英国人依仗自己帝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其中大部，地点在后来成了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知怎么都弄得自己认为阿拉伯半岛没石油。所以，当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孚石油公司去拜访伊本·沙特国王，要求获得在沙特阿拉伯钻探的特许权时，有个英国外交官就劝这位不愿让外国人在他的王国内到处戳窟窿的国王，让他干脆把钱收下，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油，这样他既可以拿到钱，那些外国人也过不了多久就得走了。然而，1938年3月，达曼7号井喷出了石油，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当时建议美国往这个王国派驻外交代表，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尽管如此，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是一家美国公司发现的，这一点后来证明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半岛有石油一事已人人皆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起初认为那项建议并不重要的美国，却用租借资金支持了沙特油田的维护。不过，中东的石油产量在战争期间还只是具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20世纪40年代成为过去，50年代开始之后，这种状况迅即发生了变化。1946年，欧洲3/4的石油来自美洲。1951年，一半以上就来自中东了。向中东产品的转变，殖民主义的结束，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加在一起生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其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产油国政府争夺石油控制权的斗争（注定要成功）持续不断，定价时抛开大石油公司另搞一套；另一个是抹去（仍未成功）或严格控制以色列。

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于1951年，即伊朗（先前的波斯）将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之时。此举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实际上对新成立的国有化公司实行了贸易禁运，使它大幅度减少了

中东石油流向世界市场的数量。不过，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手中依然很有意义的剩余生产能力，很容易地弥补了这个差距，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害。第二次危机始于1956年。当时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采取行动，将英、法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控制了水路运输。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做出反应，派部队去夺取运河区。这一行动的结果当然是运河被关闭，从中东运往欧洲的石油再次中断了。英国和法国本指望美国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料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这样做只能将阿拉伯人推向苏联，因此不但要求英国人和法国人撤走，还说不撤走就不给他们用作缓冲的石油。这一威胁起了决定性作用。人侵的军队一离开埃及，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再次出面保全了欧洲。

第三次危机源于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那天向威胁它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有可能使用“石油武器”的说法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本来就已流传了一段时间，这时便剑拔出鞘了。6月6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宣布实行禁运。6月8日，交运的石油量减少了60%。由于欧洲迅速增长的石油需求3/4要靠中东的石油来满足，所以形势十分严峻。不过，铁路委员会再度赶来救援了，它每天从剩余生产能力中拿出100万桶作支援。到7月份，“石油武器”显然变成了一把橡皮剑。

然而，1973年，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再也不是什么最后可以依赖的供油国了，沙特阿拉伯才是，而且连美国都得靠它来获取最后一桶油了。1960年，石油出口国为了夺取收益和控制权同石油公司作斗争时成立的“欧佩克”，当时尚未家喻户晓。尽管它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市场上有余量供应的状况和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不断削弱着它的努

力。然而，新的形势激励着它在与石油公司的年度谈判会议上采取强硬路线。1973年的年会定于10月8日在维也纳召开。10月6日，也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对占领西奈和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维也纳的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油价提高15%，上升到大约3.45美元1桶，欧佩克的石油部长们哄堂大笑。他们的回答是：要么加倍，要么免谈。与此同时，萨达特一边努力压美国和欧洲迫使以色列撤退，一边恳求他的阿拉伯兄弟再一次拿起“石油武器”。沙特阿拉伯感到左右为难，它既不愿意疏远美国，又在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上与其它阿拉伯人同样心有不平，不过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10月17日，禁运正式宣布，这次“石油武器”证明是一把钢制的托莱多宝剑。

在我当时居住的比利时，由于汽油短缺，人们竟然把马和牛套在了汽车上。有一次租车去我们公司驻费城的总部，我还在车里备了书和杂志，以备排队加油时消磨时间。10月16日，原油的价格涨到了每桶5.40美元，12月中旬成了1桶17美元。在美国的汽油加油站那里，价格暴涨了40%。最后，亨利·基辛格终于通过谈判结束了这场对抗。萨达特这时也正盼着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便呼吁阿拉伯人还剑人鞘，3月18日，他们收剑罢手了。

然而，禁运虽然结束了，新的势力结构却留存未去。欧佩克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在其后的五年，市场复归稳定，价格却大大高出了人们的想象。继后，伊朗国王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崛起，1978年底伊朗的油田被关闭。石油价格再次暴涨，紧跟着又是一片恐慌。全球经济受到恒大冲击。工业国陷人大衰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6%，失业率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停

滞。那些本身不产油而且基本无力支撑高价格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则境况更惨。在全球经济停滞之时，大批大批的钱哗哗地流进了欧佩克国家的金库，尔后又主要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以贷款给负债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形式，重新输人到了石油进口国。全球的民众不禁要问，是否真就别无良策。

## 休克疗法

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其实就有人问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可能并不是无限的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于是很多人开始探讨保证供应的替代办法。有些人主张和平时期增加进口，将国内的储备留作急用。这个想法非但没被采纳，反而为了使国内生产商获利，对进口实行了限额。从理论上说，开采量更加大了．在落基山脉有着巨大藏量的煤和油页岩的美国，似乎完全有能力建成可以无限期保障供应的综合性石油工业。1947年，内政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美元的曼哈顿式计划，打算在未来四五年内建成综合性燃料工业。该计划最后得到了8500万美元的研究费，但由于综合性石油工业的成本比当时唾手可得的廉价外国石油高出许多这一点已很清楚，该计划还是夭折了。

在继后的二十年里，从处理早期石油危机的成功衍生出了一种安全感，是否“别有良策”问题就没人提了。艾森豪威尔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宣传州际高速公路项目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们肯定无人提起。这真是一大历史讽刺，因为该项目将严重加剧美国对外国石油供应商的依赖。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六日战争后撰写他的回忆录《创世亲历记》时倒确实说过，

假如“我们从太空计划的投资中拿出一丁点儿用于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实用的电气汽车和核发电厂，我们早就能很好地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了，欧洲也可以从对中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苏联也不必向其中渗透了。可惜没有引起注意。但现在这个问题又重现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

东京和欧洲对1978年危机的反应迅捷而猛烈。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关掉了总部大楼的电梯，减少了冬季供暖量和夏季空调量。我记得那时候整个谈判会议期间不是大汗淋漓，就是在穿着暖和针织套衫的日本同僚面前瑟瑟发抖。这些措施当然是象征性的，但也表明日本能够采取强硬的新政策。在供应方面，日本搞了个建核发电厂的大项目，开发来自东南亚和俄罗斯的液体天然气，并尽可能让一些用石油的地方改用煤。然而，更富有意义的是，这个国家努力通过保护能源来减少需求。汽油税和电的价格也提高了。政府和业界都为创建更有效的工序和设备而努力。最重要的或许是，日本政府使公民确信，日本的未来有赖于保护能源，从而利用日本人那种传奇式的挖潜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开始制定规则，将日本的工业结构从能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此向美国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当时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副部长天谷直弘曾经对我说，整个事情一直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减少石油用量与增加能效的政策，无疑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有效。1985年，日本每生产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美元，就少用整整51%的石油。

这还不是全部，日本当局还对燃料和汽车课以重税，对能效高的车型实行部分退税优惠之后，他们的轿车和载重车的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日本所有出租车几乎都靠液化天然

气行驶。丰田和本田两家共卖出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混合型车3.6万辆。这种车2002年在美国每加仑燃料行驶50多英里。与此同时，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对手却一辆也没卖出去。1985年以来，日本在整个能源需求中对石油的依赖已从近60%减少到了大约50%，它每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用量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此外，它的长期能源政策使它到2010年还能再提高30%的能效。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也效法日本，提高了本已不低的汽油税和电的价格。在核电方面，法国采取了极为积极的政策，比日本走得还远。欧洲人在强调保护能源方面也效法了日本的作法，而且法国又走在前头了。楼房供暖热度规定不得超过摄氏20度。为了保证落实到位，监督人员还常常不事先通知就到场检查。法国人甚至禁止有可能被看作是鼓励多用能源的广告出现．政府的计划以及相当高的能源价格，同时也加快了对北海石油的勘探与开发，促进了将苏联的天然气引人北欧的努力（美国激烈反对）。如同在日本一样，这些政策取得的效果比预期的更好。1973年，法国的电63%是由石油、天然气和煤共同提供的，如今75%的电是核电，石油发电所占比例不足1%。欧洲还将大多数汽车从以汽油为动力改成了以柴油为动力，并因此将新车型本来就很高的节油量从每加仑行驶28英里提高到了大约每加仑行驶35英里。欧洲本已相对较低的耗能Uk从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8400英制热单位稳步降低到了2002年的7400英制热单位。欧洲的人均耗电量一直保持在不足美国1/2的水平上。像日本一样，欧洲也有一个未来能源保护与多样化的明确计划，该计划同样十分强调开发非传统能源。

美国的反应则是间歇性的，思路混乱，而且常常意见不

一。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自立计划”：美国将以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精神，到1980年获得能源自立。可是，尼克松不久即因水门丑闻销声匿迹了，这一计划落得连计划阶段都没进人。不管怎么说，它没得到多少支持。公众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当时的国会听证会使很多人以为石油短缺是那些大公司造成的。人们都希望华盛顿做点什么，但这点“什么”似乎意味着消除加油排队的现象，恢复以往的低价格，让石油公司付出代价。福特总统紧步尼克松的后尘，提出了一个十年计划，打算建200个核电厂，250个大煤矿，150个烧煤的电厂和20个合成炼油厂。现代石油工业奠基人的孙子，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将赌注提高，提出了一项1000亿美元的计划来支持搞合成燃料和其它经济上无竞争力的能源。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也没让其中任何一项进人计划阶段。

然而，尽管争议不绝，还是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批准铺设横穿阿拉斯加的输油管，这样就能开发阿拉斯加的油田了；二是嫩料效率法得以通过，要求到1985年新车平均每加仑行驶27.5英里。卡特总统1977年一就职，即把能源问题作为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政策称为“战争的道德对应物;y0有些人打趣说，这几个词的首字母缩拼在一起意为“瞄”，而这场争论有时也确实听起来像猫叫。除了对汽车燃效的要求外，在能源保护方面没作什么强调，石油实际上仍在实行价格控制。为了迎合公众，人为地将价格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卡特把设法使国内石油上升到世界市场价格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料却发现公众并不认为有危机存在。最终他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占了上风，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卡特的其它建议包括：对燃效确实不高的汽车征收“油老虎”税，对每加

仑汽油行驶英里数高的汽车实行退还部分税款，增加汽油税，实行旨在促使转为烧煤发电厂的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规定，一项使能运行的核发电厂数目翻一番的计划，对太阳能设备和绝缘材料的投资实行课税扣除，将设备标准从自愿性改为强制性的，对新建楼房实行强制性性能标准，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资金和对再生性资源能源开发的优惠，消除公共系统网络中使用工业用电的障碍，建立可维持 90天石油供应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那个让人不忍放手的老计划，即最终从落基山脉的页岩里一天生产 250万桶油的那个 200亿美元的合成燃料计划。

有趣的是，公共交通或铁路只字未被提及。即便提到了，也是在劫难逃。最后的结果是，国会删掉了汽油税和给高英里数车退还部分税款这两项。 1978年三英里岛上核事故的发生，基本上堵死了发展核电力的可能。由于在环境方面有极其严格的新要求，在美国境内建核电厂成本高昂得无法承受，更不用说容易惹官司的事了。尽管如此，卡特的计划对高效能和从石油改用其它能源增加了大量优惠，而且确有成效。我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利用课税扣除这项政策，将家里的绝缘材料增加了一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我所在的纸业公司也采取了增加效能的重要措施。汽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 1985年翻了一倍，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从 18400英制热单位降到了 13400英制热单位（日本从 5000下降到了 3946）。与此同时，随着阿拉斯加石油的开始输送，供应量也高了。高油价及其它优惠措施促使美国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不过，里根政府的上台使美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变得更加符合这个国家潜存的平民主义道德观念了。当时我担任商业部长的顾问。我还记得合成燃料计划等被放弃掉时的那份疯

狂。在竞选期间，这份计划曾受到公众的嘲笑，被称为政府的大包袱。（加拿大这个石油出口国则坚持不懈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今天它出产的油中20%是合成油）。联邦政府对能源保护的资助削减了70%，能源研发被砍掉64%，对新车实行高节能标准的建议被删除了。强调的重点全都是供给方的经济学政策：用课税扣除和管制鼓励钻油，增加产量。供应量确有增加，不过主要是因为阿拉斯加输油管的关系，再就是沙特实行的将价格维持在低到非传统能源不再有吸引力程度的政策，另外还有北海、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及其它地区产油量大增之故。

油价的下降，领导人对政府需要有工业政策的嘲笑，使得消费趋势开始发生逆转。随着老车逐渐被新车代替，以及新的建筑标准和新的工业流程不断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生产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美元所需能源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在变慢，即便是在美国的能效处于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的水平之时。人均能源用量从1973年的3.66亿英制热单位，降到了1983年的3.14亿英制热单位，但1997年又回升到了3.52亿—比日本和欧洲的比率高一倍还多，这两个国家分别为1.“亿和1.70亿英制热单位。新车、轻型卡车和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1988年达到最高峰，为25.9，然后又跌落下来了，因为1加仑汽油的实际零售价1972年为1.08美元，1981年升到2.05美元，1997年又落回到1.15美元。经过1977至1987这段时间的下降后，石油进口重新开始稳步上升，1997年超过了1977年的水平。新车的平均马力在1982年后稳步上升。再生性能源的用量从1984年美国能源总消耗量的近1000，下降到了1997年的7.6%，而电的实际零售价，在1973年到1982年期间上升了53写之后，又于1997年回落

到了接近1973年的水平。不管是不是偶然巧合，冷冻库在1972年到1993年间在节能上改进了2940o，其后，一达到强制性标准，曲线就完全变平。1978年以来，没有订购过核电厂，现有的也在逐渐消亡。与此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从1985年115天之高的供应量，于1999年底下降到了52天。总之，当美国迈进21世纪时，它的能源状况越看越像1973年的情况了。

## 往返海湾：20世纪90年代

1980年9月22日，欧佩克的部长们云集维也纳，为该组织当年晚些时候的二十周年大庆制订计划。庆祝活动预定在欧佩克成立的城市巴格达召开。可是，庆祝会没有开成。同天，伊拉克与阿亚图拉领导的革命的新伊朗之间长期隐忍未发的仇恨以战争的形式爆发了。伊拉克向伊朗的石油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领导下，（关于萨达姆其人，世界以后会更加熟悉）伊朗人预计能速战速决，不料战争却持续了七年之久，其间战争几乎将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都从世界市场上抹掉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危机处理机制的变化，世界才避免了又一次恐慌，尽管价格确有上升。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被迫将美国的旗帜插上了科威特的船只，并为它们护航，为的是阻止伊朗—大撒旦的仇人—称霸海湾。伊拉克军队为了夺取优势，以便强制停火，1988年春使用了毒气（后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时，无论是华盛顿、联合国，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发出强烈抗议。又一次石油冲击虽然被逃过去了，但这场战争却标志着美国海军部

队在波斯湾大规模集结的开始。到1985年，仅仅为了使航路保持畅通，美国每年就要花掉大约500亿美元。

不过，五年之后，快乐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柏林墙倒了，石油价格也下跌了。美国人买汽油花的钱比20世纪4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少，长期的忧虑似乎一扫而光。世界石油供应量增加了约50%，从1985年的6000亿桶左右增加到了1990年的9000多亿桶。可是，却很少有人能留意到，石油储量的增加大部分发生在波斯湾的主要生产国。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更像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全球的需求在迅速增长，美国消费图上的大部分曲线已上升。美国的生产在自由下落，没有大的非海湾石油资源有待打入这个体系。但是，偏偏没有人去仔细观察。然而，有一位关键的人物例外。1990年8月2日清晨2点，美国昔日的盟友萨达姆宣布他要回来了，他要派10万军队占领前不久还在对伊朗的斗争中支持他的邻国科威特。两周后，虽出于巧合却发人深省的是，《华尔街日报》8月17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布什政府正拼命阻止进行大规模能源保护的努力，因恐怕提醒选举人想起卡特时代白宫的灯被关掉之事。

美国那时虽然只从海湾购买12%的石油，但萨达姆要是接管了科威特，就能直接控制世界石油储量的25%，从而对拥有世界26%石油储量的沙特阿拉伯形成威胁。萨达姆接下去可能还会去找伊朗算账，而伊朗又占世界石油储量的9%。萨达姆对美国或其盟国虽然构不成什么直接威胁，而且不管怎样也得把石油卖出去才能获利，但布什总统却以最有力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宣称，“如果世界上大量石油储备落入萨达姆·侯赛因的手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本身的自由以及全世界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这位总

统后来自然是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多国部队，发起了“沙漠风暴”行动。在这次行动中，50万军队在“风暴”·诺尔曼·施瓦茨科夫将军的领导下，100个小时之内就歼灭了萨达姆军队的大部，还科威特以独立，让海湾轻而易举地恢复了和平。令人惊异的是，多国部队仅伤亡600余人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虽然花了610亿美元，但其中540亿美元是由日本和其它盟国出的，以代替它们的军队参战。当然，现在在海湾巡逻须更加警惕了。

以上这些均未使美国对能源的政策和态度有丝毫改变。消费图上的曲线不断猛升。国务卿贝克1991年2月虽然告诫过参议院，“我们必须多加努力，降低能源上的依赖性，”但总统3月份提出他的能源新战略时并没有提及保护或节约能源问题。该战略计划要求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钻探新的石油，但同时却削减了公共交通的开支，而且反对再提高汽车燃效的标准。克林顿总统虽然对于在北极的保护区和其它国家公园内钻井的努力有所抵制，并且对许多环境控制措施抓得很紧，但是他并没有显著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做法。

然而，海湾战争却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个叫奥萨马·本·拉丹的沙特阿拉伯富家子弟，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神圣土地上的利雅得南面设立庞大的空军基地和部署大批美军部队一事异常烦恼。他认为，这不仅是对阿拉伯半岛，也是对伊斯兰教本身肆无忌惮的侮辱，于是发誓要对美国发起圣战。即便是一个大豪富，似乎也不可能去想象他能够打败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可是，拉丹在另一场美国战争中的经历，却让他有理由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1979年，前苏联人侵并占领了阿富汗。由于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传播开来，美国帮助组建并武装了穆斯林游击队，即上帝的伊斯兰战士。他们要对持无

神论的苏共军队进行圣战，并且要在真主与美国的金钱和“毒刺”导弹的帮助下将他们打败。本·拉丹便是那些战士中的一员。他坚信，苏联后来的衰落是它在阿富汗受辱的直接后果。这使他进一步相信，只要真主与他同在，他就能所向无敌。因此，当他决定海湾战争一结束即与余下未败的那个超级大国较量时，他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萨达姆这个不折不扣的无赖现在当然又回来了，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又回来了，因为萨达姆从来不曾走开。不管怎样，我们都说目前的问题不是石油问题，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此话自然有它的道理，可你还得想一想，这个世界如果用不着拿对他手中石油的需求去填萨达姆的钱柜，如果他没有坐在世界70%的石油储量之巅或者是近旁，是否还有人拿萨达姆当回事儿。我们的态度使我想起了疯狂一词的释义—某个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程序，每次都期望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及其众多的人口，都在搞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化，预计在未来五十年内对能源的需求将是现在的三倍。与此同时，北海、阿拉斯加及其它地方的石油产量都在下降，而中东新近却有大的发现，说明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性几乎肯定会更大。这预示着还要发生冲突，我们也还会继续卷人那一地区危险重重的政治纠纷中。

## 改变布巴的生活方式

2002年秋写本书这一章时，我的邻居刚刚发动起他的吹叶机，打算在感恩节之前把晚落的叶子从草坪上弄走。这位邻居有点大腹便便，耙耙树叶子或许对他挺有好处，可是用吹叶

机却更容易，而且根本花不了几个钱。美国公众坚信，丰富的廉价能源属于美国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拒不对消费它的“自由”做任何节制。他们不相信任何有关危机的暗示，也不相信需要对“美国的生活方式”进行哪怕是些许的改变。人均能源用量重新开始攀升，将美国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又推了上去，使美国的石油进口量直冲1天1500万桶，相当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生产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总量。美国的年度贸易赤字目前为5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上升，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支撑，但似乎没什么人感到担忧。两个政党的领袖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必做的事情上，以便尽量长久地保持像现在这样正常运转。

因此，尚处在“9．11”袭击的余波中时，总统便新宣布了一份完全属于供应方的全国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钻探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的石油，放松对于在其它国家公园进行开发的限制，在未来二十年内建1000个以烧煤为主的发电厂，并且对天然气的开发实行优惠政策。可是，对能源新技术的研究资金被砍掉了，副总统不赞成美国人能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这一说法。他还暗示说，保护资源也许是一种个人美德，但解决不了这个国家的能源问题。这个计划未包括汽油税、英里数要求或其它任何种类的资源保护措施。在计划提交期间，政府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波斯湾，因为需要保证石油来源的畅通无阻。

在辩论中，国会的意见也是同样。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巴巴拉·米库尔斯基说，爱看足球的妈妈们需要皮卡车，以防碰到路上有人发火时受到伤害。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策尔·米勒说，“皮卡的后箱是有乡村特色的美国思想库，”干一天活儿下来，在那里解决的问题要比在华盛顿所有大厅里解决

的都多。国会仿佛要设法支撑起米勒的准则似的，关于每加仑汽油所行英里数问题，它情愿顺其自然，并以压倒的多数投票授权总统跟伊拉克开战。

接下去的模式是，我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利用所需的一切军事力量为得到做这两件事的权利而战。当我们邀请盟友与我们共同参战时，我们把任何犹豫的表示都看作懦弱和反对美国。但是，我们的许多外国朋友都想知道，假如我们行事更像他们，而少像被惯坏了的无赖一些，是否还有打仗的必要。

不管怎么说，美国对待能源的传统做法确实存在问题，给人的感觉像要变得无法负担了似的。想想全球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情况吧，当前世界约 60亿的人口在 2015年左右估计会达到 93亿。人口的增长，加上全球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将促使全球对石油的需要迅速增长，从目前的每天 7700万桶增加到 2012年的 1.2亿桶。中东目前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 63写。若发现不了新的大油田，美国和北海产量的降低，会将这一数字在十年内推向 70%。沙特阿拉伯一家即将拥有全球储量的 25%~30%。因此，世界需求增加的部分几乎全部都要由中东，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承担。由于沙特阿拉伯是惟一备份能力雄厚的一方，所以它会像原来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一样，在市场上起到巨大的杠杆作用。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曾称这种杠杆作用“相当于核武器”。日本早已完全依赖这种石油了。欧洲、美国、中国、印度及其它国家很快也将接近这种状况。

多年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沙特阿拉伯卖给美国的石油不仅每桶比卖给别人的便宜一美元，他们的油还用美元定价，这一点有助于美国使美元维持世界主要结

算单位的地位。这是一种极大的优势。譬如说，假如石油以欧元定价，美国就得以欧元而不是美元付款，其含义对我们来说相当可怕：由于我们的贸易赤字数额巨大，我们手中的欧元很快就会用光。当美国在阿富汗组建穆斯林游击队或在尼加拉瓜组建反政府武装人员需要钱时，或者是为了稳定市场需要多出多少桶油时，沙特阿拉伯也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作为回报，美国一直在保护沙特阿拉伯，保证它有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

但是，将来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看到美国海军担任海湾稳定的主要保障者会感到舒服吗？请记住，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原因，美国可能会屡次发现自己与跟其它主顾关系极佳的原料供应国不睦。美国将来还能与沙特阿拉伯维持那种特殊关系吗？"9.11”后，美国人对这个王国提倡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对它缺乏民主、妇女权利和宗教自由感到的遗憾，已经使关系变得紧张了。许多沙特阿拉伯人为美国人新表现出的敌意感到震惊，不管怎么说，资金大量流向可能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对的政权，总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最后，在美国石油进口量2012年预计将达到的水平的压力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的现值可能维持不了现有水平。当然，以上这些还不包括燃烧那么多石油对环境造成的后果。

因此，美国必须做出选择。什么都不做，意味着选择更高的贸易赤字，对一个把独立与自由看得比一切都宝贵的国家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要选择经济上和战略上更大的依赖性。为了抵消这一点，我们就得维持，甚至增加我们的军事力量，以便到最后迫不得已时干脆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拿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进一步卷入各种各样的圣战和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而且会深陷沙特阿拉伯王室那种宫廷政治的麻烦之中。

如果这种处境像一罐虫子那么麻烦，那么有两种选择：认真对待资源保护问题，或者认真对待以非石油为基础的能源开发。这两种选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目前美国一样也没有做。

在能源保护方面，要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美国能源密集型的基础设施，考虑到不止是美国人，而是全球经济都在依赖这种基础设施。美国的经济是驱动全球经济的惟一发动机。当你听到批评家们抱怨美国虽然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在使用它25%的能源时，恰当的回答是，世界25%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是由美国生产出来的。如果将这一产量忽略不计，那么，世界上很多地方便几乎谈不上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了。美国的大房子也许能效不高，但里面却有不止一台，而是两台，甚至于三台进口电视机、立体声装置、电脑和汽车。这种生活方式突然发生任何变化，受到打击的不止是美国人，而是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储备也许是在美国人的汽车、住宅、工厂和办公大楼里。这里并不需要搞什么缩小规模，以至于要重建。在参议院那场名声不佳的关于休闲越野车和燃料节约立法建议的辩论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提到，福特汽车公司有一则广告说，将来你可以拥有一辆这样的休闲越野车，凡是你想要的房间和电力，车中一应皆备，但耗油量却只有现在的一半。另外，他还引证了国家科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认为，以现有的技术而论，在经济上不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下，休闲越野车和微型货车的汽油英里数增加40%以上不会影响到车的大小和马力。单是这种改进，即可将预计的美国石油进口量一天减少600万桶，几乎和沙特阿拉伯的产量一样多。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技术若能在

全球广泛采用，便可使所有能源预m全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若能如此，电力在能源保护方面可能获益更为可观。首先，目前用电量最大的是耗损。电在通过高压电力网传输过程中损耗巨大。正如落基山学院的艾默里·洛文斯所解释的那样，疏散分布的微型发电厂可以大大减少这类损耗，同时还可以使电源被恐怖分子破坏的便利性显著降低。洛文斯引证的一个例子则更简单，更能说明问题。该例子对比了1990至1996年间西雅图和芝加哥的情况。西雅图年用电量的下降速度比芝加哥快近4000倍，尽管芝加哥一度电的成本要高一倍。原因在于西雅图的公用事业公司帮助人们省电，而芝加哥不鼓励人们这样做。洛文斯强调指出，十年前，美国有九个州鼓励那些帮助用户减少用电量而不是多卖给他们电的公用事业公司，如今很多州都不这样做了，但新英格兰则采取了一种地区性措施，要求公用事业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安装了能效较高设备的人提供部分退款优惠。这一措施的实施，防止了本来几乎肯定会有的灯火管制的出现。在英国，企业可以因节能投资而获得税金减免，就像注销浪费的能源一样。这种做法若用在美国，肯定能产生显著的效果。洛文斯还估计，美国若采用欧洲的方式，再加上热电厂，可减少美国燃料用量的1/3。可以引用的东西还很多，但问题在于，即便不采用严厉的措施，我们也能大大降低能源用量和石油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美国经济，也是为了全球经济。

再者，现在已有一些很有希望的技术，不用矿物燃料也能增加能源供应量。欧洲和日本已经表明，用核电可以做到既安全又经济，而处理核废料的新技术预示着可大幅度降低其危险性。丹麦已经可以从风力发电中获取近20%的能源了。欧盟计划到201。年至少22%的电主要从风力发电中获取。风力发

电亦可以用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满足美国很大一部分需要。近些年已有情况表明，转基因生物催化剂可以从几乎任何一种木本植物材料中生产乙醇。从发酵的农业和采伐废料中获取大量环保燃料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热解聚也可以将动物尸体和旧轮胎之类的废物转化成优质柴油。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在于通过使用燃料电池从氢中获取能源。这种技术可以为工厂、楼房、住宅提供电力，也可以在轿车和卡车中代替汽油。有些城市的汽车已经像某些楼房（比如曼哈顿的孔代·纳斯特大楼）那样在靠氢运行了。所有汽车公司都在试用以氢作动力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最近在巴黎汽车展上展示了一款样车，叫做海威尔。还是那句话，用技术可以做成许多事情，同时解决很多问题。尽管政府正在与汽车公司在燃料电池技术上联手努力，布什总统也刚刚拿出了12亿美元以示支持，但与我们最近集结的军事力量一对比，则是小巫见大巫。"9·11”事件发生后，国会立即通过了4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其中很大一部分进了五角大楼。布什政府2003年提议增加460亿美元的国防费，是自1982年以来年度增加量最大的一年。我们花在执行波斯湾巡逻任务上的600亿美元亦将增加，理由是为了对付伊拉克。无论这一点的必要性有多强，我们总不是在开发非传统能源上花500或600亿美元。然而，这似乎是重新考虑历年来所提出的启动阿波罗或曼哈顿式能源计划的大好时机。当然，不管投资多少，开发某些像氢燃料电池之类的技术需要时间。但这正是我们应当现在开始的原因。与此同时，像混合型汽车这类过渡性技术应当更加大力地推进。

假如布巴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良好的全球公民，他就有看上去显得更像他想惩罚的无赖之虞。

# 第五章

# 谁输掉了京都之棋

“趁我们还在这儿，赶快来看看我们吧。”

——马尔代夫群岛旅游部

如果你想找一块远离尘嚣的理想之地，马尔代夫群岛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片由珊瑚和砂质环礁组成的毫末之地，位于印度正南方大约1000英里的印度洋上。那里有怡人的亚热带气候和舒适的沙滩,还有27.5万居民,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确保你在这个群岛上感到彻底的放松和满意。有兴趣的话，赶快去订机票吧。这个岛国的最高点不过才海拔5英尺。珊瑚虫的死亡，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海水对海滩的冲蚀，使得这些小岛似乎眼瞅着就在消失。1987年，莫蒙·阿卜杜勒·加尧姆总统的汽车还差点被突如其来的海浪卷走。自此之后，这个岛国的居民对全球气候变暖及两极冰川融化之类的话题一直十分关注。

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加尧姆总统告诉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再上升几英尺，我们国家就末日来临了。”不用担心，布什答道，不自觉地模仿起了点

努特国王①的腔调，“美国决不允许马尔代夫发生这样的事。”随后，这位总统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一起作出承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采取措施，将所谓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降下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可以想象，当小布什政府2001年3月28日宣布美国不支持签署旨在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京都议定书》时，这个印度洋中部的岛国是何等的震惊。这份议定书是经过艰苦的谈判，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拟订的。议定书要求，到2010年，各签署国要将对气候有影响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7%。尽管这一减幅远远小于使马尔代夫免于淹没所必需的60%~80%，马尔代夫人及其它低地国家的居民却认为总是聊胜于无。而此时布什的环境保护局局长克丽斯廷·托德·惠特曼则认为，就本届政府而言，京都议定书已经“寿终正寝”了，她还声称，如果欧洲人和日本人想达成协议，就必须采用别的方式。如果说马尔代夫人为这个消息而沮丧万分的话，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欧洲，则被激怒了。

惠特曼这番话选择的时机也不好。两天后，凭借与绿党的联盟而上台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首次到白宫拜访了新的布什政府。（这是不是日后施罗德不愿意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布什的部分原因呢？）此前仅一周，欧盟还致函白宫，敦促进一步努力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达成协议。大约两个半月后，布什即预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与欧洲首脑进行首次磋商。惠特曼如此一说，就像是给了这一切一记响亮的耳光。6月11日，

---

①克努特国王（995？—1035）：英格兰国王和丹麦国王，曾制订《克努特法典》。——译者注

布什总统前往斯德哥尔摩前几小时的讲话，更使他们的怒气有增无减。他说，京都议定书是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协定，它的“目标不现实，没有科学依据”。他说，他不会遵从一个“会造成负面经济影响，会使工人失业、物价上涨”的协定。

在外交领域，了巨用“表示关注”这种措辞，就已经算是一种严厉指责了，而这次的反应来得异常激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称美国的IJ定“令人震惊且会引起公愤”。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米初认为，美方的说法“极其令人担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全球性对外政策问题”。而欧盟说它“深感忧虑”。欧洲议会的反立则更强烈，它称：“为了满足美国公司的短期贪欲而牺牲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长期利益，这让我们感到可怕。”日本敦促华盛顷重新进行考虑。澳大利亚强调指出，以美国消耗资源数额尼；巨，它有责任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卫报》更是无所顾u，干脆就明称美国拒绝签署这一协议是一种“塔利班式的粗.暴破坏行为”。

在2000年的竞．叁活动中，作为总统候选人，布什的确说过他将会强行限制iN电厂的废气排放量，给人们留下了他当总统后会关注环境问E的印象。然而，就职典礼刚刚过去六个星期，新政府就撤消了此前公布的保护濒临灭绝的大马哈鱼和缚鱼的一些措施。然后，2001年3月13日，布什放宽而不是加强了对发电厂排放物的管制，这和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恰恰相反。他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环境保护局局长惠特曼的劝阻。惠特曼说，“我强烈建议您继续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她补充道，“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关系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会在国内引起反响的问题。我们需要表现出兴趣。”而总统辩解说，由于电力缺乏，我们的经济处于紧急状态，目前

获取更多的电力比处理排废问题更重要。紧接着，3月 20日，他下令放宽了对饮用水中砷含量的限制，第二天又推迟了旨在保护森林地带集水区的采矿规定的实施。

由于采取了这些举措，拒签《京都议定书》的决定似乎就更凸显了本届政府根深蒂固的轻视环保的态度，并成为美国人挥霍无度、漠不关心和高傲自大的一个象征。然而，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迄今为止，美国在环保问题上一直都在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连环境保护主义都是美国发明的。而现在，突然之间，似乎我们的环境政策代表了美国所有的错误行为，我们也被当成了坏蛋。我搞不明白，我们是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呢？

## 环境保护主义：美国制造

早期的美国人先是与法国人、印第安人，后来是与英国人交战，但他们与之交战最多的还是树木。斧头与步枪同是开拓疆土的必备工具，新殖民地的上空常弥漫着火烧木头的气味。让人们意识到像这样乱砍滥伐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的是查尔斯．狄更斯。他将 1842年沿国家公路旅行的情景写成了一本《美国札记》。到 1864年，人们对过度采伐的担忧变得认真起来了，乔治．拍金斯 ·马什出版了《人与自然》一书。该书认为，砍伐树木将给土壤和当地的气候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也因此而成了美国首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年，亨利 ·戴维 ·梭罗的遗作《缅因森林》呼吁建立国有森林。国会也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蒂谷成了公共公园。 1872年，国会将黄石定为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

园，自此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这一举措。不过最伟大的模仿者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是一位提倡保护资源的总统，共建立了17个国家公园和文物保护地，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他的远房亲属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步他的后尘，在大萧条时期成立了地方资源保护队，通过修建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来提供工作机会，而这些设施让我们至今仍受益匪浅。

1962年，雷切尔·卡森和她的重量级畅销书《寂静的春天》砰然面世。这本书被称为环保运动“让全世界震耳发联的一炮”。该书无可辩驳地阐明，我们将其视为进步的现代生活方式之基础的化学制剂，实际上正在毒害着食物链中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生物。卡森特别追溯了滴滴涕的破坏性轨迹，从为控制病虫害而向榆树喷洒开始，到鸟类的死亡、鱼类的恶性病变，再到对人类肝脏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卡森1964年因癌症去世时，她开创的事业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以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保护局。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想说的主要是，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是环境问题方面的先驱。开始它只是关注国内的问题，但在臭氧空洞这一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后来也逐渐担当起了领头的角色。

## 天空有个洞

1974年6月份的《自然》杂志登载了F·舍伍德·罗兰和马里奥·J·莫尼纳合写的一篇文章。前者是加利福尼亚大

学欧文分校的化学教授，后者是罗兰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文章是关于一组叫作含氟氯烃的化学物质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用于冷藏及空气温度调节的气态物质，文章的题目为《平流层中氯代氟氯甲烷原子对臭氧层的催化性破坏》。由于该文的研究对象和它那拗口的题目，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并不奇怪。文章开头很平淡，陈述了每个人都明白的事实：这些化合物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几乎为惰性的，因而无毒，但它们排人空气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它们的极端稳定性意味着这些气体会在空气中存留60到100年。作者指出，这些物质惟一能被破坏的方式，是一旦它们漂浮到大气层的上部就会被紫外线分解掉，这一分解被称为光离解过程。接着，作者抛出了他们的重磅炸弹："在平流层中对含氟氯烃的光离解能产生大量的氯原子，从而导致大气层中的臭氧遭到破坏。"

遭到破坏又怎么样呢？臭氧是氧元素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形式，淡蓝色，有刺激性气味，而且有毒性，那时人们很少关心它。在地面上，它被用于许多像漂白剂、消毒剂、去污剂之类的产品。在30英里高空的平流层，通过氧气和阳光中紫外线的反应也可形成臭氧。尽管臭氧层密度极小，又很薄，但不管怎么说，它对大多数的生命都至关重要，因为阳光中对植物、昆虫、鸟类有害且能导致人类患上皮肤癌的紫外线的一大部分都被它所阻挡。·罗兰和莫尼纳在文章中要阐明的是，这层对于地球上的生命也算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正由于含氟氯烃和紫外线在平流层的反应而被侵蚀殆尽。

但这纯属理论推测，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种糟糕的事情发生。工业界、公众和政治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如果臭氧层没有破损就不要急着修复。而且似乎它也不会破损。

这就到了1985年。这年的5月16日，《自然》杂志又刊出了一篇关于臭氧层的论文，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约瑟夫·法曼，他是英国南极考察队的一员，也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从1957年到1984年这27年间，法曼每年都要到南极去，而任务之一就是测量那里空气中臭氧的含量。尽管他了解罗兰和莫尼纳的文章，但对他们的结论还是持怀疑态度。直到1981年南半球的春季，他所测得的数据显示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大幅度减少，这才发生变化。开始他认为也许是仪器没有校准，于是便重新调校了仪器。但1982年和1983年所测得的数据仍然显示了同样的问题。到1984年，所测数据显示臭氧层比平均水平减少了40，而且“臭氧空洞”已经扩大到了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法曼重新翻阅了过去记录的数据，发现臭氧层的减少实际上大约在1977年就开始了。

大约在法曼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国家科学院也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估计，下个世纪，臭氧层即使真地减少，也只是小幅度的。但紧接着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也介入了此事。其光轮7号卫星每一个半小时就从两极上空绕地球一周，同时也用来监控臭氧层。起初该局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法曼的文章发表后，它检查了一下卫星设备，发现凡是某一程度下的任何数据均按照指令被忽略掉了，这自然是错误的。该局重新编制了卫星的程序后，证实那些“错误的”数据其实准确无误，甚至比法曼测得的数据更加糟糕。当然，对这个重要发现，起初有些人漠然置之。里根总统的内务部长建议人们只要带上遮阳帽、墨镜，涂些防晒霜就足够了。但当医生们估计，除其他科学家预测的损害之外,仅皮肤癌的病例就会增加1.　　3亿例时,就再难乐观得起来了。

事实上，天上的确破了个洞，需要修补—而且要快。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领导下，关于臭氧层枯竭的国际研讨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为了就分阶段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达成一致，各国政府1981年就已经开始谈判。谈判在1985年告一段落，通过了《维也纳公约》，鼓励各国政府在臭氧层的研究、观察和信息交换等方面进行合作。但其实也不外乎是达成了外交上典型的一纸空文，没有目标，没有抑制手段，也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义务。作为当时里根政府的一员，我记得与会者对形势的严重性甚为担心。许多人认为该届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至少会打个折扣，因为它总体上是反对政府出面实行管制的，而且又与工业界渊源颇深。但环境保护局长李·M·托马斯坚持认为，在这种事情上美国应该带头站出来。他给美国主要的含氟氯烃生产商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最终杜邦公司首先承诺开发替代产品，并逐步停止生产含氟氯烃。与此同时，1987年夏天，理查德·E·本尼迪克大使被派往蒙特利尔，率领美国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以期就削减并最终停止含氟抓烃的使用和生产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9月16日，代表们就《蒙特利尔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协议要求到1999年含氟氯烃的消耗量要在1986年的水平上减少50肠。本来这份协议要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但发展中国家被允许推迟十年执行其规定，因为其含氟氯烃消耗量相对较少，而且对于它们而言，转用替代品的技术难度较大。实际上，协议的遵从速度比人们预计得更快。2003年，大部分专家预测，到下世纪中叶之前臭氧层就会恢复原状。

当大气层二次出现问题，而且警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频繁时，许多人都期望这次能和解决臭氧层问题时一样，在美国的领导下达成一个明确有效而又得到广泛国际支持的协议，使之得到解决，至少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不能这样。但如同不少

全球性问题一样，臭氧空洞问题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原因单一，致害源不多且容易确定；不采取行动的后果显而易见；含氟氯烃已有完全足够的替代品。然而，由于全球的气候在发生变化，再加上二氧化碳在使全球气温升高中所起的作用，上述哪一条都不成立了。致害源数不胜数：你呼出二氧化碳，同样，你的狗，狗身上的跳蚤以及洗澡间下水道里的细菌也呼出二氧化碳，更不要说你的汽车和暖气炉了。而且，所有的主要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全球气候变暖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甚至于全球是否在变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 从臭氧到温室效应气体

1820年之前，没有人问过地球是如何获取热量的这一问题。正是在那一年，让一巴普蒂斯特一约瑟夫·傅里叶①开始研究地球如何保留阳光中的热量而不将其反射回太空的问题。傅里叶在参加学者团随拿破仑去打埃及战役时患上了粘液水肿—一种让人总是感觉寒冷的疾病。回到法国后，他整年披着一件大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对热传递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地球确实将大量的热量反射回太空，但大气层还是拦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将其重新反射回地球表面。他将此比作一个巨大的钟形容器，顶端由云和气体构成，能够保留足够的热量，使得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他的论文《地球及其表层空间温度概述》发表于1824年。当时这篇论文没有被看成是他的

① 傅里叶（1768–1830）：法国数学家与埃及学家。—译者注

最佳之作，直到19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记起。

1895年，瑞典物理学家斯文特·阿列纽斯读过傅里叶的论文后，研究出了第一个用以计算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影响的理论模型。他得出的结果是，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少约40%，温度就会下降4—5摄氏度（7—9华氏度），并可引发一个新的冰川期。同理，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的话，温度就会上升5—6摄氏度（9ˆ—11华氏度）。他还估计，大概需要3000年的时间来燃烧矿物燃料，才能使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那时小冰川期大概已近尾声，对一个习惯了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寒冷冬天的人而言，天气逐渐变暖似乎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

阿列纽斯发表其计算结果后不多几年，斯平德托普油田突现于世，然后又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发现了其它储量丰富的油田。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取代马匹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得多，而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也推动了对电力生产的需求。矿物燃料燃烧量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阿列纽斯的预测，但没有人关心这是否会对天气产生影响。当然，乔治·卡伦德除外，他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人为生成的二氧化碳及其对气温的影响》。根据1880年至1934年间从世界各地200个气象站收集来的数据，他计算出当时地球的气温已经升高了1华氏度（0.55摄氏度）。他预计，由于二氧化碳不断被排放到大气层，下个世纪地球的温度将会上升2华氏度（1.1摄氏度）。1956年，在进一步收集数据后，他公布的计算结果显示，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00年的290ppm（百万分率）增加到了1956年的325ppm。这一数据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一位年轻的博士后查尔斯·基林同年公布的315ppm相当接近。次年，这些数据和曲线引出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作者是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罗杰·雷维尔和汉

斯·聚斯，他们在文中指出，“人类正在从事大规模的地球物理实验，要将几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去”。基林在此后二十年里的测量结果更证明了这一点。基林曲线从1956年的315ppm稳步上升到了1997年的365ppmo

随着基林曲线的升高，它所预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对环境构成威胁的水污染和杀虫剂等，人们此前已很敏感，这时又开始留心气候情况了。自20世纪60年代起，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约翰·麦高恩就开始注意到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的水温在逐渐升高。到1995年，水温已经比1960年升高了将近3华氏度。大约在1963年，肯尼亚山的冰帽开始明显变小，到1987年已经缩小了40%。二十年内，北极的夏天暖和了6度，而且从196。年到80年代初，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了两倍。这些迹象引发了人们对其潜在影响及应采取何种政策性措施的广泛讨论。早在1965年，白宫一份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就提到了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1971年国家大气研究委员会的威廉·凯洛格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一次会议，研究讨论他所说的“因疏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问题。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迹象及对此的分析成倍增加。在1975年的《科学》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莱士·E·布勒克尔预测，在下个十年期间，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将会大幅度增长。两年后，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能源与气候》的报告。报告称，对于可能存在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们既不应当恐慌，也不应当无动于衷，而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年，威廉·凯洛格和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大气：已经并正处在危险中》一文。作者在文中要求制定一

部《空气法》，以使各个国家都同意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某个共同商定的标准。随着70年代的过去及80年代的到来，天气似乎一心要应验人们的预测似的。中纬度冰川退缩的速度从每年30米增加到了40米。1979年至1994年期间，阿拉斯加寒冷的北坡布鲁克斯岭脚下图利克湖的水温上升了3华氏度（5.4摄氏度）。北极的冰盖萎缩了6%，雪线也持续退缩，有关大气层的计算机模型预测的结果所显示的变暖程度更甚。1987年，联合国、加拿大和世界气象协会发起召开了一次会议，46个国家的330位科学家和决策人聚集在一起，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无意识地进行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实验，其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一场全球性核战争”。他们进而敦促发达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

不过，敲响全球气候变暖警钟的一年是1988年。首先，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超过了80年代曾创下短暂的高温记录的另外三个年头，69个美国城市，还有莫斯科，创下了最高的单日高温记录。在洛杉矶，温度计的水银柱指向了110华氏度（43摄氏度），一天之内有400个变压器爆炸。中西部遭受了自黑风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而黄石国家公园几乎要燃烧起来了。在这次浩劫期间，詹姆斯·汉森—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美国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温室效应的存在业已查明，此时它正改变着我们的气候。”他百分之九十九地相信，目前的高温表明确有天气变暖的趋势，而不仅仅是自然变化。他补充说，“我们正在以不正当的手段破坏气候。”可以说，由汉森这样的专家在美国参议院庄严的会议厅中所作的这番陈辞，标志着人类阻止全球气候变暖行动的真正开始。就在那个冗长的夏季，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多伦多召开会议，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开始着手准备即将于 1992年 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后来人们熟知的地球峰会）。这将是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影响深远的会议之一。

要想理解在里约热内卢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事情，首先要知道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形成的几股重要力量和主要观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有关科学的争论。尽管基林关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数据无人质疑，但其效应却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是汉森那些人，他们将之与处理臭氧空洞问题的经验进行了类比。在那次事件中，实际测得的数据证实了先前的科学预测之后，国际上立即采取措施，商定通过减少含氟级烃排放量的办法进行补救。这些人认为，既然不同寻常的天气又一次在证明科学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就需要做出类似蒙特利尔协议那种重大决策。另一方是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学家理查德·林德森为代表的一派。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及影响仍不明了，前景也难以预测。首先，近来许多天气情况都是“自……以来最高气温”或者“自……以来最严重的风暴”等等。而“自……以来”就意味着，在大气中二氧化碳聚积与天气开始变暖之前，灾害性的天气状况就已经出现过。此外，在中世纪，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到冰岛和格陵兰岛时，就曾出现过比今天还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期。此后大约在 1350年至 1850年间出现了小冰川期，继而气候重新回暖，而这其中并没有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影响。更有甚者，尽管从理论上说， 1940年到 1970年间气温应该持续加速变暖，但气象学家在这段时间观察到的却是明显的变冷过程。人们也很早就知道，一些自然事件，如地球公转轨道的颤动、太阳的明暗等等，会对温度和气候产生影响。但这是气候变化的部分或者全

部原因吗？另外，尽管地表温度记录显示全球正在变暖，而气象气球却发现，高空中大气的温度并没有变化，这也是事实。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气候情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于1990年公布，报告认为，大气中温室效应气体的浓度正在增加。它预测，如果情况“一切照旧”的话，在21世纪，每十年气温将升高0.3摄氏度(0.54华氏度),同时海平面每十年将上涨6厘米。因此，到21世纪末期，平均气温将比现在高出3–4摄氏度(5.4ˆ–7.2华氏度),海平面将上涨60ˆ–70厘米,大约为两英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进而认为，要保持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当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必须减少6000ˆ–80%,这意味着最重要的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基本上都要被关停。尽管这一结论是世界上两千名顶尖科学家的权威看法，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根据计算机模型的测算，在过去一百年间，气温应该增长约1摄氏度（1.8华氏度）左右，但实际测得的温度增长仅约为0.5摄氏度(0.9华氏度)。而且计算机模型无法解释1940年至1970年间天气变冷的情况。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意识到，在运用计算机模拟云层方面，它遇到了麻烦，计算机不能完全涵盖某些细节情况。因此，这场科学家之战还得打下去。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兴起环境保护主义。尽管欧洲没有和美国类似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但1952年的伦敦大雾成就了1956年的空气清洁法令，而欧洲大陆上的人们也注意到河水、溪流还有空气正在变得污浊不堪。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曾在荷兰住过，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荷兰媒体讨论莱茵河横穿欧洲后到达阿姆斯特丹时糟糕的水质情况。更重要的或许是，酸雨在

欧洲和在美国一样开始成为一个问题。1974年4月间，苏格兰雨水中测得的酸度为正常水平的1500倍。1982年，德国黑森林地区的树木有7%已经或濒临死亡。三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0%。在瑞典，198。年已有4000处湖泊干涸，另外5000处也为时不远了。出于对环境的担心，法国于1971年设立了环境部，其它欧洲国家不久也纷纷开始仿效。

公众对环境事务日益增长的关注与另外一种政治潮流恰好不谋而合。尽管欧洲人历史上都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但不少人在20世纪还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无神论思想。当然，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遭到了失败，共产主义70年代开始在走下坡路，而社会主义也被主流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所同化，已和保守主义相差无几。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于是它找上了环保事业。环境保护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无懈可击。保护环境的人自然会被看作正义的一方。这使得反对集团化和反对全球化成为合理的行动，当然，它需要有大政府和强管理才能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加给西方社会。欧洲大部分左派都接受了方兴未艾的绿色运动，并很快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979年，绿党进了瑞士的国会，四年后，绿党在德国全国选举中赢得了近6%的选票，成为议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最终，绿党将成为德国执政联盟的一部分，一位叫约什卡·费舍尔的前左翼激进街头示威人士还占据了外交部长一职。这种环境保护主义和居于主流的美国环保组织相比，更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只关心崇高的革命事宜和方针政策。多数欧洲国家的环境部门，如果不是绿党本身掌权的话，最终也会被绿党的观点所支配。正是他们在联合国各个工作实体和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成了欧洲的主要代表。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主张在两届里根政府和1988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间平稳地转向了右倾。这种新的保守主义的一大主要表现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对制度的约束，尤其反对据认为掌握在不创造经济价值的官僚手中那些束缚有经济效益企业的条文。里根的第一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就削减了旨在保护濒危物种项目的资金，推动了将偏远荒凉的地区租借出去开发石油、天然气的努力，并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大幅度减少了环境规划管理方面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约翰·苏努努的看法，他作为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在里约热内卢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原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曾率先制定过控制酸雨的规定，并自视为环保主义者。但他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往往是意识形态上的，由于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破坏环境的危险性，也无法证明其提出的某条措施的有效性，所以常常阻碍经济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一事上，苏努努坚持认为，大幅度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量代价非常昂贵，并且尚无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已经严重到了要付出这种代价的程度。他说，“如果你要做出的决定牵涉到上万亿美元，会影响到百万个工作岗位，就应该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是被感情所左右。”在此问题上，苏努努很可能反映了美国参议院的态度，而任何国际条约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布什政府仔细掂量着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开始小心翼翼地为里约热内卢会议做准备。

工业界同样也在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证据和因其而致的潜在成本。在臭氧空洞问题上，只要危险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生产商就极力反对研究开发含氟氯烃的替代品。一旦臭氧空洞问题证据确凿，其危险性质也确定之后，工业界即迅速行动起来做出了必要的变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一些。任

何相关的法规都会打击主要工业和整个经济领域内的数千家公司。目前它的证据尚不确凿，未来造成的损害也不清楚（甚至有人说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有利），而且补救的措施代价又十分昂贵。因此，美国工业界准备施加影响，争取得到最灵活的结果。

欧洲工业界的态度则多少有些不同。它并不是高枕无忧，但它缺乏美国公司对政府积极施加影响的传统和能力。此外，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无须花费巨资。法国正在转人核动力化的进程，这意味着法国无论如何都会大量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量。因此法国工业界并不需要做多少工作。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一直给煤矿开采业以补贴，有意使煤炭继续作为发电厂的主要燃料。不过撒切尔政府早些时候已经决定停止提供补贴了。同时，英国又在北海属于自己的区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气田，这使得英国政府可以方便而又经济地将主要燃料从煤炭转向清洁得多的天然气。因此，英国自然也会大大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德国工业界是最划算的。统一之后，德国接收了原东德破旧低效、以煤和泥炭为主要燃料的工厂，并正在有计划地关停并以现代化的设备取而代之。原东德工厂的设备太破旧，实际上，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全国的排放量还是会大量减少。至于其它欧洲国家，由于都在欧盟的框架内，它们可以从英、法、德的排放量减少中获益。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增加各自的排放量，因为欧盟的整体排放量无论如何都会有所减少。

最后，还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将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关注”看作是限制它们发展的阴谋。总之，按照它们的想法，要让它们承担任何义务，就要给它们以大量的发展援助。欧佩克国家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殊分支，而它们根本不想听

任何关于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之事，真是奇怪，奇怪，真奇怪。

就在这几股力量都想在里约热内卢的会议上各显神通之际，联合国委派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安排议事日程，并就一些协议举行先期会谈，以便 1992年 6月地球峰会正式召开时各国政府首脑能够签署。最后确定的议事日程包括：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条约，一项保护森林的计划，一项名为“ 21世纪议程 ”、旨在全面引导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的雄心勃勃的框架方案，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这最后一项成了争论的主要焦点，并最终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出台。这次会议的方式深受蒙特利尔协议经验的影响。所有的争论在本质上可归结为两个问题：要不要按蒙特利尔协议对待臭氧问题的方式来为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削减设定目标和时间表？是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加进来？

1991年冬天，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协商先前提出的气候变化的条约，这场戏就此开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穆斯塔法 ·图勒巴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说，“ 各地人民都将 1992年看作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然而，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认为，要稳定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就需要减少 6000ˆ—80%，但考虑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几乎没有人准备考虑削减这么大的幅度。各国考虑的最激烈的提议是到 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 1990年的水平上。这项提议由欧共体提出，并得到了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支持。这一目标并无科学或经济依据，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美国却少有地和欧佩克国家结成了同盟，反对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标

和时间表。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明确表示它们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指出，如果指望它们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到 1991年夏天，这场战役转成了堑壕战。在 7月份于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国会议上，欧共体、加拿大和日本全都要求美国参加进来，承担冻结排放量的义务。美国以缺乏科学依据为由加以拒绝，．此举引发了欧洲领导人对之少有的严厉批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想要的只是一般性原则，而其它各个国家都想承担义务。”大不列颠的立场尤其引人注目，它不仅承诺要减少排放量，而且明确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美国应该尽一份责任。人们也注意到，美国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得像中国、印度等未来的污染源可以轻易地对整个事情置之不理。一个月后，像是受到提示一样，一批发展中国家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对环境问题承担义务，并要求对它在环境方面提供的合作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马来西亚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次会议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须承担义务，它将对其进行抵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环保组织执意要他履行先前说过的要成为“环保总统”的诺言。里约热内卢也成了名流们关注的焦点，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告诉观众，“整个人类正处在危险之中。”峰峦俱乐部组织了一场群众运动，要求总统同意签署强有力的协议，在峰会上起到领导作用。世界资源研究所暗示，如果总统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他会很容易受到反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指责。国会中的民主党领袖提出议案，要求到 200。年将美国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保持在 1990年的水平上—这也是欧共体在劝说美国接受的义务。尽管面对这样的压力，苏

努努也离开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位，布什还是坚持在目标和时间表方面不承担义务。在联合国，美国谈判代表坚称，要让美国承担代价昂贵的义务，必须得有明确的数据和恰当的科学依据。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得出了矛盾的结论，这一来更加坚定了美国谈判代表的立场。报告建议采取行动来减少排放量，但又称现有的资料尚不充分，不足以促使我们采取过猛的行动。

如果说这份报告对科学家们是个好消息，那么对布什也是如此，他的政府可以继续坚持其立场了。美国倾向于签署一项条约来促使签约国减少排放量—但减少的方式和时间应建立在确切的科学发现之上，并要与各国的基本需要和社会制度相一致。随着里约热内卢会议的临近，其它工业国家威胁要在承担冻结排放量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将美国排除在外。布什则针锋相对地威胁说，如果美国遭到孤立并成为攻击对象的话，他将不参加此次会议。最后，欧盟认定，即便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也胜过一项缺少美国参与的有力条约，于是放宽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后文件，承认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要求签约国到2000年将各自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但这项条约并非强制性的。它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而后者只需付出良好的意愿即可。

布什最后还是在6月13日参加了这次聚会，确切地说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特德·特纳和简·方达也到场了，还有雪莉·麦克莱恩和杰里·布朗。吉米·克利夫演唱时，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旁轻声地敲着鼓。欧洲人宣布将为环保提供总额达40亿美元的援助，这使美国吝音的投人成了人

们耻笑的对象。他们还发表声明，确认了他们减少排放量的承诺。当被问及欧共体是否正在扮演新的领导角色时，欧共体的秘书长劳伦斯 ·简 ·布林克霍斯特说：“可想而知，我们正在走向那个岗位。”然而，布什却坚持说，“我们是领导者，不是追随者。”但这次会议的代表已今非昔比，待他说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拿来谈判的”这句话后，他连仅存的一点同情也失去了。实际上，这一点正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 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

事实证明，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的道路是曲折的。第一个波折很快就出现了。里约热内卢会议结束仅五个月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比尔 ·克林顿就在 1992年的选举中击败了布什。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一向得到环保主义者更多的支持，而且这次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前参议员阿尔 ·戈尔，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的忠实信徒。还是学生的时候，戈尔就已经深受基林的研究及其所揭示的问题的影响了。在参议院，戈尔就支持制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在他的畅销书《平衡中的地球》中，戈尔对新的环境保护政策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包括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对机动车提出更高的汽油英里数要求，以及向使用非可再生材料的生产商收取费用等等。作为副总统，戈尔大有机会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成了新一届政府中环保人士的带头人，立即就制定了一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于 1993年 10月予以公布。这项计划和其它措施共同促使美国承担起了到 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 1990年水平上的义务，而这正是世界其他国家在里约热内卢一直要求美国做到

的。几个月后，各国在里约热内卢达成的协议开始生效，因为它的签署国已达到必需的数量，其中也包括此时已非常支持这一协议的美国。

但是，其后的道路马上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1994年11月，共和党四十二年来第一次在众议院获得了控制权，并选举脾气暴躁的纽特·金格里奇为议长，其权力可以说在美国政府中仅次于总统。他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在一次报纸的采访中暴露无遗。在那次采访中，他说，“我热爱环境，但我在热爱环境时很吝音。”1994年这批人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华盛顿或者说世界所见到的最保守的一批共和党人。他们讨厌大政府，而环保主义对他们而言，就代表着大政府。在选举获胜后不久的发言中，犹他州的众议员吉姆·汉森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关闭那些（国家）公园，而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唐·杨表示：“我看到一棵树，就如同看到一张用来揍鼻涕的纸。”他还补充说：“环境保护主义者是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是民主党的工具。他们现在不是美国人，过去也不曾是美国人，将来也不会是美国人。”来自爱达荷州的女议员海伦·切诺韦思插话说，“环境保护政策是由一种感情上的惟灵论所驱动的，它威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侵蚀着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和党人是对是错值得商榷，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没有丝毫的怀疑。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动态却恰恰相反。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比较小的欧洲国家，社会党人的政府已经开始执政。由于长期支持环保事业，它们发现自己目前越来越依赖于绿党的政治支持。在德国，政府现在由社会党和绿党的同盟联合执掌。绿党之所以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找到

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如酸雨和污染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在争取洁净的饮水、空气和健康食品过程中所获得的道德感所致。除此之外，绿党的受欢迎还源于，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满足了，一种日益明显的欧洲独立感。随着欧共体演化为欧盟，并着眼于“强化”其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某些政策也成了表明欧洲性的手段。当然其中之一便是单一欧洲货币方案。另外一个是环境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事由，所有的欧洲人都可以因他们处于领导地位而骄傲。同时，这也是表达他们对美国之怨愤的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环境保护主义，尤其是应付气候变暖方面的政策，成了欧洲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是欧洲的独立宣言。

天气继续默契地配合着这些厄运预言家们。1995年1月，鲁道夫·德尔瓦莱博士—阿根廷国家南极研究所的地球科学研究室主任，前往离南极洲半岛不远的詹姆士·罗斯岛上的一个观察站，在这个寒冷大陆的短短夏日里进行研究。1月中旬，拉森陆缘冰架上一个阿根廷基地里的同事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他们那里不断发生冰震。1月23日，同事又通知他，“鲁迪，要出事了，冰架即将崩塌。”德尔瓦莱乘着一架轻型飞机，在这个一千英尺厚、罗德岛大小的冰架上空，亲眼目睹了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冰架就在他眼前崩塌了。“真是蔚为壮观，”他说，“一个曾经有四十多英里宽的冰台……看上去就像是被孩子撕碎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一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哭泣。”再看看这块冰架北面突人威德尔海的部分，德尔瓦莱和他的同事们预测它也将在十年内爆裂。

这是那年在气候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但远不是惟一的一件。在连续五个没有结霜的冬天之后，新奥尔良州的蚊子、蟑螂和白蚁泛滥成灾。大西洋那边，西班牙人正连续四年遭受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在俄罗斯，莫斯科舍列梅季耶沃机场的沥青路面都变软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里约热内卢达成的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会议开幕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各个签约国所宣布的减少排放量的计划是否够量，如果不够，则要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鉴于欧盟日渐强硬的态度和美国因克林顿政府上台在立场上所发生的转变，如果这次缔约方大会会议认为一切都好，那才令人吃惊呢。事实上，《柏林训令》判定这些计划和进程并不能令人满意，并要求通过有约束力的协定或借助其它法律工具来进一步加强各国的责任。这则宣言实际上重新开始了里约热内卢谈判。

其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拥有 2500位科学家，它发布的第二份报告似乎证实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说法。他们的计算机模型也日趋完善。科学家们这时可以预测过去了，也就是说，计算机所显示的过去应该发生的事情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新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确证了 1990年的研究结果。其中的关键语句为：“对证据的比较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具有可知的影响。”科学家们预计，到 2100年，气温将上升 1至 3.5摄氏度，这将造成海平面连续上涨和降水量增加，某些地区会遭受更猛烈的暴风雨，其它地区则会为严重的干旱所困。这份措辞谨慎的报告承认，由于计算机模型不能很好地处理云层、洋流和尘粒的情况，所以人们有理由对其结论待怀疑态度。不过，当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1996年 7月在日内瓦召开时，展示在代表们面前的世界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由副国务卿蒂姆·沃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很快行动起来，带头为解决问题做出了努力。《日内瓦宣言》的主要蓝本就是美国的一份政策声明，它承认并赞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结

果，要求各缔约方确定有法律约束力的中期目标，以限制并大规模地全面削减各自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这次美国不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带头向目标和时间表发起了冲锋。第三次缔约方大会计划第二年在京都召开，留给它的任务只剩下就细节部分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条约了。

沃斯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很受欧盟的欢迎，但在其它许多国家那里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设立有约束力的目标的建议，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则一味闪烁其辞。他们不同于欧洲人，达到正在讨论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很难。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在中国的带领下再次强调，它们既不愿为发达国家在排废方面的错误付出代价，也不允许发达国家用气候变化这种现代殖民手段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只是作为感兴趣的旁观者去京都，也许它们还会接受西方的援助。但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的商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首先，英国有大量的天然气，法国已经核动力化，德国可以通过关停原东德破旧落后的发电厂来帮助其达到目标，美国却什么都没有。事实上，环保组织会坚决反对在美国搞法国式的核动力化。一位总裁开玩笑地建议吞并墨西哥，然后关掉那里的一些发电厂。此外，作为基准的1990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那年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低得出奇。而现在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增长，而且移民大量涌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的排放量自1990年来剧增，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毫无生气，人口正在减少，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要达到将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这种目标，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比别国大得多。最后一点，他们认为衡量标准有误，而且他们没有因为一直表现良好而受到好评。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相比，美国已大大降低了其单位产

出的排放量，降幅比英国或法国要高出50%还多。对增长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生产商和经济体系而言，着眼于排放总量而不是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似乎是种惩罚。因此，美国企业界建立了全球气候联盟，以对抗他们担心会在京都达成的对其不利的协议。

这个联盟主要坚持两点。第一，这份协议会减缓经济增长，造成失业。政府曾做过一个经济分析。结果显示，若采取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0美元之类的措施，到2000年排放量就会降至1990年的水平，签署协议后的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不到1%，但之后实际上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不少独立分析家认为政府的预测过于乐观。一项基于著名的沃顿经济预测协会模型的研究表明，要达到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目标，需要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2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这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幅度大于2%，而且会失去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商界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这份协议如约签署，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未来最严重的污染源是发展中国家，可它们已经被免除了履行协议的义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了这样一项协议，发展中国家会吸引美国公司将工厂迁址海外，从而加剧美国工作岗位的减少，但全球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环境保护主义者指出，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均未包括假使我们不采取行动的潜在代价，即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有一半成为现实，其代价也将是灾难性的。这话对欧洲的领导人可能会起作用，并一定能打动岛国协会的首脑—但美国国会却不管这些。国会的态度在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中反映得十分清楚。那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是痴迷冲浪的达纳·罗拉巴赫，一位来自加利福

尼亚的共和党人。按照科学家们的预计，下个世纪海平面将上涨 3英尺，美国 60% 的湿地会被淹没，淹没面积将和康涅狄格州一样大。有人告诉罗拉巴赫这一点后，他回答道：“我很想问一下，这对浪头的形状和冲浪的可行性有什么影响。但我不会问。我会等以后到了非正式场合再问。”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民主党人，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罗伯特 ·伯德和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 ·哈格尔则更为严肃一些。 1997年 7月，即京都会议前夕，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申明参议院不会考虑通过任何损害美国经济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条约。当美国代表团即将登机前往京都时，这份决议在参议院以 95票对 0票获得通过，给他们奉上了一纸送别函。

那年 12月，聚集到京都的有三部分人。发展中国家派来了 100多名代表—我怀疑他们主要是来参观京都古老的寺庙和欣赏日本故都景色的，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同意削减排放量。第二部分人是欧洲人和他们那些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亲密盟友，他们寻求的是将排放量大幅削减至 1990年以下的水平。最后一部分人的核心是美国人，外围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日本人。对美国人来说，减少排放量是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们的压力最大。但这部分人的其他代表也在考虑如何才能达到各自的目标，并希望美国人能保护他们不至于做出太大的牺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谈判颇为复杂，直到最后期限过后的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但实际上只有四项议题—涉及哪些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目标与最后期限。

## 温室效应气体

一般说，温室效应气体主要指的是燃烧矿物燃料时产生的

二氧化碳。但二氧化碳只占大气中所聚集的温室效应气体的“%左右，另外35%为甲烷（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稻田）、含氯氟代烷烃、含氢氟代烷烃和一氧化二氮。由于通过蒙特利尔协议后含氯氟代烷烃的排放量已在削减，美国派的这部分人便想将之包括在内，以便更容易达到最终的目标。

## 二氧化碳汇

森林和海洋可吸收目前排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55写，这样就形成了“二氧化碳汇”。二氧化碳汇有助于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因此，像美国东北部那样重新造林便可大幅度减少净排出量。实际上，碳建模协会有证据表明，如果将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美国可能不是个二氧化碳纯排出国。不管怎样，美国这一派想把二氧化碳汇也算在内，以便易于达到最终目标。

## 排放量交易

排放量交易是一种利用市场的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减幅的方法。此事说来可能十分复杂，但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一旦确定了排放量目标，排放者将各自分得允许其排放的许可额度或配给额度。如果某个排放者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全部的配给额，他或她可以将之卖给那些有超过限度危险的排放者．如果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的话，这个方法会充分发挥效力。在发达国家，为达到缩减排放量的目标而关闭正在运行的发电厂，代价将十分昂贵，等于白白扔掉部分投资。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建新厂，如果卖出其排放许可额度，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得到必需的资金来建造虽比较昂贵却更加清洁的电厂，而发达国家的电厂也可以继续运行，直至它再也无利可图为止。

这是一种双赢的情况，但参与者越多就越好，尤其是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话。美国人自然希望进行这种交易，所以他们开始敦促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只要出于自愿即可。

### 目标与时间表

美国人仍愿意将目标定在1990年的水平，但并不想低于这个标准。事情已经很明显，包括欧洲人在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原来在里约热内卢所计划的那样，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将最后期限定为2010年，将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欧洲的意见），还是在2008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意见）。显而易见，后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使新技术得以应用。这自然是美国所希望的。

欧洲各国和那些岛国开始时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奢侈浪费，美国的经济政策自私自利，并且经常滥用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特权地位。它们认为，所有这些二氧化碳汇、温室效应气体以及排放量交易问题，都是美国想出来的巧妙逃避办法，目的是避开它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美国的虚伪本质就在于，一面声称要做世界正义的领导者，一面又四处找空子钻。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占世界的4%，它的污染量却占全球的25%还多。美国现在要么站出来，要么就缄口不言。所以欧洲反对美国寻求的弹性目标，并再次将之视为阻挡世界上普通民众挽救环境的惟一障碍。

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的开幕辞等于是为本次会议定下了基调。他先是表扬了美国人创新的传统，然后话锋一转说，“人们一般都期待先驱者定下比较高的标准。决不能让后人遭受我们的疏忽之累。”作为欧盟的发言人，他进而建议，

到 2010年排放量要达到在 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 1500。这一标准虽低于岛屿国家所提出的 200o，却远高于美国阵营的计划。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的目标意味着美国要在现有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近 35000

接下来，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 ·米彻也不甘落后，他呼吁他的美国同行做出“更大的努力”，站出来助他们一臂之力，提议到 2010年将交通和工业的排放量在 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少 2000。此外，欧洲人不想考虑什么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以及除三种主要温室效应气体之外的其它气体问题。他们想真正减少实际的排放量，而不是弄虚作假。当时，副国务卿斯图尔特 ·艾森施塔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明白，如果他带着这样的一份协议回到华盛顿，他非被绞死不可。到达京都前，他曾说过“我们想达成协议，但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其时副总统戈尔插话说，“我们随时准备退出我们认为不起作用的协议。”然而，没有起作用的却是副总统的虚张声势。欧洲人拒绝让步，一周后，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为了挽救这次会议和他那环保主义者的名声，戈尔不顾一切地飞赴京都，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他指示执拗的艾森施塔特要“表现得灵活一点”。结果达成了一种日本式的妥协。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范围得到了认可，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笑气）和三种替代含抓氟代烷烃的卤烃。二氧化碳汇这一条他们也拿到了，但定义和吸收的计算标准则留待日后再另行研究（细节部分往往都由下边去干）。不过排放量交易问题没能通过。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协议规定，在 2008至 2012年之间，欧洲要在 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 800，美国减少 700，日本减少 600。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进来”。一旦经占到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签署，议定书将立即生效。香槟酒塞终于按时开启，疲惫的谈判代表和大多数参与这项环保事业的人一起欢庆了协议的达成。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他们在海牙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

## 海　　牙

京都的整个讨论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性质。欧洲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却为了排放量削减目标上15%的差异而相互攻击。长时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要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以免到2100年人为地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需要马上削减60%–80%的排放量。但在京都，没人提出哪怕是近似的方案。另外，发展中国家即将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这一点早已十分明显。因此，只要暖化是人为造成的，气温上升就会持续下去，京都议定书到2100年只会对气温产生零点几摄氏度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那些岛国，大部分国家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当然，欧洲方面很有诚意，但欧洲可能是在牺牲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装好人。艾森施塔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此看成一次能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机会。至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那种方案，他们多半都是大输家。因此，它们采取的批判老殖民剥削者并拒绝与之合作的策略，也许在感情上能带给他们满足，但终将会自取灭亡。美国阵营的外围国家则尽力想讨各方

喜欢—本国的选民、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促成这项协议的是日本人。美国人最后利用自己的机构设置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们与欧洲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签署完协议之后，他们不一定能保证它在国会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保不准会闹上法庭。他们不得不一边向国会表明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一边还要向己方环保主义的支持者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标准还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他们会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正如前文所述，对后者的恰当回答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了全球的25%强，并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难道有人想让这个发动机减缓速度吗？没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为子孙后代会有大难，那就得接受科学家们提出的60%一80%的排放量削减幅度—当然，除非这意味着现在就大难临头。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连欧洲人提出的减幅都那么低。再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项协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又进一步降低人们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所付的价码。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能为惟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即新技术的应用争取时间而已。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来配合，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满意，甚至于热衷于它。在京都，每个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体系还有待于去设计。

正如事先所料，这项协议一到美国参议院就石沉大海了。多项研究均认为，为避免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成本大概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有一

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50%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仅有17写的人表示愿意为避免这个问题而每加仑汽油多付50美分。除了成本因素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项协议肯定不会在美国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从京都会议到正式签署，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对任何一个地道的谈判代表而言，这样的“细节会议”一向是重开谈判的好机会。关键性会议是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还有待法院裁定，这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后一次能和一届真正支持环保事业的美国政府谈判的机会了。这次领导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一位环保事业的资深人士和国际谈判老手。洛伊非常需要欧洲人伸出援手，需要他们慷慨地同意将森林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需要在排放量交易方面获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他还希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施加一些压力，当时这些国家正由于自己的废气排放问题遭受漫天浓雾之害，这些烟雾一次能笼罩整个地区达几天之久。

洛伊后来向我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洛伊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欧洲的谈判代表均来自环保部。洛伊注意到，当他遇到欧洲国家外交部或贸易部的官员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环保部总显得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欧洲谈判代表也真地害怕无所顾忌地缔结一项协议，到头来却因其自身的漏洞而作废。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任何欺诈行为都会使他们想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希望破

灭。不管怎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洛伊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终于达成了一致，在二氧化碳汇和排放量交易方面对洛伊做一些让步，这虽不是他想要的全部，至少是他所需要的。感恩节的凌晨4点，英美草签了一份三页的工作文件，并再次开启了香槟酒庆祝。但普雷斯科特还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欧盟代表，而第二天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

## 马拉喀什

乔治·W·布什本来完全可以让京都议定书继续沉睡下去。考虑到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反对，它几乎不可能获得所必需的占全球排放量55%的55个国家的承认，这样协议也就不会生效。或者布什可以重开谈判。然而，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他公开宣布美国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无论是对美国的还是对欧洲的环保人士，布什都没有什么好感。作为石油专家和商人，他相信的是钻井取油和经济增长，对政府调控则持怀疑态度。他的能源计划包括：鼓励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开采石油，提高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煤炭技术的资金支持，以及放宽对燃煤发电厂的限制。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对我所言，“布什政府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者的新动向。他们痛恨共产主义者。”第二，布什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并确实认为在京都商定的措施会损害美国经济。他的经济顾问均来自能源供应界和铝业界。第三，在总统竞选期间，为了森

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他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他的声明之所以发表在第一次出访欧洲前夕，也是为了让欧洲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明白，华盛顿的风向变了。

除引起了一场外交和传媒风暴外，布什对京都议定书的拒签，还使欧洲人进而担当了以前从未担当过的领导角色。他们决心告诉美国，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并决意积极推动条约的签署进程。布什访问期间劝他们不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只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没有美国的签字，欧盟必须要把美国阵营的所有周边国家都拉上。他们提出，森林二氧化碳汇不要按固定标准分配，而要分国家进行谈判，这样就显得很宽宏大量，加幸大、俄罗斯尤其受益匪浅。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想要更多的排放量交易，这一点也充分得到了满足．最后，为了将所有其他人都纳人到这个体系中来，欧盟同意了弗朗克 ·洛伊和斯图尔特 ·艾森施塔特一直要求得到的东西，甚至更多。2001年 11月 10日，经过修订的《京都议定书》在马拉喀什签署并开始生效。副国务卿保拉 ·多布里扬斯基只能坐在一边看着其他代表签署协议。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美国这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创始者看作是它们的敌人。

## 应该做些什么

2001年 3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三份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前两份报告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份权威性报告称，气温在 20世纪升高了 0.6摄氏度；气温升高发生在大气层离地面 8公里以内的地区

（这样就解决了之前地面温度数据和大气温度数据不相符的问题）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海洋温度也有所升高。降水量有所增加，大雨雪次数增多，云层覆盖亦有所增加。人类活动引发的气体排放继续改变着大气的成分，据信会影响气候。有更为强有力的新证据表明，过去50年内，全球气候变暖大都因人类的活动而致。这份报告的语气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计算机所做的气候模型得到了改进，预测过去的能力加强了，并捕捉到了过去计算时没有包括在内的因素，如太阳活动等。科学家们承认，他们无法模仿气候的所有方面，并强调指出，在云层及其与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方面，尚有不确定的因素。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下个世纪的温度将会上升1.4—5.8摄氏度。这一升幅大于20世纪的升幅，而且很可能在过去的一万年间都没有先例。所有的预测都假定人类的活动一切如故，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会出现更多极端恶劣的天气状况，旱灾会增多，冰川和雪线将继续退缩。这些变化也可能会因为某一事件或某些事件的出现而突然而不是逐渐地发生。

没有人明确知道其中哪些会发生，因为人类和自然的活动肯定都要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许能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许会使其恶化。考虑到现在的知识水平，忽视这一问题似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赌博。另一方面，要确保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幅度地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但因此而造成的经济后果无人能恰当地估算出来。多数的观察家在内心深处均认为，总会有新技术或人类行为的其它改变来缓解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似乎是惟一现实的答案。既然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我们就应该—以美国的方式，从最好处着想—找出我们自己的出路。

但这需要时间，而现在问题却在不断恶化。拿一些旨在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措施当保单似乎很明智。惟一的问题是这份保单的成本和效果如何。一项价值不菲的保单若是起不到什么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作用，那它就不会有吸引力，除非它能使我们朝降低保单的成本或缓解作用更强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方向迈进。对美国而言，原来的京都议定书肯定是一份价格昂贵但缓解作用甚微的保单。它是否是通向正确终点的一步也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过马拉喀什会议的修改，京都议定书已大有不同，而且代价小得多了。美国轻易就能付得起这种代价，本应该在马拉喀什就签署这份协议。它在经济方面是划算的，并能免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极大怨愤。既然我们在马拉喀什错过了机会，如果我们在“9.11”事件之后，作为美国和那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朋友们之间团结一致的表示，而签署这份协议，也堪为英明之举。但我们也错过了这次机会，不过现在若亡羊补牢仍为时未晚。

# 第六章
# 我们只相信武力

“美国一贯宣扬法制，到头来却总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位美国大使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制国家。这里律师的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我国每千人中的律师比别的国家高出好几倍。比如，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拥有律师的数量比整个日本的还多，此话一点不假。任何一个从事国际商务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签任何一项商业合同要考虑的法律事务都比别处多得多，文件也比其它国家的厚出好几倍。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多数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身于律师的状况，也只有在美国，学习法律才往往会成为通往大公司顶级职位的途径。在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总是法治的捍卫者，尤其是总把它作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挂在嘴边四处宣传。（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自己就经常身体力行。）当然，在国际上扩展和保护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一直担任牵头发起国际条约谈判的角色.

然而，2002年4月尼可尔·德勒撰写了一份题为《权治还是法制》的报告，评论了美国对八项主要国际条约的反应。作者指出，美国“通过妥协或行动，以某种严酷的方式破坏了我在本报告中仔细研究的每一个条约”。当然，美国是几千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要说它从未完整地执行过其中哪怕一个条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近年来，美国拒绝或削弱了好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禁止小型武器贸易的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等。要说明造成美国和世界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际社会限制各种武器，以及我们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 布　雷

地雷深深地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地躺上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者是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然后，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里时，它就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者炸断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它才大量投人使用。当时坦克刚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了一个

致命的弱点：敌人可以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可能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以弹到臀部的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以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以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个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它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常发现在撤退的时候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己方的地雷所造成的。

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替察和游击队的青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得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

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

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

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惟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七十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然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的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人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人到了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埃文斯一起提出了将美国杀伤地雷的出口暂停一年的议案，199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剂强有力的

催化剂。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从此开始考虑，既然美国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事业就真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1993年2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法国将禁止地雷出口；很快十几个国家纷纷效仿，发表了类似的声明。1994年6月，瑞典国会要求全面禁止地雷。8月份意大利议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所有地雷的出口。接着，压轴戏开场了，在当年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呼吁“最终根除”地雷。紧接着，他在1996年5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到1999年，美国将在除朝鲜之外的地方停止使用“迟钝”地雷，在达成国际协议前将无限期地继续使用“灵巧地雷”（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爆的地雷），将努力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协议。

这就为1996年10月召开的引人注目的握太华会议奠定了基础。加拿大遍邀所有赞成全面禁止地雷的政府共商大计。与会者包括50个国家的政府和24个观察员国家的代表，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团体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宣布，加拿大政府计划一年后再召集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愿意加人的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一项条约，立即全面禁止所有种类的杀伤地雷。与联合国在同一问题上拖沓的会谈相比，它成功地提供了另外一种快捷的方式。

但是，正当握太华进程积聚力量时，美国的说法听起来却带上了几分迟疑。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卡尔·F·因德弗斯说，“我们不准备明确确定日期，但我们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如果握太华进程能够在那一时间框架内完成，并且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支持。”这话口气上虽然肯定，却有一大堆的“如果”。实际上，美国在地雷销毁方面正走在

世界的前列，它已经销毁了武器库中的300万颗地雷，为世界范围内的地雷销毁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美国还不断延长地雷出口的禁令，并在联合国提出要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奉行”禁止地雷的政策。然而，随着握太华进程的展开，美国官员却开始表示更偏好联合国拖沓的进程了。

这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想尽力达成一项能满足其关键性防御需要的条约，因此它要求有三点例外：须允许在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使用地雷；须允许美国在复合反坦克系统中继续使用地雷；美国须保留使用“灵巧”地雷的权利。它辩称，朝鲜应不受任何条约的束缚，因为它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而地雷是3.7万保卫汉城的美军和非军事区另一侧100万北朝鲜军人之间仅有的屏障。无论如何，灵巧地雷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到时间就会自爆，所以不应该在被禁之列。

这一立场使莱希和其他国会领袖及世界上众多媒体一片哗然。大不列颠的戴安娜王妃在去安哥拉期间看望了地雷的受害者，以此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立场。克林顿8月份相应地改变了方针，同意参加将于约两周后在奥斯陆进行的握太华进程的会谈。这些会谈系为条约的最后制定和12月份在握太华的签署所做的准备。但是，尽管美国同意加人握太华进程，它仍然坚持那三点例外，至少是暂时性的。克林顿收到了一封十位退休四星上将写来的信，称这项条约“存在明显缺陷、没有根据、无法实施且徒劳无益”。这封信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保持原有的立场。经过又一个星期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克林顿于1997年9月17日宣布，如果这项禁止地雷条约不作修改的话，美国不会签字。因此，当122个国家，包括美国所有的亲密盟国，于12月初在握太华签署《禁止地雷条约》时，

美国只能远远地旁观。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国家的责任与众不同……作为总司令，在派我们的战士去保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或其他人的自由时，不会不尽一切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但克林顿的讲话并不是最后的裁决。条约签署后不久，乔迪·威廉姆斯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克林顿政府后来宣布了其意向，它打算搞一些替代性方案，以代替现行体系，到2003年在朝鲜以外的地区停止使用所有的地雷，并于2006年签署禁止地雷条约。2001年5月，八位退休的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几位前驻朝美军司令官和西点军校的前校长，给新总统布什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签署禁止地雷条约。除其它看法外，他们着重强调了两点：地雷在保卫韩国方面远远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反而更容易迟滞和阻碍美军及韩国军队的行动；再说，非军事区的地雷属于韩国政府管辖，因此即便美国签署了此条约也不会受到影响。他们在信中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杀伤地雷已经过时，对美军而言弊大于利。这种观点系因某些人的说法而致，譬如说，在越南战争中因地雷而失去了双腿的前陆军上尉埃德·迈尔斯，他说“这种武器再也没用了，不管过去它的威力有多大”。8月，布什总统公布了白宫关于地雷政策的审查文件；几名官员强调，美国负有特殊的安全责任，应当首先考虑保护自己的部队及盟友（我们所有的盟友均已签署该条约并销毁了他们的地雷）。2002年2月底，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刊登了一系列全页广告和电视插播广告，敦促总统在条约上签字。到我写本书时，此事仍在研究之中。

## 我们只相信枪支、导弹、炸弹、毒气和细菌

小型武器是美国不愿控制其使用的另一类武器。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而小型武器则是穷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联合国估计，约有5亿件这样的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在过去12年间发生的49起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小型武器是其中46起的首选。小型武器容易得到（不管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的途径），易于隐藏，简单易用，并难以控制。AK—47式冲锋枪的黑市价格甚至成了武装冲突的重要信号。AK—47式冲锋枪的正常价格为230至400美元。如其价格低于100美元，就说明在一段时间的激烈冲突后，和平即将来临。反之，如果AK—47冲锋枪的价格高于1000美元，那就是麻烦快要来临的严重替告。

由于司空见惯，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小型武器造成的后果，却看不见这些武器本身。但是在塞拉里昂的沙场上，东帝汉的丛林里，索马里的沙漠里以及其他地方，过去十年间小型武器射杀了400万人，其中90%为平民，80%是妇女和儿童。

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状态，联合国大会199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小型武器的问题。经过这个小组几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7月于纽约召开了联合国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非法交易全面会议。考虑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主要武器出口国的反对，仅召开此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为了使会议得以召开，在“非法交易”这个重点问题上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问题远不止纯粹的非法交

易这么简单，但每个人都明白，谈及其它便会碰上美国这块顽石的强烈反对。即便仅涉及到非法交易问题，后来也证明极其困难。宽泛地说，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讨论“非法武器交易中，所有导致过量积存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且会破坏稳定的相关因素”。眼下的主要目标是形成一项政治协议，而不是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便将这些武器的生产和贸易仅限在注册生产商和代理商的范围之内，并可以给这些武器标号、对供应渠道进行追踪与核查、回收和销毁“热点”地区的武器，以及解除原战斗人员的武装并将其遣散或重新整编。对于像南非和挪威等许多国家尤其重要的是，采取可能的措施限制平民拥有这类武器并禁止将其出售给非政府实体。

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立即给与会代表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在会议之初的发言中说，“理论上，这次会议的目标和宗旨是值得称道的”。但他接着强调，他所说的只是军事武器，不包括猎枪或手枪，而且仅限于非法交易：“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假定所有的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都一样，或者都会造成麻烦。”为回应南非、挪威和其它国家的代表对到处都有武器的不安，他强调指出，“（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四修正案分别保障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安全。同理，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公民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武器销售仅限于政府认可的实体这个问题只能到此为止了。为防止有人误解他的意思，博尔顿补充道：“我们不支持采取限制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合法交易和制造的措施。我们不支持提倡无政府组织发起国际呼吁活动。我们不支持采取禁止公民拥有小型武器的措施。我们不支持只能将小型武器售给政府的措施，美国也不会支持召开强制性会议。”除此之外，他认为大会的提议或许有二些可取之处。

这次大会以公布了一套淡而无味的“指导各国处理此项问题的准则”而宣告胜利闭幕。这套准则里根本没有提到限制平民拥有枪支问题。但只有美国人沾沾自喜。“美国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操。”南非代表琼·杜普雷兹说。墨西哥的代表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称美国的立场“令人遗憾”，而会议主席，哥伦比亚人卡米洛·雷耶斯则这样表达他的失望之情，“我必须要说，由于一国的缘故而使整个大会未能达成一致，我感到很失望。”许多人离开时都相信，每个美国公民都能拥有一支AK-47冲锋枪的神圣权利，将导致接下来的十年间死亡人数增加数百万。但美国人认为这和他们没多大关系。

在.地雷和小型武器问题上，美国打算避免达成武器控制条约。而2001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则通知俄罗斯，美国将于六个月后，即自2002年6月起废止一项条约—当时在两国间尚有效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美国在1967年6月首先提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双方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1972年5月条约签署生效。它之所以能提供安全保障，是因为两国相信这样双方都不会认为自己可以免受导弹的攻击，从而不会有哪一国敢于实施首先打击，因为它明白自己躲不过对方毁灭性的报复。由于这项条约似乎正如所预想的那样促成了核僵持局面的产生，它被废弃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首次提出—连同这届政府推行与条约背道而驰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在国际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格尔·谢尔盖耶夫所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欧洲、中国、日本和南朝鲜等国领导人的看法。他说，“这样做将摧毁整个旨在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国际条约体系。”

不过，有三件事缓和了他们的反应。首先一点是，俄罗斯人明白，由于财政上的原因，他们很难保留所有库存的核弹

头，所以他们愿意考虑削减双方核弹头数量的方案。另外他们也清楚，无论美国建成何种导弹防御系统，都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因为他们仍将保留相当数量的核弹头，足以突破这个系统。况且他们也想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发展。于是他们和美国达成一致，双方将核武器库削减2/3，核弹头的数量减至1700到2200枚，同时美国同意帮助俄罗斯和北约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设法促进其经济发展。作为回报，俄国人同意吞下美方废止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苦果。

第二件事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的袭击。这次袭击正好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提供了正当借口——即作为防御“无赖国家”袭击的一种手段，这套系统必不可少。

最后一点是中国人。他们本来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看作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目标—因为他们的核武器库存量相对较小，而且美国本届政府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中国决定支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至少暂时如此，因为“9. 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减少了对抗而增加了合作，中国人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因此，当2002年6月13日正式废止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并没有多少批评美国的声音。俄罗斯人和欧洲人重复了废止条约不明智的说法，但称还可以接受。中国人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样做不明智。

然而，当副国务卿博尔顿2002年i月24日在日内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各界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当然，禁止核试验的努力差不多和核试验是一起开始的。最近一次这种努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事，始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91年10月5日的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宣布，苏联将暂停一年的核试验，并邀请美国也限制进行核试验。不久，联合国开始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最终谈判

做准备。第二年，法国宣布单方面暂时停止核试验，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哈特菲尔德—埃克森修正案，要求政府暂停核试验9个月，就禁止核试验开展谈判，另外还要求政府，除非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否则自1996年9月后须禁止所有核试验。乔治·H·W·布什总统勉强签署了这项法案。1993年，新的克林顿政府保证遵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并保证在1996年底之前促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会随即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表示支持这一点的法案。1995年年中，法国政府宣布进行新的核试验以及印度政府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保留态度，一度曾威胁到了这一事业的发展势头。但随后中国不再坚持它所谓的“和平核爆炸”；1996年9月底，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完成，只等待签字确认了。美国和其它七十个国家一道，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成了第一批签字国。条约很快就转到参议院等待批准，看上去这似乎也并非难事。

然而，条约的支持者们忽略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北卡莱罗纳州的共和党人，极端的美国例外论者杰西·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将这项条约尘封了两年之久，直到1999年冬天才将它提交讨论。而此时已经有150多个国家签署认可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将军和四位前主席，包括科林·鲍威尔将军，都支持这项条约，许多现役或退休的军事、外交及科学界的领导人也是一样。里根政府的军备控制谈判代表保尔·尼采甚至要求美国单方面进行核裁军，理由是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已使得核武器成了危及我们自己军队的因素。公众支持这项条约的比例也达到了压倒性的82%

但是，对这项条约的反对意见仍然存在。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认为，此条约的执行情况无法核实，因而容

易弄虚作假。他同时指出，替代核试验的模拟试验未经证明，因此，靠它来保持美国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危险的。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项条约是走上核裁军“滑坡”的第一步。前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呼吁推迟表决，因为这项条约还不能全面实施，并且没有将伊拉克、伊朗这样的国家包括在内。党派政治也在起作用。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不愿将之提交讨论。尽管62名参议员致信要求延长辩论时间，但却只给了一天的讨论时间。1999年10月13日，当这项条约最后付诸投票表决时，又在政党政策的影响下，以48票对51票被否决了。多数国家表示对此极度失望。有些国家希望新的布什政府会再次尝试，并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能更幸运一点。但正如博尔顿在日内瓦所表明的，这决不可能。

这届政府把重点放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可行性遭到很多科学家的质疑）上，既是基于先发制人和取得支配性控制地位的战略，又是因为它想借此来摆脱源自相互确保摧毁理论造成的易受攻击性。导弹防御系统试图将美国解放出来，以便可以对世界上几乎任何地区实行军事干涉。同时，美国也希望发展更灵活机动的部队，并改进核武器，用以摧毁加固的地下工事和对生化袭击进行报复。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新的武器，并且要为研制这些武器进行试验。

提起生化武器，我们就会想起美国拒绝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条约。控制生化武器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公约，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使用毒气作出的反应。1962年，美国和苏联都向联合国提交了销毁所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议案。国际谈判拖到1969年秋季之后，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项美国将单方面放弃生物武器、并不首先使用化学武器

的政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认定拥有化学武器并不符合它的国家利益，于是，国会在1985年11月批准销毁了美国库存的所有化学武器。1991年5月海湾战争结束后，布什总统宣布，一旦联合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达成《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将坚决放弃以任何理由，包括报复在内，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的谈判确实在1993年1月产生了一项措辞明确而强硬的条约，要求销毁所有库存的化学武器，并禁止再度生产此类武器，而且成立了一个机构来进行检查和核实。美国政府立即签了字，但对他国弄虚作假的怀疑和国会对放弃一种武器的担心使得这项条约到1997年4月才在国会通过。美国化学工业界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条约生效而美国又不参加的话，自己将失去生意，于是便积极游说国会使之得以通过。

然而，签署了这项条约后，美国却又开始设法削弱条约的约束力。国会通过议案，允许美国官员拒绝实地检查，禁止从美国领土上取走化学样品做独立分析，并严格限制申报并接受例行检查的美国设施的数量。美国还拒绝支付条约开支中自己应付的那一份资金，并拒绝为销毁俄罗斯库存的大量化学武器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在1969年的那份声明中，尼克松是将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区别对待的。1972年，联合国经过讨论制定了一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研制、生产、储存或以其它方式获得或保留”用于军事目的的生物制剂或毒素。1975年美国签字后，这项条约立即生效，并且至今仍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条约。不幸的是，它不具备强制执行和核查的条款；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揭露了前苏联的非法炭疽研究项目，而人们也在担心伊拉克的细

菌战能力，联合国因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计划形成一项新的协议，以增加有法律效力的核查机制这种形式来加强该条约的约束力。这个委员会希望到2001年能出台一份文件供各国签署。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称该计划“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在2001年12月，华盛顿却传出了不同的声音，私人分析家和一些美国国防官员在《新科学家》杂志上建议修改禁止生化武器条约，以便允许“非致命性”武器的存在。这种武器可以使整支部队进入梦乡，或者通过侵蚀塑料部件或使轮胎一触即碎而使车辆或武器瘫痪。2001年3月为签署准备的最后文件出台时，美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检查核实方面做得不够。美国的盟国极力敦促美国接受拟议中的定期报告、检查、包括突袭性检查的系统。但美国在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设施上模拟了这套系统后，认为它不仅行不通，实际上还会导致互相猜疑的增加。2001年7月25日，美国大使唐纳德·马赫利通知联合国的这个委员会，美国将退出谈判，因为“据我们估计，这份草拟的协议会将国家安全和保密信息置于危险的境地”。日本大使升圣一郎的讲话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意见，他说，“对于美国在这个阶段提出的理由，我感到相当吃惊。”

在随后于12月份召开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审核会上，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提出了几条建议来强化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他声称从来没人考虑过这些方面。然而，其实除其中一条之外，美国刚刚拒绝签署的条约中即包含他所建议的全部内容。但这并没有阻止博尔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干脆建议解散该委员会。几个月后，美国坚持要将化学武器公约核查小组的组长解职，理由是他对财政管理不善。但根本没有人相信。正如英国的雷爵士所指出的，美国拒绝交纳应付款项才是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真正原因其实在于这位核

查小组的负责人计划对美国进行突然检查。

## 主权胜过人权

美国还以类似的方式拒绝了一项旨在加强1987年签订的《反折磨公约》（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不愿意让人检查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塔利班俘虏的情况）的协议；拒绝了《消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公约》，还拒绝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原因在于思想保守，担心这样会干涉“家庭价值观”）。

但在所有这些国际条约与公约的拒签之战中，最主要的是在国际刑事法庭条约问题上的摩擦。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与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概念上及机构上的难题全部戏剧性地展露无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大屠杀行为的揭露催生了1948年的《禁止种族屠杀公约》，这正是国际刑事法庭构想的基础。在呼吁各国签署禁止种族屠杀公约的议案中，联合国同时邀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研究成立一个国际法庭的可取性，以便将种族屠杀的责任人推上法庭接受审判。长话短说吧，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发生的暴行催生了两大进展。在美国的敦促下，专门就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组织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在这两个国家犯下种族屠杀罪行的刽子手提起公诉。与此同时，国际法委员会草拟了一项法令，拟成立讨论已久的国际刑事法庭，1998年六七月间，罗马的一次特别会议将这项法令拿出来，提请联合国表决通过。

理解这次重要会议上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很重要。首先是这个法庭的独立性问题。它受理每个案件时是均需经联合国安

理会批准其审判权，这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便可有权否决，还是给予它一定的独立权？第二个涉及到公诉人的独立性以及他或者她能否任意提起诉讼的问题。还有就是所谓的许可体制问题。这个法庭应否有绝对审判权，可以对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相关罪行提起诉讼？还是每个案件均需得到罪行发生国或被控人国籍所在国的许可？这个法庭是否有权审判内战中犯下的罪行？第四个是国家审判权和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权的问题。如果国家法庭已开始启动自己的司法程序，国际刑事法庭是否还能提起公诉？最后是审理历史案件问题。比方说，这个法庭能否因基辛格被控对1971年智利的政变负有责任而对他提起诉讼审判？

当然，每个问题都可能涉及对国家主权的干涉，并且在美国看来，很可能会被反美政权出于政治目的而用来对付美国公民。推动成立这个法庭的艰难进程的是所谓的“观点类似集团”，这个有六十个成员国的组织包括美国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盟国，主席国是加拿大。尽管美国一直声称它在原则上支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但它明确反对成立一个可以不征得美国同意就起诉美国公民的法庭。美国尤其对德国提出的绝对审判权概念深恶痛绝，并威胁说将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把这一点写人法令。美国对这一点的关注极为强烈，以至于有报导称，国防部长科恩把它和美国在德国的驻军联系到了一起。在对这五个问题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主要是美国和“观点类似集团”在唱对台戏，其它国家只是袖手旁观。但到底还是美国占了上风，将这份法令草案打了不少折扣。在法庭的独立性问题上，美国想要每个案件都经过安理会的批准。起初，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也支持美国的立场，但当英国因为这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而放弃了这一立场时，大坝即溃，美国最终被孤立了起

来。最后会议决定，为了保证它作为独立法庭的可信性，国际刑事法庭无须安理会事先批准即可提起诉讼。不过，为了避免出现草率随意或出于政治目的的讼案，各方同意检查官若要开展调查须得到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组成的一个小组的批准。会议还决定，安理会可通过决议阻止国际刑事法庭的任何一项调查。在审判权的问题上，美国获得了部分胜利。绝对审判权被摒弃了，这项法令的最终条文规定，只有在罪案发生国或被控人国籍所在国同意或为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缔约方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才能采取行动。在内战问题上，美国遭到了小小的挫折，决议支持国际刑事法庭拥有对内战中所犯罪行的审判权。但在国家审判权和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权问题上，美国取得了重大胜利，会议议定，只有在国家法庭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才能提起诉讼。会议还议定各国可以在 7年时间内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战争罪的审判，但这段时间不得延期。到最后一分钟，美国仍想争取到非成员国的国民在执行官方任务时的特殊豁免权。这将会使政府有权随意阻止国际刑事法庭对本国国民的起诉，损害这个法庭的可信性。美国没有达到目的，但美国确实成功地将国家安全列为拒绝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理由，并且使奉上级的指令行事成了辩护的理由。另外各国还有两次反对和诉请该法庭审判的机会。

然而，以上没有哪条能让美国满意，于是它和中国、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卡塔尔及以色列一道，投票反对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最终投票结果为 120票赞成， 7票反对和 21票弃权。这项条约只要有六十个国家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即可开始运转。

国际社会对美国意愿的挑战，使美国对这个法庭的成立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讨伐战。克林顿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

签署了这项条约，但只是为了让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能有机会和联合国一道来完善这个法庭。然而，布什政府却早早就暗示它可能会走到撤签的那一步。2001年秋，参议院通过了由参议员赫尔姆斯提交的保护美国军人法案，这项法案将禁止美国以任何形式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并禁止美国向任何支持该法庭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这项法案还提出，美国可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武力，解救这个法庭关押的任何一名美国公民。正是这句话使这项法案得到了一个绰号，“入侵海牙法案”。这个法案没有成为法律，但却成了限制美国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措施。

当年冬天到2002年春天，法庭成立所必需的六十个签约国显然很快就要凑够了，这时，美国政府开始向各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阻拦它们在条约上签字，结果劳而无功。4月11日，第六十个国家签署了条约，法庭开始运转。此时美国采取了极端行动。副国务卿博尔顿前所未闻地致信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通知他美国实际上正准备将其签名从条约上抹去。他解释说，美国“在世界上承担着独特的责任，要帮助人们保卫自由并推动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而美国人可能会成为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诉讼的目标。所以，美国拒绝成为这项条约的缔约方。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该法庭在美国没有审判权，但美国公民却有可能在国际刑事法庭缔约国境内活动，法庭最后还是可能会不经美国政府同意就对美国公民行使审判权。美国官员认为，在美国政府不是缔约方的情况下，让美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受这项条约的约束都是不公平的。反对者则指出，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下一般罪行，外国政府有权不经美国政府批准而提起诉讼。如果犯下暴行，那该国政府完全有权力委托国际

刑事法庭进行诉讼。此外，美国只要签了这项条约，就可以对任何此类诉讼的进程施加极大的影响。他们还强调指出，尽管美国确实在全球热点地区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并不是只有美国如此，法国、英国及其它国家在各个冲突地区均驻有部队或人员，他们似乎与法庭并无摩擦。最后一点，即便美国人在别国被起诉，根据该法庭的规定，美国也有权先行起诉。只有在美国拒绝调查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才有资格介人。反对此论点者则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指控毫无道理，可能会有充分的理由不去调查。

但这次争论的不是非实质性论点，而是权力问题。美国官员展开了施压活动，想迫使签署了该条约的国家专门与美国签署双边协议，允许美国公民在该国的领土上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在欧洲，这种做法使得美国政府和欧盟发生了冲突，后者警告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家，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它们欧盟成员国的候补资格。

美国威胁说，如果安理会不批准美国所有维和人员永久免受该法庭的审判，它将从波斯尼亚开始，否决所有联合国现有维和任务的例行延期。安理会最后勉强给了美国人一年的豁免权。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半拉子解决办法，但安理会表示会每年都延长这一豁免权。看上去美国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墨西哥大使阿道弗 ·阿吉拉尔 ·辛塞尔的发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他说：“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不对的。 ” 另外一位来自美国最早、最亲密的盟国的大使私下对我说了本章引语中那句话：“ 美国总是宣扬法制，到头来却总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约翰 ·博尔顿和杰西 ·赫尔姆斯在本文中已多次出现，他们集中地体现着一种体制上的关键性特征。众所周知，他们两

位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这一般意味着他们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不信任政府。他们将美国看作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府形式，坚定地倡导美国的信条，并把美国的力量和生活方式看作最终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都会向它靠拢。尽管赫尔姆斯在2002年退休前多年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博尔顿也曾在国务院身居高位，但他们坚持对别国政府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不如美国政府民主，而且更贪图安逸，他们还认为其它国家都羡慕美国的自由。他们不喜欢联合国或其它国际机构，认为这些机构腐败，缺乏民主，一心只想限制或阻挠美国施展它仁慈的力量。他们绝对相信美国的力量，并把保持美国的绝对霸权和行动自由置于首位。

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极大地加强了这类观点的影响力。条约必须经过美国参议院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而在参议院对条约投票表决前，必须由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将条约列人议事日程并召开听证和辩论会。这位主席可以将某项条约尘封数年而不进行表决，抑或可以坚持要求采取其它一些行动，以作为对某项条约付诸投票表决的交换条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统和大多数国民都支持某项条约或法规，但由于一位位高权重的委员会主席的反对，该条约却得不到通过。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与体制上的权力的结合，是美国常常与整个世界闹别扭的一个原因。

## 军火经济

美国军国主义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美国曾企图把世

界主要国家当作自己的准附庸国，它也曾企图控制关键的武器和军事技术。1948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为91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这和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1945年相比，已经大幅减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的军事预算马上翻了一番。冷战期间，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这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法则。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庞大，这笔开支的数目也是惊人的—在整个冷战期间，所有军费开支相当于现在的15.8万亿美元。与苏联最终因军费开支过多而导致经济崩溃不同，美国的经济承受得起这个负担。不过，美国有时总是担心落伍，有时又为可以保护美国免受攻击的不可战胜的武器系统而兴奋，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会促成军费开支的增加。

美国的第一次恐慌发生在1954年。当时苏联“五一”阅兵的画面显示，苏联似乎已拥有大批新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并非源于英国或是美国的设计，而且可以飞至美国本土。事实上，后来有情报表明，苏联仅有为数不多的这种飞机，只不过是在“五一”阅兵时让这些飞机不停地做循环飞行，这样就使飞机的数量看上去好像是无穷无尽似的。当时美国国内对“轰炸机差距”的极度担心使美国压力很大，它一定要生产出更多的B–52来“赶上”苏联。直到1956年U–2间谍飞机第一次飞越苏联上空，才发现这种差距的优势方其实是美国，其后这种压力才消失。但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住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中，他强调要缩小与苏联之间正在危险地加大的“导弹差距”，建立一支难以摧毁的报复性洲际导弹部队，而这项花费高达3000亿美元。肯尼迪当选后却发现，实际上美苏在导弹方面根本没有差距，可这一事实也未能阻止他拨出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导弹部

队。2。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导弹和核弹头军备竞赛，很难说到底是美国还是苏联发起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各种限制核试验措施的出台，形势似乎稳定了一些。但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又一次使美国开始寻求免受攻击的机会。里根称，当时指导美国核威慑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方针本身就是疯狂的。自愿接受易受攻击的可能性不是美国人的理念，于是里根提出了耗资500亿美元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以研发一种能够将任何射向美国的导弹在其到达之前击落的武器系统。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家认为能够造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这种武器系统。但此系统的目标是使美国免受攻击，因而无论是怀疑还是高昂的成本都不成为其问题。冷战结束后，这个项目的研发放慢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演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正是因为这套系统，美国2001年才废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如前文所述，这套系统说是用来防范“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的，但看起来却有对付中国之嫌。对其效用，人们仍然疑虑重重。正如负责采购与技术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雅克·甘斯勒2002年8月对我所言，这套系统从未按照哪怕最简单的操纵指令工作过，而且容易受到诱饵及其它规避措施的影响。

当然，如果这套系统真能为美国人口集中的主要城市提供保护，使之免遭毁灭打击的话，多花点钱也值得。但当前却有几件事颇具讽刺意味。首先，尽管已经研究多年，也投人了几十亿美元，但这套计划中的系统对于9月11日袭击世贸大楼的那种导弹却无能为力。对于便携式“毒刺”导弹，这套系统同样束手无策，而这种导弹曾帮助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还差点在2002年11月28日于内罗毕击落一架以色列

客机。据估计，世界上约有70万枚这样的导弹，其中许多都是由美国供给那些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国家或组织的。这才是无赖们使用的武器：便宜，便于携带和隐藏，能够使空中旅行完全停滞。而政府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控制或防范此类武器，当然更没有堪与“战略防御倡议“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的措施了。

换个角度看，我们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北朝鲜和伊朗这类国家之所以企图获得核武器和导弹，可能更多地是为了防范而不是威胁我们。我们推翻其政权的意图和对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重视，明明白白地向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出了危险信号。我们最近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不为人所知。北朝鲜有几枚核武器和导弹，并以汉城作人质，我们就被迫收回了对它的威胁，但是却继续恐吓伊拉克说会随时发动进攻。这里面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你有核武器，美国就会对你比较理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会改变这种策略，因为其核武器不一定非得对准美国的国土。

坚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及其它系统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你无法取消哪套武器系统或哪个基地。某个项目一旦启动，在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中攀上支持者，这些人就会将项目资金引向重要的国会选区。军火工业有意广泛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就是为了确保获得尽量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重要委员会主席的支持。比方说，1998年，尽管空军说不想要，但众议院议长，来自左治亚州的共和党人纽特·金格里奇还是设法追加了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以购买飞机，因为飞机是他所在的州生产的。各地保持武器系统运转的经济与政治需要导致武器产量剧增，这种剧增反过来又产生了部署和使用这些武器的压力。所以，尽

管 F–15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而且美国拥有一千多架 F–15，美国国防企业仍计划用更先进的 F–22将其取而代之。这种运作方式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人提议部署太空武器，以防美国的空间设备受到攻击，并可用其击毁他国的卫星和空间设备。美国目前在太空根本没有任何已知的威胁，但将太空军事化的诱惑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计划还意味着研究拨款、工作和选票。

军火工业还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并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商品经济中一条铁的规律是，要尽可能扩大生产，以减少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并逐步收回本金和研发投资。由于美国在全世界军事研发开支方面占到大约 7000，所以军火出口成为美国一大产业也就不足为怪了。商业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雇有大批人员在推销武器，或为美国武器向世界各国的出口提供便利。 1999年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世界军火贸易额经历了从 1989年的 700亿美元到 1994年的 400亿美元的大幅衰减后，上升到了近 520亿美元。其中一半多一点由发达国家购人，余者为发展中国家购人。美国的出口额在世界总销售额中占 640o，而且根据已经签订的销售协议，美国的份额在将来还有可能接近 7000。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是沙特阿拉伯、台湾地区、日本、英国、土耳其、以色列、韩国、埃及和希腊．如果你感觉美国有时似乎是给冲突双方都提供武器，那么你的感觉并没有错。

间题并不仅仅是武器出口这么简单。美国会借武器协议来巩固与重要国家的关系，规范全球的装备和程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外国政府的政策。举个例子， 2003年 1月波兰宣布，作为加强其武装力量以履行北约新成员责任之计划的一部分，它将从美国购买 48架新型 F–16战斗机。此举显然对

制造 F-16的通用动力公司和美国经济有利，但也会带来其它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欧洲飞机制造商因此而失去了一宗生意，其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这样就会增加其成本，并使得其他客户更有可能购买 F-16.（这与美国压欧洲进行更多的防务改革的作法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还使波兰空军和美国空军有了共同之处，却未必和北约其它武装力量协调一致。由于波兰还需要美国供应它零部件，如果它要用这些飞机做某件违背美国意愿的事，美国官员手中则握有拥有影响其决定的筹码。当然，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波兰空军到底要这些飞机干什么呢？北约和波兰均没有面临须用 F-16对付的严重威胁，有人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波兰可以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而这正是巴西的看法，巴西的新总统“卢拉”几乎与波兰同时宣布，他将取消上届政府订购的美国战斗机，因为巴西对这笔钱有更好的用途。此举给一位国家元首贴上了“危险的左派”的标签。

波兰也许是一直在期待以后能得到像美国与日本、韩国及其它不少国家签订的那种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这些国家可以与美国合作生产甚至合作研制武器装备。美国武器系统，尤其是飞机的销售，常常是建立在签订这种被称作“补偿”协议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购买国，譬如说韩国，将得到在国内厂家生产部分或整个飞机的许可，而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技术也将由美国的原生产商传授给韩国。许多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购买美国的飞机，以发展本国原来一穷二白的飞机工业。事实证明，日本尤其擅长此道，它一点点增加飞机零部件的生产，最终完整地参与了下几代飞机的研发。这种方式其实提高了最终产品的成本，因为和全部在美国制造并将库存产品出口相比，产量要小得多。日本的新式 FSX战斗机大约要 1.5亿美元一架，

而从美国库存中购买的话，同样一架飞机的开销却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抛开直接损失不谈，技术转让不仅会影响美国工业的领导地位，而且会使重要的武器系统更容易获得，而这样做的名义却是增进美国的安全。

我们并不清楚这能否增进美国的安全，但这必然会降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美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３ 0o–5%花在国防上，实际上是把那么多钱用在了我们不大可能使用的产品和设施上。因此，首先，假如我们将资金用于能取得收益的方面，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们没有。其次，如果我们只是出口库存产品，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但由于补偿协议和共同研究项目等，我们损失巨大。最后，也就是第三点，我们廉价转让的专利技术会被国外的对手用来改进多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与美国的待售品进行商业竞争。我们悲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负担，我们还会抱怨我们的盟国舍不得花钱来保持部队相当的战斗力。但事实是我们想要承担这些责任，我们需要这些责任，补偿协议就是有力的证明。官方称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是为了保护盟国。但是，要让盟友接受这些协议还得给他们好处。很明显，他们和我们对威胁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在利用我们承担特殊责任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却恳求他们让我们承担这些责任。

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障碍，它们即便想和我们合作也非常困难。五角大楼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商，它的采购量占全球的二分之一强。作为武器供应商，不能向五角大楼出售武器就无法保持竞争力，就得不到大批订单以及要保持领先优势所必须的巨额研发资金。但拜五角大楼所赐，外国公司要向它出售武器，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美国军火工业结构需要重新调定的时期之一。冷战结束后，武器消耗减少了，国防工业也相应地缩小了。国防部长威廉 ·佩里曾邀请各个国防企业的总裁共进晚餐，这次晚餐后来被称为“ 最后的晚餐 ”。席间，佩里建议这些总裁开始考虑合并和抛售问题。这本是该考虑通过国际兼并将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时机，但却没有哪个企业进行兼并，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公司的抵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这样可能会削弱美国武器的统治地位，削弱帝国的优势。

## 教给他们打仗——而不是读书

美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国，而且是最重要的战争教官。‘ 譬如说，美洲学校就是 1946年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马运河区成立的，迄今已有来自拉丁美洲各国及美国的六万多名军官、学员和军士从这里毕业。成立这所学校是想达到好几个目的。一个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军事人员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据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向他们反复灌输美国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而且能在教授他们特种行动和军民协作行动等时训练他们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理论上虽然是这样，而实际上，由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前独裁者均毕业于这所学校而且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引发了诸多怨言，美洲学校已被称为“ 独裁者的学校 ”。公平地说，这所学校也有一些如洪都拉斯的帕斯 ·加西亚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在将权力交还人民民主管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独裁者的下台，拉丁美洲和南美各国在近十年里也成了民主国家。但这些与美洲学校关系甚微。

在最近一项更加多元化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状

况。在后冷战环境下，美国军方的部分重要任务是“塑造国际环境”。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军事交流，包括军事训练、禁毒计划、反恐活动、培训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等。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美国特种部队来实施的，这支部队目前部署在140多个国家，其预算已远远超过30亿美元。1991年的联合交换训练法允许他们在国外和外国的部队一起训练，并且在外国部队不能负担自己的开支的情况下，允许美国特种部队代为支付。这项法律表面上旨在为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提供关键性的训练，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同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实际上美国是在以这个项目的名义训练全世界的部队。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所属官员才4000名，而参与联合交换训练的人员却超过了此数，在任何时候均有大约45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全球。

看看这笔账的另一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相信武器的。1948年，即冷战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在援助及其它外交和非军事国际项目上的开支总额高达60亿美元（1948年美元），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大约与当时美国的军事预算数目相当,或者说相当于2002年的1 040亿美元。目前，美国全部海外非军事开支，包括大使馆的开销、援助、教育和其它所有项目，已降至不足17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亿美元大都是通过对外军事资助项目进行的军事援助，目的是提供一项资助计划，使外国政府能够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所以，实际上仅有大约130亿美元或者说0.13%的国民生产总值被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援助，其中约30亿美元给了以色列，埃及也得到了2. 亿美元（这仍是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部分回报），剩下的则分给了其它各个国家。尽管有冷战的结束、和平红利、全

球爱滋病的迅速传播和非洲饥荒的蔓延这些因素存在，这些可怜的数字实际上仍低于 1990年的水平，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美国成了工业化国家中捐赠最少的一个。

我们也是国际组织中最不负责任的捐助者。譬如说，到 2001年 12月 31日，我们在缴纳了以前欠下的一些会费后，仍欠联合国近 9亿美元。我们的盟国已经听厌了我们总是谈论特殊负担，难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然而，即使我们真地决定提供资金，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把钱送出去，剩下的人中许多甚至都不能和接受者交谈。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务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领事馆和海外办事处的数量。例如，我们在中国的领事馆数量比 1939年时还要少。而且，根据总会计局的调查，国务院在多个关键岗位上都面临着人员短缺的情况，而在位的人又往往不够资格。比如，总会计局在调查中发现，在驻外机关事务局派往中国的官员中，62%的人不能达到他们的职位所需要的语言流利程度。在派往俄罗斯的官员中，这种人占 41%。在沙特阿拉伯，公共外交处的处长根本不会讲阿拉伯语。为了宣传美国的理念而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建立的美国信息局于 1999年被撤消了。"9 . 11"事件后，布什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全球联络办公室”的机构，并请了一位麦迪逊大街上的广告经理担任主任。这个办公室是既灵活又有效还是光灵活而无效，还有待于检验。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事实，就一点儿也不会因为上述情况而吃惊了：美国人中只有 14%持有护照，许多大学已经不再要求毕业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了。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87%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

冷战结束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短期构想过的一样，美国又有机会来考虑以某些国家真正分担维持和平的责任

为基础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了。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也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并日益融人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此时，联合国已成为一个将来更具可行性的机构。美国也有时间来反思像北约和日美安全条约这样的主要联盟存在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必要在海外驻军。然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诚然，国防开支最终降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军事设施的规模也多少有所缩减。但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大幅下降与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幅度，美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相对增强了，并保留了基本的部署和任务。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美国倾向于参照外部威胁给自己定位，并总爱寻找敌人。在1992年之后没有具体敌人的情况下，美国仍然认为它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并以此为由保留了在海外的"20多万驻军。

说来也奇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总在变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不稳定”居然成了它的大敌。现有盟国及部署发生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引发危险的“不稳定”，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的开始，以及对伊拉克政权更迭的注意，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不那么危险的敌人。但这些也凸显出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指出过的一点：在国际扑克牌游戏中，美国过于依赖军事这张牌。我们不想把自己看作好战的民族，但如果我们只相信武器的话，怎么能指望别人认为我们“热爱和平”呢？

# 第七章
# 人民爱和平，战争打不停

2002年 2月，在与北朝鲜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在中东之行途中会晤了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例行视察驻扎在汉城北面非军事区的美军时，布什总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极力强调，“我们的人民爱和平。”

布什的这个声明不屑一顾。美国人的确不认为自己好战，也不承认美国有扩张领土和成为帝国的企图。在美国所打的战争中，赢得美国民众积极支持的凤毛麟角．民意调查的结果亦显示美国人作为个人对美国以外所发生的一切不大关心。如果就美国海外驻军和所承担的义务举行全民公决的话，那么美国人很可能会对其中大部分投反对票。然而，布什总统的讲话是在美朝关系已呈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发表的。美国政府一贯反对韩国对北朝鲜所采取的“阳光政策”，向来主张向北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它所痛恨的共产党政权垮台。这至少是造成美朝关系日趋紧张的部分原因。这种局面也暴露出了美国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人民生来热爱和平，但这个国家不仅诞生于战火之中，而且从此几乎一刻未停地忙于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据我统计，从 1789年《美国宪法》颁布至今，美国几乎年年卷入海外军事行动。诚然，这些行动也包括一些

小规模的战斗和警戒任务，但总共达 235次。这些行动均有代号，其中有 25到 30次行动可以说是具备了全面战争的特征。

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美国人就已经在和美洲印第安人交战了。从建国伊始到 100年后的完成疆土开拓，美国人和其他各部族几乎每年都爆发冲突。乔治 ·华盛顿当总统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西北地区（当时的俄亥俄和密歇根）的印第安人起义，虽然他因为自己必须这样做而感到惴惴不安。他希望“今后不再出现武力胁迫的必要”，并敦促国会批准善待印第安部落的政策。托马斯 ·杰斐逊在印第安人问题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虽然悲怜印第安人的命运，但也照样推行决定印第安人命运的西进运动。安德鲁 ·杰克逊曾因把西米诺尔人赶出佛罗里达而扬名于世。对此，他并未显示出文明之士应有的良心不安，反而认为印第安人“不可能与文明社会共存共荣”。虽然杰克逊不幸言中，但他得出此结论的理由也许站不住脚。不管怎样，截止到 1890年，印第安人不是死掉就是进了居留地。

除了美国内战和 1812年那场巩固美国独立于英国之地位的战争外， 19世纪美国与外敌的战争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两场全面对外战争；另一类是多次对外人侵、小规模冲突以及认为有必要保护美国人及其商业利益时在全球各地进行的军事干涉。其中许多次都是由美国先挑起的，而它几乎每次都能从中渔利。刻意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从来没有与别国共同打过一场战争。最初的一系列小冲突发生在美国人和北非各伊斯兰国（埃及除外）的海盗之间。当时，行贿已经成为在地中海地区做生意的一部分代价，但美国人不愿打点这帮海盗。到 19世纪 20年代，美国在地中海、太平洋、非洲和南大西洋均已有海军中队，负责保护美国在福克兰群岛捕猎海豹者的权益，以

及惩罚偷盗美国商人鸦片的苏门答腊人等一应事务。其中有三件事的后续影响特别大。19世纪40年代，美国获得了在中国通商的特权，开始了一个世纪的扬子江巡逻。巡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另一个是保护美国传教士。1853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着著名的“黑色船队”驶进了东京湾，要求日本人开放市场，要不然他们就炮轰东京，大举入侵。1871年，海军上将约翰·罗杰斯在朝鲜也上演了同一出戏，但收效甚微。

真正的战争是1846年与墨西哥的一仗和1898年与西班牙的一仗。与墨西哥的战争起因于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当时，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派遣了一支军队大举南下，进入了墨西哥境内。美国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结果不仅获得了得克萨斯，而且还拿走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大部和加利福尼亚。美西战争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据说西班牙人在残酷镇压古巴独立战士；二是因为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神秘地爆炸了。美国因此随即出兵古巴。在这场被国务卿海约翰称之为“那场战果辉煌的小小战争”中，美国又一次以很小的伤亡得到了大片疆土，其中包括波多黎各岛、维尔京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了控制住菲律宾，拒绝接受菲律宾人仿照美国《独立宣言》撰写的《菲律宾独立宣言》，并镇压了菲律宾的独立战士，其残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西班牙人镇压古巴战士时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威廉·麦金利总统所说的“使菲律宾基督教化”的机遇，而菲律宾人信仰天主教已经长达350年了。

20世纪的美国历史是以三场圣战为主线的。这三场圣战的目的是把世界从军国主义、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第一场当然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德国人的过错是否真的大于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这一点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美国参战后，把法国、英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从德国军国主义霸权中拯救出来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尽管19世纪美国所打的战争（内战除外）大部分是为了扩张领土、保护贸易路线或者捍卫某种说不太清楚的“荣誉”，但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却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实行的长老制体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它不允许美国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去打一场战争。相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必须“坚持和平与公正的原则”，并“为创造一个最终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听上去象布什总统讲的，那就对了，因为理想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早已根深蒂固。

威尔逊总统要求参议院批准其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但在此次交锋中他输了。威尔逊总统钟爱国际联盟，他的理想主义遭到了重创。美国常常先拿出一项计划或者一个机构，然后向其它国家兜售，但最终美国自己却不肯接受，这种事屡见不鲜。参议员威廉·博拉和亨利·卡伯特·洛奇曾经在参议院带头投票反对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他们被后人称为“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者”一词从此便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孤立主义者，洛奇实际上还一直积极支持美国搞帝国主义。相反，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他们珍视美国的主权，坚信美国的优越性，但怀疑别国的动机和可靠性。在他们看来，美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单干更自在。

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正义战争的话，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毫无疑问，美国把世界从一个名副其实的邪恶帝国于中拯救出来了。这也是一场为了自由和正义，为了结束战争而打的战争。因此，战争的目标是敌人无条件投降。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使用了一些令人毛骨惊然的武器，并向世人表明此举合情合理。由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均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美国因此决定不能抛弃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于是开始做一些以前不曾做过的事。美国领导创建并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通过签订各种长期协议，美国和其它国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它失去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当然，美国继续是老大，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可以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但是，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任何国家都会追求其国家利益，这已成为一条公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希特勒把征服大部分世界和灭绝犹太人看作是德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多年来一直单方面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此时则开始把它的国家利益界定为：改善全球的经济状况，重建那些疮痍满目的国家，并创建一个建立在总的法律原则和应有的法律程序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实际上，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与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秩序异曲同工。所以，美国在这一时期奉行的是多边主义，甚至提议由新成立的联合国掌控核武器。一个称雄世界的大国竟主动提出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不过，这项试验尚未来得及大规模展开，本世纪的第三次圣战便开始了。

# 冷　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美国的军队人数已由原先的约1500万人减少到150余万人，而且美国政府有意继续裁军。战争打赢了，也该让“士兵们解甲归田了”，谁都没有继续谋划帝国之事。可是，冷战却彻底改变了一切。

冷战实际上始于1946年初。2月9日，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一次讲话，断言西方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和平的人民不可能进行合作。2月22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出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指出按照莫斯科领导人的看法，苏美之间不可能存在永久和平。因此他们认为，要保住苏联的影响力，就必须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凯南同时还强调说，苏联人办事无计划，爱冒险。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演说，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亘欧洲大陆降落下来。”关键事件发生在2月21日。那天英国驻美大使宣布，大不列颠已是囊中羞涩，既不能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抵御共产党的暴乱，也不能继续维持在中东许多地方的驻军。

因此，杜鲁门政府就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美国是否应该接过大不列颠的重担，肩负起规划世界格局的广泛责任？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作出了回答：

> “当今世界此时此刻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迫害的自由。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基拙之上的，它依赖于恐怖和压迫……一些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或一些外部势力，企图征服自由民族。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定是支持这些自由民族……如果我们退缩，世界和平必将受到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也必将受到威胁。”

即便让乔治·布什来讲，也不一定讲得比这更好了。紧接着，美国就抛出了“马歇尔计划”，发起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在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着手研制氢弹。1949年，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军，而且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

杜鲁门提出的战略既不是先发制人，也不是预防性战争，而是遏制。其逻辑根据便是麦迪逊的名言：“坏事定有败露时。”但是，遏制战略持续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已经远非初衷了。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得服从于严密封锁苏联人、中国人和其他共产党人这个大局。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封锁是首要目标。新的“国家安全观”使得美国提出了新的指导原则，该原则完美地综合了所有的外交政策传统，不论其新旧。遏制战略激发了美国民众狂热的爱国主义和“我们要跟他们斗”的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浅埋于心，易于触发。遏制战略还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最神圣的“自由”价值观正受到攻击，同时，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束之高阁的单边主义政策重新森得了市场。美国对外依然承担义务，依然结交“缠人的盟友”。不过总能确保自己有行动的自由。实施遏制战略还使在全球建

立军事基地的需要有了依据。这样一来，美国一度在美西战争和其他较小冲突中奉行的进步牌帝国主义也变得名正言顺了。随着这些基地的建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遏制战略成功地吸收了威尔逊思想，提出了自由的国际主义价值观并把它们当作武器来运用。最后一点是，通过反对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和要求开放市场，遏制战略达到了发展商业的目的。正如托尼·史密斯所言：“美国的霸权造成了一种反帝式的帝国主义形态。”詹姆斯·沃伯格称之为从孤立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们想成为世界公民，除非世界成为美国的延伸。”

冷战是一场圣战，因为它动机纯正，既不图物质利益，也不想征服别国，而是与罪大恶极的敌人进行斗争，对此不应该有什么疑意。如果需要我们再次抉择的话，在我看来，我们还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我们兴许会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付诸实施。由于无知，偏执以及迷信武器和实力，我们至今还在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付出代价。在这里我不想描述冷战的历史，但是朝鲜战争以及美国一系列的对外干涉说明了为什么世人常常以恐惧和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尽管美国也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过许多牺牲。

## 朝鲜战争

冷战时期的首场热战是朝鲜战争。1950年6月苏联人训练并装备的北朝鲜军队人侵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这种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也许部分是由于美国的言行暗示韩国不在美国的环形防御圈内引起的，但是杜鲁门明确表示美国不可能对

此袖手旁观，尤其是在其它地区当时也存在苏联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遏制北朝鲜潮水般的进攻，美国军队投入了战斗，奋力作战。美军在北朝鲜防线后方的仁川港成功实施登陆，反击AL朝鲜的进攻。他们动作迅速，战果辉煌。截止 9月份，美军已收复了南朝鲜全境，并占领了包括首都平壤在内的北朝鲜大部分领土。北朝鲜军队的余部已溃不成军。此时，美军的伤亡情况是： 3614人阵亡， 4260人失踪， 16289人受伤。

北朝鲜明显呈现败势之后，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推进。其实这种推进毫无必要，因为共产党已被遏制住，而且联军已经对朝鲜实施有效控制。然而，联军司令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相信联军能够取得全胜，同时也认为有必要用刚逃到台湾不久的蒋介石建立的国民党政府取代共产党政权。杜鲁门不但下令出兵朝鲜，同时还派第七舰队到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巡逻。这样一来，美国就以支持腐败的蒋介石政权的方式卷入了中国内战。由于事先并未制定出与中国交战的对策，因此麦克阿瑟出访台湾，就美国的战争努力和蒋介石重新在大陆立足的尝试进行协调。麦克阿瑟还下令由美国率领的联军向鸭绿江边挺进。正如中国人在声明中所言，他们开始进攻了。三年之后，美国率领的联军 54246人阵亡， 103284人受伤，失去了对北朝鲜的控制。最后，交战各方签署了脆弱的停战协定，划定了“ 非军事区 ”，美军及其南朝鲜盟军目前仍守卫着该区域。由于对敌方了解不透，对中共存有偏见，再加上我们愿意采取武力手段延长战争，结果只是徒增了伤亡人数，而美国的地位却在削弱。当然，其它方面也受到了影响，至今我们仍能感受得到。

中共并不是注定非要成为美国的大敌不可。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向美国官员做出过友好姿态，对日作战也比蒋介石

的部队更加顽强。日本人战败之后，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这当然令中共不快；甚至在英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之后，美国依然承认蒋介石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为中国政府，这肯定也会让中共耿耿于怀（我将在第八章进一步讨论台湾问题）。但是，中国并未寻求与美国交战。中共和苏共有许多重大不同。美国有些外交官员，如约翰·谢伟思和约翰·巴顿·戴维斯，当时都曾向华盛顿和美国新闻界说明过这一点，但因为当时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美国，所以他们的意见无人重视。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出笼，他们的职业生涯也随之划上了句号。挺进鸭绿江，使美国几乎永久地处在干涉中国内战、对中国满腹狐疑，心怀敌意的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才有机会利用中苏分歧开始与中国交往。尽管中美关系从此以妥协为主，但是双方仍旧疑心重重。这种疑心病周期性地发作，致使中美关系总有重新回到以往敌对状态中去的危险。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这般。

朝鲜停战协定平息了战火，巩固了李承晚的独裁统治。李是美国干涉韩国内政所支持的人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承晚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曾与日本人有过合作。尽管美国挽救了韩国，使其将来免走暴虐的共产主义道路，但它很快就表明，它宁要靠得住的独裁，也不要乱糟糟的民主。在冷战期间，美国曾再三表明这一立场。1960年，李成晚被试图建立民主政权的韩国人赶下了台，但美国支持朴正熙将军接管政府后，韩国人的努力随之付之东流。后来在1979年，美国不仅鼓动全斗焕将军发动军事政变，而且还允许全斗焕动用韩国陆军第20师（该部队先前一直由美国正式指挥）去镇压1980年的光州学生起义。起义尚未结束，数百名韩国民主斗士就被处决了。

这次事件被称为“光州大屠杀”，韩国人一提起这件事就会想到美国人。全斗焕还逮捕了为民主长期奋斗的金大中并判处其死刑，罪名是金大中与北朝鲜相互勾结。里根政府迫使全斗焕为金大中减了刑。美国向成千上万的韩国学子张开欢迎的双臂，并向韩国开放市场，出口技术，这些做法的确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的民主人士终于在80年代末成功地建立了民主政府，金大中最终结束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回到韩国当上了总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阳光政策”，目的是通过逐步改善与北朝鲜的关系，密切双方经济的往来，动摇平壤的高压统治。

那些认为韩国人对我们忘恩负义的美国人应该铭记上文提到的这些事件，同时也应该思考一下1994年所发生的一切。当时，北朝鲜威胁要制造核武器。为了消除这一威胁，克林顿和北朝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用两座轻水反应堆替代北朝鲜能产生怀的核反应堆。两座轻水反应堆能为北朝鲜提供等量的电力（但不能生产制造核武器的怀）。美国同时还要提供一定量的燃油，承诺不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并与朝鲜建立贸易关系和一定级别的外交关系。除了关闭原来的核反应堆以外，朝鲜承诺不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在实施过程中，美国在各个环节上都遇到了难题。美国的确向北朝鲜运送了燃油，但未能按时到达；美国并没有跟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往来，尽管它的确向北朝鲜提供了足以防止北朝鲜人饿死的食物；至于所承诺的轻水反应堆，则更是遥遥无期了。韩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担心如果北朝鲜政权垮台，饥饿的难民就可能潮水般地涌向韩国—或者更糟：北朝鲜也可能孤注一掷，进攻韩国。因此，金大中开始向北朝鲜提供经济援助。2001年，随着布什政府

的上台，美国政府的政策由原来摇摆不定地修好变成了寻求北朝鲜政权垮台。北朝鲜也违反协议继续研制核武器，世人很快就清楚这一点了。在某些人看来，这则消息正好证明这届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实施军事报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任何规模的冲突都可能导致汉城被毁灭。美国被迫回到克林顿一金大中的对朝政策上来，可是又增加了一个不利条件。韩国人的反美情绪日趋高涨，新当选总统的施政纲领就包括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有些美国人认为我们驻军韩国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韩国防御北朝鲜。这些人对上述事情的反应是要求美国撤军。但他们应该注意到国防部长威廉·科恩1997年4月的声明。科恩表示，即使南、北朝鲜实现统一，美国仍打算保留在韩国的驻军。美国在韩驻军不仅是为了保护韩国，而且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尚不明白，但韩国人早已一清二楚了。

## 美国的干涉：从印度尼西亚到伊拉克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外实施了一系列的干涉，旨在以那些对美国更加言听计从的独裁政府取代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1953年，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下台，王朝复辟。在此事件中，中央情报局起了关键性作用。1954年，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本斯当选，组阁取代了残暴统治三十余年的右翼独裁分子。不料奇基塔香蕉公司刚发出几声怨言，说新政府是一个危险的左翼政府，该政府就被某些人靠着美国人的帮助推翻了。其结果是残暴的右翼独裁分子又统治了五十年。1955年，美国怂恿南越统治者吴庭艳，对结束了法国的印度支那战

争并要求通过选举实现南北统一的协议置之不理。由于所有的人都知道吴庭艳会输给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因此，美国不赞成选举。当时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南越成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整个东南亚定会自动仿而效之—在华盛顿大行其道，并被奉为圭臬。究竟为什么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从来没有人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它却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导致了与北越开战。事实上，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惜“承受任何负担，付出任何代价”来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当年所谓的北越攻击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事件，是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对越南动武的借口。如今已真相大白：该舰不仅未受什么损失，而且事件是由“马多克斯”号首先开火引发的。当然，其后令人遗憾的状况便人人皆知了。

1973年9月11日(智利人记忆中的“9.11”),美国人帮助发动了推翻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运动，将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扶上了台。在皮诺切特政权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无缘无故就失踪了，后来世人获悉，他们均遭残害，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美国要么在其中扶植独裁者，要么给予他们鼎力支持的，还有扎伊尔、印度尼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黎巴嫩、希腊、菲律宾、台湾地区、泰国和阿富汗。本章不便就此问题详细展开讨论，但是我想专门讲一讲四个国家，因为它们总是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就是印度尼西亚、伊朗、阿富汗和伊拉克。

##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由于反恐战争和巴厘岛恐怖袭击案，如今印尼频繁出现在媒体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美国担心印度

尼西亚会变成共产党国家，觉得印尼需要得到保护以抵御中国，印尼也曾频繁在媒体上出现。当时印尼华人数量很少，又受歧视，而且那时候中国人几乎连饭都吃不饱，居然有人怕印尼华人，简直是祀人优天，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印尼领导人苏加诺在苦战荷兰人之后赢得了印尼独立，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荷兰人拥有一切而印尼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一无所有的制度，因此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美苏两个阵营的竞争中奉行不结盟政策。印尼的事态发展在波托马克河两岸引起了一片惶恐。于是，1958年，中央情报局在菲律宾的训练基地培训了许多印尼持不同政见者和雇佣兵，并让他们潜回印尼。不久，他们就纠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地方军官，建立了一个叛乱政府。不过这招最终失败了，苏加诺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而且使自己成了终身总统。另外，他还将美国人的一些财产收归国有，让印尼退出了联合国。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团遭到暴徒袭击时，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

然而，1965年9月，一起重为扑朔迷离的事件改变了整个局势。从印尼空军拉出来的一批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军人袭击了军队高级将领的住宅，杀死了六名将军，占领了广播电台，并宜布他们正在拯救印尼，以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管。印尼战略预备队司令苏哈托将军不知怎么幸免于难，他组织了反击，粉碎了这伙军人接管国家的企图。当时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写道：“印尼军队中有许多人是我们的朋友，”苏哈托便是其中的一个。美国使馆人员向苏哈托提供了一个名单，帮助苏哈托完成了对军队的血腥清洗，因此而送命的共有20到50万人。紧接着，美国人的财产得以如数奉还，美洲银行应邀进入印尼，美国政府还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

印尼提供了2亿美元的最高限额贷款。在其后的三十二年里，苏哈托严格实行军事统治，任人惟亲。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印尼军官都在美国军事院校中学会了如何控制持不同政见者，苏哈托的妻子和儿女们掌握了众多大型企业，占有了大片豪宅，聚敛了巨额财富。荷兰人没有给印尼人留下任何公共事业机构，苏哈托除了建立了一支印尼军队，毫无建树。美国虽然训练了印尼的军队，但在促进民主与法制方面却无什么作为。1975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基辛格访问印尼期间向苏哈托暗示，如果印尼人侵刚从葡萄牙独立出来的东帝坟，美国不会反对。第二周苏哈托的军队便开进了东帝汉。在苏哈托统治期间，惟一能够发表不同政见的场所是清真寺。印尼的伊斯兰势力开始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地得到阿拉伯世界石油美元的支持，越来越接近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1997年，摧毁泰国经济的金融风暴同样袭击了印尼。金融风基带来了一场灾难，美国人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支的招儿更糟，使印尼面临的困难雪上加霜。作为提供救命的应急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印尼停止食品补贴，提高银行利率，以防卢比贬值，还要求印尼关闭多家银行。这些做法完全不符合印尼经济的需要，结果，印尼人立即纷纷抛出卢比。尽管银行利率极高，但是卢比一落千丈。20%多的印尼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华盛顿对苏哈托也越来越不放心，特别是因为他的军队在东帝汝继续实行恐怖统治。最后，联合国授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进人东帝坟，由印尼军队造成的动乱局面这才复归平静。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印尼的示威者和苏哈托自己党内的领导人于1998年5月共同把苏哈托赶下台，谋划了向文职政府的过渡，并最终举行了大选，开始建立民主政府。

美国人感到跟印尼军队打交道教训深刻，于 1998年终止了与其有关培训与联络方面的计划。但是，新的民主局面形成后，伊斯兰政党明显会强大起来，而且印尼新政府在建立程序方面也遇到了麻烦。"9.11”事件后，一些美国官员开始要求恢复原先与印尼军方的培训与援助关系。此事前后我正在印尼旅行。有一天晚上，我跟美国驻印尼大使以及三十多名印尼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共进晚餐。这些人向美国大使请求不要与军方重建关系。他们强调说：“我们需要培训的是市长，警官，法官和教师，而不是士兵。”他们同时还要求美国费点心思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而，数月之后，美国与印尼的军事交往又得以恢复。后来我在华盛顿遇到一名印尼高级官员，他绝望地指出，美国只是透过恐怖主义这个多棱镜来看待印尼。他说：“他们让我们终止洗钱。可是，我们连税都收不上来，如何又能办得到呢？”

数月之后，恐怖分子在巴厘岛一家夜总会制造了一起爆炸案，数百名游客在其中丧生。这一事件说明，印尼需要反恐，同时也需要满足其它需要。可是，印尼人对是否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因为许多印尼人相信这次爆炸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组织的，目的是说服梅加瓦蒂总统镇压穆斯林活动。梅加瓦蒂党内的一名议员说：“警方只能确定几个在台前实施爆炸的楼罗，却找不出在幕后策划袭击的主子。可是，我认为中央情报局插了手。”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持同样看法，他们说这次袭击很可能是由外国某情报机构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印尼塑造某种形象”。对美国人来说，这有点信口雌黄，但如果考虑到印尼人原来跟中央情报局打过交道，也亲身体验过美国人的幕后操纵，谁还会去责怪他们呢？

伊朗

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了史称“民族阵线”的伊朗政治运动。摩萨台是一名激情满怀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把苏联人赶出伊朗北部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后来他担任议会的石油工业委员会主席，提出英伊石油公司须将一半利润作为油田开采权使用费上交伊朗政府。这一要求实际上比一些主要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以及委内瑞拉政府所约定的额度分文不多，只是比英伊石油公司一直上交的要多。由于美伊公司一半归英国政府所有，另外它与埃克森石油公司以及莫比尔石油公司有约定，让它们独家经营它所产石油，因此它拒绝了。它们对中东石油的供应拥有垄断权，不打算让伊朗人进来搅局。尔后，摩萨台便说服国会把该公司收归国有，此举在伊朗深得人心。但是，大石油公司经过磋商之后联合抵制伊朗，拒绝购买或销售伊朗的石油。有两年的时间，摩萨台都在尽力出售伊朗石油，可就是无人购买。伊朗经济开始衰退，而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打一桩石油垄断的官司，另一方面则通过切断对伊援助的办法继续对其施加压力。由于石油卖不出去，再加上国家财政举步维艰，伊朗开始求助于苏联。如果从自身的历史考虑，美国也许该和伊朗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边，反对英帝国主义者，但是此时对共产主义在伊朗影响的恐惧已胜过一切。中央情报局在德黑兰策划了一起政变和一场乱民暴动，扶植礼萨。巴列维国王上了台，“孔雀王朝”得以复辟。国王很快便从华盛顿得到了4500万美元的应急拨款，以帮助他顺利复位,另有8. 5亿美元将在六年内到位,同时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将帮助组建和训练令人可怕的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

国王也偿还了这笔人情债。在 1971年于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王在组织欧佩克成员国首次提高石油价格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 1973年至 1974年间的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涨至四倍奠定了基础。当时，石油突然被视为一种战略物资，同时英国正在有步骤地减少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华盛顿开始为如何维护该地区的稳定而愁眉不展。由于不愿在该地区部署大批美军，美国就向它的老朋友，如今因石油而富起来的国王求助，并认为由伊朗出面来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比较合适。国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便向美国订购了价值约 8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计）的军火。这似乎是一笔很大的交易。伊朗国王成了美国在波斯湾的代理人，美国军火得以在该地区销售。除此以外，中央情报局说：“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伊朗源源不断且越来越多的石油供应的保险性也不比其它事情差。”

其实，就在中央情报局写出这些令人宽心的话时，它就应该意识到（但并没有，这是中情局的典型特征），随着虔诚的穆斯林对伊朗国王的残暴统治以及美国人对他的支持越来越不满，伊朗正孕育着一场革命。1979年，这场革命爆发了。阿亚图拉 ·霍梅尼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国王，赶走了美国这个大撒旦，占领了美国使馆并扣留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真主的名义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现在美国不得不一方面担心伊朗伊斯兰激进分子和新近变得不稳定的波斯湾地区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优虑日益错综复杂的巴以冲突了。1980年 9月，当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 ·侯赛因发动战争，跨过阿拉伯河进人伊朗油田时，美国人喜出望外，表示欢迎，把它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章节中加以讨论。

## 阿富汗

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问题始于1979年12月27日晚。那天夜里，苏军的坦克、大炮和载着大约10万士兵的卡车隆隆驶人阿富汗，去维持一个行将垮台的共产党傀儡政权。在伊朗国王倒台和霍梅尼执政之后，华盛顿并没有把这次入侵看作是苏联人坠人万丈深渊的开始，而是把它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苏联人已经向波斯湾和30英里宽的霍尔本兹海峡迈进了一步。霍尔本兹海峡的航道很窄，一旦有艘超级油轮被击沉，整个航道就会被堵塞。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用石油的60%要通过这个航道运出。在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吉米·卡特总统称苏联入侵阿富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无人知晓总统为何讲这番话。如果苏联人真想利用海峡阻止航运，他们派艘潜艇去击沉一艘油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不过我们不用仔细琢磨这一点，只见当时情况室的会议接二连三，气氛十分紧张，而国际间的高层磋商更是接连不断。

美国人绝不愿意和苏联军队直接交战，因为那样做战争可能会升级，局势也会变得越发而不可收拾。幸运的是，这个问题自有易解之法。阿富汗山荒人野，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这里一直是外敌的葬身之地。阿富汗人从未被外族征服过，苏联军队也决不会比别人更受欢迎。他们开始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还击，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既有种田的锄头，也有19世纪英国的埃菲尔德式步枪。虽然装备比较差，但是士气特别高。

解决这个问题，对华盛顿来说易如反掌。不仅如此，在鼓舞士气方面美国人也可以助一臂之力。除了顽强抵御外敌之

外，能够鼓舞阿富汗人的还有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信奉无神论的苏联共产党对伊斯兰教不仅拒不相信，而且横加低毁。华盛顿和巴基斯坦一道，经过百般努力组建了穆斯林游击队以抗击苏军。从 1980年 1月向阿富汗运送小型武器开始，美国最终共花费了 50亿美元购置武器运往阿富汗，包括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炮在内。美国还印刷了成千上万本教材和训练手册，里面都附有好战的伊斯兰学生袭击苏军目标的插图，并且还在巴基斯坦建立了伊斯兰战士培训基地。这些战士都是从沙特阿拉伯和其它地方来的，他们为了捍卫信仰，和阿富汗人并肩作战。奥萨马 ·本 ·拉丹就是其中的一个。沙特政府也响应美国给阿富汗以财政援助的号召，确保伊斯兰游击队不缺乏资金。

对苏联人来说，阿富汗已经成为他们身上的一个创面巨大而血流不止的伤口。经过十年的战争，他们吃尽了苦头，终于 1989年 2月开始撤军，此举成了苏联自身解体的序幕。在白宫和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内，人们打开香槟酒，为此庆祝。即便这场战争毫无必要，但从策略上讲，也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不过，这时庆祝胜利未免为时过早了一点。在巴基斯坦的支持和美国的默许下，胜利后的阿富汗建立了野蛮的压制人性的塔利班政权。这使那些阿拉伯伊斯兰战士树立了信心，他们把战胜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归功于神的干预。他们认为，有真主保佑他们，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包括打垮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内。

两年以后，即 1991年海湾战争（关于海湾战争，后文再详述）结束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人数已达三万，其中大部分驻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庞大的苏尔坦王子基地。美军好

像要长期驻守在这块被许多穆斯林视为圣土的土地上似的。他们的存在激起了许多伊斯兰战士的强烈愤怒。尽管拉丹是沙特富商的后裔，但他认为沙特王室和政府均已腐败，已成为净化伊斯兰和重现古老伊斯兰文化辉煌的障碍。美国是沙特政府的靠山和后盾，其标志便是美国这帮异教徒驻扎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地方。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赶走这第二个超级大国大撒旦，并相信有真主的保佑，他能做到。于是，“基地”组织应运而生，历史也会因为“9·11”事件而永远记住它。

## 伊拉克

早在1980年，萨达姆的恶名就传开了。国务院已经把伊拉克列在了1979年开出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1980年夏末，500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关押，后来再也没人见到过他们。伦敦的《独立报》报导说，他们均在毒气试验和化学武器试验中被杀害。这件事与美国国防情报局文件中所记载的相一致。文件说，自70年代中期以来，伊拉克已拥有化学武器。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杀死的只是库尔德人和伊朗狂热的伊斯兰信徒；另外，两伊战争肯定会很快结束，原因是伊朗的武器都是在巴列维统治时期从美国获得的，现在大部分由于缺乏配件已成为一堆废铁。但是伊朗人运用人海战术，一波又一波地发起反攻。到1982年时，伊朗人不仅把伊拉克人赶了出去，而且还继续推进，攻人了伊拉克。由于担心“上帝之军”有可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占领伊拉克油田，里根总统下令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包括美国间谍卫星照片在内的军事情报，同时向伊拉克提供足够的武器，以确保伊拉克不输掉这场战争。为了扫清对伊军援道路上的障碍，国务院虽然还在报告伊拉克给恐怖组织的支持丝毫未减，美国照样把伊拉克从支持

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撤掉了。1983年11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已得知伊拉克军队几乎天天使用化学武器。

不过，12月19日，美国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是奉命前往巴格达，向萨达姆通报美国政府要和伊拉克恢复外交关系。同时，拉姆斯菲尔德还转达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想帮助伊拉克跟伊朗作战的口信。在后来的几年里，美国重开驻巴格达使馆，派遣中央情报局特工和美军军官到伊拉克，帮助伊拉克处理战争方面的各项事务。1986年5月，美国甚至还将两批炭疽病菌连同两批肉毒杆菌运往伊拉克高等教育部。几乎同时，美国情报当局获悉伊拉克正致力于发展弹道导弹。但这份情报并未阻止住美国计算机专家被派往伊拉克的导弹研制中心。

现在跳过两年看1988年。我们发现,当年1,　　　　2月份,美国商业部曾批准向伊拉克出口用于研制“飞毛腿”导弹的设备。3月，伊拉克使用美国提供的“贝尔”直升机向哈拉布贾村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喷洒了致命的化学毒剂，结果导致约5000人死亡。关于伊拉克夏季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报导越来越多后，舒尔茨国务卿说证据不确凿，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则写道：“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对实现我国长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都很重要。我们相信，要想影响伊拉克人，经济制裁无济于事，也许会产生相反的结果。”9月，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1988年防止种族清洗法》，取消了伊拉克接受美国贷款和军事或非军事援助的资格，还将进口伊拉克石油列为不合法。但是，里根政府花大力气在众议院成功地否决了该法案。在1989年3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向国会汇报说，伊拉克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武器生产国，但这并未能阻止美国批准向伊拉克出口军民两用设备。甚至到了1990年

7月，老布什政府还批准向伊拉克的研究中心出售了价值 500万美元的先进设备。众所周知，这些研究中心一直在从事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发。很显然，萨达姆也是在 7月份决定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不过，在行动之前，他首先试探了美国人会作何反应。 7月 25日，萨达姆会见了美国大使阿普里尔 ·格拉斯皮。后者向他保证，布什总统“ 希望两国关系更好，更深入。我们对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如贵国和科威特的边界争议，不发表任何意见。 ”此次会晤后，美国又在 8月 1日批准向伊拉克出售了价值约 70万美元的先进数据传输设备。 8月 2日，伊拉克军队冲过边界，侵人科威特。

美国人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并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了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为“ 沙摸风暴 ”的军事行动，以阻止萨达姆的侵略。见到美国如此反应，我们可以想像萨达姆的惊奇程度。 1991年 2月 27日，布什总统下令多国部队停止攻击，萨达姆的军队因此没有被彻底摧毁。我们再想像一下，当时的萨达姆心里又在盘算什么呢？还有，当萨达姆把美国提供的直升机当武装直升机用，去平定盟军惹起的北部库尔德人与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叛乱时，美国和多国部队却丝毫未加制止。不知萨达姆又作何感想？这种儒弱的行为明显暴露出盟国担心如果萨达姆垮台，伊朗人在该地区的影响便会增强。这就是原因。因此，萨达姆之所以能逃过此劫，是因为盟国仍想利用他来制约阿亚图拉们。另外幸存下来的还有庞大的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和警戒设施。布什政府让成千上万的美军驻扎在沙特阿拉伯，使得该基地成了第一个主要的外国基地。正是这些驻军激怒了奥萨马 ·本 ·拉丹，他让我们在 9月 11日及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受折磨。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第 687号决议要求萨达姆销毁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和研制核武器的

设施，并允许外界核查他是否已经照办。在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采取的为时已晚的保护行动中，在伊拉克的北部和南部分别设立了“禁飞区”，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建立了对伊核查机制。核查从来没有成功地发现和彻底销毁这些武器。针对伊拉克的不合作行为，联合国开始对伊实行经济制裁。制裁的结果只是让许多伊拉克百姓陷入贫困，并没有进一步销毁伊拉克的武器。一方面由于美国在核查人员中安插了情报人员，另一方面由于伊拉克渐渐地对核查加以阻挠，这样一来美国搞间谍活动就更有理了，联合国最后终止了核查。美国人不时单方面用巡航导弹轰炸他们怀疑伊拉克武器的藏匿地点，但是，到1998年，所有核查人员已全部撤走。四年之内，他们再未涉足伊拉克。

"9 . 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担心遏制战略可能已经不灵了。如果萨达姆和恐怖组织定有某种盟约，那么伊拉克就有可能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给“基地”组织。由于小布什政府班子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过职，加上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因此小布什政府很快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萨达姆身上，认为必须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他们认为萨达姆必须下台，因为他（别的先不说）对伊朗人使用过化学武器，甚至还毒死自己的人民。这种品行恶毒的家伙必须除掉，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布什政府内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们甚至对总统说，采取这种行动没有必要经过国会批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于1983年关心而详细地询问萨达姆，还有哪些方面美国人能帮他的。如今已当上了国防部长的同一位拉姆斯菲尔德却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单方面发起攻击，尽快拔掉这颗眼中钉。拉姆斯菲尔德宣称，可以将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的核查决议和结束1991年海湾战争的有关

协议作为袭击的依据。美国政府断言，鉴于威胁太大，因此美国需要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为了应付全球范围内反对采取这种行动的呼声和美国国内的坚决反对态度，美国政府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如第一章中所述，安理会投票一致通过了 1441号决议。决议要求萨达姆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进展情况和储存地点提供完整的资料，同时向联合国新的武器核查小组通报上述情况，以备核查。

反战的呼声反映出人们许多方面的担忧。在美国国内，民众普遍不愿意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单独动武。在国外，人们对国际社会无法约束美国的影响力感到越来越担忧。国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伊拉克的威胁并不像美国政府所宣扬的那样严重。伊拉克既不拥有核武器，也不拥有弹道导弹，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同时还有一种担心，美国人侵伊拉克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它可能给海湾地区许多国家，或许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带来不稳定，而且需要付出高昂代价长期占领。

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国家尤其会认为美国的立场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也是把巴以问题和伊拉克问题本末倒置的实例。为什么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就不能接受，而以色列人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就完全可以呢？他们说，在美国攻击伊拉克前，你美国在解决巴以问题上就应该动点真格的，这样，如果最后有必要对伊动武，动武本身在穆斯林世界就不会被看作是为了支持占领西岸地区和加沙的以色列，而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动攻击了。面对这些担忧，执行 1441号决议就很容易引发争端。在最初结果表明伊拉克并未全面履行决议的时候，鲍威尔就请求安理会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碟。可是，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要求联合国加大核查力度的方案，

但这些方案均遭美国拒绝。当安理会内部未能达成妥协时，美国就已下定决心，打算不顾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分歧，单独发动战争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附带说明的是，在美国人二十年来一直不敢踏足的伊朗，在那些喜爱互联网和爱唱摇滚以及要求自由的伊斯兰共和国青年的面前，阿亚图拉们的统治已经发生动摇。正如在越南所发生的那样，我们的军队和枪炮离他们越远，他们就越喜欢我们。

# 第八章

# 一以一台牌两张，来龙去脉故事长

鉴于本章要探讨的问题政治性极强，所以我动笔之前踌躇良久。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而言，以色列和台湾意义重大，无法避而不谈。尽管它们的人口数量不大——分别是 620万和 2200万，但是我还是经常觉得，美国与世界的分歧大抵可用下面四个词解释：以色列，台湾，宗教和院外活动集团。

## 以色列

美国与世界其它各国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无休无止的冲突了，我们与其它国家关系疏远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此。 2002年春夏，这一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针对日益升级的巴勒斯坦人自杀性爆炸，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 ·沙龙命令军队在加沙和西岸地区展开报复。以军毁灭性的报复令整个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布什总统反复要求以色列撤军，沙龙就是不理会。尽管如此，布什仍继续支持沙龙并称其为“ 爱好和平的人 ”。 6月 24日，布什总

统发表国际社会翘首引领的演讲，要求最终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不过他也指出，巴勒斯坦能否如期建国，要根据巴方停止恐怖袭击和选举巴勒斯坦新领导人的情况而定，巴勒斯坦的现任领导人（如亚西尔 ·阿拉法特）“ 妥协于恐怖主义 ”。尽管演讲顺便提到了以色列最终撤军，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巴方想让美方帮助促进和平进程，那么巴勒斯坦就有责任和义务实施改革。国会领导人也都支持总统，民主党领袖理查德 ·格普哈特说：“ 我们支持以色列 ”。共和党参议员米奇 ·麦康奈尔建议通过立法，正式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引文是：“ 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

布什引用《圣经》中的话，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在巴以问题上的观点深受《旧约全书》或者说摩西五经中上帝许给犹太人土地一事的影响。美国人，不论是信仰基督教的还是信仰犹太教的，往往都把以色列人看作是那一约定的继承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有权拥有至少是目前以色列所占的土地，也许还有权拥有《圣经》地图中以色列有过的其它地方。

另外，美国人还认为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像美国。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受压迫者的避风港，一个开拓者定居的社会，一个愿为真理而战的英勇顽强的国家，一个实行法制的民主国家（中东地区惟一的一个）和一个存在于异域沙漠中的西方消费文化的绿洲。当然，许多美国人生活在以色列。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以色列就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在美国媒体被广泛报导，并把它等同于“ 基地 ”组织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同时把它诊释为一个关系到以色列人生存的威胁，

布什在演讲中也如是说。美国媒体对以色列人就他们的报道所提出的批评非常敏感。以色列曾报怨CNN（有线新闻电视网）在报导巴以杰宁镇交火时过分偏袒巴勒斯坦。结果，CNN有史以来第一次道了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袭击美国人就不大在乎，而且很容易被看作是正当防卫。以色列的战争被看作是美国的战争。

别国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尽管谴责恐怖袭击，但除美国以外很少有国家认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恐怖袭击与“基地”组织有牵连。欧洲的一些分析家担心，以色列连续不断地对巴勒斯坦施压，也许恰恰会造成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恐怖主义组织大联合的局面。耶路撒冷路德教主教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评论说：“这似乎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似乎是一场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未来的战争。”他又补充说，以色列使用美国产的武器，而美以关系又很密切，有时会给人造成美国支持这场战争的印象。

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看法。以色列实施报复时，我正在亚洲旅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播出的电视画面明显让人感到CNN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反映美国人提供的直升机和其它武器攻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沙龙对布什要求以色列撤军置之不理的画面，到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反美印象，与布什把沙龙刻画成“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做法异曲同工。众所周知，沙龙是以色列最强硬的鹰派人物，过去曾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过暴力并且反对和谈。马来西亚杰出的作家达图穆罕默德·乔哈尔·本·哈桑说：“布什怎么能称那么一个人为‘爱好和平的人’呢？连我这样一个亲美的穆斯林都开始觉得美国很差劲了，因为它对以色列的压迫置若罔闻。”

《经济学家》周刊指出“美国报纸从不登载以色列用推土机推倒巴勒斯坦人房屋的照片；作为给以色列制造武器的国家，美国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巴以问题上该承担多少责任。”每到一个地方，与我交谈的人都会很快提到双重标准问题。“如果美国真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它为什么不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为什么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而单单不提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呢？”“美国要求一些国家实行民主，但以色列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很显然，在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统一。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由沙龙最近提出的。他称欧洲对以色列的批评存在偏见（言外之意就是反犹），可是，这也许只是针对以色列的国际偏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以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孤立地位有其正当理由。我曾经有过与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的经历。既然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那么就让我来试一试，看能不能提出一个比从《福克斯新闻》或《世界报》的观点更加不偏不倚的观点来。

##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我于2002年9月27 FJ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安全检查相当严格，包括两次审核护照，对美国人也不例外—以色列是惟一一个见不到任何反美迹象的地方。几天前，一辆经过市中心的公交车上又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案，导致5人死亡，50人受伤。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乘坐的出租车途径艾伦比大街，离那辆汽车被炸得粉碎的地点不远。那里现在已经没有爆炸的痕迹了，人行道上到处是人，有购物的，也有喝卡普契诺咖啡的，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但每个人都知道曾经发生过，就在以色列北部的自杀性爆炸炸死一名警察后

第二天，这里又发生了爆炸。在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布什6月份演讲之后，曾有6周短暂的停火。这些是继停火以后的第一轮袭击。为了让每个人都明白，布什的讲话和沙龙的军事战术改变不了什么，巴勒斯坦的两个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和哈马斯声称对新一轮袭击负责，并扬言还会有更多的袭击。看着这条时尚的大街和无辜的人群，我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在大规模杀害那些欢欢喜喜地寻觅便宜货的无辜者之后竟然还公开炫耀。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忙说他们与恐怖袭击无关，但在以色列或美国，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对于受CNN所播出的恐怖画面的影响而观察又不仔细的人来说，以色列人的生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出奇的平静。当然，每座办公大楼和旅馆都有一支保安部队，你进人办公楼和旅馆时，他们会用锐利的目光打量你。金属探测器无处不在，特别通行证到处都要，政府办公大楼看上去像要塞。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相当多的国际旅行经历的人来说，这些安全措施并不显得格外刺目。特拉维夫乍一看就像是圣莫尼卡①搬到了地中海，人们同样在阳光斑驳的树荫下随意地做着生意。大街上人山人海，餐馆和随处可见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也都是顾客盈门。这些景象甚至会令人对报纸中所报导的10%的失业率和政府驱逐外国非法打工者的内容产生疑惑。在一个依靠别国救济品度日的国家，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像是交战地区。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人们生活在担惊受怕、扰攘不安中。早晨送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刊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为生存而战之中。战争的

①圣莫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目的正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我边看报便听到一连串暴力袭击的新闻。这里典型的每日新闻都是这样的消息：95岁的阿拉伯老妇在西岸地区乘坐出租车时遭枪击毙命；耶路撒冷又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为了报复先前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摧毁了数间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一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成功地粉碎了西岸阿拉伯人炸毁公交车的企图。这些报道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无时不在。陪我吃午饭的以色列人就显然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很快吃完饭，随即离开了饭店。后来他告诉我，附近餐桌上有一个人让他感到很紧张。

尽管整天忙忙碌碌，但经济还是一团糟。在耶路撒冷，我住在马里奥特饭店。这是一家拥有700多个房间的大饭店，可以俯瞰老城的部分地区。数月之前，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我发现，人住的客人连我才十来个。要不是给客人提供欧洲大陆式早餐，餐厅就可能停业了。后来，我散步到了橄榄山。站在山上，耶路撒冷壮观的景色和它的标志性建筑可尽收眼底。这些建筑包括阿克萨清真寺，西墙①，老城，另外还有很多。这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美景之一，旅游业占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而游客想看的就是这里。要不是有几个可怜的以籍阿拉伯小男孩围着我兜售纪念品，山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一开始我坚持不买他们的东西，但听到其中一个故意对另一个低声耳语时，我心软了，于是买了一张地图和一本书。他说的是：“他是美国人。他不想买是因为他们恨我们。”很显然，晚上他们只有靠卖给我书和地图弄来的那点钱买吃的了，他们并不介意我离开时会不会把地图和书扔在宾馆里。

---

①西墙：即著名的“哭墙”——译者注。

但是，对刺激以色列的经济来说，我那笔小小的买卖绝对起不了任何作用。据预测，今年以色列的经济增长将萎缩近3%，同时通货膨胀率达8%。尽管以色列政府的债务仅次于日本，且信用等级越来越低，但是以政府仍然要求美国作担保，帮它获得更多的贷款，另外还要求再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约合每个以色列人645美元。维持军事设施以及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都牵扯了很大一部分人力，他们得设立检查站，肃清恐怖分子和保护定居者。这项负担数额庞大，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帮助，根本无以为继。正如《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对我所讲的那样，“以色列的经济令人琢磨不透，但是与巴方的冲突掩盖了所有矛盾。”以色列的经济靠来自美国民间或官方的捐赠支撑着。这就是那个战火不断，陷人包围，但又很能左右美国人看法的以色列。

## 犹太人定居者和以籍阿拉伯人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说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在许多人心目中，“生存”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些人中很庞大的一股势力便是以色列定居者。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对阿拉伯军队发起了攻击。当时的阿拉伯军队驻扎在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颇具威胁。结果，以色列人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沙漠地区。1979年，以色列人把西奈半岛沙漠地区归还给了埃及，以此换取了和埃及的和平。但是，以色列至今还占领着其它一些地方，和其它几方的和平条约尚未签署，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实际上，以色列人不是仅仅是占领领土而已。1967年他们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包括许多历史名胜，并把首都从特拉维夫搬迁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环耶

路撒冷地区修建了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建立一条安全带，以应付未来的袭击；二是实现对《圣经》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土地的占领。从一开始，这些定居点就一直引起激烈的冲突和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样做并不合法，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四））》的有关条款规定，占领国不能吞并被占领土或向被占领地区移民。另外，也可以说是违反了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大局出发，“从被占领土撤军”。这样做毫无疑问也是置美国总统的要求于不顾。从吉米·卡特到目前的布什，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求它撤军。在过去的几年中，定居点的成倍增加，即便不能说是违背了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承诺的字面条文，至少也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实质。

更为重要的是，定居点的建立意味着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检查站和特别进路，以及做出不胜枚举的导致巴以摩擦的事情来。第一批定居点数量有限，规模不大，而且主要是战略性的。但是1977年，在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发起了大规模扩大定居点的运动。贝京坚决主张建立他所谓的“埃雷兹以色列”，即“大以色列”，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于是，以色列政府开始用金钱刺激定居者，向他们提供住房以及其它在以色列本土根本享受不起的生活便利设施。结果，定居者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千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40万人。定居点的总面积，包括军事区和特别进路在内，约占西岸地区面积的42写。

定居者及其支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中多数来自美国，并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和犹太组织的支持。其中一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莫莉

·穆尔采访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在以色列得到《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所有土地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和平。”另一类更多的是从实质上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从其中一人对穆尔女士说的话中可见一斑。“问题不在于定居点是否合法，而在于应该把这些山丘留给阿拉伯人还是应该让犹太人来这里生活。这是问题的关键。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管持哪种观点，定居者都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为之而战的“生存”，是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人以色列版图。

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定居者的生存而战。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愿意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并把它们让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真正持久的和平。大多数以色列人生活在1967年以色列边境稍作调整后的范围内便觉足矣，沿新的边境线把以色列和西岸地区隔开的墙，目前已在建设之中。不过，许多人不相信巴勒斯坦人仅仅对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地带感兴趣，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在消灭了以色列之后才会』b满意足。

这种看法盛行过，也遭人冷落过。1993年9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之后，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式启动。当时有一阵子大家都兴高采烈，希望满怀。但是随着各种“路障”（本义和喻义兼有）不断地出现，大家渐渐不高兴起来，不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夏、秋两季，戴维营会谈和埃及的塔巴会谈进行得很艰苦，但双方似乎很快便可达成协议，这又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而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现在骤然变得不屈不挠。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持观点是，埃胡德·巴拉克先在戴维营向阿拉法特开出了巴方无法

拒绝的价码，2000年12月在波林堡军事基地又进一步使价码更优惠，2001年1月塔巴会谈时以方又一次锦上添花。按照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的说法，当初阿拉法特只要回答一个“行”字，那么以色列就会撤出几乎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就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得到约旦河西岸地区97%的土地，拥有圣殿山的主权，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所造成的难民也可以有权回归巴勒斯坦国了。然而，据这种观点所言，阿拉法特居然拒绝了，并发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实施自杀性爆炸。他的拒绝使人们得出了不愿得出的结论，即巴勒斯坦人的真正目标是最终消灭以色列。编辑兼作家约西·克莱因·哈列维对我说：“这件事令我忍无可忍。你知道，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起先，我以为和平没什么指望，后来我开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观点并相信他们的诚意。但是，这下全完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反击。”在海法市的一块指示牌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面写着，“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定居者”。以色列的许多中间政治派别也纷纷感到，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与那些定居者同呼吸共命运了。

　　不过，也有人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讨论）。是不是因为以方持续不断地新建定居点给巴方造成了类似的怀疑和绝望并助长了恐怖袭击，而这些袭击又使以色列人认为巴方留给他们的只有选择为生存而战了？正如一些以色列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是不是因为那些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有意挑起争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团结一致为生存而战？或者如以色列一个反战者所问的那样，是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所有的土地，但不要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这一争论牵涉到生存问题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犹太国”的存留问题。这一点美国人不甚明了。在以色列，人们不仅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国”这个词，而且几乎跟听到有人提起许多与伊斯兰教关联的阿拉伯国家一样自然。导致建立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本出发点，毕竟是建立一个犹太人不再受迫害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而且由犹太人控制的。如今，犹太人的控制与以色列本土及被古领土上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色列的国民包括500万犹太人和120万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繁衍速度要比犹太人的快得多。过去，犹太人人口不足的缺陷通过移民得到了很大弥补。但是，由于冲突持续不断，加上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移民人口已经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民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这样的发展趋势会带来一些令人极其苦恼的问题。如果要让以籍阿拉伯人彻底融人以色列社会，他们肯定会淡化犹太国这一概念并提出异议。如果不让他们彻底融人，那就必然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隔离统治、这有损于犹太文明和以色列国的根本价值观。然而，令人感到不妙的是，在以色列，你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迁移”一事，就是把以籍阿拉伯人全都迁出以色列。这种主张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有点像种族清洗。而定居点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被占领土还有35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繁衍速度也远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的。据估计，到2010年，生活在原来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以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多于犹太人。如果定居点继续存在并且增加，那么，届时已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在“大以色列”的地位会怎样呢？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够高明，他就会放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

表示巴勒斯坦人愿意成为以色列人，条件是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选举权。”

正是这样一个前景，促使拉宾总理于1993年把流亡于突尼斯的阿拉法特重找回来，并以他作为主要对话者，开创了奥斯陆和平进程。他认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稍作变更的1967年边界内只有以小以色列面貌出现才能生存。他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和一个能与其共建和平的人。尽管阿拉法特浑身毛病，但他是惟一可能的人选。

这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小以色列，以籍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和以色列究竟是一个犹太教国家还是一个非宗教国家的问题仍很棘手。列夫·格林伯格说：“用任何一个标准衡量，以色列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辞。对于犹太公民来说，以色列是周围地区最为喧闹最富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见到的那样，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与巴方达成协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太多了”。但是，以籍阿拉伯人显然是二等公民，这也是事实。雷茜克是一名给人印象不错的以籍阿拉伯妇女，来自雅法，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说得都很流利，在一个维护以籍阿拉伯人权益的机构工作。她指出，阿拉伯人社区的学校、公共事业和道路维修部门，与犹太人社区的相比，资金明显不足。她还说，对阿拉伯人购置土地和开办企业都有严格的限制；学校的教科书只反映以色列人的历史观；阿拉伯人不是征兵对象，而且也不鼓励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军队。尽管造成后面这一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而且也可以理解，但是在以色列，有服役的经历是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这种二等公民地位的情况竟发展到出现这种事的地步：在2003年初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两名以籍阿拉伯人议员一开始竟被中央选举委

员会禁止参加连任选举。最高法院后来虽撤销了这个决定，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尼西姆·卡尔德龙所说的犹太国理念和民主之间的矛盾。

## 西岸地区

不到约旦河西岸地区，你根本感受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阿拉法特主席可以见你，但你必须在下午5点赶到拉马拉检查站。”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问题有多复杂。拉马拉实际上地处耶路撒冷郊区，在正常情况下，赶到那儿不会超过半小时。

但是，西岸地区的一切都不正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占领达35年。出于保护越来越多的定居者的需要，以色列人绕过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区域，不可思议地建立了一个由多条特别通道构成的交通网，绵延400公里，供定居者和以色列军方的车辆快速安全地通行。不过，这个网络中的许多道路不是被阻断，就是要绕好长的弯。到处都是军事检查站，动辄要求车辆行人停止行进。由于上述原因，我勉勉强强地按时与我的几个向导见上了面，其中有伯利恒市市长，市长的兄弟以及尚未赴任的巴勒斯坦驻美大使。在由卡车、自行车、毛驴以及行人构成的长长队伍中，我们缓慢地向检查站挪动。以色列的士兵都是些小伙子，年龄大约在18岁至25岁之间。他们很有礼貌，而且细致周到，但我不难感觉到我的几名陪同有羞辱感。他们都是成熟而有经验的官员，却在自己的家园里被一帮毛孩子盘来问去。

一过检查站，我便发现坦克给城市街道带来了什么后果

——路面变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阿拉法特设在木卡塔的总部大楼一部分已被推土机推倒。通往大楼的道路车辙深陷，坑洼密布，我们乘坐的汽车也只好颠颠簸簸，东倒西歪。几天前，沙龙盛怒之下派出他的坦克和推土机又一次挤逼阿拉法特。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以军对已塌垮的大楼建立的坦克包围圈，然后停放好汽车，穿过铁丝网和沙袋进人楼内。

阿拉法特个子不高，七十七岁，患有帕金森氏症，显得苍老。很难想象他就是令以色列人害怕的根源。但他的思维依然敏捷，当天我们主要讨论了美国人最近一次冒犯，即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议案，该法案令总统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那天早晨，以色列媒体兴奋得近乎病态地报导了这件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迁馆就会使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合法化，使得巴勒斯坦人收复失地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向他解释说，事情的前前后后只是美国人政治上的一次动作。该议案留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如果总统认为迁馆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可以不遵从这一指令，而他肯定会丝毫不差地这么认为的。通过议案只是国会耍的一个手段，既迎合了国会中亲以势力，又不必冒正式实施动议的风险。美国政治把戏的确玩得很高明，可你很难向一位满腹狐疑的外国听众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

阿拉法特竭力想说明他既没有下令，也没有授意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色列军队几乎摧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有警察局和政府机关，还关闭了巴勒斯坦人的大学，甚至拿走了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谈论这些情况时，他说他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指挥任何事情。他说：“布什要求我们实行改革，举行选举。但是，如果我们连一个电话都打不了，我们怎么能够举行选举呢？”他认为自杀性爆炸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伊斯AiL圣

战者实施的，这两个组织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竞争，争取获得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对他本人的攻击越猛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破坏越严重，哈马斯的力量就越壮大。他还否认是他拒绝接受克林顿的主张和塔巴和平计划的内容。相反，他说，是巴拉克在承认自己无法让以色列民众接受和平计划之后离开塔巴谈判桌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大选中，他输给了沙龙。）我们会本能地怀疑像阿拉法特这样的脱难老手，但他的一番评论还是很吸引人的。他说，他欢迎由美国或者由美军和国际部队保护下的国际机构实施的解决方案。他这一说法和一些以色列人的评论不谋而合。他们对我说，惟一的希望是美国人强行干预，解决问题。

萨阿卜·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旧金山生活了八年，参加过戴维营、塔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所有谈判。他也是杰里科市的市长。我准备第二天下午在杰里科拜会他。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名以籍阿拉伯人，第二天他带我来到杰里科检查站，但以军不允许他送我进城。我只好下车，步行穿过检查站，换乘杰里科市内的一辆出租车来到埃雷卡特的办公室。

我立刻问埃雷卡特，为什么无法阻止自杀性爆炸和恐怖袭击，同时，我也提到作为一个了解美国的人，他肯定了解每一次袭击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力度的破坏是何等严重。他的回答着实令人不安。他说他心里当然明白。“但是，克莱德，你听我说，在杰里科，应该说我是有点权力的，但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快成一副空架子了。杰里科市真正的头儿是检查站值勤的阿龙中尉。是他在决定谁能进城，谁能出城；老太太是否可以去医院看病；燃油是否可以运进城来。而且不止是阿龙中尉在挖我的墙脚，那边那些人……”他朝清真寺一指，“也在

架空我。他们跟巴勒斯坦民众讲，埃雷卡特给你们办不了任何事，只有真主能够帮助你们。我给你说说恐怖袭击吧。西岸地区的生活如同地狱。大部分地区的失业率近80。有一半人住在草棚里，每天靠两个美元生活，而且还得在检查站等候，让以色列人优先通过。以色列人抱怨自杀性爆炸，我也认为它们不人道，但是，现在被杀死的更多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每次沙龙下令实施报复和组织暗杀，就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他在学校经常受到骚扰和辱骂，因为我这个做父亲的被看作是一个亲美的软蛋。我只能每天晚上祈祷他不会变成一个自杀性爆炸分子，用年轻人的狂热捍卫家族的荣誉。在沙龙把我们的整个基础设施都夷为平地后，我们还能够阻止什么呢？布什是不是在开玩笑？”

至于戴维营谈判，埃雷卡特强调，他和阿拉法特都曾恳求克林顿在会谈开始前能给他们点时间做准备，但是毫无作用。当时，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还有六个月，巴拉克只希望利用谈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巩固其日益动摇的地位。埃雷卡特强调指出，恰恰是巴方一直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建议。例如，巴方曾建议以方把境内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土地给巴勒斯坦，作为交换，以方可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些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并人以色列本土。他还强调说，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不会同意巴勒斯坦难民大规模回归，所以建议采取自主选择回归的办法，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巴方已经对这个感情性很强的问题作了处理，另外也可以避免回归的巴勒斯坦难民洪水般地涌人以色列。最后，尽管他承认由于没能就克林顿的提议达成一致意见，结果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他又坚持说在塔巴会谈时，双方意见很快就要达成一致了，只是因为巴拉克

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必败无疑才以失败告终。他坚决否认是阿拉法特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暴动。他说，戴维营会议失败后，得知沙龙想到圣殿山上走一走，阿拉法特就明白此举必然引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感。为此，他赶赴巴拉克家，恳求他出面加以阻止。至于会出什么事，他说他无法控制。除此以外，埃雷卡特还指出，沙龙步行圣殿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游行后，首先遭到枪杀的是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士兵干的。在暴动的前几个月里，死者几乎都是巴勒斯坦青年。

要想彻底弄清巴勒斯坦问题，从几个角度去仔细观察很重要。首先，外界观察家证实了埃里卡特所描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还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观点。以色列最重要的报纸《国土报》报道说，超过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学生已经辍学，而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报告说，巴勒斯坦的各种经济损失价值达40亿美元，而1999年巴勒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才3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损失似乎是由以色列军队造成的。他们摧毁了那些靠近定居点公路并可能用来藏匿巴勒斯坦袭击者的果园和建筑。联合国还报告说，巴勒斯坦医院的就医人数以及按照医疗操作规程进行诊疗的情况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大约为30%到70。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对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宵禁和限制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简言之，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以色列相比更加糟糕。

其次，如果说在被占领土上巴以之间的互斗在最好时也让人心烦的话，那么，犹太人定居者只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司法裁决，再加上以色列军队出于安全目的随意征用土地，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现，如果那些越来越激进的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给巴勒斯坦人造成损失，巴勒斯坦人很少能

指望以色列法庭会做出给巴勒斯坦人赔偿的裁决。如果是以色列军队所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希望。那里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以色列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个由拒绝到被占领土服役的士兵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戴维 ·宗西因说：“你站在检查站，看到以色列定居者畅通无阻，而阿拉伯人则不行，这时你会想起南非。”以色列前谈判代表乌里 ·萨维尔的一席话更具震撼力。在描述奥斯陆预备会谈期间他的惊奇发现时，他写道：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能盖房，不能上班，不能上学，不能买地，不能种庄稼，不能做买卖，晚上不能散步，没有我们发放的许可证，也不能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探家。”在“文明占领”的幌子下，他以前一直没能看到这一切。

最后一点是，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十分复杂。由于阿拉法特已逐渐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象征，同时也由于沙龙这么说他，世界上许多人都把它当成独裁者，以为他完全掌控着巴勒斯坦的所有运动。这一点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设立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将由以色列逐步归还的地区。他还主持巴勒斯坦议会。按特拉维夫大学尼西姆 ·卡尔德龙的描述，该议会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但是，阿拉法特至少面临着三个有力的挑战者。第一个是“哈马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开始创建时得到了以色列那些希望削弱阿拉法特的官员的支持。哈马斯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但也许不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与国际上的穆斯林组织有联系，而这些组织又管理着大型的慈善机构且经费充足，所以在以色列的哈马斯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慈善事业，向穷人提供食物、药品和其它帮助；另一个负责军事，专门从事自杀性爆炸。“伊斯兰圣战者”则是一

个相对较为松散的组织，但同样信奉激进的伊斯兰哲学，同样采取恐怖手段。“赫兹布拉”也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成立于黎巴嫩，与伊朗有联系，活动方式与哈马斯雷同，也有军事和慈善两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对和平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创建巴勒斯坦国毫无兴趣。他们主张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这一点跟那些支持建立“大以色列国”的以色列鹰派人物一模一样。

以色列人和许多美国人常常讲，阿拉法特同样想什么都要。虽然，有一段时间，阿拉法特的确这么想过，但是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不管阿拉法特当时多么不愿意，在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他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事实，并寻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对他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与以色列的斗争实际上就成了土地之争，而不是生存之争。正如巴勒斯坦负责民意调查的哈立德·希卡基所指出的，阿拉法特连一寸土地都没收回，导致了巴勒斯坦青年近卫军的诞生，而且其势力与日俱增，对这位老资格的巴解领导人形成了挑战。这一代人不一定要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他们越来越坚信一点：只有当代价高得让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沙龙和布什共同采取的旨在削弱阿拉法特并阻挠他实现巴勒斯坦的合法目标的行动，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大大增强了哈马斯和其它所有挑战者的力量。沙龙明知故为，继续挤压阿拉法特，这又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和许多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想把巴以之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之战。其用意在于团结以色列人，打一场战争，把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去，最终实现《圣经》中以色列国的版图。该地区有许多人都担心，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会为沙龙吞并西岸并肃清该地

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掩护。

## 遥遥无期的和平

目前冲突的根源还在于19世纪末。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莱奥·平斯克尔和摩西·赫斯都坚信，避免犹太人遭屠杀和受歧视的惟一办法是在环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古老家园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从1878年开始，他们便安排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无视那些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天真地提出了“无人生活的土地应归无土地生活的人”的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磨擦很快便出现了，因为人们很快便看出新来的这些人无意融人当地的社会生活，相反还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单独的大不相同的社会。犹太殖民研究会会长哈伊姆·毛尔高利特·卡利瓦里斯基说，他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遭遇。二十五年来，驱逐他们的行动并不容易，但犹太公众一定要这样做。犹太哲学家和作家阿哈德·哈姆曾预言说：“对待当地人我们必须有爱心，要尊重……但是，我们的同胞在以色列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恰恰相反。……他们用敌意和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生活伤害了当地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新的重要变化。英国外交大臣鲍尔弗勋爵在努力争取犹太人支持欧洲和美国的同盟事业时，发表了《鲍尔弗宣言》。他说，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还补充道：“犹太复国主义是好是坏暂且不论，但总比那些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种种欲望和偏见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的观点。当

时，他正努力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致阿拉伯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麦克马洪承诺，如果他们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省份内的阿拉伯人即可独立。他还委派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去帮助组织起义。

这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在凡尔赛和会上撞了车。威尔逊总统尽管一直致力于民族自决，还是指出，“未开化的民族”需要国际联盟托管机构的“指导”。此时的英国早已把劳伦斯和阿拉伯人起义忘得一干二净，极力主张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威尔逊1急统的金一克莱恩委员会被派去调查当地民众的情绪，发现在基督教一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坚决反对犹太复国计划，并表达了愿意由美国人托管的愿望。这个主意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由于他们已预感到美国人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结果阿拉伯人必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更愿接受英国人托管和《鲍尔弗宣言》。（这件事使图姆·塞格夫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违背了民主原则。,’)威尔逊对此表示同意，结果就由英国负责托管巴勒斯坦了。

但是，英国人的这段时光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大量犹太移民从欧洲涌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越发紧张，结果导致频频暴乱。最后，英国人试图限制移民，但这又引发了与犹太复国组织的冲突。二战时这些问题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但在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大屠杀的幸存者转而奔向巴勒斯坦。由于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反客为主，阿拉伯人反对再增加犹太移民，而英国人也再一次强行实行限制。这时，一直与阿拉伯人为敌的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伊尔根”开始把枪弹对准英国人。英国人则把“托管权”奉还给联合国，于1948年撤走了。联合国（当时共有56个成员国，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和拉美国家）提出了一个

很有创意的两国方案。联合国提议，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实体，耶路撒冷城则由国际共管。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方案，并对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宣了战。结果阿拉伯人战败，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沿停火线一分为二。这条停火线目前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以色列国边境。约75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其他一些国家如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内，无依无靠，束手无策。他们来自原巴勒斯坦地区，但他们原先生活的地方已被以色列人占领。从那时到现在，巴以冲突几乎一刻都未停止过，时而激烈，时而平缓。这段历史滋生出了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不公，他们“回归”的渴望，以及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围困和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斡旋。

1967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时发起了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运动，从此便有了几十年的争斗、恐怖袭击、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双方和谈并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以及各种各样的和平谈判。1987年至1989年的第一次以籍巴勒斯坦人暴动以及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的确使巴以问题的解决有了新进展。巴勒斯坦青年举行起义，手执石块掷向以色列人，反对他们长达21年的占领。武装暴动也博得了国际社会和部分以色列人的同情。有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对占领土地和修建定居点提出质疑，问道义何在。海湾战争突出了解决巴以长期冲突的紧迫性。老布什总统呼吁在马德里举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停止修建定居点（美国的援助不可避免地被用于这项工程）。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是个“大以色列”主义者，他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布什因此暂停了对以色列的一些援助。马德里和会成果寥寥，但的确使巴以双方第一次得以直接会谈。美国中断援助，在伊扎克·拉宾击

败沙米尔的选举中也起了作用。拉宾继续与巴方举行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 1993年 8月在奥斯陆达成协议。

奥斯陆协议规定，以方必须逐步从部分被占领土撤军并向巴方移交该地区一些部门的权力，如教育、卫生和治安等部门。巴方则必须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逐步移交有限的权力是为按照安理会第 242号和第 338号决议彻底解决巴以冲突打个基础。第一批撤军将从加沙和杰里科地区开始。拉宾在台上时，一切事情都在按照协议进行，只不过是进展稍慢了点。但是，当拉宾在 1995年底被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后，整个和平进程便开始显得后劲不足了。问题的关键是协议中隐含的两个推断：一是尽管以色列没有写出书面承诺，但是巴方预期它会停止扩建定居点，因为定居点的持续增加显然有悖于协议的精神实质，即便不是违背协议的书面条文。二是尽管巴解组织已开始停止恐怖活动，但以方预期巴解也会停止哈马斯以及其它组织的恐怖活动。然而事实却是，在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这些年内，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番多。恐怖活动尽管大幅度减少—以色列人都可以在杰里科的夜总会里尽情享受——但是并没有彻底绝迹。

原因在于和平协议是哈马斯和其它激进组织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恐怖袭击是破坏协议的最有效手段。恐怖袭击也帮了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们的忙，他们可以利用它拒绝撤军，利用它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解。尽管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人放弃土地换来的只是些巴勒斯坦人未必能兑现的承诺，但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巴勒斯坦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人放弃了对原巴勒斯坦托管地大部分土地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以方拆除他们痛恨的定居点的承诺，除

了说巴方有权商讨一个无法确定的“最终方案”外，巴方没有获得以方对未来的任何保证。以色列的一名评论家说：“冒这样的风险，阿拉法特十有八九是疯了。”不管怎么说，到1999年底，所有的计划都已向后推迟，双方的暴力行为均有上升。很显然，和平进程已陷人困境。

### 院外活动集团

巴以冲突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面积在持续增加。自1967年开始一直如此，原因在于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一直未停过。即使以色列拆除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也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企图夺走他们所有的土地，这一点肯定导致了暴力的产生。最近我和美国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共进晚餐时，席间他同意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并告诉我说，由于一直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停止修建定居点，所以确实有点令人灰心丧气。我问，为什么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总统没办法让一个比美国小得多并完全依靠美国援助和保护的小国保证不再修建呢？“克莱德，”他说，“这是你第一次问我一个答案很明确的问题，回答是：纽约和佛罗里达。”他所指的是这两个州的美籍犹太人的选票的重要性，更广泛一点说，指的是，势力庞大的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我会把“基督教联盟”及其它一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组织的重大影响也考虑进去，他随即表示同意。

和平努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院外活动集团阻止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的能力。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最有影响的亲以团体之一。它声称，任何对以色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案都得先从我们那块可靠的根据地溜一遭儿。所谓可靠的

根据地，是指他们有200名众议员和45名参议员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对基督教联盟发表的演讲中，福音传教士帕特·罗伯逊又加上了传教士这块砝码，他说“我们将支持以色列，”接着又补充说：“巴勒斯坦国将遭到诅咒。”前国会议员保罗·劳德利写道，院外活动集团可以确保“不会公开讨论巴以冲突”。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威廉·匡特说，70%到80的国会议员会同意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张。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福克斯新闻在2002年5月初报导说，支持以色列的一系列决议在参众两院分别以94票对2票和352票对21票通过，其中包括一项援助以方军事活动2亿美元的决议。此前布什总统曾要求以军坦克4月份从约旦河西岸地区撤走，后来白宫收到了10万余封愤怒的基督教保守分子发来的电子邮件。一位以色列政治分析家告诉我：“在美国争论以色列问题的余地，要比在以色列国内还要少。”他本可以加卜一句，即便争论起来，争论的水平有时也令人感觉可笑。2002年5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梅伊做客《名人访谈》电视节目时说，只要不让以色列放弃已经控制的领土，他就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建国。

### 相互指责

2000年3月，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已奄奄一息而自己再次当选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建议：避开烦人的奥斯陆协议，在戴维营举行一次“不谈则已，谈则必成”的谈判，寻求最终解决方案。尽管准备时间不足，自己和巴拉克执政时间均已屈指可数，而且还得冒因谈判失败而引起冲突加剧的风险，但是克林顿看好这次历史性机遇，认为谈判一方

面可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因此他连忙同意了。这次赌博最后还是输了，导致巴勒斯坦开始实施自杀性爆炸，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实行残酷的报复。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可避免的责难声中，许多美以领导人广泛接受了一个矛盾的观点：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拒绝以色列的提议，是因为他们痛恨以色列，更愿通过暴力消灭以色列而不是与它烤和。

巴拉克本人的话最能表明这种观点。我与巴拉克共进早餐时，他坚持说，他向阿拉法特开出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价钱。其中包括：以 92%的西岸地区和 100%的加沙地带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同时还可得到 1967年前以占领的部分领土作为补偿；拆除绝大部分定居点，将定居者统一迁至占西岸地区约 8%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将并入以色列版图；让巴勒斯坦国在东耶路撒冷建都；对圣殿山实行托管（并非出让主权）；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勒斯坦国（但不可以回以色列本土），以及一项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计划。但是，阿拉法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巴勒斯坦领袖居然说“不”。巴拉克坚持认为阿拉法特并没有“真心诚意地谈判”，而是在“逢场作戏”，企图获得以色列人的最大让步。他不仅是对阿拉法特一个人，而且是对所有阿拉伯人深恶痛绝，并说在他们的文化里不存在“真诚”这个概念，因此他们撒谎时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至于阿拉法特为什么不愿做成这笔显然只赚不赔的买卖，巴拉克说，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无权生存，他们寻求的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相信阿拉法特在把人口数量当做他的主要武器。他说，巴勒斯坦人将利用以色列的民主先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然后再促使以色列演变成一个双民族国家，等到巴勒斯坦人口占大多数后，

“犹太国，便会不复存在。他还指出，阿拉法特始终在谋划如何先充分利用和谈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然后运用暴力手段逼迫以色列做出更多的让步。

尽管表述方式跟巴拉克的不完全一样，但克林顿的戴维营首席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同样指出，阿拉法特先是不接受对方的提议，接着又放纵暴力行为。对和谈的失败，他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他把阿拉法特比喻为一个“冲浪者”。他说，由于阿拉法特对继续冲浪比冲向岸边更感兴趣，因此他没赶上“大浪”。也许是因为有限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岸边”并不是阿拉法特所一直寻求的目标。克林顿也指责阿拉法特说，一位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接近巴勒斯坦人多少年来一贯要求的方案，而阿拉法特竟然拒绝以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比这些要人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现任总统布什相信这些人所言非虚。于是他就对沙龙的藐视行为耐心十足；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要巴勒斯坦人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但这位新领导人不能是阿拉法特；于是他就把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和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并要求和平谈判开始前必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于是他就拒绝与阿拉法特会面，甚至在联合国总部拒绝与他握手。如果这些人的说法都符合事实，即便布什总统的举动和态度有些刺激性，那也是无可非议的事。然而，如果他们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呢？

通过与各方主要谈判代表的交谈，我的印象跟我看完日本电影《罗生门》后的印象差不多。片中卷入同一件事的几个人物似乎都与几个迥然不同的事件有关联。阿拉法特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否认拒绝过协议，并共同指责巴拉克，而巴拉克则坚持说他们的确拒绝了。更有意思的是罗伯特·马利的分析。马

利曾是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事后对会谈作了“修正主义的”描述。他的这些描述与我自己在研究和访谈中的发现趋于一致。

首先，马利证实阿拉法特担心会谈准备时间不足而且存在失败的危险。2000年6月15日，他向克林顿表达了自己的担优。他说“当着总统的面”任何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还说“峰会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你真想烧毁它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不点燃美国人的怒火，阿拉法特继续谈判，但是对谈判结果不抱太大的希望。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巴拉克很急迫，而阿拉法特很谨慎。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对于渐进主义式的奥斯陆进程深表怀疑。对他而言，奥斯陆进程意味着撤军，为此以色列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结果是既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回报，也不见巴勒斯坦人的最终要求。此外，持续增加的巴勒斯坦人骚乱也造成了加快动作的压力。若能签署一个激动人心的和平协议，便可提供一个机会，挽救他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下降的局面。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巴拉克认为还是抛开沙拉米香肠制造机而直接去买一整份三明治更好一些。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谈判结束阶段上，他疏忽了许多过渡性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从西岸地区部分撤军并把耶路撒冷附近三个村庄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方，这是以方在奥斯陆协议和后续的一系列协议中正式向巴方承诺过的。同时，西岸地区扩建定居点的速度却在加快。在巴拉克看来，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最终方案一旦被双方接受，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阿拉法特有不同的理解。他也发觉奥斯陆和平进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原因与巴拉克所说的不同。对巴勒斯坦

人而言，奥斯陆协议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大堆既无法兑现又受到阻碍的诺言。“协议签署已过六年，以色列人的定居点更多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更少了，经济状况也更糟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巴拉克对必要的过渡性撤军的疏忽，定居点断断续续的加速修建，只能进一步加深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人以及巴拉克本人的怀疑。为了增强自己对峰会的信心，阿拉法特向克林顿提出应当多给一些准备时间，同时要求以色列落实先前承诺过的部分撤军协议。阿拉法特的某些担心克林顿同样也有。他用巴拉克的一个承诺答复了阿拉法特。巴拉克答应不管和谈能否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都会开始撤军。总统也向阿拉法特保证，万一和谈失败，他也不会受到责备。克林顿对阿拉法特说：“不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的”。结果，既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以色列也没有撤军。但是，阿拉法特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戴维营会谈的过程跟人们心目中所理解的谈判大不一样。一说戴维营谈判，人们会想像为以巴谈判代表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在美国人的监督下，仔细斟酌推敲各种提议。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从来没有举行过实质性的会谈，他们大部时间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由美国人穿梭往来，传递想法，转述回复。我接受别人的建议，用了“想法”这个词，因为双方都未曾给对方递交过任何正式的书面提议。美国信使负责做记录，为了确保不产生误解，记录内容都读给双方代表听一下，但是一切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些想法是作为美国人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以色列人的提议提出来的，用的措辞是以色列人愿意把它们作为谈判的基础，条件是阿拉法特也得同意。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并没有推行自己的计划，而是担当了一个不了解双方底线的高级媒婆罢了。为了把“球”带

向“球门”，美国调停人员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议，以便把这些反建议转达给另一方。此时，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点。正如埃里卡特在杰里科告诉我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很有创造性。例如：为了让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点并人版图，他们想出了交换土地的主意；作为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的权利认可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对实际回归以色列的难民人数加以限制的办法；他们还保证允许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行使主权。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终还是没能给美国谈判代表拿出一个内容连贯的和平方案。尽管有许多因素从中作梗，但是谁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中一个便是巴方感到过去一直被那些措辞含糊的临时协议所蒙骗，觉得如果这一次是最终协议，那么它必须一目了然，落实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谁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巴拉克的立场一直在变。这的确是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在阿拉法特严肃认真起来之前，巴拉克不愿透露底线，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对方底线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另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局势令阿持法特难以驾驭。这就造成了代表团的内部分裂。该代表团开始盼望能有一名继任者取代年迈的阿拉法特。最后，巴方认为，即便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接受这些想法也充满危险。这些危险虽小，但影响重大。美国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对难民问题却只字未提，在土地交换问题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对圣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有主权。巴方担心，接受了这些想法，就有可能动摇巴方的根本立场，把争论的焦点由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应履行的义务变成讨论美国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巴勒斯坦的几位

重要领导人对我说，他们认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机。

不过，与此同时，美方并没有给巴拉克施加任何压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说拆除定居点了。而35年来，美国一直声称修建定居点是非法之举。克林顿及其代表团所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其实，他们深知达成一份公正的协议关系重大，也知道如何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戴维营峰会毫无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从此结束。2000年整个秋季，三方重开谈判。在总统任期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克林顿于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给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可能成为新巴勒斯坦国的地方（不过不是以色列），和一种更有利于巴方的耶路撒冷处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谨慎，不过在2001年1月2日与克林顿会面时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巴拉克：“我接受你这几条，但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同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们必须尊重的看法。”

这时巴拉克似乎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一点他私下里跟克林顿透露过。三个星期之后，克林顿告别政坛，也不再参与和谈，但是以巴的直接谈判在塔巴继续举行。塔巴谈判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拒绝了某一方案，而是因为以色列大选在会谈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巴拉克竞选时主张继续和谈，并授权发表巴以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宣布达成协议近在咫尺，这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双方共同认为，随着以色列选举后和谈的恢复，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一上台，立即宣布塔巴会谈死亡，并宣布了他反对进一步进行和谈的立场。巴拉克之所以输掉竞选，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来暴力事件迅速升级，降低了

他的和平倡议的可信度。其次在于阿拉法特，有人指责他策划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进一步加以纵容，目的是为了对以方进一步施压，以便以方做出让步。但是，重新审视一下当时的形势，我们却发现事情更为复杂。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龙计划要到圣殿山散步。阿拉法特专程到巴拉克家中拜会他，请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说法，巴拉克说他也无能为力。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巴拉克说那是以色列内部的政治事务，这件事曾与巴方的安全官员协调过；他还说此事与后来爆发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深谙内情的观察家并不持这种看法。丹尼斯·罗斯在谈论沙龙散步这件事时说："我可以想出许多损招，但是确实想不出比这一招更损的了。"考虑到沙龙素有反巴、反和平之名，而且局势又动荡不安，这一事件显然具有挑衅性。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的挑衅行为可以让他在大选中坐收红利，这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于是，9月28日，沙龙在一千名以色列警察的层层护卫下散了一小会儿步。第二天，游行以攀力告终。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担任了一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确定巴以暴力冲突的原因。根据他所提交的报告，大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游行者遭遇大批以色列警察，双方形成对峙，冲突由此开始。"在西墙附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替察发射实弹驱散示威者，死4人，伤200人。"14名以色列警察也受了伤。根据米切尔的报告，"在大部分冲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过火器或炸药。"

到第一周结束时，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几个国际组织纷纷抱怨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军队越来越

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来越忠于沙龙。他们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

不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饰巴勒斯坦人，也不要为他们开脱在戴维营和谈失败以及暴力升级问题上的责任。两年来，这种暴力冲突已经毁掉了这一地区。我认为，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期间铸成了大错，因为他没有能够做出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意的反应。但是，和谈失败和暴力升级的责任不能只归到阿拉法特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消灭以色列的事业。

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真正之所在：尽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是根据这些看法制定出来的。到头来，我们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众叛亲离，而美国恰恰正处在需要几个朋友的节骨眼上。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是这样对我解释巴以局势的：“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始终是联合政府。这就变得激进党派的权力与地位不相称，并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张‘大以色列’者的挟制。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们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与建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强行干预，也可以把北约拉上一块干。但是由于美国的以色列一基督教院外活动集团百分之两千地支持以色列并控制着国会，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只想补充说，只要院外活动集团、国会以及白宫继续执迷不悟，美国人就得继续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扔到以色列人扩建定居点的工地上。这一政策只会充当暴力事件的

“催化剂”，导致残酷的报复，后者反过来又会使世人对美国更加鄙视，而各方热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会渐渐退去。

## 台　湾

由于台湾问题牵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1972年“对华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一直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共产党政治。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理想之地，仅美国公司就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时也是重要的对美投资国。除了实行资本主义以外，中国还大规模地开放了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中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来，美中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能够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那就是美国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干涉。

对中国人而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一个肃清半殖民统治残余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束中国内战的问题。在大陆，内战已于1949年结束。中国人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国干涉均视为一种对中国内政难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们在此打一个比方，尽管有点夸张，但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女儿在毛伊岛有一栋房子。毛伊岛俯瞰着毛伊海峡和无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岛。近年来，原先生活在这些岛上

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后裔掀起了一场夏威夷独立运动。设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独立分子占领卡胡拉威岛并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独立王国，情况会怎样？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军会被派去镇压起义。现在假定中国人要派海军到毛伊海峡巡逻，以保护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国不受伤害，那又将如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每个美国人会多么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正是这种愤慨。每次与中国人交谈，人们如果开头不问美国人为何干涉台湾问题，结束时也一定会问。他们问，为什么美国想在一个纯属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冒战争风险。究竟是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惹中国人生气的原因。

2001年 4月 24日，美国宣布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 4艘驱逐舰， 12架反潜直升机，以及多达 8艘的既能发射鱼雷也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价值达 4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向台湾出售公认的进攻性武器。美台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美国将扩大台军学习使用先进武器系统的培训规模。此事宣布前数小时，中国驻美大使在午餐会上还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美国继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侵犯了中国主权，也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壮了胆。”这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对台湾（尤其是那些鼓吹台独的人）和台湾在美国的说客（包括密西西比州—所售舰只将在该州建造—民主党参议员特伦特 ·洛特和几个得到台湾大量好处的美国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来说都是大胜利。克林顿奉行与中国保持密切接触的政策时，这些说客曾经对克林顿推迟他们的对台出售武器建议感到心灰意冷。

更令人吃惊的是布什总统第二天所发表的评论。他说“美

国将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帮助台湾自卫”。尽管中国将此称为“公开的挑衅”，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台湾军方的高级将领又对美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访问，“非正式地”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美军对台军的训练以及与台军协调的规模也得以扩大。

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激怒北京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完全违背了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精神实质，而且很可能也违背了《公报》的条文。该公报是指导美中关系的三个关键性文件之一。在该文件中，美国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还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是美国首次违反该协议。1992年，当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人白热化阶段时，老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此种战斗机性能比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任何型号的战斗机都优越），显然是为了巩固其在得克萨斯的政治基础，因为得克萨斯是飞机的生产地，同时也是为了拍那些反华的右翼共和党人的马屁。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最近已被改称为台湾院外活动集团。为了理解此中的一切，我们得稍稍了解一点历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的首选之地。“拯救”中国，在传教士们看来，就好比商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为点亮中国的每盏灯而提供煤油。我还记得小时候不时去拜访我所去的教堂资助的赴中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中包括亨利·B·卢斯的父母。卢斯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

兼编辑，被西奥多·怀特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怀特还指出：“在卢斯看来，耶稣的意志和美国的意志是以一种最为简单、毫不复杂的方式结为一体的，而这两者的意志欣然接受了中国人。”它所欣然接受的中国人中有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1937年，《时代》杂志评选他们为“年度风云人物”。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曾设法松散地控制了中国各地的军阀，并开始统一中国。除了他以前的盟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顽强抵抗外，其统一大业还算取得了一定成绩。蒋夫人，即宋美龄，是宋耀如的女儿。宋耀如当时是中国最富的人之一，他通过出版《圣经》发了财。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还说服蒋委员长饭依了基督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临近时，领导中国的正是此二人。卢斯和传教士们也都站在他们一边。《世界传教士评论》说：“中国现在拥有了历史上最开明、最爱国、最能干的统治者。”

作为中—缅—印战场的美军总指挥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跟蒋介石及其夫人打过交道后，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史迪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由于他发表意见时直来直去，因此被称为“刻薄的美国佬”。比起对日作战来，蒋介石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节约战争资源，准备和毛的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已经多年，史迪威精辟地描述了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结盟的对象是一个愚昧、无知、迷信的土包子。”史迪威发现了共产党人的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积极抗日；同时他也看到，由于蒋介石的将军们贪污，士兵吃不上饭，领不到晌；在军事部署上，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为改革贪污贿赂盛行的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奋力斗争，并要求拥有一定的

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和共产党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国军队投人战场，去抗击日本人。正因为如此，蒋夫人才利用她的个人魅力和故友新朋以及卢斯手下是非不辨的报刊，革了史迪威的职。怀特的总结非常到位：“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是个完全不能执政的政府。他〔蒋〕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如果当初史迪威能够自主行事的话，共产党没准也不会赢得江山。即便赢得了，也是以我们盟友的身份赢得的，至少不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但是史迪威并未能自主行事。日本人投降之后，由于国共再次反目，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内战。尽管蒋介石有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他根本不是毛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轻松地横扫国民党军队，缴获了美国提供给它的所有武器，并用它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美国人活活成了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人，而国民党则扮演了送货郎的角色。怀特把这个腐败的制度和受美国支持的政权描述为“坦慕尼协会①的腐败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②的残暴”的结合体。但是卢斯的《时代》杂志不愿登载这种坏消息，因为“它摧毁了他的世界观”。

卢斯并不是惟一一个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就在怀特寄出《时代》杂志不愿发表的文稿时，美国外事部门的一群中国问题专家，其中包括约翰·谢伟思，正向华盛顿报告内容类似但

---

①坦曼尼协会——一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由于好施小惠，贿赂敌对政治派别的领导人，致使“坦曼尼协会”一名成了腐败政治的同义词。——一译者注

②异端裁判所，又译宗教法庭，它是天主教教庭的司法机关，用以镇压异端以及炼丹术、巫术和魔法。—一译者注

美国官员不愿了解的情况。结果，怀特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社，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蒋介石带着中国的金条逃往台湾岛。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和他夫人仍然深受卢斯的喜爱；由于参议员乔 ·麦卡锡和一些保守的左翼分子指责约翰 ·谢伟思和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把中国给丢了 ”，谢伟思因此被解职。

一踏上台湾岛，蒋介石便下令处决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建立了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因此被迫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军事管制。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还说他要反攻并重新夺回大陆。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为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 1972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造成这种幻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朝鲜战争。 1949年，蒋介石一飞到台湾，美国国务卿迪安 ·艾奇逊就宣称，福摩萨（即台湾）不在美国的环形防御带内。如果情况继续如此的话，共产党无疑会较快地占领台湾岛，结束内战。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被派往台湾海峡巡逻。在后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时代》杂志、一些宗教组织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如参议员沃尔特 ·乔治、约翰 ·福斯特 ·杜勒斯和迪安 ·腊斯克，均使美国民众相信，蒋介石在台湾的腐败独裁统治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尼克松所需要的技巧是，在实现与北京修好目标的同时，如何放弃蒋介石但又不让美国人看上去似乎要终止对台湾长达

二三十年的支持。通过“创造性的举棋不定”和在措辞上耍点花招，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仍然幻想自己的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自己很快将反攻并控制大陆。在《公报》中，中国申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坚决反对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因为蒋介石也持同样观点，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所以美国宣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表述很聪明但略显诡诈。不过，接下来的内容确实让美国人承担起了义务。《公报》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不过，“最终”可能意味从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和与台湾的军事往来一如往常，丝毫不减，而且美国一直把美国驻华大使派往台湾。

1979年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后，中美才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交时，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意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废除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军。武器出售问题遗留了下来，没有得到解决。看上去似乎要把时任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似的。但是，蒋夫人及其继子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支持者。尽管台湾实行了三十年的新闻审查和军事管制，但是他们仍然把蒋夫人及其继子刻画成争取自由斗争的胜利者。

他们在美国国会中也有朋友。卡特政府草拟了一个法案，本打算处理一下美国将对台北的外交承认转为北京所涉及到的无数法律细节问题。这个本来很平常的法律文件被由两党亲台

议员组成的小组变成了《1979年对台关系法》。该小组由我们的老朋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共同领导。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向台湾出售足够用于自卫（不论这究竟是指多少）的武器问题，同时美国承诺反对任何对台湾动武和施压的行为。这个法案还导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半官方的使馆—美国在台协会。该组织是一个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的民间组织，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成员由国务卿任命。

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违背了自己刚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所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国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要求美国予以澄清，这就导致了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台湾的对面集结了一支导弹部队，1996年演习时示威性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威胁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要开战。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美国人的保证使得台湾政权得以拒绝参加关于采取香港模式实现统一的认真讨论。他们的行为有时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辩论者常常引用他们所打的类似于我那个“毛伊独立王国”的比方，他们常常问：如果中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派部队去支持南部邦联，美国会作何感想呢？

不过，我们所幸不必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半个盟友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点，再加上台湾终于建立了民主政权，致使美国保守派中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动向。不过这一问题虽然讨论过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台商已纷纷把工厂迁往大陆。一开始，台湾政权极力限制这种投资和尖端技术的外流，但是这有点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样异想天开。

台资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大约50万台湾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因此，布什也许会发现，就在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台湾时，最后一名台湾人已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乘船去了大陆。事实上，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949年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首架商务包机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经启航。因此，最后的那位台湾人连船也不必再坐，坐飞机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 以色列和台湾问题的教训

在对以和对台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容许那些极端自利的团体歪曲它对现实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证据，这样实际上是在继续大肆自残，同时不必要地引起了别人对它的深仇大恨。由于实行三权分立，我们的政府体制促使一些工于心计的少数人争夺关键职位。这些人有时会受到一些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影响。一个来自人口不足百万的州的参议员，如果在关键时刻担当主席一职，就可以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强盛的国力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不能面对现实，因此，强盛的国力不仅能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新闻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报导越南的实际情况。现在新闻界仍然没有全面报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台湾地区以及其它许多关键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经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不敢

向观众和读者们的偏见发起挑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观众和读者这一边。他们对别的国家的关心常常是有选择的，暂时的，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偏见。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这些思想要么就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要么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为美国人鸣冤叫屈的。古巴的问题我就别说了。

# 第九章
# 朋友与敌人

1989年 11月 9日，当我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看到东、西柏林的德国人从柏林墙顶上璞璞地开启香槟酒瓶塞时，心情与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样，既高兴又怀疑。许久以来，一直作为专制与分裂象征的柏林墙，现在突然成了自由与希望胜利的标志。四十年的冷战，我们这代人一生不幸的背景，并非在大决战中结束，而是在自由人民的笑声和歌声中划上了句号。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一直领导着这场斗争的美国，以及对西方人的观念和价值观来说，这都是个伟大的时刻。

这刚是个开头。1991年 3月 2日，伊拉克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出的结束海湾战争的条款，似乎永远结束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对邻国的威胁。1991年 7月，华约解体。1991年圣诞节时，罗纳德·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庞大而坚不可摧的苏联崩溃了。过去一直是 20世纪特点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以民主资本主义为惟一幸存者而告终了。弗郎西斯·福山称其为“历史的终结”，而且似乎很快就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一度荒芜的土壤里破土而出，中

国则实行了一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中国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称谓。甚至连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情绪也似乎好了起来，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另外，受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期的带动，世界经济发展腾飞了。美国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终于得到推广，成了全世界不可避免地终将据此融为一体的准则。

美国似乎没有敌人。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不管是在伦敦、巴黎、利雅得、莫斯科、北京、汉城、雅加达、开罗、墨西哥城，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的时刻，很像1946至1948年间的情形，当时美国同样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开始为多边合作的新秩序打造基础，结果却因冷战的爆发而使这一努力夭折。这一时刻比过去那一时刻甚至更好，因为早期建立起来的体制和观念已经取胜，现在甚至连威胁发动一场新冲突的潜在对手都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艾奇逊及战后早期的领袖们都想方设法要在一种世界新秩序创建时“在场”，并想在其创建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的领袖们却认为，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梦想。他们只须遵循罗纳德·里根的忠告，“奋力贯彻始终”即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代表了政治上的一种终结形态，因为它“可以给予人们历史上一直在寻求的自我价值。”一个由观念一致的自由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不会有多少发动战争的积极性，因为人人都知道，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他们宁愿通过贸易致富。一个由这样一些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将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平秩序。因此，美国应优先促进民主区域的拓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从令人陶醉的“全球化”这个词中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一富有魅力的方法十分令人注目，各国为了致富都心甘情愿地实行严格的共同规

则（汤姆·弗里德曼的“金紧身衣”）。全球化将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更为民主；而且随着各国更加富有，更为民主，它们将变得更加现代化，因而会更加致力于和平、稳定以及合法的幸福追求。这是个美丽的梦想，它的最佳之处在于不需要任何人在任何形式的“创造”时“在场”。

美国的领导人刚刚赢得了这场战争，对和平就开始管理不善了。他们继续沿用过去的作法，好像冷战及20世纪尚未结束似的。尽管美国的国防开支的确减少了，至少是短暂的，但相对来说却上升了，因为过去的苏联以及其它国家的国防开支都在逐渐减少。旧的联盟结构依然维持原状，韩国、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依然是美国的附属国并受美国的保护。海外义务和基地甚至还有所扩大，尤其是在波斯湾建起了前面提到过的沙特阿拉伯大型空军基地之后。但是，非军事性对外行动却继续受到忽视。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数目在继续上升，而美国用于援助及海外外交机构的预算款项却在下降。美国仍在咄咄逼人地进行有关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通过这些谈判，基于过去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然而，美国领导人丝毫没有考虑根本的基础结构及新近参与和新近开发的市场的状况。“华盛顿意见一致”这一政策哲学教导人们说，自由贸易会自动解决所有那些问题。

其它重大发展同样没有受到重视。击败苏联后，美国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其后继国由共产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民主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对于疏于严密保护的危险材料储备库也没有采取什么保安措施。由于盲目认为核俱乐部可以局限于少数成员国，当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几声巨响宣布拥有了核俱乐部成员资格时，美国及其盟国着实震惊不小。尽管个

球化刺激了某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均衡，以及会造成贫富之间更大差距这一趋势却被忽略了。同样受到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化使贫富差距更为明显，并且迫使不同信仰和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以致威胁到了他们各自的特性。冷战的结束，欧盟及其新货币欧元的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可是，这一发展也没有为美国所认识。同样被熟视无睹的情况还有：美国的毒品泛滥及政策对拉丁美洲的腐蚀作用；伊斯兰教徒感觉失去了尊严而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前后不一致的日本政策、韩国新的民主政体以及中国重新崛起的意义。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以及流行更为广泛的疟疾及肺结核病，均被视为遥远未来的问题。同样不受重视的还有以下预告：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1/3将会缺乏洁净的饮用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及洪水将使埃及和巴基斯坦这类地区的小麦产量减少20%到50%。当然，提及这些事情有些太鲁莽，而且会干扰来自华尔街的更为重要的消息。

结果是，20世纪虽然在1991年的圣诞节可能已告一段落，但21世纪实际上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真正开始。在这一天，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清楚地表明，历史仍在进行之中，全球化不一定就是有魔力的灵丹妙药。这次袭击触发了影响深远的全球关系的转变，美国的一些老朋友看起来更像是对手，而一些老对手却更像是盟友。

## 欧　洲

这些转变在欧洲最明显不过了。长期以来，美国与欧洲

直保持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尽管美国诞生于对英国及欧洲很多东西的反叛之中，但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表述的观点都源自欧洲人的思想。正因为建立在民主、人权及反抗压迫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才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造就了几个关键的全球性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相互作用，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启动。美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八百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的总和。美国在欧洲所设公司的产值约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欧洲在美国的投资额也大致相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10万亿美元，欧洲为 9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几乎占全球经济的 60%。正如前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现任英国石油公司总裁的彼得·萨瑟兰对我所言：“我们这个联盟的成功与否，对全球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

萨瑟兰说的一点不错。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美欧联盟之间日益增多的麻烦现状令人十分担忧。虽然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仍对美国持肯定态度，但是比例却低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区，而且该比例还在下降。在 2003年 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春季的比尔德堡会议，以及 2002年春天的跨大西洋政策网络会议上，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工商业、政府、媒体及学术界的高级领导人注意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9.11”之后，美国请求北约宣布在阿富汗参战，在得到北约响应后，却又拒绝欧洲盟国实际提供帮助，理由是欧洲人只会拖延战事。此举不仅伤害了欧洲人的自尊心，而且对联盟的使命提出了质疑。当美国急欲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寻求军事解决时，欧洲则坚持认为，应该遵守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承诺的武器销毁工作进行核

查。实际上，德国总理格哈特 ·施罗德发誓，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国新的预防性和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在比我们更熟谙战争的欧洲敲响了警钟。当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公约以及其它条约时，欧洲则继续前进，以使这些条约在没有美国签署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效。另外，诸如变基因 tł品之类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贸易纠纷，亦如雨后春笋般地显现出来了。

此外，辩论这些问题的口气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了。美国的老欧洲朋友感到失望，并有些叛逆表现。欧盟前任专员艾蒂安 ·达维农对我说，“ 美国正在将北约改变成一个志愿者联盟。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 ·沃尔夫说，“ 美国过去有个很好的优点，以世界的利益为美国的利益。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弃了。如今的美国令人恐惧，因为它不受约束。左冀人士一向认为美国是个无赖国家，现在连中间人士也这么认为了。”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似乎已经背弃了支撑着全球机制的价值观，而且用沃尔夫的话说，它选择了“ 有势就有理 ”的价值观。在美国方面，国防部副部长杜格 ·菲斯把美国对北约的政策称作是“ 让这个怪物继续活下去 ”的政策，而白宫的一位官员则称欧洲人是“ 共安乐而不共患难的朋友 ”。罗伯特 ·卡根 200。年在他所著的那本倍受关注的《论天堂与强权》一书中称，“ 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源于火星。 ”他还认为，欧洲在军事上的虚弱，往往会使它对美国采取绥靖和牵制的策略。在美国，欧洲的形象正逐渐变得不仅是对美国姑息迁就，而且是反民主、反市场，闭关自守，一副机会主义的模样，不愿在国防上花钱，却又嫉妒和憎恨美国的实力和成功。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和失望之下，隐藏着的是有关价值观、

动因及模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法国专栏作家多米尼克 ·穆瓦西在《外交》季刊上评论道，"20世纪 70年代的反美，是对美国以往所作所为的反应；今天的反美．则是对美国本性的回答。”一些美国评论家，如《国民评论》的约翰 ·奥沙利文，发出警告说，欧盟正在朝着成为美国敌对势力的方向发展。而马丁 ·沃尔夫则说，欧盟、中国和印度也许需要结盟来与美国保持平衡。

这种矛盾并不像老夫老妻之间的口角。巨大的地质板块正在运动之中，很有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萨瑟兰所描述的全球系统，如果不是将其毁灭的话。“历史的终结”论认为，已获胜的民主资本主义是一元化的，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假如历史继续前进并在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引起竞争，那么，这种竞争有可能引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列强中，惟独欧洲具备可用来挑战美国的规模、资源、体制和技术。实际上，包括福山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早就在问，“西方”一词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鉴于美国业已宣布要实行防止挑战者崛起的政策，这种思路突然使得有关美国人侵海牙的笑话（该笑话是由于美国拒不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而杜撰出来的）变得不那么好笑了。当然，实际的人侵不会发生，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某种冷战显然是有可能的。

美国人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欧洲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欧洲立场的难于统一，没完没了地成立委员会，专心致志地制订八万多页令人头脑发木的欧盟全套规章制度等等，往往令我们感到不胜其烦。但是，正如肯尼迪总统 1962年在发表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联合欧洲”的任务远比建设美国的任务艰巨得多。 20世纪 70年代，当我作为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在布鲁塞尔

工作期间．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有过切身体验。当时，我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里都设有分公司，并且正在努力规范我们的营销活动，以使这些活动得以在全欧洲，而不只是在某个国家里开展。

这一努力常常需要把各个不同国家的市场营销经理们召集到一起商讨市场变化。其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然而，这样做并非总能行得通。此外，还有上千条理由说明全欧洲的营销策略行不通。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北部有一家造纸厂，在比利时北部另外还有一家。我们想让这两家造纸厂向法国市场供纸。可是，比利时的纸巾卷比意大利的碰巧宽一点。这样一来，把货物运到法国超市后就造成了混乱。还有，在英国标签上的信息必须与在荷兰的有所不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我们已从中窥其概貌。这是一个冗长乏味、经常急得人发疯的过程，而我经管的只是一个公司和一个相当简单的产品流程。对那些正在为欧盟一次制订一个标准的欧洲官员们所表现出来的精力、耐心及奉献精神，我实在感到惊奇。

我们来看看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吧。欧盟制服了疯狂的通货膨胀，减少了恶性国家预算赤字并对新的赤字做了限制，设立了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而且使用了单一的货币。如今，你可周游欧洲各国而不必兑换货币或出示护照了。人们常说，美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一，日本第二。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2002年12月13日，欧盟决定吸收10个新的成员国，2004年6月生效,欧盟的人口总数将因之达到4.5亿,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日本的两倍，仅次于美国的10万亿美元。此外，如果欧元大大强于美元，那么欧元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对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在全球经济领域，欧洲是一支羽翼丰满的超级势力，它使得美国无法采取单边行动。欧盟可以通过一名高级官员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像它在贸易、农业、技术标准、竞争政策及货币等事务上所做的那样，它完全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一点儿都不用受别人的摆布。假如这类事情发生，欧盟自己往往会制订标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及工商大亨杰克·韦尔奇以切身之痛领教了这一点。为了在退休前做出最后的业绩，韦尔奇试图实现通用电气公司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当该方案顺利通过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审查程序后，他和华尔街的人士们都认为这笔交易已是板上钉钉，并订购了香槟酒。后来证明，他们过于心急了，没有把欧盟竞争政策专员马里奥·蒙蒂考虑在内，结果正是此人扼杀了这笔交易，也毁了韦尔奇的退休宴会。蒙蒂以此证明，任何两家在欧洲设厂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未经欧洲批准就无法实现合并。通过此举，他也维护了注重对竞争者而不是对消费者的影响这一竞争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典型做法。

还有比竞争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货币。货币是王牌。以前，华尔街，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总是说，欧洲货币的统一永远不会发生。当欧洲货币统一后，人们又说统一的货币无法流通，即使真地流通，欧元也不会对美元构成挑战。欧元是否能够长期流通，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它对美元的冲击。由于美元呈持续走软之势，2003年2月底，俄罗斯将它的部分外汇储备由美元换成了欧元。欧元正在成为60年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可以代替美元的独立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在利率、存款利息及贸易赤字方面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抑制。这一点美国已有

感受。美国也会发现，自己要为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系统的控制权而同欧洲扭打争执了。如果欧美之间在更大范围的全球事务上加大分歧，这一竞争有可能变得尤为激烈，最终将有可能影响美国能力的施展。

这两个经济实体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发生其它方面的冲突。正像罗马帝国分裂后，罗马和拜占庭最终发展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已演变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原因，这两种社会经济模式之间的摩擦正在日益加剧。差异的核心是对个人与政府的作用及责任的不同看法。美国当然强调个人而不信任政府。它信奉机会均等，但会欣然接受大量不平等的结果。2002年8月26日，《每周商务》杂志在它的头条社论中敦促在美国采取会扩大贫富差别的政策。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贫富差距会拉大，可穷人的绝对收人水平也会提高。这在欧洲却是个不受欢迎的论点，因为欧洲强调的是调节不平等的结果，而人们认为政府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发展与福利国家的辩论中，美国一向认为，政府对工商业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可以保持低失业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启动、创新、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往往强调欧洲的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欧洲人则争辩说，他们的失业人员比美国许多有工作的人生活得还要好。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缺少医疗保险，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欧洲人为之哀叹。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一争论似乎有可能以美国人获胜而告终。欧洲人开始设法取消政府调节并实行私有化，同时还大谈“股东”一词，并创建了纳斯达克的翻版。可是，随着科技泡沫的破灭，美国模式看上去不再那么诱人了，这一争论继尔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正如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

斯·施韦策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认为，一种股票在某一短时间内的价格，是估价一家公司的价值或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的最好方法，这种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尽管美国通常对“欧洲僵化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欧洲许多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待遇的经济实体，如瑞典及荷兰，却运转得相当好。而且总的说来，欧盟的表现并不比美国的表现落后多远。比如说，如果对结算方式作适当的调整就会发现，美国近来大肆宣扬的生产率增长，实际上落后于欧洲的生产率增长。更重要的是，欧盟的经济基础看上去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的经济基础。欧元的储蓄率为 6.35，而美国的大约为 3%。美国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而欧盟在这方面却大体上持平。因此，为取得所谓的经济增长优势，美国每年不得不从欧洲及其它地方借债 5000亿美元。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美国举债过高，已到了近乎无法支撑下去的地步。另外，欧洲有将自己的民族经济彻底融人欧盟之中的独特经验，许多人认为欧洲在全球化进程及技术方面更为先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会积极地推销自己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将会十分诱人。这样一来，全世界也许不选择美国的结算标准而采用欧盟的；而且在有关国际互联网隐私的规则上．全世界也许会摒弃美国的而采纳欧盟的。全球化也许很快就不再是美国人的游戏。

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对以上成就以及对取得这些成就起了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许久以来，美欧对话的祷文一直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我们虽说是同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后嗣及民主的支持者，实际上却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宗教。半数的美国人在每个周末去一次教堂，欧洲的这一数字却不足 15%。欧洲人一般对美

国人有关堕胎及进化与创造之争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理解和令人气愤的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频频乞求上帝保佑美国，好像这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值得上帝保佑似的。托尼 ·布莱尔或雅克 ·希拉克绝不可能在对公众讲话时乞求上帝保佑英国或法国。

欧洲人担心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会以一种十字军精神加二元论的成分深深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和不一定非要发生的剧烈冲突。因为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善恶之争，欧洲人倾向于寻求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就像欧洲人不赞同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那样，他们也不赞同它的超级爱国主义。一名瑞士的交流学生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后，对他在美国见到的悬挂国旗及经常保证报效国家的现象感到震惊。再者，在欧洲有一种感觉，认为这种强烈的崇美主义很容易转变为敌意。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人往往贬抑民族主义，似乎更热衷于用无休止的谈判来解决危险的问题。

美国人强调机会均等，欧洲人则更重视结果平等。诺基亚是世界上生产手机的主要厂家，但付给其经理们的薪金却相对较少。欧洲人纳闷，为什么美国需要付给经理们比他们的工人多那么多的薪水。他们对美国工商业由股东驱动的价值观存有疑问，认为股份持有者含义广泛，除了企业所有人之外，还应照顾到雇员、供货商、顾客及当地社区的利益。这种对社区的重视还包括，相信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而不信任政府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上犯罪盛行,暴力充斥,其监禁率(白人为 4. Moo,黑人为 34. 08%o,而欧洲则少于 iYoo)简直令人咋舌。他们尤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枪支，更不能理解需要用枪支来保障民主的论调。他们认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尽

管没有把每个居民武装到牙齿。他们觉得死刑尤为可憎，并拒绝把恐怖分子嫌犯引渡到美国，假如这些人有可能面临死刑的话。的确令欧洲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怎么竟热衷于一种如此无情的刑罚。最后，他们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易受大量专门利益的影响，所以是极不完美的。然而，尽管他们发现美国社会存在着缺点，但是连法国都有 61% 的人仍对美国持有一种总体上肯定的态度。

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致在上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他们还视欧洲人为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遇到独裁者就姑息迁就，还利用美国的保护伞作防护，可是暗地里却又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在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尽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却反对外来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申请上又表现得犹豫不决，还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略微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味道。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根本不是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远离普通民众、半似贵族的精英所统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他们决意要遏制比较生机勃勃的美国，是出自嫉妒和留恋已经失去并永远不会再次获得的全球控制权。我必须再次强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又同时是主要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欧洲和美欧联盟的未来。从一开始，欧洲规划就提出，要通过经济的逐渐融合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现已基本完成，欧洲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拨哪个电话号码能打到欧洲？我写本书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在

组织起草一部欧洲宪法，计划于2003年6月提交给欧洲的领导人考虑。如果被采纳，它将创建一个用更真诚的声音讲话的更统一的欧盟机构。不过，它的目标早已在文件和讲话中有了预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奖时说道，“对欧洲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们如何使欧洲变得强大和富有影响力，以及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欧洲所具有的潜力来永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势力。”布莱尔后来强调，“这是一个有关集体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规划……此举可造就出一种超级势力。" 2000年9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发出指示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欧洲扮演一种全球性的角色，有着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声音讲话，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意味着将由来已久的主权让位于大欧洲一体化．因此，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牛津大学举办的2000年查塔姆讲座上指出，“如果从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主权，那是胡说八道。一个赤身露体、饥肠辘辘、独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拥有主权—但却是必死无疑。”瑞典首相卡尔·比尔德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这种观点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客或政治家的兴趣的，然而，正如《时代周刊》的编辑约瑟夫·乔菲向我指出的那样，“欧洲领导人正在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这种无能为力在整个冷战期间被掩盖起来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列强时代划上了句号，但欧洲作为冷战主战场的地位，以及随后美国需要与欧洲人商讨并密切合作的状况，使欧洲维持了仍居列强地位的幻觉。实际情况改变许久之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苏联崩溃及美国人的兴趣转移之后，欧洲人的电话就没有以前响

得那么频繁了。

这种无能为力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即有所体现。1991年波斯尼亚爆发种族冲突时，正值卢森堡任轮值主席。卢森堡的外交大臣雅克·普斯飞去进行他认为的救援活动，并且宣告说，“这是欧洲时代，而不是美国人的时代了。”一想起这番话，普斯现在仍然如鲠在喉。后来证明欧盟根本无力处理局势，还是美国人最终起草了结束战争的代顿协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科索沃那份尴尬。欧盟不仅无法在自己的后院发起一场有效的军事行动，甚至几乎不能够支援美国的行动。此外，尽管欧盟极不同意美国主要针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策略，而主张在科索沃本身动用地面部队，但它无力改变美国的行动计划。欧洲的反应是复杂的：对美国人的努力导致米洛什维奇政权的垮台感到欣慰，对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尴尬，对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之间的技术差距感到震惊和懊恼。这一经历导致它1999年做出决定，要加快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并任命贾维尔·索拉纳为该机构的欧洲高级代表，负责处理创建一支大约六万人的独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等事宜。这支部队配备的武器和装备，可以使他们不必请北约和美国人参加即可独立处理类似科索沃那种情况。这便是基辛格要的电话号码，至少是代接电话的机器。

但是，既然北约能够轻而易举地创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而且实际上随后也是这么做的，人们便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欧盟部队存在的意义何在？尽管也可以披上永恒的友谊和相互协作的外衣，但真正的答案似乎主要是美国人不会加人其中。正如托尼·布莱尔所言，“不管其初衷如何，如今的欧洲不再仅仅是关心和平，它要考虑展现集体的力量了。”在北朝解及中亥仗些传统卜一吉亦羊国影响下的傲仅．VIA洲只开拾讯

速主动地展现它的力量。

如欧盟本身一样，欧盟的外交政策亦在完善之中。尽管如此，目前已有一些重要迹象可显示其可能的基调和实质内容了。首先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是欧盟正在进行的扩展问题。2004年增加10个新成员国，不仅会极大地扩展欧盟的规摸，而且还如伊莱恩·西利诺所说，这是1200年来最大的一次自愿放弃主权。虽然这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但也是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的一项主动行动，因为它使欧盟将其稳定的民主化影响延伸到了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边界，并直指中东。从欧盟一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最终达到意见统一的内部作法判断，它将在外交上坚持实行多边政策，并将坚持主张通过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来处理全球问题。罗伯特·卡根及美国其他保守派评论员认为，此举也许部分反映了弱者想利用联合国中小人国的人来捆住美国这个格利佛①的策略。然而，此举也证实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的真实性。在经历了数世纪的战争之后。欧洲不再相信绝对主权论，而发现会议室是一条更好的通向光荣之路。

因此，欧洲人坚持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付伊拉克，以使行动合法化。对美国号召由志愿者组成联盟以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举措，他们一直感到十分优虑。J·索拉纳说，“也许恐怖需要用一种新的遏制形式来对付，但预防性地使用武力需要通过联合国或某种形式的多边支持来得到更广泛的合法认可。如

---

①典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利佛游记》第一卷，描写格利佛乘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小人国厘厘普特．他在那里睡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许多6英寸高的厘厘普特人捆绑起来，当了俘虏。一译者注

果美国声称自己拥有那种权力，那么只会助长人们的憎恨并损害它的国家利益。”除了多边主义外，还应通过经济及社会计划重点解决不安定因素的根源。索拉纳在此指出，美国往往强调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欧盟则相信，单靠军事行动是解决不了恐怖问题的。他说，“欧盟有一种通过对话以及对经济及政治暴力根源的敏感性来避免冲突的特殊文化。”他的同事，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补充说，“我不会那么天真地相信，你丢给阿富汗几宗2000万美元的援助，恐怖主义明天就会消失了；但是我的确相信，在全球不平等及国家分裂、暴力、不稳定与恐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用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开支达到了3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在该方面开支的3倍。

最后，欧盟十分怀疑渗透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中的道德情感以及在中东等地区的“意外曲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华莱士说，“美国认为只有它才能够促进民主，而且它是惟一有效的模式。然而，它在道德与经济方面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腔调往往招致强烈反对；而它那些诸如支持以色列而同时又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腹地建造庞大基地的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因此，用马丁·沃尔夫的话说，“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意即欧盟〕就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怀有矛盾情绪。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独立纪念堂讲话时说道，“美国以充满希望和羡慕的心情观望着这一雄心勃勃的杰出事业。我们并不把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当作对手而视为伙伴。在过去的17年间，帮助它发展壮大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接下来号召发表一个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互相依存宣言”。然而，随着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这一观点改变了。1991年欧盟各国政

府间会议提出了一个赋予欧盟一种安全功能并最终使其具有军事能力的建议。鉴于美国经常抱怨欧洲人没有分担足够的防务负担，许多人认为美国人会欢迎这一举措。可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是失望，并警告说，此举有损害北约的危险，于是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六年后，鉴于在波斯尼亚的经验，美国完全赞同把欧盟发展成为具有安全和防务特色的组织的建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未经协商就设法将北约扩大到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随后，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开始形成并计划让它的快速反应部队在 1999至 2000年间向前跨进一步时，华盛顿又一次表示担忧并发出了警告。美国参议院议员杰西 ·赫尔姆斯抨击“ 欧盟军队 ”，称它是“ 北约内部的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 ”。他的评论受到前国务卿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及国防部长威廉 ·科恩的赞同。即将上台的乔治 ·W·布什总统的过渡班子称这支快速反应部队为“ 刺向北约心脏的一把剑。 ”就这样，美国政策一直游移于督促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负担和设法阻止其发展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之间。正如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 欧洲是受美国保护的地区。 ”华盛顿需要欧洲作为一个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中途补给基地以及作为它全球通讯网络的一部分。北约是美国在欧洲餐桌旁的座位，所以美国想得到欧洲对北约以及对美国领导的行动给予更多支持，但对如何能导致欧洲发挥真正作用的事情却丝毫不感兴趣。

由于欧洲坚决主张自己独立，美国对欧洲的评论已明显趋向负面。甚至在“ 9 . 11”前，像《国民评论》编辑约翰 ·奥沙利文一类的分析家便警告说，欧盟有“ 实行一套竞争和敌对政策的动向。 ”奥沙利文写道，“ 没有必要成立欧洲安全部队或制定欧洲安全政策。它纯粹是一个以反民族主义为掩护、刚刚

萌芽的国家地位及民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他认为，独立的欧洲政策来源于反美主义及挑战美国的愿望。“9·11”后，欧洲迟迟不能像美国一样快地将同样装备精良的部队派往战场（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英国的特种部队），它在支持美国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方面犹豫不决，却坚持按复杂的联合国的程序办事，这一切向许多美国人证实，欧洲不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绥靖者，而且与其说热衷于监管别的什么人倒不如说对抑制美国势力更感兴趣。当然，欧洲人指出，对阿富汗的初期进攻阶段结束后，正是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维和部队及援助，并且坚持认为，按联合国程序办事才是避免国际间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根本。这一论点对美国没起什么作用，它更倾向于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即欧洲人来自金星，而美国人则来自火星。

卡根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受到美国势力的保护，欧洲在享受低国防开支优惠的同时怀有一种错觉，认为军事斗争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得以避免。在这一观点看来，既然欧洲不理解霍布斯的哲学世界而美国又必须依其行事，它就会将美国视为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它自己幻想的世界只有通过美国势力的保护才能得以存在。这一论点有其正确成分，但不幸的是，它并非完全正确。欧洲人如同日本人以及处于美国防护盾牌之后的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没有为他们自己负起完全的责任，因而能够透过更呈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而这正是美国所喜欢的。当欧洲朝着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迈进时，美国便频频出来反对，并试图破坏欧洲的这一努力。

例如，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于波斯湾的石油，任何合情合理的防务分工都会要求欧盟国家在那里部署比美国更多的航空母舰及军队。然而，美国从未提出过那种帮助要求，因为它并不

特别希望他们在那里，以免他们的存在会削弱美国势力的影响。美国认为由美国自己来做这件事更容易、更迅速，而且还不那么复杂。说实话，美国实际上对欧洲人并不信任。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看法与我们不同。让欧洲人在该地区充当重要角色，并不总是符合我们对自己利益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愿让欧洲人承担正式主权大国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能抱怨他们是无能之辈。我们经常埋怨说，欧洲没有将足够的资金用于防务，还埋怨它的武器技术水平可悲地落后于我们，这两种抱怨都有一定的道理。欧洲人确实更愿意把钱用在医疗和休长假上，而不愿用在国防上。然而，在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真正角色上，美国却不断强调说，它将过多的经费用于国防，并且利用该“威胁”来为我们自己增加军备辩护。

我们也一直在系统地采取行动，以束缚欧洲武器的发展。我曾在里根政府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为技术出口发放许可证是个热点问题。美国用各种方法限制技术出口，使得外国公司很难或不愿与我们做生意，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武器采购商的五角大楼也与美国军火供应商密切配合，帮助他们保持对全球的控制。对外国人与五角大楼做生意的限制，以至使得外国最大的供应商BAE系统公司在五角大楼武器系统采购的比例中所占不足百分之一。因为五角大楼用于发展新式武器的基金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公司。

更有甚者，美国在欧洲利用北约作为击败欧盟的一种办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来自俄罗斯新增的威胁，不过是为了给北约扩张找理由罢了，而且新增的成员国并没有给北约增加任何实力。事实上，它们只是增加了北约的负担，而没有为其增加资源。北约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种族政策，

部分在于想把东欧国家直接与美国捆在一起。譬如说，对波兰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很强的种族联系的国家来说，具有北约成员国的资格是颇具吸引力的。可是，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它就得提升自己空军的档次，而五角大楼正等着帮忙卖给它 F—16 战斗机呢。波兰采购美国战机自然会削弱欧洲飞机制造商的竞争力。此外，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波兰空军受到美国众多许可证、供应规定和使用要求的限制，美国就可以在波兰如何使用这些飞机方面有有效的发言权。因此，如果说欧洲人生活在幻境之中的话，那么，这种幻境也是由美国创造和维持的。

与欧洲发生第二次冷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继续不断的摩擦则很有可能发生，特别是从美国努力在“新”“旧”欧洲之间制造分裂这点去看。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也已导致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产生了隔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俄罗斯现在似乎倒成了美国相当好的朋友。如果我们想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他们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想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同意，虽然不大情愿。但是，俄罗斯人没有资格向我们挑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皮特·萨瑟兰的观点。全球系统并非建立在美俄联盟之上，而是建立在美国与欧盟的联盟之上；假如它真的垮台了，那么全球系统也会跟着垮台。我们之间新近出现的所有分歧在冷战期间就已存在，然而，我们以更大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成功地消除了它们。该系统的垮台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所以，美国重新检讨自己的欧洲政策，并制定出一个与欧盟合作的新架构，是头等重要之事。

# 亚　洲

在亚洲，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与老朋友的关系最近在变冷，与过去的对手似乎倒热火起来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整个亚洲对美国的看法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东京、北京，还是在雅加达，对美国的目标及动机的分析均与标准的美国逻辑依据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人们都认为，美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道德标准、政治哲学及组织结构的载体，或者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是“文明化的国际行为的典范及仲裁者。”他们看到的美国，是一个通过猫权控制和多边机构努力推行和实施美国式西方价值观的美国。此外，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同样发现，在他们认为处于美国价值观核心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与他们自己更重视集体和等级的亚洲价值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相信，美军在亚洲的存在，主要为了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和防止任何竞争势力的崛起。在他们看来，美国想要一个强大、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必须严格遵循美国的条件—经济上稳固，政治上稳定和民主，并接受美国的领导。他们还相信，美国也许在潜意识中需要有敌手，以便为它那庞大的高科技部队提供存在的理由，其地缘政治战略也好有个重点。他们认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强调“无赖国家”概念及“稳定”的需要。他们还认为，正当布什政府准备将中国纳人“敌人”之列时，奥萨马·本·拉丹恰好突然跳出来，成了更好的靶子。

他们还认为，美国自认为可以不遵守约束他人的规章，因

为它把自己看作一个善良的霸主。因此，美国解释说，它部署前沿部队并不构成威胁，但却经常称其它国家部署极为有限的部队为威胁，并以此为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辩解。又如，在亚洲，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发现人们对可感觉到的双重标准极度敏感，特别是在核武器问题上。对美国来说，英、法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可以接受；亚洲人拥有核武器则不可接受。

尽管存在以上看法，但不能由此认为亚洲人不喜欢美国。实际上，皮尤民意调查显示，总的来说，人们对美国的态度是肯定的，而且有些民意调查还显示出对美国极其羡慕。另外，亚洲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把美国人与美国这个国家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大多数人喜欢美国人，但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其政策和行为经常令他们摸不着头脑，而且非常可憎。然而，在亚洲人对美国在该地区所作所为的看法与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为了搞清这一鸿沟的细微之处及含义，就让我们从特点最为突出的朝鲜开始，在亚洲走上一遭儿吧。

## 朝鲜

我在第七章中已经说到，美国与韩国的关系在日益疏远。在 2002年 12月的大选中，当卢武铉被选为韩国总统接替金大中时，这种疏远达到了高潮，同时也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烦恼。大选之前，华盛顿一直真诚地希望卢的对手，美国的老朋友李会昌当选，以改变金大中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

卢武铉不仅获胜，而且获得了年轻人压倒多数的选票。他当选之时，恰逢北朝鲜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之际。北朝鲜不仅透露了它先前的一个秘密浓缩铀计划，而且驱

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并准备重新启动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北朝鲜可从这一设施提取可用以制造核弹的怀，这不仅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也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有关协议。正当华盛顿坚持在北朝鲜停止这些威胁活动之前它不会与其谈判之时，卢武铉却宣布说，他不仅将继续实行阳光政策，而且自己还要与北朝鲜展开谈判。在这一裂痕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在华盛顿前所未闻的有关朝鲜局势的观点。当然，这一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韩国一位高级谈判代表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美国人理解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美国人自己知道美国没有侵犯北朝鲜的打算，但北朝鲜却不了解这一点。迄今为止，仍没有缔结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 50年来，美国一直在韩国驻军近 4万人，并拥有对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再加上美国明显打算进攻伊拉克并将北朝鲜列为“ 邪恶轴心 ”国家，所有这些都使北朝鲜将美国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美国人的观点源自他们认定不能相信北朝鲜会遵守任何双边或多边承诺。朝鲜违反 1994年在《框架协议》中与美国所达成的协议而启动浓缩铀计划，就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然而， 1994年协议的具体条款是为了中止北朝鲜怀生产设施的修建而制定的，那些条款并没有被破坏。此外，美国本身也未遵守这项协议的关键条款。它所承诺的到 2003年底 20亿瓦核动力发电量的设备没有交货，“ 完全实现政治及经济正常化 ”这一点没有兑现，美国也没有作出“ 不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 ”。这样，在北朝鲜人的眼里，美国得到了它最想要的—即冻结北朝鲜的怀计划，而北朝鲜得到的却大都是空头诺言。

此外， 2002年 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凯利在访问平壤期间，美国已了解到有浓缩铀计划。当时，北朝鲜主动

提出停止这一计划。作为交换，美国要承诺不进攻北朝鲜，并继续其承诺过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凯利告诉他们必须停止此项计划，事情到此为止，没有谈判的余地。根据韩国谈判代表的看法，北朝鲜最想要的是美国的承认和一个结束战争状态的互不侵犯条约。鉴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美国、日本和法国除外）都承认北朝鲜这一事实，韩国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就如此困难。韩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策是在鹰派强硬思想路线的逼迫下做出的，这些人想要北朝鲜彻底崩溃。他们要维持敌对状态的目的，是为了在太平洋更广泛的地区部署美军寻找正当的理由。这样，在许多韩国人看来，美国和北朝鲜一样，都是解决问题的障碍。

除此之外，韩国人憎恨华盛顿所采取的横暴手段。最近有消息透露说，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曾认真考虑过发动空袭摧毁北朝鲜的核工厂。最终它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通过谈判达成了关闭该工厂的《框架协议》。然而，韩国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政府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获知进攻计划，而政府当即强烈反对。韩国的首都汉城在边界以南仅17英里处，而且北朝鲜已将它作为世界上最密集炮火的靶子，任何类似的攻击几乎肯定都要导致汉城被夷为平地。美国是韩国的坚定盟友，在他们干这种会摧毁韩国首都之事的时候，竟然连问都没有问他们一声，这对韩国人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华盛顿把朝鲜列人“邪恶轴心”时，或以美国的强硬路线来损害韩国的阳光政策时，同样没有与韩国人商量。总之，韩国人认为美国对他们不重视，并对此极为憎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憎恨系由在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和商人中新近占支配地位的民主思想所引发的。他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并已返回国内，希望韩国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享有同等的权利。当美国

并不依照它的观念行事时，他们即与许多欧洲人一样，往往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有一件新鲜事十分耐人寻味，韩国已开始向美国派送传教士了。在过去的50年间，韩国已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主要为新教，特别是基督教长老会。许多韩国人开始认为，美国越来越需要精神更新。

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成为韩国产品的一个主要进口国，数量大得令韩国人预计到总有一天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超过对美国的出口。此事在韩国引起了对区域贸易战略及区域化的普遍讨论。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对驻韩美军地位的争论。50年来，美国人一直说在韩驻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韩国。当然，国防部长科恩1997年有关即使朝鲜统一后美军仍要留驻的那番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事实上，美国把那些部队部署在韩国，这是它在亚洲总体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如今，麻木不仁及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政策，也许恰恰会损害美国一直在设法保持的驻军地位。

### 日本

从朝鲜渡过海峡就是日本，那里的形势要复杂得多，而且还在缓慢地发展，但特点与朝鲜相类似。日本实际上处于危急之中，尽管这场危急悄无声息，基本上不被人注意。假如你漫步东京街头或周游日本全境，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交通流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餐馆里顾客满堂，火车正点运行，地铁刚好停在开门标志线前。建筑吊车随处可见，甚至连最小的村庄都通上了高速公路和快速列车。而这正是危机之象。尽管外表上光泽耀眼，实际上日本的经济正处在灾难的边缘，它的政治也已从心里腐烂，其证据就是那些建筑吊车及不知通向何处的

高速公路和火车。在过去的50多年里，除了大约2年时间外，日本一直在自由民主党的管理之下，该党的权力支撑是一个铁三角，其中包括农场主与乡村居民、建筑公司与它们的雇员及相关活动人员、以及小工商业者与店员。如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其政治体制受到腐朽的享有自治特权的市镇的操纵。由于选票的统计方法所致，日本农场主的一张选票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2张。自民党通过大量补贴和保护维系着这一铁三角的存在。它通过世界上一些最高种类的关税，保护着农场主不受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农场主还可以得到大量的补贴，致使国内的大米价格高到了世界市场的10倍。小工商业者同样能以各种方式得到政府的津贴，而且最妙的是，它们几乎不缴纳税金。建筑业依靠和政府签订修筑连接乡村的公路和桥梁的合同而得到大笔接济。结果是，建筑业的开支大约占整个日本经济的10%，约为美国该项花费的两倍。

此外，多年来，日本经济大都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而未曾受到进口和外国投资者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了一条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政府强迫实行高储蓄，这些储蓄通过银行系统集中流人诸如汽车、电子和钢铁一类的大批量生产制造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多数产品出口了，而把国内市场主要留给了日本的产品。这一系统运作得十分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多进口少的问题十分突出，日元被迫依照1985年的广场协定升值。这时出口战略本应改变，然而，让如此成功的模式调头改向却并非易事。结果，政府并未改变出口战略，而是把资金注人经济，以抵消较为坚挺的日元所带来的冲击。这样，日本的出口可以不受较为坚挺的日元的影响而仍具有竞争力。结果造就了二个典型的泡沫，这一泡沫在1991ˆ—1992年

间终于破灭，从而导致许多公司几乎破产，多家银行拥有大量无法偿还的贷款。然而，这些公司中不少都是与自民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建筑公司和银行。在过去的10年里，自民党非但没有大刀阔斧地清理这些债务，而是一直在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发放补贴。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因为早已背负过多坏账的银行仍给那些不景气的公司贷款，以使其生存下来，结果使这些银行的坏账进一步增加。现在日本的国债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仍在上升。日本现已陷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之中，惟一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大幅度通货膨胀的措施，但这有可能影响到家庭财富；抑或可以来一场20世纪30年代式的经济大萧条，肯定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这当中美国都起了什么作用呢？自民党是美国的产物。1955至1958年间任中央情报局负责东亚地区活动的艾尔弗雷德·C·小厄尔默，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里担任情报与研究部门领导的罗杰·希尔斯曼，以及1966至1969年任驻日大使的U·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均承认1955至1972年间曾向自民党行贿。另外，中央情报局与自民党以及“野寇息”（即日本的黑手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到现在，华盛顿在日本一直支持自民党，因为它一向反对共产主义，向美国提供基地，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追随美国。许久以来，美日之间一直有个交易：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并可使用日本的基地；作为回报，美国支持日本，至少要接受日本的经济政策。近年来，美国与日本在结构和金融上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与其说是接受，倒不如说是几乎无能为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日本的弊病，尤其是在其压制真正的民主的弊病中，美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病因（但远非惟一的病因，甚至也不是最大的病因）。

美国还以其它重要方式使日本畸形发展。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把讨论日本天皇作用的问题排除在外了（由于美国认为需要通过天皇来统治日本），因此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些审判不过是胜利者惯常的审判，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过这段战争历史。总的来说，日本在学校里也基本不讲授这段历史。这就使日本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无法结束战争。近年来，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日本的战争亡灵，包括被判刑的战争罪犯的亡灵），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愤慨。而这种愤慨令许多日本人费解，他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与拜渴美国的阿林顿国家公墓没有什么两样。除此之外，美国就像在欧洲一样，在日本也创造了一种幻境：日本在保卫石油通道或在亚洲整体战略事务上没有承担真正的责任，它既可以肆意享有很低的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可以避免应付棘手的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现在不再抱怨日本国防开支的水平低，虽然日本比欧洲少得多。）驻日美军的地位给日本当局带来的实际司法权问题，其实比给韩国带来的还要多，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日本是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也是其附属国。在有关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方面，美国也没有充分同日本协商，尽管日本肯定也会成为朝鲜导弹的靶子。

以上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日本产生像韩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美情绪，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是与美国经济关系较大的受益国，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民主没有韩国发展得那么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不那么外向的缘故。但是也有些重要的信号值得注意。例如，近年来，日本轰动一时的电影大片之一是《骄傲》，这是一部颂扬东条英机将军的片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他被判有罪并作为战争罪犯被处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加懒秀明目

前正在写一本有关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书。他说，“东条过去是个超级明星，现在仍然是。”另外，最近在东京喝咖啡时，日本最受欢迎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告诉我，对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把亚洲从西方殖民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战争。最重要的是身为小说家兼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他与索尼公司的前总裁盛田昭夫一起写过一部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石原是个外向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观点虽说微妙深奥，但有点儿鼓吹沙文主义的味道。在该书中，他建议日本中断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以此来回答美国对日本贸易壁垒的抱怨。在一个厌恶腐败并对美国支持下的连思想都表述不清的自民党领导早已厌倦的国家来说，他现在成了全国惟一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一直有人作为可能的首相人选提到他的名字。假如他当选，他很有可能加人韩国人的行列，提议把美军赶走。（我曾经在日本的电视节目里与他辩论，他没有忘记强调他反对美军使用日本基地。）即便没有他的那番言论，日本要求减少美军规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本外相川口顺子 2003年 2月 2日宜布，日本政府将努力减少在冲绳的美军人数。

日本对美军及其基地作用的看法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日本，日本人应该感激才是；而日本人把他们为维护基地所提供的资金称作“同情预算”。在日本，政治领袖们并不把这项拨款当作一个盟友应当对关键性联合任务所做的贡献，而是将其视为对美国的一份恩赐或礼物，以使他们得以满足自己的霸权野心。我想再说一遍，观察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日本人喜欢美国人。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及我与日本长达 40年的接触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前任驻泰国大使的那种观点。他曾对我说，“美国需要冲突来

维持其经济的运行。”日本不会明天就背弃美国，或许永远都不会。但是，美国政府里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是美国“战略伙伴”的人，也许会发现自己非常失望。

## 中国

美国今天与中国的关系，如同与俄罗斯的一样，比“9"11”以前明显为好。自从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呈上下波动之势。在里根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遏制苏联方面的共同利益，曾把两国拉在一起。作为里根政府的一位官员，我参加了一些与中国的早期经济谈判，可以证明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有极大的兴趣。然而冷战的结束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使两国关系冷淡下来了；而老布什政府迫于工商业界的压力以及出于更广泛的战略利益考虑，又使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1992年竞选总统期间，比尔·克林顿曾指责布什政府“纵容”中国人，并许诺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作为总统，在人权及其它一些问题上，他起初的确态度强硬，但不久便屈从了经济发展逻辑，首先提出了“接触政策”，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此举激怒了一些日本人和共和党内许多右翼人士，前者认为日本才是“战略伙伴”，后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仍怀有宿仇。

2001年，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美国实行的路线又一次强硬起来。中国被贴上了“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监视也有所加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似乎需要一个替代苏联的敌人，它选择了中国。

奥萨马·本·拉丹的出现似乎令北京喜出望外，他们迅速表示同情并主动提出与华盛顿合作，此后两国关系大大升温。然而，中国人仍旧担心，一旦恐怖威胁得到控制，他们有可能

再次成为美国敌视的目标。

台湾是中美关系难题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对大陆上的中国人来说，把台湾置于中国的旗帜下，意味着中国最终重新获得了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殖民主义掠去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完全被视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除了美国有意要削弱和遏制中国之外，此举根本无法解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每当台湾领导人会见美国领导人，以及每当布什总统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台湾一类的话时，就是要鼓励台湾领导人抵抗中国旨在重新统一的努力，从而给北京的领导层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中国人曾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过（大多数专家都相信他们的话），有一点几乎肯定会引起战争，那就是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台湾对面增加兵力部署会构成威胁，迫使美国做出反应；而中国人的观点恰似其翻版。他们认为，除了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姿态所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应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在他们看来，是美国首先制造了台湾问题，他们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企图遏制和破坏中国日益提高的国力及影响力这一更大目标的一部分。

这就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难题—霸权的争夺。有位中国教授所说的话，不管真实与否，却十分说明问题。他评论说，“中国曾经有过150年不幸的岁月，但如今我们复兴了。”一旦不可避免的台湾问题讨论过后，中国上层人士心目中的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该国光明的前景以及重返各国前列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你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上个世纪的忧患给中国人带来的深深的历史耻辱感。然而，中国当前的成功所带来的愉悦和期望感却很容易感受得到。不过，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焦虑，他们认为，美国害怕中国成功，并想对其加以限制。

前文所说的美国观点的翻版又一次在起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1年初美国一架EP-3型电子监视飞机在海南岛迫降的那次事件。美国人视其为一次无故敌对行为，叫嚷这又一次证明美国为什么必须当心中国。然而，中国人则问，为什么美国飞机要不断在他们的沿海巡逻，故意触发中国的国防通信系统以便监视中国的防卫能力？中国指出，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飞机，而且也没有在美国沿海或亚洲周边国家沿海巡逻。在他们看来，美国从充当霸权大国中获益，并且谋求保持这种霸权地位，甚至不惜通过强行阻止对手崛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的所作所为，当然还有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以及其他官员要求进行预防性战争及防止任何竞争势力崛起的言论，大大增强了这种感觉。从北京来看世界，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部署军队和舰队，将先进的美国武器送往台湾，美国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因阿富汗冲突之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几个与中国临界的中亚非民主国家驻扎美军。他们看到了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努力，表面上这是针对北朝鲜一类的“无赖国家”，但也是在消除中国核弹的威慑力；他们看到了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采取单方面行动；还看到了它那无比先进和强大的军火库。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令中国人惊恐的画面。这一画面向他们表明，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威胁。中国坚持说，它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扩张主义大国，除了对美国构成经济竞争之外，并不构成任何威胁，而经济竞争美国又说它是欢迎的。实际上，他们是说美国的姿态迫使他们在国防上浪费资源，这些资源他们宁可投人到经济发展中去。许多人怀疑，美国的威胁是其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难题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自豪、尊严、文化撞击和

最终意向。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对美国最具矛盾心理的人。如果你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做一次讲座，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会受到尖锐的提问，并遭到有关美国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以及介人台湾事物的尖锐批评。可是讲座结束之后，一半的学生会围过来询问他们怎样去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就读，或者是如何在美国得到一份工作。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它的工业和生产力，以及它的民主政府和民主精神都无限迷恋。中国人还发现，美国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不拘泥形式、善于表达和易于交谈。然而，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有极强的自豪感，并深信中国的管理方式必须不同于美国的，但中国的方式必须融人全球化的框架之中。对于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方式或称西方方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好方式这一点，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学生一次次表现出愤慨。他们一再坚持说，世界不能只按照美国的标准运作，必须要把中国的标准也结合在内。在这种讨论中，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他们也不想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任何人。

这种说法在亚洲其它地区引起的反应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除台湾以外，亚洲没有什么人担心中国会发动武装进攻。另一方面，许多人告诉我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的等级和权威制度将会重新调整全球的结构这一点，使他们感到有威胁。这些人觉得附近也有美国存在才更为放心。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我 2002年春天与清华大学师生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长谈中看出来。在他们为美国的蛮横及西方标准的缺陷问题斥责了我许久之后，我问他们是否可以确切地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标准或未来的政治体系及地缘政治架构，他们诚实地承认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么，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想成为一个大国，并渴望

得到美国的承认和尊重，这是一种会给我们造成很大潜在影响的愿望。可是，中国还没有能够以可以肯定的系统方式来应对变化的机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含有危险因素的事实。中国今天肯定不是美国的敌手，然而，在它按照自己的解释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使中国的敌意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因此，我们应三思而后行，以确保中国继续沿着发展与自由化的道路迈进，这件事最为重要。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美关系难题的最后一个因素：经济。自从 1982年我执行那次早期贸易谈判任务以来，中国的变化令人吃惊。它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但正朝着那一方向高速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尽管它远不是个民主政体，但对普通人来说，今日的中国是个也许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得多的地方。这一发展得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界通过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强有力的推进。这一趋势是未来中美和平、友好关系的最好保证。这里面确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当我们还在中国到底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问题上摇摆不定时，美国经济已经在两个关键方面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了。首先，由于美国越来越依赖中国供应从油漆毛刷到手机之类的所有高质量低价产品，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已达到 8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聚集起庞大的美元储备，并逐渐成为美国证券的投资者。正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的不断流入。中国成为这一资本的较大来源后，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北京的官员们希望，当奥萨马·本·拉丹被除掉后，美国将无法再把中国视为敌人。

# 拉丁美洲

“有一个巨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在美国边境的南面，而且就要爆炸了，它就叫拉丁美洲。”2002年秋天在墨西哥城吃早饭时，这些出自墨西哥前财政部长安赫尔·古里亚的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当时，阿根廷在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墨西哥的失业率在上升，哥伦比亚无休止的冲突在加剧，委内瑞拉似乎至少有美国暗中支持的政变企图已经失败，而巴西的经济则处于灾难的边缘，原因是其总统竟选运动情况混乱，有可能导致左派掌权，因此国际投资者纷纷撤出资金。古里亚哀叹，华盛顿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一方面在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并发表有关冒道德风险的声明（主要指的是为了达到近期目的而实行从长远来看并不明智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对整个系统有可能崩溃的大得多的风险置之不理。他说，“巴西正在为举行民主选举遭受民主国家投资者们的惩罚。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怎么能期待拉丁美洲人坚持实行民主呢？”他还严厉批评“华盛顿一致意见”只知道依照教科书而不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政策。他说，“美国需要有一个拉丁美洲战略，但它从来没有过。”

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一位比较好的朋友的评价。鉴于美国在该地区有忽儿干涉忽儿又置之不理的纪录，人们对美国的动机普遍持有讥讽怀疑的态度就不足以为奇了。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只有利益，没有朋友，而且主要是对物质利益和权力感兴趣。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不是热爱和平的。实际上，另一

位拉丁美洲驻美大使曾问道，“热爱和平？你是在开玩笑吧？在拉美，没人相信那种胡扯。”美国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与在其它地方一样受到广泛批评。可是，这里的人们同样羡慕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它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并普遍认为美国是拉丁美洲的惟一希望。但是，正如巴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希望很难成为现实，因为“在这个半球不存在安全威胁或核威胁。因此，华盛顿是不会对拉丁美洲予以优先考虑的。”

这种不予优先考虑的状况一直特别令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失望。他曾把他总统任期成功的赌注压在他的好朋友和同为牧场主的乔治·W·布什身上，以为对方会极大地改变两国关系的形式和实质内容。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福克斯感到很痛心。不过，该地区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领导人仍然希望布什会在他的任期里处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控制毒品买卖以及支持民主。

经济发展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正在该地区遭受惨重失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内私有化和取消调控实行的同时，制定自由贸易协议。遇到的困难是，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已使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该协议并没有达到人们的其它许多期望和预测。例如，自从1994年以来，墨西哥人的薪金和工资大幅度降低，随着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已上升。因此，向美国非法移民以寻找工作的吸引力仍然很强。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北美贸易协议造成的，它也是1995年金融危机以及油价起伏不定的结果。但是，北美贸易协议一直不足以抵消上述任何情况所带来的影响，反而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墨西哥的产品或服务业，如蔗糖和货车运输，进人美国市场者仍然有

限。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农业市场却在对美国玉米之类受政府补贴丰厚的商品开放，因此，墨西哥的生产商正在越来越面临灭顶之灾。欧盟的作法不同，它接纳西班牙和葡萄牙时，提供了实质性的调节援助，完全的市场准人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而依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行事的美国则一直认为，贸易本身将会提供满足其它必需条件的手段。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以外的其它拉美和南美国家里，问题甚至更加棘手。尽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议，但只有一项与智利的协议已签署。拥有南美最大经济的巴西发现，它的一多半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某种限制。除了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中国的挑战。一些原先由美国移人墨西哥的工厂，现在又离开墨西哥迁往中国了，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的低水平还要低得多。这个半球其它国家的处境甚至比墨西哥更糟。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在里奥格兰德以南则被视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终结的开始，而在华盛顿，似乎无人处理这一问题。

最令人烦恼的问题是毒品买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它在石油进口方面的行为实相类似。在石油进口一事上，美国对廉价石油的喜好已使它陷人了中东危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并导致它一不小心资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和恐怖主义分子，如今已自食其果。同样，美国对可卡因及其它麻醉剂的嗜好，正在为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等地的社会腐败与腐蚀势力提供资金。美国人口中估计有 2000万到 2500万人吸食大麻， 600万人定期使用可卡因， 50万人吸食海洛因，这些人每年在毒品上的花费大约为 640亿美元。自从 1909年以来，美国一直采用禁止的办法，严格要求“毒品走私者、毒品贩子及毒品瘾君子都无条件

投降。”然而，投降并没有发生，从毒品市场的规模以及从1985至1996年间全世界的鸦片和古柯的产量增长了两倍多这一事实即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美国政府与毒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而且经常是腐败的。苏联人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在阿富汗组织穆斯林游击队时，它就知道那些游击队员在通过销售鸦片筹措资金。到1980年为止，美国市场上60%的海洛因来自阿富汗。巴拿马前总统曼纽尔·诺列加为中央情报局充当了多年的间谍，同时他又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有着长期的勾结。1989年，老布什政府人侵巴拿马并逮捕了诺列加，他因毒品走私被判入狱40年，现正在美国的一家监狱里服刑。然而，巴拿马仍然是洗钱和转运可卡因的重要中心。

美国对付毒品走私的办法不仅是禁止，还采用准军事的强力干涉手段。尽管美国的法庭和监狱塞满了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人，但通过治疗来减少对毒品需求的重大努力在美国却从未真正采用过。控制毒品的努力一直集中在停止生产和禁止运输上，往往使用大量的舰艇和飞机来发现、追踪及阻止毒品的流动。美国训练拉丁美洲的军事部队，并资助他们在自己国家制止毒品生产和非法买卖。他们还用飞机喷撒农药，毁掉农民在热带丛林及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农田里所种植的古柯作物。这种喷撒常常不仅仅会毁掉古柯及合法的农作物，而且还会造成水土腐蚀。帮助农民种植其它可替代农作物的努力，总的说来一直不充分，也不成功。此外，对于拉丁美洲麻醉品控制人员的训练与对反暴乱战士的训练非常类似；在该地区普遍存在游击战的情况下，这些人员常常被用来执行非禁毒任务。

有一个问题影响比较大，即对外国政府合格证书的年度审查问题。每年，白宫都须向国会证明，外国政府在麻醉品控制

问题上正在与美国的努力进行充分的合作。被收回合格证书的国家就会失去外援并面临贸易制裁。这一独特的政策明显地意味着，反对毒品之战并不是在与盟国合作开展，而是在与他们为敌。在确定墨西哥或秘鲁是否在阻止毒品越过美国边境的行动中发挥了正常作用中，美国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而且还是陪审团。这一年检过程令人觉得耻辱和无法忍受，而且在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国的眼里，充满了美国式的虚伪。一位满腹牢骚的墨西哥官员对我说，“美国设法找借口为它的银行处理毒品资金开脱；尽管它能够跟踪卡车一直到美国边境，可是一旦进入美国的管辖区，这些卡车便不知去向了。”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都在质疑供求关系的需求一方。只要需求巨大，此项贸易的利润又丰厚，不法商贩就会找到提供的办法。其后果是，拉丁美洲的警察部队、法官、军队以及普通人都被淹没在了侵蚀着他们社会本质的黑钱之中。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为我们在控制无法满足的毒品需求方面的努力发放合格证书。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民主的问题上。在过去的15年里，一个振奋人心的方面是拉美国家转向民主。可是，人们越来越怀疑它是否行得通。一位领导人说过，“政策需要时间才能显示出结果，可是民主不给你任何时间。”另一位领导人说，“请看新加坡、台湾和智利这些已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发展阶段并不是民主政体。”这些领导人不晓得在一个毒品黑钱的海洋里民主怎样才能支撑得住。然而，最令人灰心丧气的是，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对拉美的民主并不那么关切。当然，他们都已注意到，美国过去曾帮助和扶持过独裁者。最近的一个主要例子是委内瑞拉。2002年4月，美国官员似乎曾向企图把当选总统乌戈·查韦斯赶下台的一次政变提供支持。当然，美国后来放弃了支持，并否认曾卷人政变企图。但是，拉

美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人相信美国的否认。美国的政策再次在拉美没有给人提供多少让人们信任它的理由。

## 中　　东

如果说拉美国家对美国没有什么信任感，那么，中东、南亚及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感就更谈不上了。这一点同样反映出了一种极大的逆转。作为受宗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他们自然会拒绝共产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也大都是美国的盟友，尽管他们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感到不快。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言，沙特阿拉伯一直同美国有着特别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美国首次在沙特的沙漠里发现石油之时，当时英国及其它国家都顽固地认为那里不可能有石油。另一个重要的中东国家是埃及，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可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它也成了坚定的朋友。约旦和黎巴嫩尽管较小，却也发挥着美国的帮手与朋友的关键作用。特别是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领导下，在该地区变化无常的政治中经常起着一种缓和作用。

如今，就像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到的那样，皮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友好早已统统被冲刷殆尽，直接的原因是伊拉克局势，但更长远和更深层的因素是感到美国偏袒以色列而反对巴勒斯坦人。另外，毫无疑问，由于迄今无力应付现代化而感到受挫和自我烦恼，这些国家不少都把矛头转向了美国。不过，我特别在此提到的对美国不再友好和尊敬，指的是那些把自己的生涯都押在了与美国为友这一基础之上的国家。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尤为重要，因为它的许多上层人士都曾在美国学习

和生活过。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国家在支持美国在全球的秘密行动以及控制石油价格方面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9 . 11"后，此前对沙特友好或通常对沙特不感兴趣的美国报刊，突然对沙特阿拉伯敌视起来了，原因是19名劫机者当中有15人为沙特公民。经过多年对该王国的忽视，或者说，经过多年肯定地报道它对大多数美国行动的有力支持之后，《华尔街日报》一类的报刊在沙特王国竟找不到任何好的东西可以报道了。它的伊斯兰法律，它使妇女罩上面纱，它的慈善机构，它的学校体系，它的缺乏民主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野蛮的，中世纪的和反美国的。尽管有些批评点到了真正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也是沙特人自己在努力处理的，但是，那种严厉的口气以及先前友好态度的突然调转，刺痛了沙特人的心。他们觉得，美国人显然已经忘记，或许从来就不知道或不介意沙特阿拉伯曾给予他们的支持。

沙特一家大报业的业主向我道出了这一态度所引起的愤慈。这位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居住过不少时间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描述了他的展撼。突然之间，他过去一直视为朋友的人现在似乎对所有沙特人都起了疑心。更重要的是他对21岁的儿子的反应所做的描述。+9·11"之前，这位年轻人从美国一所名牌预备学校毕业后，一直就读于美国的一所重点大学。他过去一直是橄榄球和篮球的大球迷，不停地听着美国音乐，吃着美国快餐，玩着电脑游戏，与美国女孩约会，对政治、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根本不感兴趣。正如我的这位报业朋友所解释的那样，他的儿子从所有实际的角度来看都是个美国人。可是，如今在美国的态度突然逆转之后，他告诉我说，他儿子已从该大学辍学了，并拒绝到美国旅行，在沙特阿拉伯甚至都不见美国人。更令我的朋友担优的是，他儿子对政治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定期出席由激进的政治和宗教人物召开的会议，现在不仅强烈反美，而且反以色列。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但它却说明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影响。庞大的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在美国不断监视波斯湾的构架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沙特领导人已经透露说，一旦与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他们将要求布什总统把所有的美国武装部队从这个王国里撤出。实际上，许多沙特人似乎认为，美国与伊拉克新打的这场战争最好的一点，并不在于消灭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消除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这样，奥萨马 ·本 ·拉丹也许会看到他很久以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沙特与美国联盟的终止。

与沙特阿拉伯一样，约旦和埃及也在烦恼。在会见约旦领导人时，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认为华盛顿误解了该地区发生的事时所表示出的那种失望。开罗的阿勒一阿拉姆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 ·穆奈姆 ·赛义德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作了最好的表述。一次在吃早餐时，他解释说，美国人往往把伊拉克、伊朗、原教旨主义、恐怖和巴以冲突问题视为互不相关，可以一个个加以解决的问题。他说，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伊拉克问题，倒不如说是巴勒斯坦问题。他说，实际上，打击伊拉克只会加剧中东局势的恶化。尤其是，它可能抑制不了，反而会刺激原教旨主义和阿以之间暴力的产生。他强调说，你们这些美国人不理解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感受得到的那种深深的不公正。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拥有原子武器，阿拉伯国家却不能？为什么以色列能够无视联合国决议而不受惩罚，萨达姆却必须要立即受到进攻呢？为什么以色列在 1967

年战争中击沉美国“自由”号海军军舰并利用像乔纳森·波拉德（此人目前在监狱服刑）那样的美国人来刺探美国情报却照样没事儿，而侨居美国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就因为是阿拉伯人就得定期地被召集起来询问是否参与了恐怖活动呢？另外，他说，阿拉伯人并不把萨达姆视为如同恐怖一样的大威胁。他指出，为了逼迫伊拉克，美国选择了一条省事的办法，即袭击一个它可以轰炸的首都。他继续说道，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起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抑制伊斯兰革命浪潮以及在1991的海湾战争中结束萨达姆威胁的作用。而现在，他说，阿拉伯人把美国本身视为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力量。

这一观点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受到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赞同，2003年2月他在由116个成员国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上说，美国现在不再仅仅为反恐而战了。他说，相反，它是在为控制世界而战。他强调指出，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失望情绪漠然处之。他还谴责了令穆斯林大为恼火的极其明显的双重标准，并争辩说，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努力正在造成不公正和对其它种族及肤色的人民的压迫。就是这个马哈蒂尔，不足一年前还曾因坚定地支持美国向恐怖开战而在白宫受到盛情款待。

## 南　亚

巴基斯坦1947年从印度分离出来时留下的后遗症，还有冷战，再加上反恐战争的出现，这几者交织在一起，在南亚造成了混乱局面，也许使该地区成了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印

度与巴基斯坦的惨痛分治，使数百万人丧生，并造成了克什米尔分割带来的连续不断的痛苦。在过去的 50年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过三次仗，虽然两国都很贫困，却一直在竞相研制极其昂贵的武器。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也纠缠其中。

尽管印度一直是民主政体，巴基斯坦经常是军事独裁统治，然而，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对美国与其前殖民统治国英国的密切关系存有戒心，因而它在冷战时期倒向了苏联。这样一来，美国就靠拢巴基斯坦了。 20世纪 50年代，巴基斯坦欣然加人了由美国发起的诸如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类的联盟。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时热时冷。在冷战初期，由于美国想在亚洲寻找盟友，两国关系很热。后来， 1962年中国进攻印度时，由于华盛顿向印度提供了一些援助，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热了一段时间。可是，巴基斯坦不久就成了中国的盟友，而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尼克松则希望打开中国之门。于是巴基斯坦领导人主动提出，可以作为通向北京的一条渠道，这样一来又促进了巴基斯坦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以至于在 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美国竟倒向了专制的巴基斯坦而反对民主的印度。此后，华盛顿似乎多少忘记了该地区的存在，直至 1974年印度的第一枚核装置爆炸。虽然美国曾经培训过印度的科学家并提供过关键性核材料，但在爆炸之后，尽管印度许诺不会使这一装置武器化，美国还是中断了向印度的核燃料供应。此举反而使印度更紧密地投到了苏联的怀抱，而苏联则很高兴成为印度的重水供应者。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 1971年与印度开战之后，便开始了它自己的核发展计划。尽管加拿大和德国为其提供了关键设备，美国则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表示它对

一项并不明显的核武器计划的反对。然而，到了 1981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对华盛顿来说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了。为了训练、武装穆斯林游击队并为其提供物资，美国需要一个后方地区，而巴基斯坦正是理想之地，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里有许多部落与住在阿富汗的相同，而且讲的语言有些也相同。这样，里根政府尽管逮捕了一个企图将两吨错偷运到巴基斯坦的走私犯，但还是解除了对巴基斯坦的制裁，并重新开始向它提供慷慨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以报答它对穆斯林游击队的帮助。1983年，中国据报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份炸弹设计方案；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对巴实施经济制裁，除非白宫能证明巴基斯坦并没有启动核武器计划。在后来的 5年里，白宫做了这样的证明，但在 1990年，当巴基斯坦由于害怕再次与印度交战而制造了几个核武器的核心部分时，白宫最终对它实施了制裁。然而，该计划一直持续到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进行了一系列核试爆。华盛顿再次表示出了它的愤慨。

苏联崩溃后，随着大批印度企业家在美国的硅谷发财后回国创立新的公司，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开始变暖。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与印度展开了更多的军事合作，以此向中国发出它已被包围的信号，这时美印关系更热了。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的指导下，塔利班控制了1989年苏军撤出后被美国丢弃和忘记的阿富汗。当塔利班把妇女罩在面纱之下，使她们离开工作、学校、甚至医院，向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设施和帮助，并把一个地地道道中世纪式的政权强加在阿富汗人民头上时，美国一直保持沉默，直到“9·11”事件发生。

突然间，我们又需要巴基斯坦了。由于穆沙拉夫总统保

证，在反恐战争中他是“与”美国站在一起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又开始流人巴基斯坦。实际上，穆沙拉夫敢这样保证，足见其大胆。他自己的军队及秘密特工部队里就深深地埋藏着伊斯兰激进分子及塔利班的支持者，而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特别是毗邻阿富汗那几个省份，均倾向于支持奥萨马。考虑到穆沙拉夫政权又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暗杀或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过去存在，现在也仍然存在。然而，如果说穆沙拉夫是胆大，那么也可以说他是狡猾。当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支持者抓住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拍尔并将其杀害时，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部队掌握并且很有可能参与了杀害活动。2002年2月穆沙拉夫造访华盛顿时，他几乎肯定知道此事。可是，他告诉美国公众说，他相信丹尼还活着。为了自己能活下来，也许他不得不这么说。不管怎样，当今的形势是，尽管穆沙拉夫在美国的支持下仍然当着总统，但他并没有控制他自己国家的西部省份或所谓的部落地区，而且他似乎也无法控制他的一些继续支持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的内务部队。这一活动很容易导致与印度的战争，但是美国告诫印度要冷静处理，因为华盛顿需要穆沙拉夫支持它在阿富汗的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在伊拉克和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正在使巴基斯坦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现已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正如巴基斯坦一位重要的出版商对我所说的那样，类似塔利班的集团极有可能杀掉穆沙拉夫并夺取巴基斯坦及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如果你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 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的形态虽然还未定型，但却越来越令人不安。这一新秩序并不完全是美国反对整个世界，就像我那位马来西亚朋友所预见的那样。但是，美国与它在韩国、欧洲、日本、东南亚以及拉美那些老朋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上升至危险的程度。与俄罗斯、印度及中国这些老对手的关系实际上倒有所改善，不过仍然存在不可预知性。的确，整个世界秩序已变得不可预测和不稳定了。我们需要们心自问，那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本意？

# 第十章

# 山巅之城

夜晚无须星月的光亮，

白天不用灿烂的阳光；

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

千秋万代永远放光芒。

——《圣城颂》（威索利与亚当斯作）

在我开始写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美军会同部分英军，也许还有“志愿者联盟”其它成员国的武装部队象征性出的一些兵，似乎大有可能在本书出版时占领伊拉克。到了这种地步，占领伊拉克或许比听任萨达姆公然蔑视和嘲弄联合国安理会并继续残暴地对待伊拉克普通民众要好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是在采用下下之策去做一件在理的事，结果搞得自己面前只有糟糕的选择，造成一种“双输”的局面。因为无论我们是很快进攻，还是因萨达姆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而推迟进攻，或者根本就不进攻，我们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即便占领结束，伊拉克在今后五年内成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出现这种局面非常可能），这种损害带来的影响也将是久远的。如果

把伊拉克和北朝鲜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两个孤立的问题来看，那就更是如此。

首先，华盛顿在千方百计对迄今为止仍是无核国家的伊拉克动武的同时，有意降低北朝鲜的威胁和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这样，华盛顿就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不讨美国人的喜欢，那就最好发展核武器，而且要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曲解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及我国国力的基础，我们已经对国家造成了损害。例如，欧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已经成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消除了欧洲国家间由来已久的敌意，平息了欧洲民族间的战火，它创造并播撒了财富，成了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伙伴；它确保了民主、和平以及稳定在整个欧洲乃至亚洲部分地区的传播。过去，美国因欧盟对自己大为有利而积极促进其发展。如今，这块巨宝因为在如何处理伊拉克危机上内部出现分歧而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的政策使得这些分歧愈加严重。此外，美国的政策也损害了美国与欧盟以及大部分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些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虽然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反对美国的政策，但是英国领导层支持美国。不过，也不要被“老欧洲一新欧洲”的论调所蒙骗。“新欧洲”既不会派遣一兵一卒，也不会负担任何费用。由于“新欧洲”跟华盛顿亦步亦趋并已与“老欧洲”分道扬镳，它很可能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发展前途。

我们再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例。美国人习惯上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欧洲驻军看作是美国人施给欧洲人的某种恩惠。可是，事实上，由于苏联已不存在，欧洲已不再面临任何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利用北约的基地，又得不到北约的合作，它便无法向中东和非洲投送力量。实际上，我

们比欧洲人更需要北约。其实欧洲早就有人谈论终止或限制美国人使用北约基地和空域的可能性问题了。在不久的将来，沙特阿拉伯将要求我们撤出基地，这一点已经很清楚。韩国可能也会提出同样要求，之后也许还有日本。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似乎正在侵蚀那些单边主义的鼓吹者们试图扩大的霸业根基。

## 早该变为现实的梦想

事情本来可以不必这样处理的，现在也不必非这样处理不可。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别种选择。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对停火提出严格的条件，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实，当时的伊拉克军队已全线溃退，而多国部队竟然在这个时候不打了，反而要求伊军指挥官准备停火。在没有接到什么指示的情况下，多国部队统帅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于 1991年 3月 3日与伊军将领会晤，商定了停火条件。联军没有要求萨达姆或者萨达姆的任何代表签署任何投降书，也没有提出诸如要求伊拉克解除武装，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保护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联军曾经鼓动他们发动起义，反对萨达姆政权）等条件。萨达姆等于就此逃过了一劫。施瓦茨科普夫当时的确要求过伊拉克的固定翼飞机不得在美军附近飞行，但是对直升飞机却没有明文限制。因此，当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在联军的鼓动下发动起义时，萨达姆派遣直升机对他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华盛顿后来把这种结局归咎于需要照顾沙特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恐惧心理。但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和沙特高级官员对我说，事实上，

沙特人是想帮什叶派穆斯林的。不管怎么说，美国最终还是在伊拉克南部设立了禁飞区，但对于挽救什叶派穆斯林则是晚之又晚矣。后来，联合国于4月份颁布了687号决议，令萨达姆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外长虽回函表示接受这一指令，但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机已经错过，这时只不过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

假如美国与其盟国（当时还的确是盟国）在停火时即对伊拉克提出解除武装的条件，要求萨达姆签署一份附有实际条件和执行办法的正式文件，我们早就可以做现在声言要做的事情了，世界舆论也会全力支持我们。当时在该地区的美国高级专家曾对我说，如果联军提出这种要求，萨达姆肯定倒台。可是，我们却放纵萨达姆，让他把军事上的惨败变成了政治上的大捷。当时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如今仍在现政府任职，其中包括切尼、鲍威尔、沃尔福威茨、法伊特和哈斯。如今，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国会和联合国当时只让他们把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而向巴格达推进很可能会导致联军四分五裂。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回避了一点，那就是，根本不存在向巴格达推进的必要，有必要的只是强迫伊拉克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大家兴许还记得，我们曾为这帮领导人大摆过庆功宴；在曼哈顿为他们举行过抛投彩带的欢迎式；因为他们举目共睹地战胜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还在国会为他们举行过授勋表彰仪式。其实当初我们应该用一片啼嘘之声迎接他们的，因为他们把事情办砸了，而且是糟糕透顶。

他们原本可以缴获却没缴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事情办砸了；他们任凭萨达姆用直升机镇压他们鼓动起来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所在地区的反叛起义，把事情又办砸

了；他们对战后缺乏规划，对伊拉克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说句公道话，他们听从那些担心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的盟友的话，结果再次把事情办砸了。当时他们就知道萨达姆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气弹，也晓得萨达姆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肯定希望，也许甚至相信，他手下的军官有朝一日会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他们也准备接受萨达姆留存下来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萨达姆已经战败，今后不会再构成威胁了。

不过，还是暂且不谈这些吧。当时这一切对许多人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假如美国批准了与美国最初的提议非常接近的京都议定书；假如美国成了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的缔约国，或者至少在与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作对方面有所收敛；假如我们签署了禁止地雷的条约，禁止轻武器贸易的条约，没有抽去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主要内容，支持了防止灭绝种族公约和有关妇女地位的公约等；假如美国一直带头重新定义和改造北约，重新定义美国与欧盟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它已经过时的冷战时期的机构的关系；假如我们没说“自由本身遭到了不敢露面的儒夫的攻击”，也没有说“他们憎恨我们的价值观和各种自由，”而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遭到了宗教狂热分子”的攻击（这些人曲解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政策，正如当年十字军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一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企图洗雪那些编造出来的冤屈。这些冤屈跟他们自身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关，而我们曾承诺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假如我们落实了阿卜杜拉王储提出的和平计划，而不是去称阿里埃勒·沙龙为“爱好和平的人”（在以色列都不会有人这样称呼他，更不用说在阿拉伯国家了）；假如美国总统在“9·11”事件之后没有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而是利用世人对美国的极大同情，飞赴巴黎、柏林、

莫斯科、北京、开罗、德黑兰、汉城、东京和伊斯兰堡道一声“谢谢”。假如布什把世界各国领导人召集起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收集一下各国对付恐怖分子的情况和堵住恐怖主义源头的建议；假如美国没有公布它那旨在防止任何对美国霸主地位形成挑战的势力抬头的先发制人战争的新战略。以上这些“假如”如果成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再譬如，假如美国把伊拉克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并为此展开真正的辩论，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举足轻重而挑战安理会，那么，国际社会是否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呢？即便反对的势力依然庞大，但会不会有人更加真诚地支持美国的立场呢？即便最终美国要单独采取行动，会不会冒较少的风险呢？因为这样一来，美国的做法就会被认为是一次例外的单边主义行动，而不会被认为是一连串单边行动中的最近的一次？我相信，如果我们被看作是良好的国际成员而不是无赖国家名单上的候选国，我们现在会面临好得多的选择。

朝鲜的形势又会怎样呢？假如我们没有严厉斥责韩国总统金大中，而是把他请到华盛顿来，就如何对付北朝鲜向他征求意见；假如我们没有称北朝鲜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而是一直保持与北朝鲜金正日主席的接触，向他保证美国一定会将答应给他，而他也迫切需要的发电设备送到；假如我们主动提出通过谈判签署和平条约，最终结束朝鲜战争，像我们所承诺的那样主动在外交上承认北朝鲜，而且没有为了防御“像北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而极端重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情况；我们何须处理朝鲜危机？政府何须令人可笑地使劲解释，为什么朝鲜虽然拥有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而且还在生产，但是却比不上萨达姆的威胁大。还有，如果我们没有宣布打预防性战争的战略，北朝鲜还会如此明显地惧怕我们吗？我想答案是否

定的。如今事情发展到面前尽是糟糕的选择这种地步，我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 * *

除了时下的各种危机之外，目前争论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我们先说战略问题。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奉行的是两种相互依存的战略—遏制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它的盟国达成的默契是：盟国不仅可以获得美国的投资，而且可以进入美国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接受一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结成的伙伴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为长，但也并不总是头号伙伴。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势力并没有扰乱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用一套广为理解和接受的共同规则把自身约束住了。”换句话说，其它国家之所以把自身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等同起来，是因为美国“使自己的势力无法造成损害”。本杰明·施瓦茨和克里斯托弗·莱恩在2002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共同撰文，将此称之为“再保险战略”。文内描述了外国对美国的疏远感、恐惧感和背叛感，指出造成这种感觉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势力增长的幅度相对过大。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得非常恰如其分。他说，“我热爱这个国家〔美国〕……与许多欧洲人的想法恰恰相反，美国势力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美国’的，而纯粹在于‘势力’太大，即便是大天使下凡，握有这么大的势力也是件危险的事……即便是民主存在于超级势

力之内，也会滋生各种诱惑。”加顿·阿什过去虽然从来未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间的分歧发表过评论，但他这番话也许是对的。我认为，这番话值得引起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在美国的战略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讲出来的。这种转变使得美国势力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办法造成损害”了。

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 2002年 9月写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俱，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

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

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①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地将自己列为“保守”性出版物，号召美国“肩负起白人的责任②”。《华尔街日报》先前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坚帝国之理由》一文中称，" 9 . 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经由戴着遮阳帽，穿着马裤，信心十足的英国人实行过的文明统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帝国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得……无法抗拒，”并敦促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把自己的公共机构移植到那些无秩序的

---

①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

②白人的责任：即所谓“白人应将其文明带给落后民族”的责任，语出吉卜林的诗作。—译者注

国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后，它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号召“在美利坚帝国软力的影响下，把繁荣带给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国度。”

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很有诱惑力。首先，新的非对称威胁已经出现，而旧的威慑力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抵御这些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世俗的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来说，美国人管理下的有序状况和经济发展，似乎显然比动荡不安更可取。尽管那些支持该观点的凡夫俗子们会否认，但是这跟麦金利总统当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决定将菲律宾纳人美利坚帝国时，他谈到有必要“提升他们并使他们基督教化”。绝大部分新帝国主义者都不愿意跟“基督教化”沾边，而代之于“美国化”，避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新的战略原则的根本点是主张无限扩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潜在威胁的数量极大。试图控制住像伊拉克这样的威胁，可能只会使我们面临新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阿富汗已经看到了。为了对付新的威胁，可能就会有必要去控制新的领土和新的实体。到头来，保障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每一块土地都变成自己国土的延伸。

这似乎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支帝国势力的崛起，都会使其它大国自动结盟与合作。结果，该帝国又会为对付这种新的联盟而加倍努力进行扩张。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它扩张过度而最终灭亡为止。另外，新帝国主义者还相信，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贪图领土得失，它的统治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善为被统治国着想，是一种软力，甚至颇具魅力。任何抗衡的行动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不喜欢美国的方式。如果有可能，谁不

愿成为美国人呢？因此，应该把美国的男女编成一支远征军，将他们派往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播撒世人如饥似渴地寻觅的美国信条。

但是，这种办法行不通。个中原因，让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首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军事安全。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核导弹,侦察卫星照片,能保护美国免受“9 . 11”用小刀劫机的人和自杀性狂热了吗？我们高度发展的军事能力吓得北朝鲜人屈服了吗？我们在海外到处修建军事基地减少了我们面临的危险了吗？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军事基地的扩散说不定还会增加我们面临的危险。

其次，即便我们美国人确实很好，但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未必同样这么认为，即便他们喜欢我们，也未必想跟我们一模一样，况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与我们的势力抗衡了。这一点从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中看得最为明显。不过，在其它方面表现得也很清楚，例如，欧盟努力寻求跟美国更加平起平坐，俄罗斯和中国恢复关系，许多国家积极倡导用莱纳克斯而不是用微软的视窗作为计算机的主要操作系统。这里面有一种人的因素在起根本性作用，美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当头一个表示理解才对。国家与个人其实非常相象，与其说是受获得物质的欲望、恐惧和爱的驱使，不如说是受获得尊严与尊重的渴望以及被认可的需要在驱使，都极想被看得与旁人或旁的国家同样可取，同样重要。有人曾问过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穆克，是什么让伊斯坦布尔的老人宽恕袭击世贸大楼的行为？又是什么让巴基斯坦的青年仰慕塔利班的？他回答说，“是因落魄僚倒而生的无能为力感，是不被人理解，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

能力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也许喜欢，甚至羡慕美国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们的确如此。），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得到尊重。

全球化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法国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就不再当法国人了，或者转而抛弃笛卡尔。年轻的印尼妇女会离开传统的村庄，到奈克运动鞋厂去打工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这种经历可能会使她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注意戴穆斯林妇女那种头巾，甚至不戴了的还会重新戴起来，以此来坚守她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去扑灭这种火焰，也不应该试图去这样做。

第三，发动美国人进行十字军式的远征行不通，是因为它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人各种各样的便利联盟和残忍的行动，这样不单会败坏我们的品德，腐化我们的机构，从长远看，也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

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人的极度浪费，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我们想控制的国家，而且依赖的程度比我们觉察到的要大。有人指控我们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入侵伊拉克，这种指控在美国人听来虽然纯属虚妄，但国外相信它的却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则正是因为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人经济上有几根软肋，所以才把美国搞军事威胁的意图作此理解：美国人想让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安全港，然后通过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来实现保持“布巴”的生活方式不变的目标。美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它的增长绝大部分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消费则是靠数额不断增加的借款来刺激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于生产水平了，而我们只有从国外借款才能保持

现有的状态。我们为世界的安全提供保障，又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提供国。正是靠了这种地位，我们的美元才得以坚挺，我们才得以享受一种高于我们实际所得应达水准的生活。但是，欧元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储备货币了，而我们的国际债务需求量已经大到了让债主们日益胆寒的程度。如果我们整天摇晃着马口铁杯子，怎么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呢？当然，除非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但这也正是搞十字军式远征行不通的最后一个原因。美国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英国人。美国也许时不时地会干些傻事，甚至于坏事。但是，美国人民既不会把运尸袋看成是光荣与英勇的象征，也不会热切地希望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或女儿送到殖民军中去服务。由于我们本身是在反叛帝国中诞生的，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帝国主义那一套安之若素过，也根本不善于搞帝国主义。原因之一是，我们太想让别人喜欢我们了。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乔治·W·布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事实上，他竞选时开头说的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谦逊的国家，别人会看到并予以尊重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回到真正保守主义的道路上来。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提出的帝国规划，根本称不上是保守主义，只不过是用富于煽动性的传统爱国主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激进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罢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保守主义的精位是有限政府，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者也常常宣传。可是，他们所提出的帝国规划将大大增加政府在国内外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机器，把国土安全部变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机构的同时，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联邦

政府的开支。这绝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大政府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小 l翼翼地平衡预算，坚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履行公民义务。但是，新的帝国主义者们却一边要求减税，一边增加开支。今后再不会有什么征兵和牺牲了，总统惟一要首肯的公民义务就是敦促大家都去购物，助美国经济一臂之力。

这既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 ·伯克几个世纪前谈到英帝国的势力时讲过的一句话吧。他说，“ 我生怕我们遭到许多人的讨厌。 ” 势力会招来诸多威胁，、对威胁所作的反应又会促使种种基金的规划出台。温思罗普总督认为，“ 山籁之城 ” 不是因为势力强大，而是因为道德高尚才富有吸引力的。约翰 ·昆西 ·亚当斯总统曾经嘱咐说，我们 “ 不要到国外去找妖怪杀。 ” 这些人都是优秀的保守主义先导，我们在确定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时，应当多多参照他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不要太把对美国的批评当回事儿，因为当老大的遭人嫉妒和埋怨是常有的事。想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要我们持无动于衷态度的训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想和罗马与英国一样行事？我们常常说，美国必须当领袖，美国是 “ 不可缺少的国家 ”。可是一位墨西哥朋友却这样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美国必须什么都管？有谁给美国下过委任状吗？ ’ ’ 当然，这种局面不是一天所造成的，但他这番话倒提醒了我们，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可以不让美国放弃它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甚深，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撒手而去。我们得记住，尽管美国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从皮尤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它仍被看作是一个相对无害的霸权国。不过，从各个方面

来看，如果美国能成为人们最后而不是首轮求助对象，那将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下面是对这种战略可能包含的内容所作的一些思考。

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美国以及它能拉来的无论什么伙伴只能将萨达姆推翻并占领伊拉克了。如今若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这样做付出的还要大。但是，我们应竭尽全力避免美国长期占领伊拉克。我们可以重新确立联合国的重要地位，要求联合国组建一个由马来西亚、约旦、瑞士、加拿大之类的国家及其它一些国家构成的联合机构，在这个机构的监督指导下创建一个新的伊拉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占领国，对医治最近的创伤起到帮助作用。美国可以是一个主要参与国，也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但它决不可以单干或者是执掌帅印。

联合国本身的未来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联合国的确有缺陷，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谈到民主时所讲的那样，“它还不是最最糟糕的东西”，所以它依然存在。我们非但不能废弃它，相反还应当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设计它。应当将印度、巴西，也许还有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增设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则应该由欧盟一家取而代之。在挑选轮流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的问题上，日后必须规定相应的条件。另外，否决权的使用范围也必须重新加以审核。目前看来，这些想法似乎有点理想化，但从长远来看，一个能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联合国只会扩大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在伊拉克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和继续努力打破巴以僵局结合起来，其中应包括将以下要求作为对以色列援助的条件，即：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冻结一切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关闭除了戴维营和塔巴谈判暂时认可之外的所有定居点。

在塔巴未达成协议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在西岸和加沙地区部署北约的部队担任守卫来实施。任何协议均不应以结束所有暴力活动为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只会促使双方的激进分子动用否决权。

至于北朝鲜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项协议既要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使它不会受到外来攻击，又要确保它有足够的电力和食品；要签订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朝鲜；要支持韩国在发展与北朝鲜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努力。比起外部威胁来，内部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改变金正日政权。当然，作为对所有这些的回报，北朝鲜必须停止其核计划并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

人们一直用“成年人监督”一词来形容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有些观察家（如卡根）认为，由于欧洲和日本把应付现实世界的负担甩给了美国，因此它们可以生活在人造天堂里，沉须于作作毫无意义的姿态，自私自利地打打自己的小算盘。此话并非空穴来风，污蔑欧洲人和日本人不知感恩图报，不愿意做一些为保护自己该做的事情时，人们就会这么说。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却不曾有人说，美国人更愿意欧洲和日本的青春期更长一点，这样它就有理由继续支配它们了。不幸的是，我们正为这种支配权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我们之外的发达国家和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憎恨美国人的监督，而且反叛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美国为保护它们的石油运输线和防备它们的周围地区所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们真正长大成人，或者用小泽的话来说成为“正常国家”呢？与其去反对建立一支独立的欧洲防务

力量，为什么不欢迎并促进其发展呢？我们应该放松对军事技术流人和流出欧洲的限制；向欧洲和日本敞开五角大楼的采购大门，让它们真正参与进来；并鼓励加强跨国的国防工业。当然，在将来再遇到类似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问题时，欧盟必须同意完全承担起维护自己周围地区秩序的责任。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对北约进行改组的问题，以便应对更多的全球事务。为什么不让北约负责石油运输线和波斯湾的巡逻呢？我们可以参与其中，但决不可独自包揽。我们甚至可以租给欧洲人几支航母特混部队。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宣布今后在欧洲防务及政策问题上只和欧洲当局打交道，这样我们就可以促进欧盟制定真正的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了，还可以断绝法国人那种带有怀旧情绪的想要恢复列强地位的念头，而且单一的欧盟可能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欧盟朝思暮想地想拥有一支真正的力量。不过，在它拥有这样一支力量的同时，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远东地区，一旦北朝鲜的局势得到控制，如果韩国人有美军留驻的要求，美国应该把驻韩美军兵力减至象征性水平；如果韩国人没有这种要求，干脆把美军全部撤走。在任何时候，韩国军队均应由韩国人指挥，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也必须修改，以确保韩国的法制得到完全尊重。对待日本同样也应如此。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事实已经证明它不能阻止北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制造麻烦，反倒促使中国加强了军力，对我们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停止部署该系统，替自己省下一大笔钱。对日本也应该像对待欧洲一样，坚持要它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国家。这就要首先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结束冷战状态，从而结束由于美国单方面保障日本安全而造成的梦幻世界。新的协议在责任和决策权两方面都应当

体现双向性。我们应当鼓励日本成立一个正式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就日本对二战的原因、责任和后果等问题的认识发表一项权威性的声明，彻底了结二战。该声明不仅可以作为编写各类教科书和发表各种评论的依据，亦可以消除因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各种纷争。此外，我们还应当鼓励日本也这样做，该向谁道歉就向谁彻底道歉，该向谁赔偿（比如说，向仍然健在的“慰安妇”—二战期间朝鲜和其它国家被迫给日军充当随军妓女的妇女），就足额赔偿。

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起草的，这很不正常，也导致了日本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常发生不正当扭曲。美国应鼓励日本重新考虑宪法问题。如同在韩国一样，驻日美军的规模也应该大幅度降低。我们应当把冲绳岛真正归还给日本。至于在西太平洋海域巡逻一事，美国可以提议组成一支区域性特混舰队，将该地区大国的力量，包括中国的在内，都吸收进来。

美国应该表明它反对台湾宣布独立，万一台湾宣布独立，它也不担任防守台湾的任务。它也应当向中国大陆表明，如果大陆方面在台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对台发动进攻，它一定会进行干预。但它同时也应当自我克制，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也不要再与台湾搞联合军事活动。我们应该进一步鼓励台湾与北京会谈，以求在内部达成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在其它方面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给予中国它所渴望得到的承认和尊重。例如，由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将俄罗斯包括在内，如今成了八国集团。该集团的各国首脑定期举行峰会，制定全球经济战略。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俄罗斯，它的国际货币储备量也令俄罗斯相形见细。那么，为什么不把中国吸收进来呢？实际上，何不把中国和印度都吸收进来，让这个组织变成十国集团呢？

美国应该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条约，同时应仔细检讨一下在前文讨论过的其它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可能的话，朝着签署这些条约做出认真的努力。我们还应该向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交纳我们作为成员国应该交纳的会费。此举必须跟努力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和减少能源使用量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其它工业国家已经在实行的许多措施。布什政府提议追加十亿多美元用于资助氢能的研究，这倒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既然我们能提出拿300亿美元支付土耳其的基地使用费，似乎也可以考虑用同样数目的钱来保证美国不必去依赖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使用战争手段的能源供应国。有关非传统能的曼哈顿计划早就该上马了。

美国在国防上的开支，要比排在美国后面的十五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种力量集中现象的存在，很可能会给别的国家造成压力，促使它们也相应地增加军费开支。在我们逐渐把负担转移给别国时，我们也应该制订一个逐渐减少国防开支的计划。应我们的要求，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要把它的国防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或许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目标，将我们的国防开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减少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肠—2.5%。节省下来的钱可转用于援助、疾病控制和支持其它国际努力，从而使我们的军费退回到1948年的比例上去。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也l待检讨。一两个会议主席大权在握，尽管得不到相当数量的公众支持，却照样可以决定美国的对外政策，这样的程序真是祸患无穷。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何时进入战争状态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有决定权，这个问题也亟待澄清。国会的参与度似乎越来越小了，但美国是不应

当由恺撒式的人物来统治的。要做到所有这一切，将意味着大大减少美国出头露面的次数和各种开支，却可以改善美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精力去关注下面两个潜在的危机了。这两个危机目前虽然尚未露出端倪，但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处理。否则，它们会使得 20世纪的一切暴力冲突看上去像小儿科一样不足挂齿。

第一个危机是全球化。尽管“金紧身衣”被吹得神乎其神，但它显然并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发挥出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作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把认为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发展依然落后。保守的政府应该是反对补贴的。因此，我们应该停止向美国的棉农提供补贴，让他们去具备将西非棉农挤出该行业的能力。中国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需要仔细加以分析，需要制定出可行的政策，确保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很显然，仅仅开放市场，然后就坐等自由贸易来解决各种问题，这种作法往往是死路一条。我们需要认真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投人和主要发展领域的调节需求。如果经济发展搞不好，世界各地的所有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防御系统都保护不了我们，尤其是因为全球化虽然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却能让大家看到别的国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不过，在我们为全球化的畅行无阻而努力奋斗的同时，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也急需处理。布什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要设立一个耗资 150亿美元的项目，以便与非洲的艾滋病作斗争。此话令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这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仅仅是一步而已。非洲有些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已高达 40%以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死亡人数每年已逾 200万，所以艾滋病的肆虐情况引起了一定

程度的关注。但是，更令人深感不祥的消息却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是否有人知道西非几乎每个人都患上了某种疟疾？又有谁知道肺结核在世界许多地区大肆传播，染上肺结核的人数要比染上艾滋病的人数还要多呢？

至于水资源短缺、滥伐森林、耕地沙漠化、土地贫瘠化以及人口过剩等问题，我们又处理得如何呢？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哪位委员在考虑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可能会因为水的问题而爆发战争吗？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很快就要控制源自其山脉流向南面国家的大部分水流量了。据大坝管理人员称，土耳其可以长达八个月不让水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到 2025 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可是，又有谁在追踪研究这一情况呢？看看巴基斯坦吧，那里有些种族集团越来越受塔利班分子之类的人影响，它还拥有核弹和投放核弹的弹道导弹，已经成了地球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要靠集中灌溉，但由于大片森林被砍伐和人口增长过快，继续搞集中灌溉已经越来越困难。巴基斯坦的水源主要依靠印度河，印度也是一样，它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而且规模比巴基斯坦的还要大。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已经准备动用核武器了。如果有一天印度河水干涸了，这两个国家又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滥伐森林已经使塞拉利昂主要热带雨林的夜盖面积从原先的 60%减少到了 600。同时，中国的滥伐森林也已导致了洪水频频泛滥，表层土壤遭到侵蚀和水井干枯。结果，人均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由于人们都想离开内地到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去，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华盛顿，有谁在考虑如何帮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吗？看一下我们的预算，答案就再清楚不过了。从预算上看，五角大楼的经费增

加了500多亿美元，而用于援助和发展项目的拨款却继续半死不活地维持在160.8亿美元。

我知道我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有点离奇。但有时候，小点其实更好，而少点反而会更多。我们可以让别人对我们的势力感到放心；甚至可以减少我们的相对实力；可以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别人，维护他们的尊严；可以跟别人相互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如果采取了这种策略，一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积极的结果。它可以让美国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使美国成为多个目标中的一个，而不是惟一的一个；它可以让别人承担的责任与我们的更为相似，使他们不能不理解我们的视角；它可以给予别人更多的平等机会，减少他们的嫉妒和怨恨；由于我们不再控制或支付一切，花费将会少得多；它还意味着共享某种权力，不过独立宣言讲的是自由和追求幸福，不是追求权力，宪法讲的则是控制和限制权利。美国原本就不是为帝国而生的。

如果我们打算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策略，减少我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好，那就是信条问题。我们确实是一个受到命运恩宠，满怀善意的民族。我们拥有令人羡慕的民主制度，但它并不是惟一可行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总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很成功，但别人的也很成功，我们的经济并非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我们拥有一套很好的令许多人羡慕的司法制度，但别人也有，而我们的司法制度也并不总是最佳的。

我是经过大量的阅读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才终于有了这一认识的。我过去一直想相信美国是最纯洁的，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此，我可以想象读者您或许眼下无法接受这里谈及的某些想法。但是，美国要想实现我认为是她最终最真实的自我，惟一的办法就是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真理将使她获得自

由，使她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例外论。"9 . 11'事件带来的部分震撼是"坏事只会落到别人头上"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这个震撼让我们与世界混成了一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宿命论，但是在全球化的年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么一点：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我尤其想提醒基督徒同胞们记住奥利佛·克伦威尔讲过的一句话。他在致苏格兰教会的一封信中说，"我以基督的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作为长老会的一名年长的教徒，我想强调一点，基督不是搞国家和权利的，他也不用武力传播福音。当有人问及税收问题时，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上帝拯救人的灵魂是一个一个拯救的。拯救美国教会的办法是政教分离。欧洲的教会曾经紧紧地抱住政务不放，结果衰亡了。在美国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避免而不是欣然接受政教关系过于紧密的状况。那些在竞选运动中拿上帝当靠山的政客们应当牢牢记住："上帝是蒙骗不了的。"美国要看重宽容而不是强权，要强调公开质疑的传统而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请求上帝保佑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美国人自己。这样一个美国才会成为世界极想看到的美国。当然它也会成为别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看到方济各，圣①的故乡意大利小城阿西西时的情景。我在夕阳马上就要落山时拐雄一个弯道，它赫然出现在那里，在山巅上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

①方济各，圣(Francis If Assisi, Saint, 1181/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意大利主保圣人。天主教会中相传方济各身上带有耶稣受刑所留的五处伤痕。1228年中，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追谥方济各为圣徒。—译者注